


黄家驛 著

驻蒙外交官二十年工作实录

五进蒙古

 布赫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


D829.311

1

驻蒙外交官二十年工作实录

五进蒙古

黄家驊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进蒙古:驻蒙外交官二十年工作实录/黄家骅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 11

ISBN 978 - 7 - 81115 - 547 - 1

I. 五… II. 黄… III. 中外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史料 - 蒙古 - 现代
IV. D829. 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1055 号

书 名	五进蒙古——驻蒙外交官二十年工作实录
著 者	黄家骅
责任编辑	赵 英 邓池君
封面设计	张燕红
出 版	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235 号(010021)
发 行	内 蒙 古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内 蒙 古 爱 信 达 教 育 印 务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开 本	787 × 960/16
插 页	20
印 张	16
字 数	260 千
版 期	2008 年 11 月 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 第 1 次 印 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15 - 547 - 1
定 价	4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五进蒙古

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代序)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黄家骅同志写的自传体回忆录——《五进蒙古——驻蒙外交官二十年工作实录》向我们展现了蒙古国和蒙古草原的美好景色和绚丽风光。

回忆录叙述了一名外交战士自觉地执行我国外交政策，维护祖国尊严，为发展中蒙睦邻友好关系、增进两国人民友谊而努力工作的情景；详细地介绍了作者在党的教育下的成长过程、五次到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以及参与我国三位国家元首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主席访问蒙古的接待工作等经历，其中既有一个外交战士心路历程的描写，也有不少鲜为人知的中蒙关系重要事件的珍贵资料。此书写得实实在在，言之有物，娓娓道来，读来使人感到亲切可信。

黄家骅同志从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学习蒙古语开始，就与蒙古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65年他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是我亲密的同事和战友。我们俩人一直在外交部和驻蒙古大使馆共事，相知甚深。他服从组织调遣，先后五次到驻蒙古使馆工作，从普通科员一直干到特命全权大使。他二十年如一日，在一个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国家工作，体现了一名外交战士可贵的奉献精神和较高的素质。

黄家骅大使离任前，蒙古国总统巴嘎班迪向其授予了“北极星”勋章。这一方面表明蒙方重视发展中蒙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蒙古政府对他多年在蒙工作的评价与肯定。我想，黄大使在自己的岗位上之所以取得出色的成绩，一方面是适逢中蒙关系的最好时期；另一方面也是他个人不懈努力的结果。

总之，这是一本有特色、可读性强的好书。我以为，值得外事工作人员，特别是立志从事外交工作的年轻同志一读，从中可以汲取必要的精神营养。



在《五进蒙古——驻蒙外交官二十年工作实录》一书即将出版之际，衷心祝愿中蒙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祝愿中蒙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

中蒙友协副会长、前驻蒙古国大使

张德麟

2007年11月16日于北京



目 录 ◆

第一章 最高奖赏	1
一次“特殊”的外交活动	1
蒙古国家宫	1
授勋仪式	2
第二章 儿时回忆	5
老家佛山	5
黄家大宅	6
家中的“老疙瘩”	7
我的兄弟姐妹	8
念“门牌”	9
小伙伴	10
二小、三中和一中	11
多彩的梦	12
第三章 北上求学	14
向往首都	14
命运的转折	15
同蒙古语亲密接触	18
在锡林郭勒大草原	19
一次“出洋相”的翻译	21



第四章 外交战士	23
入外交部	23
在翻译“仓库”里	24
“四清”工作队员	25
翻译“红宝书”	25
在农药厂当工人	27
第五章 初进蒙古	29
乘“小列”赴乌兰巴托	29
离开国境	30
大使馆馆员	31
当头一棒	33
第一份工作	34
耐得住寂寞	35
“和尚庙”的生活	35
掏锅炉和造冷库	37
扫雪、植树和迎送战友	38
初次上阵	40
第六章 边界联检	42
边界沿革	42
寸土不让	43
“准测绘专家”	45
谈判期间小儿子呱呱落地	45
欢声笑语和摔跤比赛	46
第七章 二进蒙古	48
大使翻译	48
关于苏联从蒙古撤军的交涉	49

17	一幅地图引起的麻烦	50
18	解冻从文化学术部门开始	51
18	忠孝不能两全	52
23	十年磨砺	53
28
28	第八章 外交译员	55
30	翻译是交流的“桥梁”	55
32	前人的教训值得记取	56
32	给副外长当译员	57
33	副委员长访蒙	58
34	接待奥其尔巴特主席	59
34	再次给江总书记当翻译	61
37
37	第九章 三进蒙古	63
38	熟门熟路再“出山”	63
39	职务的变动	64
40	重签友好合作关系条约	65
43
43	第十章 四进蒙古	67
44	时刻听从党召唤	67
45	“后勤部长”	68
46	大使的助手	69
49
49	第十一章 出使蒙古	71
51	任命通知	71
51	赴蒙古履新	72
52	递交国书	73
53	到任拜会	75
54	出席人革党的宴请	78



	国庆 50 周年活动	79
	中蒙建交 50 周年	81
	活跃的蒙古外交	83
	近距离接触蒙古领导人	85
	抓好经贸这一环	88
第十二章	捍卫尊严	90
	就台在蒙设“代表处”进行交涉	90
	台北“主任”的喧嚣	92
	达赖 7 次窜访蒙古	93
	关于口蹄疫“从中国传入”的猜测	95
第十三章	增信释疑	97
	所谓“中国威胁论”	97
	交媒体朋友	98
	把青年学生请到使馆来	100
	“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提法的由来	101
第十四章	友好邻邦	104
	半个世纪的中蒙关系	104
	中国人民的“礼物”	107
	友谊的纽带	108
	两国“国门”	109
	内蒙古和“外蒙古”	113
	“桑斯尔”和《索伦嘎》	115
第十五章	接待元首	118
	邻居需要互访	118
	慈祥的老人	118



五 井 蒙 古

	当主席联络员	120
	全程陪同胡锦涛主席访蒙	123
第十六章	祖国亲人	127
	一次严格的“中考”	127
	“中国政协是什么团体?”	129
	何副委员长来到蒙古草原	130
	三任外长做客蒙古	132
	和著名作家谈天	135
	“军民一家亲”	137
	老家来的“父母官”	140
	来自内蒙古的亲人	143
第十七章	蒙古风情	146
	蒙古人不是匈奴人或突厥人	146
	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	147
	热情好客的蒙古人	149
	绿地毯上镶嵌的白珍珠——蒙古包	150
	蒙古人离不开羊肉和奶食品	151
	“那达慕”大会	154
	蒙古民风点滴	157
第十八章	千里巡访	160
	寻找“蒙古海”	160
	“大蒙古国”遗址——哈拉和林	163
	“总统的摇篮”探秘	164
	走访林彪折戟沉沙的地方	167
	像是到了另一个国家	170
	重访达尔汗乌拉省	173



三访“铜城”	175
第十九章 蒙古友人	179
我的“珍贵财富”	179
职务最高的“赛乃兹”	180
友协主席额奈比希	181
“巴特”老友	183
“金刚石”阿勒玛斯	186
测绘局长拉格查	188
蒙古的“赵忠祥”	189
“中国通”尼玛苏伦	191
学者外交官楚龙·达赖	192
蒙古“体育之父”玛格旺	194
同行“老普”	196
我们的朋友遍蒙古	197
第二十章 故地重游	199
一个创意的诞生	199
我的老前辈	200
回“娘家”	201
与媒体接触	203
难忘的相聚	205
高规格的接待	206
第二十一章 接受采访	208
频繁出镜的“明星”	208
《我想当演员》	209
《我对中蒙关系的前景充满信心》	211
《藏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在繁荣发展》	214

	《让我们携手共同发展》	217
	《蒙古是我常驻的唯一国家》	219
	《蒙古国在我心中留下难忘的记忆》	221
	《二十年》	226
第二十二章	再见蒙古	229
	接到调令	229
	辞行道别话友谊	230
	主持最后一次国庆招待会	235
	惜别依依	237
	再见,乌兰巴托! 再见,蒙古国!	239
后 记	242



五井蒙古

第一章 最高奖赏



一次“特殊”的外交活动

九月下旬的蒙古，往常已开始寒气袭人，预示着初冬将至。然而2003年9月22日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却是晴空万里，秋高气爽，温暖宜人。

中午时分，我特意穿上4年前到任递交国书时的“行头”：黑西服，白衬衫，红花领带，黑皮鞋。行前，我在大使馆前厅的清代古董大穿衣镜前再仔细地将自己审视一番，“检查”合格后，信步走出大使馆办公楼，坐上插着五星红旗的小轿车，前往蒙古国家宫，准备出席一次“特殊”的外交活动——授勋仪式。

陪同我出席授勋仪式的有我的同事——大使馆政务参赞王福康、武官陈林海大校、经济商务处参赞宋学军、办公室主任刘志杰二等秘书。

中国大使馆离国家宫很近，只需五分钟的路程。我乘坐的小轿车刚驶上友谊大街，拐了两个弯，便到达国家宫。



蒙古国家宫

蒙古国家宫，又称政府大厦，因为整座楼呈深灰色，人们称它为“灰宫”。



这座四层楼的灰色建筑建于20世纪40年代,由日本战俘建成。原为三层,60年代初加高了一层。整个建筑给人以庄严肃穆、神秘莫测之感。国家宫前面建有蒙古领导人苏赫巴托和乔巴山的陵墓。

苏赫巴托是蒙古党和国家的缔造者,又称“蒙古之父”、“蒙古的列宁”。他出身于贫苦的牧民家庭,19岁时参加“蒙古自治军”,曾在苏俄军队服役,退伍后在库伦(乌兰巴托的前身)印刷厂当排字工。在他的领导下创建了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义勇军。30岁时他被人毒害,英年早逝。

乔巴山元帅是苏赫巴托的战友,又称“蒙古的斯大林”,与苏赫巴托一起建立了蒙古党和军队,于1952年逝世。1956年以后,蒙古领导人曾两度掀起反对乔的“个人迷信”运动。

国家宫的南面是苏赫巴托广场,近年刚进行了一次大修,面貌焕然一新,更加雄伟壮观。广场中央矗立着苏赫巴托骑马的雕像。

国家宫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是蒙古议会和政府所在地,蒙古“三巨头”——总统、议长、总理办公的地方。蒙古国家大呼拉尔(即议会)例会及全国重要会议均在此举行。这里也是各国使节向蒙古国总统递交国书和蒙领导人向国内外人士授勋的场所。

2003年8月,蒙外交部向巴嘎班迪总统呈递报告,建议向即将离任回国的中国大使授勋。得到批准后,蒙外交部正式通知我馆。我馆将有关情况报告我国外交部,部答复可接受授勋。考虑到巴嘎班迪总统9月23日要出访欧洲,经商定,仪式定在9月22日举行。



授勋仪式

2003年9月22日中午。国家宫三楼礼仪厅。

我和大使馆陪同人员在国家礼仪局工作人员的引领下进入礼仪厅站立一旁等候。随后,总统办公厅主任巴特赫希格、总统外事顾问朝克特巴特尔、代外长巴特包勒德、外交部邻国局长恩赫图尔等陪同人员从里厅走出外厅,站在另一旁。

12 时正，总统新闻办主任哈龙女士引领巴嘎班迪总统走进礼仪厅。

仪式开始。哈龙宣读总统令：“为表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国特命全权大使黄家骅先生多年来为发展蒙中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所作出的贡献，特授予‘北极星’勋章。”宣读毕，我趋前几步，略斜对总统。总统将一枚金光闪闪的勋章别在我的胸前，同时将授勋证书颁发给我。

总统对我说：“祝贺你获得‘北极星’勋章。”我说：“感谢总统阁下和蒙古人民给予我这一殊荣。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而且是中国大使馆全体人员的光荣。”此时，礼仪厅内响起热烈的掌声。蒙古《世纪新闻报》、《蒙古新闻报》、《今日报》等主要报纸记者和我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纷纷按下快门拍下这一凝结着中蒙友谊的一幕。

“北极星”勋章是蒙古“苏赫巴托”、“劳动功勋红旗”勋章之后的三级勋章，主要用于奖励为蒙古国作出杰出贡献的国内外人士。50 年代时，仅有我第 2 任驻蒙大使何英同志被授予“苏赫巴托”勋章。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蒙古国内规定的更改，这两种勋章很少授予外国人。近年来，蒙古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对外交往更加频繁，改变了过去的授勋规定。此次时隔 40 余年，我作为第 12 任驻蒙大使有幸被授予此勋章，这是近年来中国使节接受的最高奖赏，表明蒙方对发展中蒙关系的重视，也是蒙古政府对我个人多年工作的评价与肯定。

授勋后，巴嘎班迪总统在内厅同我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说：“大使先生懂蒙语，长期在我国工作，熟悉我国情况和人民风俗习惯，在你的任期内为发展两国关系做了许多工作，我代表蒙古国家和政府给予高度评价。”总统在谈话中对当前两国关系达到的高水平表示满意。他希望我回国后继续为增进两国友好关系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新的贡献。我感谢总统阁下拨冗接见与授勋，并表示：我在蒙古国工作和生活了近 20 年，同蒙古国、蒙古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回国退休后，我一定会继续为中蒙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做力所能及的工作，献出绵薄之力，希望有机会再次来蒙古看看。

在我即将结束自己的外交生涯的时候，当荣誉、掌声向我纷至沓来的时候，我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从进入外交部起，我从事对蒙工作已近 40 年。作为中国驻蒙古国的使节，我牢记自己的使命，忠于祖国和人民，真诚地为中蒙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关系的发展、为蒙古的繁荣献出了自己的青春。我做的一点工作得到外交部领导的信任，也取得驻在国——蒙古国的肯定，这使我甚感欣慰。



我能成为一名外交战士、驻外大使，全靠党和人民的培养和哺育，全靠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所培育的外交部优良传统的熏陶和许许多多老同志的传帮带。

我在向外交部呈送的离任报告中这样写道：“自1973年以来，我在蒙古整整工作了20个年头，为促进中蒙关系，加强中蒙人民友谊与相互了解做了自己应做的工作，对此我无怨无悔。”

此刻，我想到我的故乡、我的童年与少年、大学生活以及五进蒙古国，一幕幕往事如电影般在我的脑海中萦回，一切都是那么令人难以忘怀。我愿用我的拙笔，搜索我人生的轨迹，向亲爱的读者袒露一名外交战士的赤诚之心……

第二章 儿时回忆

老家佛山

我的祖籍是广东省南海县上柏乡。相传南海于隋代就已建成南海郡,后将该郡所辖番禺县改置而成。据史学家称,南海建成至今已有 1400 多年历史,是广东著名的“鱼米之乡”。

据说,我们属黄贵宾家族,算起来我是第二十几代孙了。祖父辈早年从南海到佛山谋生,就在那里“落地生根”,我们也把自己称作佛山人。

佛山,全国四大名镇之一,与汉口、景德、朱仙齐名,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早在唐代和宋代就成为南方重镇。在四五千年前,有百越人在此渔耕和制陶。佛山位于广州市西南,离广州只有十几公里的路程。这里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是物产丰富的宜居之地。佛山以纺织、陶瓷驰名于天下,又称“广纱中心”和“南国陶都”。20 世纪 7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佛山取得长足进步。1992 年,佛山在全国百强县中排名第 4。到了 21 世纪,佛山市又把南海县包括在内,成为“大佛山”。

五千年的沧桑变迁和文化积淀,使佛山成为一部丰厚的“历史文化教科书”。这里有祖庙、梁园、孔庙、仁寿寺、石湾、南风古灶、西樵山等众多名胜古迹。这里也是人杰地灵之乡,明代太师梁储、状元伦文叙、近代资产阶级改良领袖康有为、修建铁路第一人詹天佑、革命烈士陈铁军等名人均出自于佛山。

石湾镇原为佛山市的一个镇,著名陶都,是佛山人的骄傲。这里除生产日用陶瓷制品外,盛产彩陶。彩陶艺术历史悠久,世代相传。艺人们精心制作各种人物、动物和山水作品,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佛山人家家家户户无不摆放着



各式各样的陶瓷工艺品,我家也不例外,有老虎、熊猫、雄鹰等鸟兽和各种人物雕像,我十分喜欢,爱不释手。

“谁不说俺家乡好”。谈起故乡,总会引起我浓浓的乡情。粤菜海鲜及佛山特有的食品“扎蹄”(一种酱猪蹄)、应记云吞面、佛山盲公饼;小镇街巷的清凉石板路;从小就熟悉的满街跑的老乡“磨较剪(即剪刀)”的吆喝声、挑担人卖芝麻糊、杏仁茶的叫卖声以及摆摊销售酸萝卜、卤牛腩的吆喝声,都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之中,至今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黄家大宅

我的家坐落在佛山水巷正街(“正街”是“主要街道”之意,它的旁边有一条水巷大街)。至今我还搞不明白为何把一条从未被洪水淹过的胡同称之为“水巷”。

黄家是个大家庭,我的祖父为老大,住处被称为大宅,他的三弟、五弟,住处分别为三宅、五宅,都住在同一条街上。

在大宅里,我父亲排行老三。我还有三个叔叔和四个姑姑,分别在佛山和广州居住。

我家是工商业主,抗日战争后生意衰败破产。我家住在一条小巷内,这里有五户人家。我们家和五叔黄范吾家同住在这条巷内,其他三户是我们的房客。我们与五叔家关系最密切,经常联系,互相照应。我们家大学生多,几个孩子在外读书,家中显得很冷清;五叔家四个女儿三个是教师,可以称得上是“教师之家”。她们一家人都在佛山,没有外出的,常在一起,倒也其乐融融,挺令人眼馋的。



家中的“老疙瘩”

家里七个兄弟姐妹中，我排行老七，是“老疙瘩”。上面有四个姐姐，两个哥哥。

父亲黄孝同曾在私塾做过先生，读了一些书，算是个“知识分子”。他性格内向，少言寡语，每天除了看书和散步外，就坐在大厅门口右侧的一张藤椅上休息，跷起二郎腿，有节奏地摇晃着，这是他的习惯动作，这个时候谁也别想打扰他。

父亲对我十分严厉。他经常用三条“家训”来教育我：一是勤学，要勤奋读书，“学而时习之”；二是诚实，做老实人，讲老实话，办老实事；三是孝敬父母，尊重兄姐。这三条“家训”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至今仍对我的影响很深。

父亲对我虽严，但很疼爱，从不打我，在我的记忆中仅有一次例外：一个星期天，我最要好的同学带我去远郊游玩，玩了整整一天，很晚才回家。怕父亲批评，我不敢说实话，这下子激怒了父亲，他拿起一把尺子打了我，从未被打的我为此伤心了好几天。

1956年，父亲因患鼻咽癌久治不愈，离开了我们。时年我13岁，我为永远失去父亲而痛哭了一场。

母亲招海英出身于富人之家，是个贤妻良母。她操持家务，照顾七个儿女的生活，负责全家“后勤”，付出了许多艰辛。她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认得不少字，字写得工整，家中的所有账目都由她一手承担，管理得有条不紊。母亲对我这个“老疙瘩”特别宠爱，从不打骂，我在家中得到的母爱最多。家中产业破落后，主要靠部分房租及原有的积蓄维持生计，有时经济略显拮据，母亲不时变卖作为嫁妆的金银首饰以补家中之需。

父亲和母亲相濡以沫，相敬如宾，从未见他们拌过嘴。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帮助，和睦相处，从没发生过不愉快的争吵。我就是这样温暖和睦的家庭氛围中长大成人的。



我的兄弟姐妹

在我的记忆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二姐、大哥和六姐。

在我们家客厅西面墙壁上挂着一幅匾,上面写着“优秀教师”四个大字,这是市教育局授予二姐黄锡芬的。她大学毕业后为了支持教育比较落后的边远省份,毅然留在就读的广西师范学院数学系任教,并在那里成了家。当时广西的生活条件远不及广东。但为了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她立志在那里扎根,一干就是三四十年。

在广西师范学院(后改称师范大学),人们亲切地称呼二姐为“雷锋式的教师”,流传过她的感人事迹。她经常帮助老师和同学们,一位同学的家长病了,她偷偷往他家寄钱;一个老师出差了,她默默地为他家的孩子做饭。她可以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去资助一个山区贫困学生,且不告诉人家自己的真实名字……二姐的事迹令我感动,也是我学习的榜样。

1995年,我参加外交部大使参赞学习班到桂林参观,见到了骨瘦如柴的二姐,令我心酸。长期的工作辛劳,她得了脑血管疾病。多年不见,姐弟自然谈得很多。她还在家附近的一个餐馆请我吃了一顿饭。临行前,姐姐千叮咛万嘱咐,叫我教育好孩子,我也请她千万要保重身体。离开桂林不久,二姐因患脑溢血离开了人世。殊不知,桂林一别,竟成永诀!

大哥黄家驹毕业于南方大学(解放后南大改名华南师范学院,后又改为华南师范大学),历任政治系讲师、教授、系主任、校党委书记。他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博览群书,治学严谨。在他读了无数次的《资本论》一书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注释和评论。他能言善辩,口才极好。学生对他评价说:“黄老师讲课深入浅出”,“黄老师能把枯燥无味的题目讲得引人入胜”,“同学们非常爱听黄老师用带有广东腔的普通话讲的课”。

大哥与我性格爱好相近,从小在生活上学习上对我很关心,给予我很多帮助。我到外交部工作后,大哥到北京出差时总来看我,鼓励我勇于接受组织的考验,做一个政治和业务都合格的外交官。我被中央任命为驻外大使后,他十

分高兴,对我提出要求,希望我不要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嘱托,不辱使命。

四姐黄锡瑶比我大6岁。她性格内向,酷爱读书。她中学时学习成绩优秀,尤其数理化,学得最好。我俩性格不同,有时简直是“针锋相对”。尽管我不想学她那么“书呆子”,但她的勤奋好学精神对我影响很大。我变得不那么散漫,抽时间看看书,高中阶段逐渐走上正轨,除语文、历史、俄语等成绩保持上游外,几何、代数、化学等理科成绩也逐步提升。

我上大学5年的学习与生活费用,都是由四姐负担的。90年代,我回国休假给她送去一些小电器以表谢意时,她却婉言谢绝了。这就是我的四姐。

我的大姐黄锡遐是教师,二哥黄家聪、三姐黄锡裘都是干部,他们在不同的岗位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他们许多优良的品格对我的成长都有过很大的影响。



念“门牌”

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母亲常带我去“省城”——广州玩,同时探望我的外婆、舅舅和姨。在小地方居住的孩子,有机会去省城是最开心的时刻。出发前一天的晚上,我睡得不安稳,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迫不及待地爬起来,然后跟着妈妈先坐上广三铁路(广州至三水)的火车,到了石围塘车站后,再坐上轮船“过海”,轮渡珠江。到了长堤,就是广州城了。

轮船在水面上行驶时,我总是闲不住。我最喜欢的是念江对面的各种商店的“门牌”。所谓“门牌”,即写有店名的牌子。我一个个地数,一个个地念,为的是认字。念的时候,遇到生僻的字,就问母亲,母亲不懂时,旁边的叔叔阿姨就会主动教我。

望着对岸珠江边的邮政大楼,我好奇地问母亲:“这是什么建筑?”“这是沙面钟楼。”下了船,我们走入闹市区。我又问母亲:“这是什么路?”“这是太平南路。”“这又是什么路?”“这是上下九。”“这条呢?”“这是六二三路。为纪念工人举行罢工而改名的。”“这是什么戏院?”“是南方戏院。”我们拐了一个弯,来到一座热闹的大楼。母亲立即告诉我:“这是南方大厦,全广州最大的



商厦。”

读初中以后,我开始读小说,如巴金的《家》、《春》、《秋》,鲁迅的《祝福》,老舍的《龙须沟》及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都读过。我看书看得很粗很快,简直是一目十行。我不仅被其生动的情节所吸引,更为其精彩的文字所折服,有好的辞藻我都会记下来。

放学了,吃过晚饭,我喜欢在巷子里乘凉。我特爱听大人们聊天。他们茶余饭后,天南地北,名人轶事,无所不谈,有意思极了!听着听着,我偶尔还插插话,发表自己的见解。

我性格开朗大方,喜欢与人交往,乐于谈天说地。亲戚与邻居都比较喜欢我。邻居开纸店的大妈对我母亲说:“你们家老七很会说话,将来不搞外交就浪费人才啦!”不成想,大妈不经意的一句话日后成为现实,我走上了外交之路。



小伙伴

儿时,我有不少要好的小伙伴,而且都相处得非常融洽。

五叔家的两姐妹——堂姐黄锡婷、黄锡棣,与我年龄相仿,又在同一学校读书,课余时间我们常在一起玩耍。

何家姐妹——姐姐何思红,妹妹何善仪,是我家的房客,她们的父亲是佛山著名西医师何焯。她们家、我们家和五叔家的大人常有来往,孩子们从小就认识,成为经常玩耍的伙伴。她们的哥哥何昌华比我大几岁,善搞美工,他虽不跟我们一起玩,但常给我们玩游戏出出“点子”,搞点恶作剧,帮助我们做道具,逗我们开心。他是我们的“大伙伴”。

在这里,我可以向大家透露个“秘密”:由于有了这段热闹而难忘的日子,一来二去,从相识到相好,何家姐姐何思红后来成了我的夫人。人们说的“青梅竹马”,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另一家房客,姓方,方家兴与他的姐姐。他们从外地搬来,说话有外地口音。由于都是同龄人,兴趣爱好相同,他们极愿意与我们一起玩。

我还有两个男小伙伴。一个是许家锵,当时他玩起来常流口水,我们爱称他是“口水锵”。他脾气特好,我有时也爱逗他、欺负他,但他居然毫无怨言。别看小时候挺“窝囊”的样子,可长大后他很有出息,继承了当牙医的老爹的衣钵,成了佛山颇有名气的牙科医生。

阿智,也是我们邻街良巷的街坊。由于大家都这样称呼他,竟把他的真名给忘记了。他比我们要小好几岁,但十分喜欢参加我们的“活动”,每次我演“大戏”(即粤剧)时他早早就等着,问我们什么时候开演,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每次“看戏”都自始至终,坚持到底,是我们最“忠实”的观众。

每天晚饭后或礼拜天,我们就在巷内尽情地玩。玩的种类真不少:有“捉迷藏”、“过家家”、“逛商店”、“抓小鸡”、“找手绢”等等,玩法同北方大同小异,规定略有不同。又如打扑克,当时还没有“争上游”、“一百分”什么的,我们玩得更多的是“扫厕所”、“盖棉被”、“合七”等等。

唱粤曲,演“大戏”,是我的“专利”。演出以我为主,我每次都演“主角”。何家妹妹何善仪与我合演,姐姐何思红则负责舞台布景和“剧务”事宜,其他人一般都当观众。

几十年后,2003年我和当年的小伙伴们有幸相逢在佛山。正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当我们互相端详,看到对方已是满头银发,脸上皱纹纵横时,不禁惊叹时光的飞逝,也为我们少年时代结下的情谊而感慨万千。分别后从未再见过阿智,不知他现在流落何方?



二小、三中和一中

从小学到中学,我在佛山经历了三所学校。

佛山二小是一所名校,与名胜古迹祖庙仅一墙之隔,历史悠久,师资充足。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景:母亲领着我踏入一年级教室时,第一眼见到的是一位有双“金鱼眼”的女老师,她是我的班主任。她说话时眼睛瞪得大大的,怪吓人的,我越看越害怕。第二天,我说什么也不愿意进这个班上课了。幸亏有当校长的大姐的“帮助”,把我调到二年级,才解决了“问题”。就这样,



我跳了一级,那时语文、算术等课还比较简单,一年下来,我主要科目的成绩未受影响,跟上了全班。由于跳级,我在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上大学时刚17岁。

佛山三中原名联合中学,当时只有初中,有不少很优秀的老师。如我的班主任关伯伟,他教语文,讲起课来生动形象,我们很爱听。他还有一副好嗓子,那洪亮的歌声像磁铁般吸引我们,我还特别喜欢上他的音乐课。通过在这中几年的学习,为我日后中文的提高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佛山一中的前身是基督教中华道会创办的华英中学,建于20世纪初的1913年,1955年与原称南海中学的佛山中学合并改现名。它的教学水平在广东名列前茅,高考录取率一直很高。一中培养了一批批杰出人才,如医学专家伍学宗,艺术家冼星海、司徒汉和科学家彭加木等。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也曾就读于此校。

一中不仅理科老师出色(有数学老师梁恩赐、郭应劳、邝善航,物理老师何法英等),文科老师也毫不逊色(有语文老师罗健夫、曾郁,俄语老师黄尚仪、廖超然,政治老师韩景基等),他们都很优秀。“名师出高徒”,毕业于佛山一中的学子们都有较扎实的知识功底,这些都应归功于我们可敬的启蒙老师们!

到了高二,开始文理分科,我被分到丙班,是理科班。但我并不喜欢理科,而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对文科情有独钟,语文、历史、俄语等科成绩更好,是俄语科代表。因此,高考前,我毫不犹豫地选择报考文科。



多彩的梦

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与其他孩子一样,我少儿时代也有过许许多多的梦想,想当演员、作家、记者……不过,其中最喜欢的还是想当一名粤剧演员。

受母亲的影响,我从小就爱听粤曲,爱看粤剧。我看的戏太多了,收藏的“戏桥”(即说明书)装满一个长方形的竹箱子。

粤剧,是用广州方言演唱的地方剧种之一,流行于粤语地区,属皮黄梆子系统。广东粤剧吸取了广东音乐和民间小调的精华,就是不懂广州方言的外地人也会觉得其曲调悦耳动听。

我看得最多的是《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名著的戏,像《宝玉哭晴雯》、《晴雯补裘》、《祭潇湘》、《武松打虎》、《三顾茅庐》、《赵子龙拦江截斗》、《水泊梁山》等。再有是历朝的爱情和家庭伦理戏,如《牡丹亭》、《柳毅传书》、《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唐伯虎点秋香》、《胡不归》、《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窦娥冤》等等,不一而足。

我看戏不仅仅专注情节,而且更主要的是欣赏唱腔。对于一些精彩唱段,我百听不厌,耳熟能详。我最爱看的是来自香港的文武生罗家宝和正印花旦林小群演的戏。他俩的演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唱做俱佳。我最欣赏的是罗家宝的一种叫“哈腔”的唱法,婉转圆润。到了中学时,已能唱不少罗家宝、罗品超等著名演员的唱段。我参加了佛山一中的民乐队,经常与队友们清唱粤曲,参加演出。由此,我特别渴望成为一名粤剧演员。

过去人们把演员叫做“戏子”,这是人们对演员的俗称,所谓“三教九流”,演员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但我不这样看,我觉得演员是角色的创造者,他们以艺术打动观众,很了不起,应受到人们的尊重。

高中快要毕业了,我知道“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就当不成演员了,不能再耽搁。主意已定,我宁可放弃高考,也要去考最大的粤剧基地——广东粤剧院。

1960年5月的一天,我在母亲的陪同下找到广东粤剧院的一位琴师,接受了他的面试。我自弹自唱了一段名演员罗家宝唱的《柳毅传书》,他说唱得不错,叫我等待答复。

一个月过去了,仍无音讯,我十分焦急。不久,班主任林田老师找我谈话,劝我仍参加高考,强调祖国更需要大学生,升大学更有前途。与此同时,我的姐姐也联合起来“做”我的工作,劝我放弃当演员。就这样,在种种“压力”下,我不得不作出让步,参加了高考。后来得知,班主任同粤剧院通了气,剧院虽想收我学艺,但在此情况下也只好作罢。

为了在当不了演员的情况下仍能实现我的文学戏剧梦,高考时我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渴望成为一名戏剧作家。



第三章

北上求学



向往首都

1960年8月底的一天,我怀揣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与两个考取北大的一中同学一起,满怀对首都、对未来的向往,坐上了北上的列车。

京广列车到了广东省的最后一个车站——坪石。望着连绵起伏的南岭,我意识到,马上就要离开可爱的家乡了!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第一次离别故土,北上求学,我为即将踏入梦寐以求的全国最高学府而自豪,为能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而兴奋,但又为离开白发多病的母亲和我的故乡而感到一丝难舍和悲凉。

正如孟郊《游子吟》中所写:“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行前,母亲亲自为我准备好被褥及一年四季所有换洗的衣服,生怕我到了北国受冻。车越往北走,我越想念我的妈妈。妈妈,儿子什么时候才能报答您的恩情?

列车在广阔的田野上奔驰,眼前飞逝的是一幅幅活生生的山水画。“两广”、“两湖”(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是典型的南方景色:茂密的亚热带树木,潺潺的流水,起伏的丘陵,碧绿的稻田,水乡的农舍,好像一幅幅精细的水彩画。

列车通过武汉长江大桥。走过这条雄伟的大桥整整用了近五分钟。长江,中国的第一大河,近看果然气势不凡。听人说,在修大桥前,列车只能是一节节车厢通过轮渡越过长江。如今实现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奇迹!

列车到达武汉(包括武昌和汉口两个站)。按通常的说法还没走出南方。人们常以长江为界划分南方和北方,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过了长江以后,不仅气候差异大,且地形地貌、自然风光、语言与生活习惯也有很大变化,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尽管在列车上只走了一天,但我已深深地体会到祖国地域之广大。

到了河南、河北,这是典型的北国风光:广袤的平原,大块的麦田,高大的杨树林,蜿蜒的公路,茂密的灌木,宛如一幅幅笔墨浓重的油画。在这里,我看见了一个在南方绝对没有的景象:远处的农田没有水,农民们竟可以穿着鞋子下地干活。

列车继续往北行驶,过了黄河——母亲河,到了河北省的保定和石家庄。列车快要进京了,我的心亦随之激动起来。祖国母亲,您的儿子就要来到您的心脏、向往已久的首都北京,他将满怀报国之志,努力学好本领,成为您所需要的有用之才。



命运的转折

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终于走出北京站。北京实在太大了,好不容易才找到开往西直门的电车站,先坐上3路无轨电车到西直门,然后再转乘32路汽车,走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坐落在中关村的北京大学。

新生们提着行李陆续走进东校门。校友们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迎接新北大。我来到中文系报到处报到,负责接待的一位男同学找了一下表格,并未找到我的名字。他去询问一位负责人后告诉我:“你已转系了。”“是吗?”我十分愕然。怎么回事?他和颜悦色地告诉我:“学校决定将你转到东方语言文学系。”听到这一消息,我感到有点失望,难道我要成为作家的愿望要成为泡影?但我明白,既然学校已决定,提出异议也枉然。况且,服从分配是对我们这些学子的基本要求,我毫不犹豫地来到东方语言文学系报到。

到了东方语言文学系才得知,该系不是每年招生,今年仍缺新生,所以从中文系抽调了部分学生转系,我是其中的一个。



东方语言文学系于1946年由东方学著名学者季羨林教授等创建,是我国高校中开设东方学科最悠久、专业最多的系。主要目标是培养从事外交、外贸、国际文化交流以及出版、外语教学和外国问题研究等应用型人才。如今,该系已扩展为东方学系,建系60年来,共为国家培养了5000多名毕业生,真可谓“桃李满天下”,而这些东语系的毕业生也成为各个部门或领域的中坚力量。

东语系的师生们热烈欢迎我们这些从外系转来的同学。各专业的老师们热情地介绍了各语种情况,让我们再报志愿。考虑到高中时学的是俄语,与蒙古语相近,学起来可能容易些,所以蒙古语成了我填报的三个志愿中的一个。最后,系里决定把我招入蒙语班,从此我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与蒙古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语系副主任黄宗鑑老师是蒙古语专业的“元老”。他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蒙古语言文学专业设置的历史。

蒙古语专业设立于1949年,主要教授蒙古喀尔喀方言和基里尔蒙古文(即新蒙文)。黄老师说,蒙古是社会主义国家,与我国关系不错,目前外交事业有很大发展,国家需要培养蒙古方面的外事和研究人才,他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定会大有作为。

开学后,首要的任务是巩固专业思想。有老乡劝我说,蒙古国家小,人少,学蒙古语没什么前途,还是早点改学“大语种”为好。“好心人”的劝说对我不可能没有影响,我情绪一度有些波动。而正在这个时候,系里领导和老师一再从政治上帮助我们端正专业思想,指出最重要的是要明确学习的目的,要有为祖国学习的志向。只要学习目的明确,那么不管学习什么专业,即使是小国语言,都是很有前途的。而相反,如果政治上迷失方向,那么不管学习任何专业也不会对国家作出贡献。

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思想是比较单纯的。我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况且,我们还是“稀有金属”,行行出状元,物以稀为贵嘛,没准将来还可以给国家领导人当翻译哩。想到这,就想通了,一切就这么决定了。

蒙语班原有10人,一人因故退学回家,实有9名学生(7男2女)。上海人姜金生与我一起从中文系转来。孙树理、翟文亮、康树漪、苑存祥、张翠铃是北方人;阮山青、陈芳是南方人。我们班是一个团结向上的集体,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学习蒙古语,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到一起,互相帮助,共同切磋,

和谐相处,完成了五年的“同窗”生活。毕业时,我们几个同学分别被分配到中联部、中组部、外交部、外贸部、国际电台等中央和国家重要部门工作,可见蒙古语在当时还是急需人才的。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从我国撤走专家,又遇到自然灾害,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所有粮食和食品(包括食油、点心、糖等)都定量供应。正在长身体时期的大学生每月只供应粮食30斤。每天我们拿着一张饭卡吃饭,吃一顿划个“叉”。早饭一般只有馒头和玉米稀饭,配之咸菜。稀饭很稀,可以照得见自己的脸。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人经不起考验,涂改饭卡,想多吃点。他们的行为终于被发现,受到处分。说实话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谁不感到饥饿?但人一定要有点精神,我经受住了这场考验。

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不仅要读书,还要参加体力劳动。记得入学不久我们全系同学与其他系的同学一起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这一年冬天特别冷,天阴沉沉的,飘着雪花。我们的任务是用锹挖土,推车运土,每天规定要完成一定的土方任务。这是重体力劳动呀,每一顿饭吃的主要是窝头,菜里肉也不多。我,一个刚从广东来到北京的南方人,穿着只能抵御南方寒冷的薄棉袄,只觉得四面透风。这次我真正尝到什么叫严寒!为了保暖,有个同学给我捡了一根草绳帮我把腰扎起来。一阵寒风吹来,冻得我直打哆嗦。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知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本不习惯吃窝头,但劳动累了,饿了,吃起来还特香!劳动结束了,我瘦了,黑了,也变结实了,用当时的口头禅叫做“晒黑了皮肤,炼红了思想”。

由于政府采取了正确的调整措施,过了两年,经济形势逐渐好转。我们的生活也好起来,伙食好了许多。

大学的课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周末有交谊舞会。高年级的同学都跳得不错,但我们新生过去没学过,看人家跳起来那么复杂,就干脆不去“丢人现眼”了(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悔,搞外交真应该学点交谊舞)。学校成立了不少文艺社团,如民乐团、合唱团、话剧团、诗社等。我参加了民乐团的的活动,还到附近院校演出过。当时我练的是弹拨乐,团里没有琴,我把自己的琴拿出来参加演出。我们团的水平还不错,到兄弟院校表演还受到好评哩。



同蒙古语亲密接触

我们班的蒙语课由4位老师教授。一年级时倪申源老师教语音语法,他语法抠得细,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二年级由巴特尔老师(蒙古族)教课文,他解释蒙语词义准确详尽,让我们对每个词和词组牢记于心。四年级起楚勒特木老师(蒙古族)教课文,他文学功底好,讲解蒙古文学家的作品生动形象,有利于我们加深理解。进入五年级由道宝忱老师(蒙古族,已去世)教翻译课,他将翻译理论讲得深入浅出,使我们懂得了许多翻译的真谛。

蒙古语原来使用老蒙文文字,即竖写的形似蚯蚓的回纹体蒙古文。1942年蒙古将老蒙文改成基里尔即俄文字母。应该说,蒙古文字的这一改革,方便了蒙古人和外国人学习和掌握蒙语。由于新文字易写易读,很快便在全国推行起来。

我学蒙文发音时由于受广东方言的影响,个别舌齿音(з, ж, ч, ц, ш)的发音有点困难,不过经过努力总算过了关。学习中,我为自己总结出一套办法,如“读音记词法”,即将一个个蒙语词的读音用中文字标出来记忆,效果不错。另外,我还“发明”了“翻字典找词法”、“字条记忆法”、“散步记词法”等等,目的是通过各种工具和场景来强化记忆,以增加词汇量。上述方法取得明显成效,使我的学习成绩稳步上升,在班上始终保持上游。

学外文讲究“听、说、写、读、译”。20世纪60年代的电化教学设备与现在无法相比,没有电视,广播有时听不大清楚。老师先在长波台选择一段清楚的新闻或讲话制成录音带让我们用耳机反复听。但由于有杂音,听起来很吃力。不过“熟能生巧”,听得多了,自然就习惯,听得懂的内容逐步增加。学外文,朗读不可或缺。清晨,我常常在校园僻静处的树下大声朗读课文,尤其是文学作品,这样做能熟记单词,掌握词义和语调。

要搞好中蒙文互译,提高中文水平是基础。一次,倪老师指导我们翻译一段课文,大致内容是一群学生在公园玩耍,要我们将一句蒙文译成中文,句子中有一个蒙文词 *наадах* (中文是娱乐、玩耍、游戏之意,“那达慕游艺大会”一

词由此词根产生)。正当大家沉默不语时,我灵机一动,答道:“可以翻译成‘儿童们在公园里嬉戏’”。倪老师说我这个词译得准确、贴切。老师的表扬,更增加了我学习的信心。

大学与高中不同,学习靠自觉,老师布置作业不多,更多的是自习和阅读课外书。一、二年级我学得很轻松,测验考试经常得5分,老师提问我都能回答出来。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便到了三年级的下学期,离毕业所剩时间已不多了。我知道,毕业后要真刀真枪地拿出真本事去干,再这样“轻松”下去,到头来吃苦头的还是自己。于是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取消了绝大部分的“娱乐”活动,其中包括不去民乐团,不看电影和戏剧,延长读书时间,特别是加强课外阅读。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效果不错,我的知识面扩大了。



在锡林郭勒大草原

1964年初夏,我们“蒙四”班在倪老师带领下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附近的一个种畜场实习。这个盟离蒙古国最近,语音同那里的喀尔喀语相近。到这里实习更接近“实战”,机会难得,全班同学为此很高兴,也十分珍惜。

我们先坐京包线列车到集宁,然后坐汽车到赛汗塔拉,几经周折,才来到锡林浩特。在20世纪60年代,下乡要贯彻执行“阶级路线”。我和翟文亮同学被安排在一户贫牧家,是我们的“依靠对象”。这家的儿子是生产队长,祖孙三代生活在一起。

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绿绿的草,其景色足以令第一次见到大草原的我们心驰神往。白天,我们跟随主人放羊,晚上就睡在主人的“额吉”(ээж,妈妈)身旁。我们尽量用所学到的蒙语与他们对话,为的是加强口语。

蒙古族人民素以热情好客著称,这一家也不例外。为了迎接我们,主人用野韭菜(гогод)包羊肉荞麦饺子给我们吃。吃饺子,这对当时他们的家境来说,已是过节的规格了。几天吃不到肉,很馋,吃不惯羊肉的我此时也吃得特



香！人要生存，就得适应各种环境。这就是我在内蒙古牧区吃的第一顿蒙古“大餐”。

清晨，我们迎着太阳，坐勒勒车（蒙古式牛拉车，“勒勒”是牧民赶车吆喝牲口的声音，又叫“大轱辘车”）去十多公里以外的小河边汲水。对于我们这些“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打开水龙头就可用水的城市青年来说，哪里想到用点水那么困难？汲水回来后，我们都知道节约用水，把剩下的水用来洗涮餐具和搞卫生。

高原地区，属大陆性气候，早晚温差特别大，真是“早穿皮袄午穿纱”，中午很热，有30多度，但太阳一下山天就马上变脸，穿上秋衣秋裤还凉飕飕的。在我们快要结束实习的一天傍晚，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倾盆大雨，狂风夹杂着沙土扑面而来。我们赶紧回到蒙古包。夜里，雨下得越来越大，雨水顺着包顶的毡子，滴落在我们的被子上。不一会儿，被子全湿了，褥子也难逃厄运。就这样，我们一夜都没怎么合眼，躲躲藏藏地才熬到天亮。早晨太阳一出来，我们赶紧把被褥拿出去晾晒。贫牧家穷，包顶毡子很破旧，当然经不起日晒雨淋。如果我们去富牧家住，就不会淋个“落汤鸡”了，但为了表明我们的“阶级立场”，我们宁愿去“经风雨，见世面”。

在锡市期间，我们参观了食品厂、皮革制品厂等企业。每到一地，我们都主动与蒙族同志用蒙语聊天。经过近一个星期的锻炼，感到口语和听力有明显提高，当我们的进步得到他们的肯定后，都感到很高兴。

记得在参观皮革制品厂时，由于闷热难耐，加之吃了羊肉肠胃不适，我一时眼冒金星，接着就不省人事了。这下子可把老师和同学们吓坏了，又是灌我喝水，又是掐我的“人中”，不知过了多久，我才被“救”醒。

短短一周的实习期结束了。我们带着实习的成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离开了可敬的牧民们。通过实习接触了大草原，草原美轮美奂的景色令我难忘，使我增加了难得的人生阅历。



一次“出洋相”的翻译

1963年10月,我和康树漪、张翠铃同学一起参加了由作曲家、指挥家那木斯莱扎布率领的蒙古交响乐团访华的翻译工作。在全班9名同学中被选中去参加实践,我们感到很幸运。

首次当译员心情紧张是不言而喻的,生怕说错或译错什么。在欢迎宴会上,我们一桌的主人有文化部、外交部亚洲司的领导。外交部一位会蒙语的老同志坐在我身旁,我更加紧张。当我方领导问蒙古朋友当地天气情况时,乐团一位负责人回答道:“Монгол улсад найман сард ч цас ордог”。我将他的话翻译成:“蒙古一年下八个月的雪。”当时旁边的老同志马上纠正我说:“应翻成蒙古8月份也下雪。”听了这话,我霎时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之所以出“洋相”,是因为我在学校学的“8月”一词要加后缀的(наймдугаар сар),而蒙古朋友在口语中往往省略后缀“дугаар”,这样我就将“第八月”(即8月份)理解成八个月了。

我本以为,当翻译就像“八哥的嘴——鹦鹉学舌”,只要跟着人家讲就行,实际上没那么简单。学语言必须要到基层去,学习人民的口语,甚至方言土语,要尽量接触老百姓,学他们最精彩的、最新鲜的词汇,这样才能说得更地道。譬如,蒙语说“上厕所”,我们在课本里学的是“бие засах газарт очих(去修理身体的地方)”,但蒙古人平常更喜欢说“жорлонд очих(去厕所)”或“морь харах(看马)”。特别是“看马”,这是一个典型的蒙语用词,既生动,又形象。茫茫大草原,没有厕所,蒙古包里也没有厕所,借口“看马”外出一下就是“方便”了。又譬如,讲时间九点二十分,按常规应说“есэн цаг хорин минут(九小时二十分钟)”,但蒙古人平常往往省略,说成“ес хорь(九、二十)”便可。

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活的语言植根于人民的生活之中,书本上学的东西只有在实践中经过检验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语言不能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否则有可能闹笑话。



快毕业了,老师弄到一部蒙古电影《给我一匹马》给我们看。第一次看到蒙语电影,特别好奇。我们逐字逐句地使劲听,但由于蒙语语速太快(比俄语要快),整部电影大概最多听懂10%—20%,太难了。第一次看蒙古电影,这样的结果本属正常,但自尊心极强的我感到很不安,已是大四了,凭这样的水平毕业后如何工作呢?真后怕。此后,我更加注意听广播,并从报刊、文学作品中去学习口语,努力充实自己。

五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我们捧着陆平校长签名的红彤彤的毕业证书,满怀豪情地走向新的工作单位。



第四章 外交战士



入外交部

1965年9月,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我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也不是党员,外交部仍招收我入部,这使我特别感动。

入外交部,是我多年的梦想。能成为一名外交战士,我感到无比自豪,但又知道自己尚存不足,生怕难以胜任工作,唯有下决心加紧学习提高自己。但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外交战士?前面的路怎么走?起初我还比较模糊。

入部后,领导和老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周恩来总理的教诲。总理作为外长,主管外交工作长达26年之久。他为我部提出了“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16字方针。这是外交人员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座右铭,在外交队伍的建设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几十年来,外交部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逐渐形成了良好的、过硬的“部风”,在贯彻执行党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外关系、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环境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领导和老同志还向我们介绍说,外交人员是“文装解放军”。作为一名外交战士,没有比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更重要的东西。维护祖国的尊严,是我们的神圣使命。同时,外交人员又是从事双边或多边外交的战士,要致力于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与相互理解,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件真实的事:20世纪90年代,我部国际司负责人权事务的一位年轻外交官,本是未来的外交“新星”。他可与外国同行侃侃而谈,熟



练地介绍中国对人权问题的立场,口径倒背如流,但他脑海深处想的却与此格格不入。终于,他在一个外交场合向西方同行“袒露”了自己对人权的真实想法,违背了国家的政策和自己的使命,这样的“战士”,终因不合格而离开了外交部。

外交官在人们的眼中是值得羡慕而又有点儿神秘色彩的行业。外交官出入于灯红酒绿的场合,出席各种觥筹交错的宴会,经常接触国家领导人;他(她)们西装革履,风流潇洒,谈笑风生。殊不知外交亦是一个充满艰辛,富于挑战,会遇到风险的职业。在有战乱或疾病流行的国度,除了担负繁重工作、经历离别亲人的痛苦外,还要面临生与死的考验。但绝大多数外交人员都经受住了考验,他们毫不畏惧、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战士。



在翻译“仓库”里

刚入部时,我被分配到教育培训司下属的翻译队去学习和锻炼。

外交部有翻译室和翻译队两个单位。翻译室隶属于办公厅,这是英、法、俄、阿(拉伯)四大通用语翻译人员工作的单位。他们有大量的口译与笔译任务:一方面要为中央领导同志会见外宾做翻译,另一方面要为外交部和中央有关部门翻译外交文书和其他重要文件。

翻译队则隶属于教育培训司,是储备非通用语干部的地方,人们形象地称它为翻译“仓库”,无日常的具体工作。翻译队有100多人,住在魏公村外国语学院院内。队员们平时主要是学习,有任务就出差做翻译。20世纪60年代中期正是中蒙关系恶化时期,蒙古没有什么代表团来访,我没有出差任务,每天读书看报,学习政策时事。这也好,我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充电”,补充各方面的知识。看到别的语种的同志们可以经常出差给代表团当翻译,我甚是“嫉妒”。

没过多久,我被借调到北京图书馆整理蒙文图书,我乐此不疲。因为我正好利用此机会接触蒙古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类图书,了解蒙古情况。在图书馆的半年时间里,我收获颇丰。



“四清”工作队员

1965年冬,我随外交部“四清”工作队到江苏省如皋县搞“四清”。这场声势浩大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的是“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的问题”,整肃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带有明显的极“左”色彩。

我随工作队来到新民公社一大队第十二小队,开始了四清工作。经过宣读文件,基本“摸底”和与社员“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了解到该队队长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大不了的“四不清”问题,但为了表明农村干部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同时为执行上级的政策,我们违心地“整理”和“揭发”了该队长的一些“问题”,让他下了台,另培养了一名年轻女干部当队长,同时还发展她入了党。当时尚不是党员的我还同那位入党积极分子谈话,做她的工作,现在想起来还十分可笑。

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结束了,我们于1966年初夏回到北京。此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席卷全国,外交部也在所难免。在向“资产阶级夺权”的口号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一系列使外交大权旁落的极“左”事件,给外交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可以说,参加从一开始就出现方向错误的“四清”运动在政治上谈不上有什么收获,但对于我这个“足不出户”、“五谷不分”的“穷书生”来说,下乡对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大有裨益,是一次难得的接触社会的机会。



翻译“红宝书”

到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极“左”思潮更加肆虐,所谓“早



请示”、“晚汇报”等形式主义的极“左”活动颇为流行。当时领导层甚至提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等口号，干一些强加于人的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大东语系师生响应其他语种同志们的号召，向中央提出要翻译蒙语的《毛泽东选集》和小册子，向蒙古人民传播毛泽东思想，让红彤彤的“红宝书”“武装”蒙古人民头脑的请求。这个请求很快就得到上面的批准，在外文出版局毛选翻译室中设立了蒙语翻译组。

经部批准，翻译队调我去外文出版局报到。我为有机会搞蒙文翻译，提高笔译水平而欣喜。我们每周一方面搞翻译，另一方面还要回外交部参加所谓“反击二月逆流”、“揪‘五一六’组织”运动。人们称我们这些“参观”运动的人为“逍遥派”，实际上这样游离于运动更好，否则可能会深陷“极左”泥潭。

在毛选翻译室，我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初稿。我初译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两篇著作，同时我还和其他同志一起负责部分小册子的核稿。整个翻译的定稿由从驻蒙古使馆归来的张德麟，北大倪申源、史习成老师以及内蒙古的蒙和、满达赫同志来负责。

翻译毛选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准确理解并将毛主席的论断、观点翻译出来，要求有较高的蒙文水平。为了翻译得更准确，我参照了俄、英译本，同时搜集了许多政治、经济方面的蒙语词条。

参加定稿的前辈们是我最好的老师，他们有很高的翻译水平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我每次请教他们时都把有关内容记下来，留作日后参考。

蒙语翻译组是个临时集体，也是一个严肃而活泼的团组。工作时，我们经常为一个词的使用，一个句子的译法而争得面红耳赤，但工作之余，我们又是很好的朋友。

最难忘的一项工作是到外文印刷厂校对译文清样（付印前最后一道工序）。我们两人一组将中蒙文逐字逐句进行校对，确认无误后，签上自己的“大名”。一经签字画押，就意味着你要负全责，以后如出现问题，唯你是问。这一签字，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责任心及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

我们的办公地由百万庄迁到友谊宾馆。经过两年，办公室摆放的成果逐渐多起来，一本本“红宝书”小册子相继问世。据我的记忆，我们一共翻译了40多册单行本。

考虑到蒙古与我国关系的现状，我们放弃了出合订本或选集的计划，只出单行本。通过驻蒙古使馆，我们的“红宝书”源源不断地送到蒙古朋友的手

中。同时我们在国际列车、展览会或公共场所都摆放了大量的小册子,供人们阅读。据老同志介绍,由于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不得人心,“红宝书”逐渐发不出去了,只能静静地躺在使馆文化处办公室的橱柜内。十几年后,我第一次在使馆看到了满是尘土、已多年无人问津的毛选小册子。见到这些我曾付出过劳动的图书,心中不免有一番感慨。

毛选翻译室的工作使我的翻译水平有明显提高,为日后完成大量口译和笔译工作打下了基础。譬如,领导人政治会谈时遇到一些特别长的句子需要翻译时,我也不“发憊”,显得胸有成竹,这都归功于那一段时间的磨炼。



在农药厂当工人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广大机关干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五七”干校(毛泽东同志在五月七日指示要办干部学校,故名为“五七”干校)去,到农村去,与工农相结合。外交部也分别在京郊和外地办起了“五七”干校,干部分期分批到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锻炼,改造思想。

我本应被安排到干校劳动,但部干部部门考虑到我爱人在广东,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决定安排我到老家佛山,一方面“下放”劳动锻炼,另一方面亦可与爱人团聚。组织这个决定是对我个人生活的关心,我十分感激。

1971年夏,我回到佛山。市政府根据外交部的要求安排我到佛山农药厂。两天后,我便到厂报到。

佛山农药厂是新建不久的一家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化工企业,是个小厂,有200多名工人,生产十余种产品。厂领导都很年轻,丁厂长原是市机关干部,陈副厂长是业务干部,主抓技术。他们对我表示热烈欢迎,并向我介绍该厂的生产情况。厂长问我希望到什么车间,我表示服从安排。结果,分配我到乙醛车间。

乙醛车间主任罗晓霞是位十分能干的女同志,她介绍说,乙醛是生产农药的主要半成品。我来到车间,看到生产的“高炉”都是由陶瓷制造,生产流程均是自动化,工人们只要在操作室里按动电钮就可以正常生产。车间工人上



班都是“三班倒”，主任想照顾我只上白班。我说：“我是下开来锻炼的，不能搞特殊。”就这样，我执意同师傅们一样“三班倒”。

白班是早八点至下午四点；中班是下午四点至十二点；夜班是深夜十二点至次日八点。三个班一周换一次。我上早、中班都没有问题，夜班对我来说比较辛苦。夜里从家出来要走“高基”街一段崎岖不平的石板路。我骑着自行车，路灯昏暗，为安全起见，我只好小心翼翼地往前骑。快到厂门口，还要坐上小船摆渡过河。这些对我一个有深度近视的人来说，困难不少。深夜3点以后，是最瞌睡的时候，我一边看各种仪表一边与同班师傅聊天，学习有关化工知识，将这段最“困难”的时间“打发”过去。快天亮时，我们要出最后一批乙醛，此后就一直忙到下班。早上回到家，马上强迫自己“违反”生物钟规律去睡觉。邻居家中有孩子哭闹，无法睡好，晚上的觉白天无法补。不过幸好只是一周，熬一下就过去了。

我们车间的反应炉是陶瓷炉，属于“新生事物”，还未完全“过关”，时间长了，炉缝有些磨损，会发生泄漏，不时要进行维修。一次突然泄漏氯气，这是有毒气体，呛得我们直喘粗气。这时，大家立即戴上防毒面具，进行紧急抢修。师傅们哪里最困难就往哪里冲，他们不让我上。我作为车间的一员，哪能在这个时候下战场呢？我一直帮助打下手，直到抢修战结束。当我们摘下防毒面具时，人人都是汗流浹背，衣服可以拧出水来。

经过一年的劳动，向师傅们学到不少东西，结识了不少工人朋友，我已成了他们其中的一分子。

后来，厂领导让我“改行”到办公室搞政工，协助厂领导起草讲话稿，编写介绍厂情况的材料。我利用此机会，发挥自己的专长，搞了一些“副业”，编了一个名叫《攻关》的独幕粤剧，歌颂农药工人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进行技术革新的创举。在这个剧中，我创作了几个较易上口的唱段，受到大家的欢迎，在系统的文艺会演中居然得了奖。我在演出中参加了乐队操琴伴奏。

一年半过去了，外交部要调我回京，同时将我夫人也调入外交部幼儿园。1972年12月，我怀着感激和惜别之情告别了可爱的农药厂，告别了与我战斗过的工人师傅们，踏上了回京的归途。师傅们，请你们放心，我会把你们忘我劳动的精神带到今后的工作中，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第五章

初进蒙古



乘“小列”赴乌兰巴托

1973年2月23日傍晚,我乘89次北京—乌兰巴托“小列”(当时人们习惯把北京—莫斯科的国际列车称为“大列”,至乌兰巴托的列车称为“小列”)前往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工作。如果说过去我只是在书本上了解了一个纯理论的、抽象的蒙古的话,那么,从这个时候起,我将亲自接触一个具体的、真实的蒙古。

与我同行的是比我低两届的北大东语系蒙语班校友高树茂。历史往往有许多巧合。谁能想到30年后,同车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两个年轻人分别成为我国驻蒙古国的第12任和第13任大使呢?

列车驶过山西省大同市,进入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境内。茫茫雪野,荒无人迹,一派北国高原的风光。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出塞》的诗句:“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此刻离别妻儿,离别家人,来到荒无人烟的塞外,无人为我吹奏杨柳古曲,虽然我们并不是要过玉门关,而是前往北方的蒙古国,但此刻真有一种“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悲壮!

过去“戈壁滩”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列车到了内蒙古,方知它是那么荒凉,寸草不生,只有碎石和沙砾,灰蒙蒙,光秃秃,气候恶劣,多风暴,是中亚寒潮的“发源地”。我国天气预报提到的大风降温、冷空气大多是从北部的蒙古高原刮过来的。

列车缓缓而行,想到我今后将与这个气候环境恶劣的高原之国打交道,心



中不免一阵惆怅,后悔当初选择蒙古语专业,不过现在是悔之已晚了。但是,此时另一种声音又在激励自己:你是为祖国的外交事业而来,为克服困难而来,哪能因一点小小的困难而退缩呢?

列车员是北京机务段的老席、老李,他们经常走蒙古和朝鲜,是很有经验的列车员,十分善解人意。当得知我们首次赴蒙,他们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和朋友,把自己带的面条、饺子拿出来煮好让我们吃,我们也将所带的面包、香肠全拿出来与他们分享。霎时间,列车内热气腾腾,温暖如春,使我们暂时忘却了思乡。

但蒙古到底是个怎样的国家?蒙古民族到底又是个什么样的民族?还是个谜……



离开国境

第二天中午,我们顺利到达国境站——二连。到站后旅客先在车里坐着,等待边防、检疫人员上车。他们态度和蔼,向我们敬了个礼,然后对我们逐个检查护照和健康证明。检查完毕,就可以下车了。二连外事处的同志们热情地迎接我们。他们向我们介绍了二连和对方边境城市的情况,还为我们准备了在车上的食品,这一切,对我们这些第一次出远门的人来说,感到格外亲切,并由衷地感叹:还是祖国的亲人好!

中蒙苏之间三国的铁路于1956年正式通车,此后开始了三国联运。中国与苏蒙两国路轨轨距不同,我国是标准轨,蒙苏方为宽轨,过境时要更换底盘。起初苏联人帮助铺设的宽轨一直延伸到集宁,我们在集宁建设了换装厂。后来中苏两国关系恶化,我换装厂搬到二连。在外事处同志们的陪同下,我们来到换装厂参观。走进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将整列车分解成几组吊起来,然后迅捷地把原来车轮拆卸下来,又立即将新的车轮安装上去。他们敏捷而熟练的动作着实令人惊叹和钦佩。

下午两点过后,列车从换装厂开出车站,边检人员向我们发还了护照。列车即将驶出二连。车站工作人员用中、俄、蒙语播放了“再见,祝一路平安!”

的祝词与我们道别。此刻,我知道真的要离开祖国了!祖国,我的母亲,再见了,儿子尽管就要到外国工作了,但他的心永远与您在一起!

听老同志说,白天在车上可以清晰地看见两国竖立在刻有本国国徽的第357号界标。我特别注意看双方的界标,但因列车开得太快,界标看不清楚,只好留待以后看了。

二连至对方边城扎门乌德相距约10公里。两个边城的地理环境相同,过境时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列车缓缓地行走了约20分钟,我们便“出了国”,到了蒙古国的边境城市——扎门乌德。

扎门乌德车站是一个米黄色的俄式建筑,尖顶塔楼,大门旁立着一匹雕塑的马。这里上下车的人不多,显得有点荒凉。车站士兵的穿着与俄国士兵差不多。车停下来后,蒙方边防海关人员分别上到各个车厢收取护照,查看健康证,还检查和扣留所谓“禁品”或“超量”物品(这与两国关系有关,如出现不愉快的事件,海关就查得严些)。过关时我们特别谨慎,生怕出麻烦。在车上,蒙方人员用蒙语问我们,我听到熟悉的音调,本想用蒙语回答,但老同志曾提醒说,为避免麻烦,在边境最好装作不懂蒙语,我们照此办理,果然相安无事。或许因为我们是使馆工作人员,这一关顺利地过去了。但蒙方边防海关人员对华侨态度就大不一样了。我亲眼看见他们将认为有走私“嫌疑”的华侨带下车进行搜身检查。

列车继续在蜿蜒曲折的山谷中绕行,海拔在升高,睡在铺上,不断地摇晃和颠簸。如心脏有毛病的人会有明显反应。在睡梦中过了赛音山达、乔依尔两个大站。清晨一觉醒来,车内温度很低,尽管穿着毛衣,仍感到一阵寒意。这时,列车员告诉我们,目的地——乌兰巴托快到了。



大使馆馆员

2月25日上午,列车终于抵达终点站乌兰巴托。

乌兰巴托,蒙语是“红色英雄”的意思。我从书上对她已有所了解:她最早称“乌尔格”(өрөө,即宫殿之意),已建成300多年,这是一个南北短,东



西长的城市,位于肯特山脉图拉河谷。清朝时称其为“库伦”(хүрээ,围场、院落、城镇之意)。

乌兰巴托给人的直观感觉是两个字:“小”和“少”:城市小,街道小,房屋小;高楼少,车少,人少,商店也少。这里有不少欧式、俄式的建筑,比我想象要现代化一些。街上显得整洁和宁静。

使馆办公室主任陈云武二等秘书前来迎接我们。乌兰巴托车站离使馆只有20分钟的车程。当我们还在欣赏城市风光时,车已驶进使馆院内。

驻蒙古大使馆坐落在友谊街5号,在市中心。这是一座二层楼的中式建筑,房檐镶有蓝色琉璃瓦,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正门前方是花坛,中间立着旗杆,五星红旗迎风招展。踏上20多级台阶,可以走到正门。楼两侧有弧形坡道,供小轿车出入。听老同志介绍,刚建馆时我们在现德国使馆办公,50年代末才搬到这里来。这座二层楼当时在乌兰巴托算是最华丽的建筑了。时过了20多年,友谊街上已建起了一些更高的楼,这座楼就变得不那么起眼了,略显陈旧。

使馆办公楼,大家叫“前楼”。进了楼门,两侧是衣帽间,走进去是一个很宽敞的等候厅,再往里是我们举行招待会的大礼堂,大概可容纳四五百人。馆领导安排我和高树茂住在前楼二层的宿舍,上班很方便。

使馆后面有一座三层宿舍楼,叫“后楼”,这是50年代使馆商务处和工人事务处办公的地方,后划入使馆院内,与前楼连成一体。使馆院子占地面积将近4公顷,绕一圈将近400米。

到馆不久,馆长许文益大使接见了我们。以前在书本上知道有大使这个职务,知道是个“大官”,听说大使接见,不免有点紧张。许大使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皮肤有点黑,上海人,军人出身,来蒙前曾在驻刚果使馆任参赞。看得出,他很有外事工作经验,讲话慢条斯理,态度和蔼可亲。谈了一阵以后,我们就不那么紧张了。他介绍了使馆情况,并提出使馆对每个工作人员的要求,鼓励我们努力工作。大使的讲话言简意赅,具体明确,句句说到我的心里,增强了我在新的岗位上干好工作的决心。

来到使馆,就算是大使馆馆员了,感觉挺神圣的。当馆员后有两个明显的感受:一是这里等级“森严”,人们都互称职务。除大使外,还有参赞、一等秘书、二等秘书、三等秘书、随员等级别之分。我们这些刚来的“小萝卜头”对有外交官衔的各级领导都很敬畏。二是纪律严明,事事要请示汇报,出使馆要请假,且要二人同行(但夫妻不算“二人”)。这里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八小时以

外不能绝对“自由”，更不能“彻底休息”，只要领导一声号令，就要立即投入工作。

使馆设有办公室、领事部、文化处、研究室等部门（90年代还增设了武官处）。新华分社在我们院内办公。

我被分在研究室工作。研究室主任王海山是蒙古族，曾在外交学院学习，很有经验。室成员有张德麟，是我熟悉的老领导，我们一起参加过“毛选”翻译。老张夫人乌嫩，是蒙族老大姐，也是我们蒙语界的老前辈。还有李枫，是北京外语学院的俄语老师。我们研究室可以说是人强马壮，精通蒙、俄语，对蒙古情况特别熟悉，是大使的智囊团。在那么多好老师的手下工作，我感到很幸运，决心“拆下大梁当长枪——大干一场”。



当头一棒

到馆不久，我接了一个电话，是乌兰巴托车站库房一位苏侨女士打来的，她略带俄腔，语速极快，听得我“一头雾水”，不知说什么，只好请大使翻译刘振鲁帮忙。其实她是说车站来了我馆的货物，要我们次日去接货，就这么简单。一个在北大学了五年蒙语的翻译连普通的电话都听不懂，真是给我当头一棒！如果说在国内读书时没有蒙语环境的话，如今到了国外时刻被蒙古语所“包围”，还学不好，能说过得去吗？！只怪自己没有很好地利用在蒙古的一切有利条件。此后，我每天“浸”在蒙语里，听广播，看电视，楞往耳朵里“灌”蒙语，久而久之，电话里的蒙语开始听得懂了，还觉得很熟悉，很亲切。经常听广播、看电视这一习惯一直保持了多年，直至退休。回想起来，形成这种好习惯，还真的很感谢这个听不懂的电话，它激励了我几十年……



第一项工作

到馆后的第一项工作是编写《报纸摘要》。每天早晨首先阅读《真理报》、《劳动报》、《青年真理报》、《文学艺术报》、中文版《蒙古消息报》等主要报纸和《党的生活》、《啄木鸟》等多份报刊，从中译出主要内容并编写成《报纸摘要》，油印数份，供领导和有关部门参考。得益于曾在毛选翻译室干过几年，这个工作我很快便能胜任。

《报纸摘要》要求准确和时效。准确即反映的情况要准确无误，符合事实；时效即及时，当天的报纸最迟下午要出，如报纸下午才到也要于当日编译出来。

开始时，我先翻译初稿，经领导核改后用钢板刻在蜡纸上。刻钢板看似容易，其实并不轻松，用力过大会划破，常要多次修改，弄得十分狼狈（唉，假如有计算机又何至于这么辛苦哩）。后来日趋熟练，领导不再过目，直接刻在蜡纸上，时效明显提高。每天报纸一到，我便抓紧时间开始阅读一刻钢板一印刷一发送“一条龙”服务。有时内容多，就得加班加点，饭也来不及吃。为了尽早出手，干到深夜是常有的事。虽然每天干着同样的活，但我一点也没有枯燥的感觉。因为新闻每天都是新的：蒙古的内政外交、蒙古人民建设祖国的进程、蒙古的风土人情，奇闻轶事……都通过我写的《摘要》储存在我的脑海中，这不正是我学习和了解蒙古的最佳途径吗？每天我把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摘要》发到各个部门后，又立刻投入到当天报纸的阅读编写之中。



耐得住寂寞

除了翻译编写《报纸摘要》外,领导让我开始搞点调研,动笔写点东西。

搞调研,即对驻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是公务员的基本功之一。要搞好调研,首先要过中文关,同时,要有较好的综合分析能力。这是件“细活儿”和“苦差事”,要求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要耐得住寂寞。为了掌握更多情况,就要大量阅读报纸杂志等“死材料”,不仅要泛读,还要精读。同时要听广播、看电视,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不论是普通工作日还是休息日,都得干。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有读了大量的报刊,记了大量的卡片,积累了大量素材,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类、梳理、分析、提炼,最终才会有所收获,写出及格的成品。老实说,当时我很年轻,当看到别人在休息、娱乐时,是多么羡慕啊!我也很想出去玩玩,放松放松,但有任务在身,只好放弃休息,继续工作。调研实际上也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要经过长期的锻炼,没有三年五载,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可能取得成功。



“和尚庙”的生活

20世纪70年代外交部规定,使馆只有一等秘书以上的外交官才能带夫人出国,至于带孩子更谈不上。这种“特殊”规定是由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人们形容我们使馆是个“和尚庙”,人人都是“案板上的擀面杖——光棍一条”,不能与家人在一起,生活枯燥寂寞,常常思念亲人。关于休假有这样的规定:如驻在可乘火车抵达的国家如蒙古、朝鲜、越南、老挝等,因离国内近,



可以一年回国休假一个月；驻在其他国家则只能两年休假一次，休两个月。

一些欧洲驻蒙外交官不止一次地问我，“你们中国使馆的人为什么不能都带夫人？”的确，不能与夫人一起出国，这在外国人看来，实在不可想象。

通过外交信使每月送来一次信，这是我们与家中联系的唯一途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其实又何止“万金”啊！）。信使抵馆之日自然成了使馆的“节日”。天天盼，日日想，望眼欲穿，为了取信，有的人连饭也顾不上吃，早早在大厅守候。收到好消息的笑逐颜开，收不到信的忧心忡忡。尽管收信时许多消息都已成“旧闻”，但大家看得津津有味。结婚不久的青年人，一次收不到爱人的信时都快急疯了。就算收到信，遇到大的事情，“远水”又怎能解“近渴”呢？一些人由于长期分居，爱人移情别恋，提出分手，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为了工作，他们只有把悲痛永远藏在心底。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这首诗最能表达我们驻外人员的心境。我从小爱看月亮，它特别圆，特别清澈、明亮，给人以深情，给人以力量。“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之夜，当我与使馆的同志们一边赏月，一边聊天，一起吃着国内送来的月饼时，更加思念祖国和亲人。“月亮代表我的心”。亲爱的祖国，外交战士要为您站好岗放好哨。只要祖国人民能和平、安宁地享受天伦之乐，我们这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此刻我特别想念我的爱妻和儿子，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不可能在这里安心工作。等我凯旋回国时，一定会加倍地报答你们的厚爱！

针对使馆单身汉多，生活比较枯燥，每到节假日容易想家的特点，每逢春节、国庆节等大的节日，俱乐部都要组织丰富多彩的业余文体娱乐活动，如舞会、扑克牌、棋类、麻将、台球、乒乓球比赛等。通过集体活动，既活跃了生活，促进了团结，也使大家少想家。

周末，馆员到郊区“特列尔吉”旅游点、龟山、南山（博格多汗山）游玩，这是大家最快乐的时光。蒙古的夏天景色迷人，绿草如茵，牛羊遍野。来到大自然的怀抱，心情豁然开朗。馆员们到了目的地，就分头活动：有的散步，有的打扑克，有的踢足球，有的钓鱼，有的骑马，各显神通，各得其乐。中午，大家一起野炊，烧烤羊肉串，有时还将刚钓的鱼煮汤喝。吃饭时候到了，大家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平常彼此再有什么疙瘩，都可以化解。使馆就是这样一个集体主义的“铁打的营盘”。

那时蒙古市场商品相当匮乏，牛羊肉多，蔬菜水果少。就是在只供应苏联专家和驻蒙外交机构人员、相当于北京“友谊”商店的十号特供商店里商品也

并不丰富,多是罐头鱼、罐头炼乳之类的食品。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容易缺乏维生素。有一次我馆同志去蒙古医院检查身体,不少人被诊断得了营养不良。为此,部里对我馆生活十分关心,每逢有代表团来馆都捎带些蔬菜或水果给我们。利用离国内近的优越条件,我们定期派人到内蒙古采购食品,同时在院内种蔬菜。中国人是勤劳的,到什么地方都能“生根发芽”。夏秋之际,我们种的菠菜、大白菜、黄瓜、西葫芦、豆角、土豆、萝卜等相继到了收获的季节,我们边收边吃,基本做到“自给自足”。我们种的菜比蒙古市场上的还要好,种类更多。我们还与朝鲜、越南、老挝等使馆相互赠送自己的“产品”,互通有无,既改善了伙食,又增进了友谊。



掏锅炉和造冷库

虽然生活比较单调、枯燥,但使馆绝对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共同的目标,使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士能以乐观的、豁达的态度,团结一致,克服和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中央和外交部赋予我们的任务。

使馆生活中有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其中掏锅炉和造冷库最值得一提。

我馆一直使用50年代建的旧式热水锅炉,每年5月停止供暖后,锅炉底部坑道内积满了炉渣,必须彻底清理干净才能继续使用。怎么办?使馆是外交机构,请外国人来干不方便,只能自己动手。

这一天几乎是全馆动员。年轻同志是当然的主力军。一大早,我们就穿上工作服,准备投入“战斗”。全体人员分成几批,轮流下坑。第一批很快便钻进坑内,由于高度不够,在坑道内只能弯着腰,用一把特别短的小锹,一锹一锹地将炉渣用小桶递送上来。这种活干一会儿就累得直喘气,大汗淋漓。干了20分钟后,第一批上来休息喝水,第二批下去干。再过20分钟,又换一批。中午吃过饭后又接着干。就这样,一直干到太阳下山,最后一车炉渣送上车,才算完成任务。当我们从坑道爬出来的时候,人人都成了“非洲黑人”,身上脸上全是煤灰。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哈哈大笑。劳动完了,我们精疲力



竭,好像被人打了一顿,手脚都提不起来。过了一个多星期,还一身煤味,工作服根本洗不干净,不过没关系,可留到明年再用。

使馆人多,需要储存大量蔬菜,在六七十年代没有大的冰柜。怎么办?我们的办法就是自己打冰造冷库。

三九天,天气奇冷,河上结了厚厚的冰。越是这样的天,冰的质量越好,我们决定马上到图拉河打冰。我们这些长期坐办公室的干部也很想换换“工种”,锻炼一下自己的身板。馆领导一声号令,大家都踊跃参加“打冰队”。吃过早饭,大队人马整装待发。每个人都穿上既能御寒又便捷的大衣和厚毛裤。脚上穿上虽笨重但十分暖和的蒙古毡靴。我们的车队由吉普和货车组成,浩浩荡荡直奔冰面。

破冰队开始干活。主要工具是镐头,大家分成几个小组轮流干起来。抡镐头是件重活,干一会儿,就汗流浹背,有人虎口出血,有人手上起泡,但“轻伤不下火线”,没有一个叫苦的。这时,一块块冰块被装上货车。干到中午时分,货车上已装满冰块。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们打心里高兴。这时,办公室主任一声命令:“返馆!”车队立即“打道回府”。回馆后把冰块摆放在预先准备好的菜窖里,一个天然冷库就这样“建成”了。

劳动创造财富,劳动使人身心愉悦。在国外使馆的特定环境下参加体力劳动,更有意义,令人难忘。



扫雪、植树和迎送战友

在使馆,扫雪、植树和迎送战友,也是值得我回味的、颇有意义的活动。

每到冬天,蒙古经常下雪。有些年头,雪特别多,三天两头就下起雪来。头一晚天还很晴朗,第二天一早起床就见窗外白雪皑皑。雪后的蒙古,“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大地银装素裹,风景煞是好看!不过,下雪也给我们造成不少麻烦。院子里积雪过多,车子行走不便,特别是大门前的路段影响客人进出我馆。因此,扫雪是我馆冬天一项“经常性”的任务。

馆办公室为此专门制订了各部门负责扫雪的“责任区”。清晨,馆员们只

要看见下了雪,就立即行动起来。下雪,就是命令。同志们除了手头有工作者外,不管你是什么职务,是干部还是工人,是领导还是群众,“男女老少”齐上阵,毫不例外地走出院子,投入扫雪的队伍。此时,有的拿笤帚,有的拿铁锹,有的拿起我馆自制的扫雪板,热火朝天地干起来。有的同志还主动拿来手推车将积雪运到树下。在大使馆,“各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是行不通的。扫完“责任区”的雪以后,大家还要继续打“歼灭战”,沿着近400米的院子扫出一条宽约1.5米的通道来。不一会工夫,就“大功告成”。

到了21世纪,馆领导为节省大家的劳动,想到欧洲买一台扫雪机。但一打听,价格不菲,只好作罢。就这样,扫雪的“光荣传统”就一直传承了下来。

至今虽离馆多年,但扫雪的热闹情景仍印象深刻,难以忘怀。扫雪劳动,起码有两个好处:一来可以锻炼身体,舒展筋骨;二来可以培养团结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确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活动。

记得第一次到馆不久我就参加了植树劳动,时间在4、5月份,比国内3月12日植树节时整整晚了一个多月。我们经过蒙古外交部服务局从市园林局买来了松树苗和杨树苗。先要挖出深一米半的树坑。挖坑并不轻松,挖到半米时,石子很多,镐头都下不去,每一镐下去,费力不少。不过我们每个部门每个同志都按质按量完成了任务。

树种下以后,重要的是保证成活。使馆的锅炉工师傅负责定期浇水,精心地保护树苗的成长。但是由于蒙古气候十分干燥,加之地下石子太多,树根扎得不深,几经风雪,到了第二年,成活的还不到20%。

我们并不气馁,第二年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再一次补种了新的树苗。过了一两年,又继续补种。就这样,死了再种,反反复复,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院内的树木郁郁葱葱,使馆的环境更加优美。

植树劳动,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启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人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经过不懈的劳作,才能逐渐做到“天人合一”,让自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使馆是一个“铁打的营盘”,不断有老的同志离开,又不断有新的同志到来,补充新鲜的血液。

在我们使馆,已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一些“规定”。一是新到馆的同志,由其工作部门的同志负责迎接的事宜,包括食、宿等。新同志普遍到馆的当晚,使馆的领导和同志们都要看望他们。新同志普遍反映,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同志们热情问寒问暖,感到亲切,也很受感动。二是对离馆的同志,全馆同志



要会餐一次以示欢送。用餐时，馆领导要发表讲话，对其作出评价并予以鼓励。走的同志也要谈谈感受。全馆活动之外，本单位同志还要进行单独的欢送活动。记得1978年11月我第一次从蒙古回国前，相处得不错的伙伴们为我饯行，想着法子逼我喝酒。想到要与几年相处的战友们分别，马上就要回家了，百感交集，“有史以来”第一次喝吐了。20世纪90年代后，使馆馆员生活管理实行改革，增加了生活费，馆员的伙食自理，再不搞“大锅饭”。此后，基本上不再搞全馆会餐，但在一定的场合，如遇全馆对外活动，一并对离开的同志表示欢送。三是馆员休假回馆时，同志们也要去看望。一来通过谈天了解国内形势和本部门近况；二来因蒙古水果奇缺，回国的同志带来些水果给大家“尝尝新”。进入21世纪，随着使馆改革的深入，乌兰巴托的供应大有改善，再没有必要让同志们花那么多的精力从国内捎水果到蒙古来。这种“看望”回国休假同志的方式也逐步改变。

我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从事不同的工种，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通过几年的共同生活建立起来的战友情谊，也十分值得珍惜与怀念。直到如今，我们这些有着“蒙古情结”的“老蒙古”几乎每年都聚会一次哩！



初次上阵

1973年夏，领导让我陪同吕子波政务参赞同蒙外交部服务局就我华侨培才学校移交蒙方问题进行谈判。

初次上阵，未免有点仓促，准备不充分。蒙服务局副局长讲了一连串学校房子的历史及前期交接的过程，由于我对背景不太熟悉，翻译起来并不顺畅，有些话未听明白，紧张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幸好对方翻译是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人员、懂中文的强查拉女士，有她在旁“补台”，总算完成了任务。

这次上阵，使我明白，作为译员掌握词汇和翻译方法固然重要，但了解和掌握情况，熟知事件来龙去脉，更为重要。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此后，我每次翻译都做到“不打无准备之仗”，进行认真的准备。就这样，我逐渐“进入情况”，翻译水平明显提高，顺利完成了整个谈判任务。



第六章

边界联检

边界沿革

关于中蒙边界,1962年底两国正式签订边界条约以前,蒙方一直认为,两国边界“早已划定”。双方已于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当时的中国政府换文中关于在中国政府承认蒙古独立之后,蒙古“即以现在之边界为边界”的规定明确划定。但实际上换文并没有对中蒙边界的具体位置和走向有所规定,也没有附载任何划界地图。因此,当时中蒙两国之间并没有经过两国谈判并正式勘定、能为双方共同承认的边界线。

新中国成立后,中蒙两国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1953年,蒙方撤销了其部署在与中国接壤地区的边防部队,两国边境上出现的一些问题,由双方的边防站代表协商解决。但由于双方对边界线的认识不同,中蒙边界各个地段,特别是西段,如新疆北塔山、青河县、大沙尔布拉克等地段曾发生过边民越界放牧和从事其他生产活动的边境纠纷。这样,通过谈判正式划定两国边界的问题就提上了日程。

自1957年起,中蒙双方多次互换照会,就边界谈判问题交换意见,提出建议。至1962年,双方就谈判的级别、时间和地点达成了协议。同年10月,双方派出了以副外长为团长的代表团在乌兰巴托进行谈判。双方根据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和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30多天的友好协商,最终就两国全部边界线的划法达成了协议,双方团长就谈判的结果签署了会谈纪要。1962年12月26日,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访华,在北京同周恩来总理签订了中蒙边界条约。1963年3月,在乌兰巴托互换批准书。双方高度评价边界条约的签订是

双边关系中的重大事件。随后,从1963年起,召开了3次联合勘界委员会会议,签署了会议纪要。勘界工作完成以后,1964年6月30日,两国政府全权代表姬鹏飞和索苏尔巴拉木签订了《边界议定书》。至此,中蒙全长4676公里(2005年经第二次联合检查后确定边界长为4710公里)的边界线走向与界标位置全部确定,中蒙之间圆满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寸土不让

根据《议定书》第40条规定,双方边界确定后应每隔5年进行一次联合检查。但由于各种原因,1964年议定书签订后已过了近20年,并未进行过边界检查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界河河流改道、界桩损坏等界线不明确的现象,急需协商解决。

进行边界联合检查的建议首先由蒙方提出,中方表示同意。经双方多次协商,1982年2月18日,两国边界联合检查委员会在乌兰巴托举行首次会议。这是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后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双边行动,表明了双方改善关系的诚意,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

参加此次会议的我方首席代表是外交部条约法律司资深专家程文津,蒙方首席代表是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尼亚木道。我方代表有吴文彬、宋澜、唐再璜、张瑞琏、郭春元,专家宋光中、杜志平,秘书张光明、张友庆,翻译有白羽翮和我,分别由外交部、总参测绘局和新疆、内蒙古等地方主管同志组成。蒙方顾问策登依什,代表桑加、巴达木扎布、达希达瓦、拉格查,专家古尔斯德、鲁布桑、拉木扎布,秘书达木恰巴德嘎尔,翻译默德勒尔特、阿勒玛斯。

2月18日,联委会举行首次会议。经历过两国关系近20年恶化与冷漠,会议开始时气氛冷淡。由于相互不摸底,双方首席代表的开场白都讲得很“原则”,各唱各的调。代表们脸上表情严肃,你瞪着我,我瞧着你,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特别是谈到边界出现的具体问题时,往往都将业务问题“政治化”,把造成的责任推给对方,使本来冷淡的气氛似乎凝结了。

边界联合检查的谈判,关乎国家领土主权,每一个谈判代表都深知自己肩



负的责任。“寸土不让”，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原则，绝不能让祖国的一寸土地在我们的手中丢失，成为千古罪人。

联委会会议中，最棘手的要数界河改道和调整岛屿沙洲面积，因为这涉及领土问题。如位于东部的561—562号界标间的哈拉哈河有3处严重改道，579号界标附近的一段中方河岸被严重冲刷。由于河流改道，原河床干涸，双方一些岛屿同对方的陆地相连。根据双方商定的原则，河流改道后应以现河道中心为界，同时要将新出现的岛屿和沙洲归属进行调整。商谈时，双方人员争论得面红耳赤，都坚持己见，各不相让。

再一个是联检队组的组成、指导原则和工作任务。这本来属于技术问题，但由于双方信任度不高，所以诸如人员组成、工作职责、联检队组会的工作程序等问题都涉及“原则”，都要引起争论，往往长时间确定不下来。

就这样，本来可以一天完成的任务，要拖延到两三天甚至四五天。会议开了十几天后，不少问题都留了“尾巴”，未能解决，结束的时间迟迟确定不了。一旦僵持不下，我们提出需向北京请示，建议休会。蒙方也表同意，他们一方面可请示领导，另一方面得到喘息的机会。

会议分两个组：一个界务组，另一个技术组。界务组涉及边界领土调整的原则问题，发生争论和僵持不下的情况最多；技术组主要是测绘技术问题，勘测和制图等虽也涉及主权问题，但总的来说争论少一些。

会议最后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形成最后文件——《纪要》。这个时期，双方的秘书和翻译最忙。首先由我方提出初稿，蒙方研究后提出一个新的意见稿。双方要将两个意见稿进行对照研究，提出本方的方案，然后双方以秘书为首的“秘书团”开始坐在一起，字斟句酌，逐字逐句进行修改。要想达成协议，双方都要作出妥协，以便找出共同点。为完成《纪要》的一个段落，常常要挑灯夜战，停停打打，打打停停。这种“马拉松”式的谈判真是苦差事，但很能磨炼人的耐性与毅力。当我们经过“奋斗”，拿出一份双方达成协议的《纪要》稿时，不少人都瘦了一圈。不过，我们也为完成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重要使命而倍感欣慰。



“准测绘专家”

两名翻译中老白负责边界事务,主要陪同首席代表;我负责技术组。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主要碰到的是从未接触过的边界测绘方面的专业词汇。面对诸如“坐标”、“方位物”、“三角锁”、“导线”、“方位角”等词汇,简直太难了,我连其具体含义都弄不清,更不用说翻译了。幸好蒙文科技词大多借用俄语词汇,而代表团中宋光中专家的俄文功底很深,当我碰到困难时,老宋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平时他还毫无保留地教我有关俄语词,并解释其中文含义。由于他的指点,弄懂了不少词的意思。经过点滴积累,我还整理出一本中、俄、蒙文对照的三国测绘词汇“小册子”,内收集了中、俄、蒙语词各 1000 多个,可惜离开联检工作后再没有机会将其加以充实完善,不然还真可以出一本书哩。

有趣的是,联检第一次会议结束前,专家们决定“授予”我“准测绘专家”称号。这个象征性的“荣誉称号”,是对我辛勤劳动的肯定,我很感满足。



谈判期间小儿子呱呱落地

我准备出国参加此次联检会议时,正是夫人何思红的临产期。她是高龄产妇,身体又不太好。在这个关键时候,她当然不愿意我走。但由于日期临近,边界谈判翻译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我为此已准备了数月,临阵换兵,不利于工作,条法司领导希望我如期赴蒙。没有别的选择,为她请了个保姆,我就匆匆出发了。到了乌兰巴托后,我不断打听有关消息,默默地为妻子祈祷。就在我们联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第 6 天,1982 年 2 月 23 日,我们在乌兰巴托紧张地举行谈判时,我的小儿子呱呱落地! 当得知夫人顺利产下一男婴,母子平



安,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双方代表团成员得知我当爸爸后都纷纷举杯向我祝贺。

40多天,当我胜利完成联委会第一次会议的任务,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时,小儿子已过了满月。望着活泼可爱的儿子和疲惫不堪的妻子,我无言以对。除了感激、歉疚,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妻子很理解我,她自始至终不愿告诉我走后她遇到的困难和麻烦,怕我分心,独自默默地承受了一切。后来我才知道,从南方请来的保姆只会做粗活,不会做饭,连最起码的炖鸡汤都不会。我妻子在整个产假期只吃过一次鸡汤!为此,她产后身体虚弱,至今落下了腰肌劳损病。我欠她太多了,我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

我也愧对我两个心爱的儿子。选择了外交这个职业,就意味着牺牲和奉献,长期不能待在他们身边,让他们吃了许多苦。我也是个不称职的父亲。



欢声笑语和摔跤比赛

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气氛与过去相比有了改善。双方人员逐渐相互熟悉,甚至摸透了对方的脾气,那种互不信任的状况有了变化。蒙方人员逐渐理解了我方的诚意。他们明白中国确实是希望搞清边界线,促进睦邻友好关系发展的,并非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谈判休息时开始有了欢声笑语。蒙方专家拉格查、鲁布桑和翻译阿勒玛斯都是滑稽幽默的“活宝”。每到休息时间,他们就进行角力。阿勒玛斯俄文名是“金刚石”的意思,他臂力过人,许多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这一次我们开始一个新项目——摔跤。阿勒玛斯又是首当其冲,大家都拿他当靶子。大个子鲁布桑也有相当的实力。中方代表团成员实力较差,不是阿的对手。

技术组因有许多具体技术问题要商谈,所以会议特别多。会议在二连和扎门乌德轮流举行,我们要在两国“国门”之间来往穿梭。冬天,我们乘车从二连出发,蒙方人员来到357号界标处迎接。吉普车踏着约半尺厚的积雪到达扎门乌德车站。开完会,我们又回到二连歇息。夏天,我们驱车走过国境

线,蒙方人员照例前来迎接,下车后踏着软软的细沙,缓缓走到扎门乌德车站。见面多了,双方人员十分熟识,可以互叫绰号,甚至相互打闹。这种气氛同开始时剑拔弩张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

1982年4月3日,经过40多天的谈判,双方克服了分歧,解决了有关边界联检的所有问题,签署了边界联检第一次会议《纪要》。

《纪要》洋洋92页,包括正文30页和附件62页。《纪要》确定了联检的任务、联委会工作程序、工作原则与作法、联检组划分、测绘工作技术要求等诸多问题。附件中详细叙述了联检登记表填写规定、增设边界附标一览表等。《纪要》的形成为以后实地开展界上检查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联委会第一次会议结束的宴会上,大家举杯畅饮,用中、蒙文同唱《东方红》和《十五的月亮》。歌声是那样的和谐、悠扬,这是两国人民友谊与合作的缩影。

我从1982年2月起参加中蒙联检工作,一共干了一年半。1983年8月,外交部调我去驻蒙古使馆工作,我不得不告别日夜相处的同志们和朋友们。一年后,1984年7月,两国政府全权代表在北京签署了中蒙第一次联合检查议定书。这是中蒙两国重要的法律文件之一。至此,中蒙边界联合检查的全部工作宣告结束。

第一次边界联检工作圆满完成,在两国关系史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是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和困难后一次有历史意义的突破。

一年半的边界联检工作给我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这次工作实践对我的锻炼是多方面的,虽然已经过去了20余年,但至今仍历历在目,唤起我许多关于中蒙两国关系的美好记忆。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20年后,我与参加第一次联检的蒙古朋友们相聚在中国大使馆时,大家不约而同地谈起当时的情景,感慨良多。可惜业务、人品都很好的巴达木扎布专家已离开人间,永远不可能参加我们的聚会了。

我在使馆工作期间,每到中国的节日,蒙古朋友们都要来电话祝贺。其中测绘专家拉木扎布与我保持了经常联系,遇到问题就来电找我帮忙。后来他因患心脏病辞世,我亲自到他家向其家属表示哀悼。这些交往,都是源自于20年前结下的深厚情谊。



第七章 二进蒙古

大使翻译

1983年8月,根据工作需要,我第二次踏上征途,到驻蒙古使馆工作。由于“文革”期间干部提职处于停顿状态,“文革”后一律按规定予以纠正。此次我的职务一下子从普通科员提为二等秘书,连“升”三级。我已到不惑之年,自知应格外珍惜这大好时光,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出色。

我仍被分配到研究室,不过任务更重了,要当李举卿大使的翻译。

当大使翻译,实际上也是首长的秘书,要参与大使大部分对外活动。李大原部是部新闻司副司长,之前曾在驻芬兰和波兰使馆工作过,是一位富有外交经验的老前辈。他懂俄语,可用俄文同蒙方和使团人员自由交谈,我主要负责蒙语的翻译工作。

李大使对手下工作人员很平易近人,也很民主。平常与我们打成一片,一起打球,一起散步,一起活动,但对工作的要求很严格。尽管他对我们的缺点批评起来很严厉,但我们对他都很服气。他很善于发挥大家的积极性,使大家工作起来心情舒畅。我很庆幸在这样好的领导手下工作,能够更快地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和素养。

我每天的工作大体是:上午给大使读蒙文报,介绍报上的重要新闻、蒙古国内大事及蒙报道的国际时事;跟随大使出席对蒙双边活动,会见蒙方领导人和各部门负责人;撰写大使活动简报,起草报回国内的电文。

1987年,使馆报部批准晋升我为一等秘书兼研究室主任,同时仍继续当大使翻译。

大使翻译同研究室主任的任务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负责大使的对外事务,能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和事,了解更多驻在国的政情与民情;而熟悉更多的蒙上层人物和外国使团的官员,在翻译工作中就更能有的放矢,做到游刃有余。这一段工作经历,对我日后完成更繁重的任务弥足珍贵。

20世纪80年代初至中期,中蒙两国关系虽有所改善,但意识形态的分歧依旧,矛盾斗争不可避免。在这个时期,我经历过两次重要的交涉。



关于苏联从蒙古撤军的交涉

1984年3月2日,云登第一副外长约见李举卿大使,递交了蒙古政府就中苏即将举行第4轮磋商发表的声明,声明中称蒙古“断然拒绝”中方在磋商中提出苏从蒙撤军的要求,说中方的要求是“干涉”蒙内政。

众所周知,从1982年起的中苏政治磋商中,中方向苏方提出了消除“三大障碍”问题,即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联从蒙古撤军;在阿富汗问题上找到合理解决的办法。中方的要求合情合理,充分表明我们改善两国关系的诚意。但苏方不仅极力回避,而且还指责我设置“先决条件”,振振有词地提出两国关系正常化“不应损害第三国利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蒙古自己主动“对号入座”,为苏帮腔,并攻击我“干涉”蒙内政。

李大使首先表示对蒙方的“声明”不能接受,并给予了严正批驳,指出中方提出这个要求是中苏两国关系中的现实问题,并不涉及第三国。苏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是针对中国的,对我国安全造成了直接的威胁,中方理所当然地对苏方提出从蒙古撤军的要求,这是苏为消除对中国威胁的真正诚意的表现。

李大使还指出,中方一贯承认并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点毋庸置疑。中方也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发展对蒙关系。

云登再次阐述了蒙方立场,重复了其声明的内容。李大使表示,蒙方对中方的指责是无理的,中方不能接受。中方提出消除“三大障碍”问题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我们希望双方本着向前看的精神处理好两国关系问题,使



中蒙关系沿着正常化的轨道前进。

1986年7月28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发出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信号。蒙古政府当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表示蒙苏双方正在讨论苏从蒙撤军的问题,这是对整个亚洲和太平洋的安全和加强亚洲相互谅解和睦邻关系作出的“贡献”。



一幅地图引起的麻烦


1985年,我《世界知识》半月刊第9期刊登了一篇介绍抗日战争的文章,并配发了一幅抗日战争形势图,图中显示的中蒙边界线用虚线标出。就是这条用虚线标划的边界图引起了一场外交交涉。

5月16日,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额尔登楚龙紧急约见李举卿大使,对我在《世界知识》期刊中未标出中蒙国界线表示“抗议”。我将蒙方的讲话内容准确地给李大使作了翻译。

李大使表示,尚不了解蒙方所谈的情况。在尚未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不能接受蒙方的“抗议”。并指出,期刊中所标出的地图只是按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实际情况进行标划,符合历史事实。期刊作者只是表明自己的历史观点,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1949年两国正式建交,1962年两国签订边界条约,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完全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额再次强调蒙古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希望中方今后在刊物中不再出现这样的政治错误。

蒙方对历史问题历来非常敏感。60年代两国关系恶化期间,蒙曾就历史问题发表过声明。如1964年9月蒙古通讯社就毛泽东主席当年同日本社会党人谈话发表声明,称我“觊觎远古以来就有独立历史的蒙古”,“继承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蒙方对我国出版的一些教科书中地图的标划及一些书中谈及蒙古独立问题的言论多次提出交涉。我对此进行了驳斥,指出学者的言论并不能代表官方,而且学者的论述也都是基于当时的历史事实。两国史学界对历史有不同的评价和看法是正常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但这与当前外交关系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中国一贯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的立场不会改变。

蒙方对历史、地图问题的强烈反应也引起了我有关部门的警觉。此后,我一些出版物中的提法及所附的地图等材料都注意尽量避免引发不必要的外交交涉。



解冻从文化学术部门开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加之中蒙双方都抱有改善关系的愿望,两国关系开始“回暖”,基本处于“冷而不断”时期。所谓“冷而不断”,即指关系虽冷淡,但并未中断,如贸易、气象等部门始终保持了联系,例会如常举行,两国关系逐步改善。过去大使出席蒙方会议或集会时,往往要退场以示抗议,而现在集会上基本不指名反华了,大使可以自始至终地听完讲话。

文化艺术是“无国界”的,最易相互融合和沟通。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文化团体的互访和学者之间的交往与学术交流逐步增加。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对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交流和磋商,有利于促进双边关系的恢复。两国关系的解冻正是从文化学术部门开始。

1984年11月,中国摔跤队访蒙,进行7个级别的自由式摔跤比赛;12月,“中国工艺美术挂屏展览”在乌兰巴托举行。1985年2月,蒙著名画家楚勒特木个人画展在北京开幕;9月,蒙古国家民间歌舞团在华演出;12月,我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艺术团访蒙。1987年4月,中国现代画展在乌兰巴托举行。1988年3月,蒙古艺术团在北京和呼和浩特进行访问演出;5月,中国青海省艺术团在蒙古访问演出。1989年6月,蒙古“友谊”文化娱乐中心艺术团在中国演出;7月,中国蒙古文书展40年来首次在蒙举办;12月,蒙古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达什泽伯格率蒙体育代表团对华进行友好访问。这一系列文体交流,为两国关系的改善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利于增进相互了解。

中国驻蒙古使馆也利用自身的优势开展学术交流。譬如,对中共八大的



召开,蒙一直给予积极评价,双方有共同语言。1986年8月,蒙中友协和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联合举行中共八大召开30周年学术讨论会。我馆派张德麟参赞和我出席。我在会上用蒙语作了关于八大的发言,阐述了我党八大的历史意义,宣传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做法。由于语言相通,我的发言受到蒙学者的欢迎。

此外,结合我国的节日或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日,如国庆节、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五一”劳动节、“三八”国际妇女节等,我馆同蒙有关部门共同举办研讨会。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沟通形式,收到较好的效果。



忠孝不能两全

1984年5月17日,广东老家通过外交部向使馆发来了关于我母亲病危的电报,要我火速回老家。得知此情,我心里真是火急火燎。我多么想回家去见上母亲最后一面啊!但冷静一想,此时我工作正忙,况且一周只有两趟回北京的火车,最快也要3天时间才能回到北京,即使回去也恐难以见上母亲一面,我告诉兄长,决定不回去了。

5月18日,母亲溘然长逝,享年79岁。得知母亲病逝的消息,我强忍悲痛,拼命工作,以期用我的忙碌减轻痛楚。


夜深人静,看着母亲的照片,睹物思人,百感交集,母亲的身影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母亲是世上最好的母亲。从小我这个“老疙瘩”就得到她体贴入微的关怀和爱护,是她使我真切地感受到母爱,体会到家的温暖。

记得念初二时一次我中暑发高烧,又是母亲带我去看病,亲自给我熬药,夜里一听到我呻吟声,她就立即过来给我喝水,擦汗。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的烧退了,可母亲明显消瘦了。

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北大念书暑假回到家,母亲见我瘦了,难过得掉泪。她赶紧用家中仅有的肉票买了鸡肉、猪肉炖给我补身体。

听兄长说,母亲临终前不断喊我的名字,在她的内衣口袋里唯一的物件是



一张我的照片……听到这,我哽咽了。亲爱的母亲,我又何尝不想回到您的怀抱!

回国休假后我立即赶回佛山。当我捧起母亲的骨灰盒时,泪如泉涌。我在心里呼唤:“亲爱的妈妈,儿子回来看您来了,请您原谅,忠孝不能两全啊!我在蒙古为国站岗放哨,为了更好的家庭得到和平与安宁,顾不得我们的小家了。您老人家安息吧!我永远是您的好儿子,绝不辜负您的教导和期望。”



十年磨砺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大约十年光阴,我两次在使馆负责调研工作,从翻译《报纸摘要》、写《会见会谈记录》,到编写《情况摘记》,直至撰写调研成品,经历了一个锻炼与磨砺的过程。

开始学写《会见会谈记录》,因有些讲话听不清或记不准,只凭“记忆”或“想象”去整理,写出的《记录》到了领导那里过不了“关”。怎么办?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全神贯注,会见时尽量听准确;二是厚着脸皮问“当事人”(谈话者)。但当事人只能把他讲的内容告诉你,如他不懂蒙语就无法将对方谈话内容告诉你。要写出合格的《记录》,关键是提高蒙文听力。经过多次实践,我逐渐摸出了“门道”,写出了符合要求的《记录》。

编写《情况摘记》是张德麟参赞倡导的一种调研形式。内容包括会见会晤以及蒙古和外国报刊报道的有关情况,是使馆各级领导了解蒙古国内外大事的主要参考之一,也是各部门进行沟通的好形式。这种材料要求少而精,时间、地点、人物要交代清楚,谈话内容要简明扼要,让人一目了然,最后提出看法及处理意见。后来我负责研究室工作后,也一直倡导大家写《摘记》。要写好《摘记》,必须加大交友的力度,做到广交和深交朋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写出质量上乘的材料来。

近十年的调研实践,使我体会到,调查研究的目的是通过问题、事件或人物的表象探求其实质,提出看法、结论及处理意见,供领导研究参考。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老同志在调研方面很有功力,转眼功夫,就能妙笔生



花,写出一篇篇好文章来,而领导对他们写出的东西几乎不必作任何修改。对此我十分钦佩。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他们经过了长期的磨炼。常言道,“不经风雨,哪能见彩虹?”要做到“神奇”,决非一日之功。

外交调研专题成品,起码有以下标准:一是开门见山,直接切入主题,不能冗长拖沓;二要言简意赅,言之有物,不靠舞文弄墨,不许堆砌辞藻;三是语言流畅,文笔通顺,不说啰唆话、多余话;四是实事求是,以事实说话,丁是丁,卯是卯,来不得半点虚假或故弄玄虚。

在调研过程中,我曾走过一些弯路:一是在尚未获得全面和详尽的材料的情况下就急于研究和下结论;二是往往先下结论后才去找“根据”。这都是违反唯物辩证法和客观规律的做法。

毛主席说,研究问题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要做到尽可能掌握所有素材,从中找出其规律性的东西,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结论做出来以后,还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你的结论是否正确。

譬如,研究一国的政治形势,要将执政党的主张、党内各派的共同点与分歧、各在野党的情况和政见、执政党同野党的矛盾以及政府、议会内的各种政见与矛盾归纳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然后结合执政党历史、历届政府的施政理念、纲要和主张以及主要领导人的言论,作出推断,提出看法。这样得出的结论才经得起推敲。

再譬如,研究一国经济情况,要将近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政府经济政策及近期采取的措施,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农牧业产值、外贸总额、消费指数、通胀率等数据归纳起来进行分析,再将这些数据同去年或前几年同期的数字进行比较,然后得出经济是向好的方面还是向坏的方面发展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根据国际上流行的理论与方法,对一段时期的经济形势走向进行预测。

十年的磨砺,收获颇丰。经过领导的培养和自身的努力,我提高了政治与业务素质,为日后接受更艰巨的任务打下了基础。

第八章

外交译员



翻译是交流的“桥梁”

外交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工作,因而外交译员可以说是一个“特殊”工种。外交工作和外交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外交译员有与一般翻译不同的特殊要求。读者们或许听说过,周总理对翻译人员要求特别严格,在会见外宾时若遇到不称职的译员,立即不留情面地把他换下去。为什么?因为翻译是双方交流的“桥梁”,不称职的翻译无法使双方正常沟通,必须撤换。

外交译员,首先要忠实于原文,忠实地执行和宣传本国外交政策,要使对方完整地领会我方阐述的内容。为了完成好这个任务,翻译时,在不影响原话的基础上可适当“把关”。当主人说得不完整或准确时,在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譬如,主人在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只讲了四方面的内容;讲我党对外交往四项原则时只讲了三项,翻译可以将完整的内容翻出来。又譬如,主人在祝酒词中由于对蒙古朋友的名字记不住而没有讲全时,为表示对对方的尊重,译员应把全名念出来。

我在翻译中有一个体会,要100%地把双方的谈话准确、完整地翻译出来,确实不易,但是对一个合格的翻译来说要尽量争取达到90%以上,不能随便地“添枝加叶”,更不能“胡言乱语”。



前人的教训值得记取

章人毅

历史文丛

我刚到馆时,馆内主要由两名同志任大使翻译。我是个新手,口语翻译机会并不多。后来随着人员的调动,我开始参加部分口译工作。我曾陪张伟烈大使出席了几次蒙方集会。70年代冷战时期,蒙古领导曾追随当时的苏联,把矛头指向我国,指责我推行“霸权主义”。在此情况下,大使出席集会时退场是家常便饭。我们当翻译的“主要任务”是竖起耳朵,细心地听发言者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一旦听到有攻击我国的内容,立即翻译给大使听,大使当即退场以示抗议。所以在这个年代,翻译的工作十分重要,是一项涉及对外表态的政治任务。

谈起参加蒙方集会,老同志常跟我们谈起一件事:有一次,一位翻译陪同大使出席集会时听到报告人讲到“印度支那”(蒙语词组 энэтхэг хятад,其中 хятад 一词又是“中国”之意)一词。当翻译同志听到其中的“中国”一词后就认为是蒙方反华,立即告诉大使离场。第二天,越南使馆同志告诉我们,昨日蒙方只讲“印度支那”,并未攻击中国,报纸来后一看果然如此,遂知道翻译有误。应该说,这个“洋相”出得不小。

这个教训的确值得我们记取。以后凡新同志到馆,老同志必介绍此事,以此为戒。有了这个教训,每次我们都好似“拿着鹅蛋走冰路——特别小心”,生怕出差错。出席集会前我对会议有关内容均作准备。蒙语有一个特点,谓语句即动词在句子的结尾部分,所以听讲话时一定要听完全句后才能理解整句话的含义。“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由于认真对待,此后我们再没出现过类似错误。



给副外长当译员

给副外长当译员

五井蒙古

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后,中苏关系出现了转机。在这样的背景下,1986年8月7日至10日,我国副外长刘述卿访蒙。这是两国关系朝着正常化方向发展的重要事件。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访问的接待工作,给刘副外长当译员。这也是我首次参加重要的会谈翻译,既激动又有点紧张。

访问的“重头戏”是双方副外长举行会谈,刘副外长的谈话对手是蒙古外交部副部长云登。

刘副外长曾任驻波兰、挪威、孟加拉等国大使、亚洲司长,是资深外交家。他充满睿智,说话条理清晰,颇有谈判才能。云登副外长文质彬彬,在蒙外交部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经验。双方在会谈中回顾了近年来两国关系所取得的进展,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3轮会谈。由于此次访问是在双边关系出现转机的时刻举行的,双方在谈话中对意识形态的分歧只是点到为止,都不主动挑起争论。

刘副外长强调,中蒙之间不存在什么障碍问题,我国坚持睦邻政策,相信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中方提出了通过经贸、文化、人员交往3个方面改善双边关系的建议。蒙方对此作了回应。由于双方都表现出了诚意,会谈气氛友好,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会谈前,我把一些常用的外交政策、条约协议和政治词汇、辞藻收集起来预先熟读,特别重要的还背诵下来。翻译中,我尽量注意将每句话完整地翻译出来,力求用准确的中、蒙文词语来表达。我没有专门学过速记,就自己创造了几种“符号”,将较长的词语用简单的文字记下来,以防止讲了头忘了尾。

第一次出席“大场面”,心里未免紧张。尤其是蒙语很好的老同志坐在我身边,有点不自然,生怕翻错。有些句子,翻译得不太顺畅。还好,乌嫩同志在我突然出现“卡壳”时给我“提词”,帮我度过了“难关”。



副委员长访蒙

1987年6月18日至25日,彭冲副委员长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蒙古。这是中蒙两国关系恶化以来我到蒙古访问的最高级别代表团。代表团成员有副外长符浩、人大常委钱敏、章瑞英,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主任巴图巴根等。

此时我在使馆任一秘,部里决定让我任主要翻译。因这次是60年代以来我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蒙古,国内相当重视,同蒙方多次进行磋商,确定了会谈的主要内容和访问日程。为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使馆原本有让我到欧洲采购的“美差”也因此给“冲掉”了。

蒙方对彭副委员长一行给予很高礼遇。代表团下榻“大天口”国宾馆单独的一幢楼内。“大天口”国宾馆是蒙古的“钓鱼台”,由我国工人援建,楼内的地毯都是中国地毯。彭副委员长访问期间向苏赫巴托、乔巴山陵墓献了花圈,同蒙大人民呼拉尔主席阿勒坦格尔勒举行了会谈,受到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巴特蒙赫的接见,参观了“戈壁”羊绒衫厂,并到牧民家做客。蒙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秘书长高陶布全程陪同。

彭副委员长在会谈中强调中方真诚地希望改善同蒙古的关系,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抱着加深了解、增进友谊的真诚愿望前来访问的。”他赞扬蒙古人民在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取得的显著成就,同时还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形势,阐述了我人大与世界各国议会发展交往的主张。蒙领导人表示将坚持同中国发展睦邻关系和互利合作的路线。

彭副委员长访问牧民巴特尔家时,主人按蒙古习惯向客人敬献哈达,彭副委员长喝了他家自制的浓烈的马奶酒,品尝了奶食品,同他的家人进行了亲切交谈,询问了生产队牧业发展和牧民生活情况,并同他们一起照了相。陪同访问的新华社记者把这一生动的场景拍摄了下来,其中也给了我一张。就是这张陪同彭副委员长访问牧民家庭的照片有幸于2004年1月4日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中国翻译成就展”外交部展区中展出。这是中蒙关系走向正常化的珍贵见证。

为了接待好首长,我们在礼宾生活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如知道首长在傍晚要有一段较长时间歇息,事先同对方一起在日程中作了安排。另外,我们还为首长准备了一些外国电影片影碟备用。

彭副委员长访问期间,我全程给团长当翻译,不仅当“舌头”,而且也当“参谋”,向代表团同志们介绍蒙古的有关情况。在参观时我还是个“向导”,介绍街道、建筑的历史和具体方位。彭副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可他对我们翻译人员很尊重,谈话时,讲到一段,即停下来,等我翻。我有不清楚的地方他还耐心地向我解释。宴会时他专门让出时间叫我吃饭。他还亲切地称我为“小黄”,使我十分感动。

因有了接待刘副外长的经历,此次翻译过程比较顺利。访问结束后,我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包括如何进行翻译、接待代表团事项,直到如何写访问简报等都一一进行了回顾。通过总结,对今后完成高级代表团的接待任务大有裨益,积累了经验,增强了信心。



接待奥其尔巴特主席

1990年5月4日至7日,蒙古国家元首——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彭·奥其尔巴特访华。

1989年秋冬,在苏联、东欧发生动荡的影响下,蒙古也发生了“民主化”运动。这场席卷全国的风暴使以巴特蒙赫为总书记的人民革命党政治局宣布总辞职,导致政府改组。奥其尔巴特当选国家元首后一改领导人先到莫斯科“朝拜”的惯例,根据中方对巴特蒙赫原主席访华的邀请,决定将中国作为访问的第一站,中方对奥访华表示热烈欢迎。

此时,我在亚洲司一处任副处长。领导决定由我任主要翻译。我一边要配合礼宾司做日程安排工作,一边加紧作翻译的有关准备。

奥访华日程中原定除北京外还访问内蒙古自治区、广州和深圳,但因其国内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导致苏赫巴托广场出现绝食事件,局势趋于紧张,奥不得不缩短了访问日程,临时撤销广州、深圳的访问。由于日程早已与各地



联系妥当,这一更改,确实给我们的礼宾接待工作造成诸多不便。

这一天是星期天,一大早,礼宾司的电话铃声就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立即赶到外交部。因日程更改后涉及许多部门和单位,为此我们整整忙乎了一天,同各个单位进行联络,修改活动日程,直到月上枝头,才披星戴月地回家休息。

5月4日,奥其尔巴特主席如期访华。杨尚昆主席、江泽民总书记分别会见,李鹏总理同他进行了会谈。访问结束时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签署了关于科学技术、保护自然环境和卫生等3个协议。

此次会谈的特点是双方本着向前看的态度,表达了扩大和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江总书记用“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话概括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并以我国的经验说明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奥强调蒙要同俄、中两个邻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访问公报强调双方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和发展双边友好合作关系。

访问的重头戏是李鹏总理与奥其尔巴特主席的会谈。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最高级别的政治会谈。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先是搜集了有关词汇,同时根据拟定的会谈提纲预先进行逐字逐句的准备,将所有认为是难点的词语专门列在一本小册子中,重点内容熟记于心。由于准备充分,整个翻译比较顺利。会谈的“告捷”使我在合格外交译员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内蒙古自治区过去接待来访的外国元首的机会不多。此次安排蒙元首到呼和浩特访问,自治区领导很高兴,外办十分重视,早早就作了准备。代表团下榻在内蒙古的“钓鱼台”——新城宾馆。由于硬件不够先进,入住后各个楼层之间的联络不太通畅,电话打不通,只好“坐11路”(靠两条腿)解决,影响了工作。礼宾司了解情况后决定以后对内蒙古外办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据我了解,外国元首访问外地时由于地方硬件不够好,在接待方面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如蒙古总理宾巴苏伦访问西安时也遇到类似情况。不过,到了21世纪,各地外办都是“鸟枪换炮”,接待能力和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

奥其尔巴特主席是个地质矿山方面的专家。他对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访问企业时询问得很详细,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经验,以便回国可以借鉴。在访问工厂企业时,我明显感到掌握的词汇不足,尤其是经济、科技知识欠缺,有些内容不太懂,翻译不太准确。幸亏客人是专家,只要把意思翻出来,他们便明白了。由此也可看到,对一名翻译的要求是全方位的,特别是科技方面,我们还差得远哩,要做得更好,还须加把力。

在呼和浩特，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布赫同志出面接待奥其尔巴特主席一行。在小轿车上，布赫主席告诉我：“我是蒙古族，不过是在农区生活，基本不懂蒙语，对蒙古客人的话只能听懂一点。还得请你来翻译了。”我说：“主席别客气。我是翻译，这是我的任务。我很高兴为主席服务。”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广东人，他对一个南方人学习蒙古语很惊奇。我说是服从组织分配去学的。他说很好。

奥其尔巴特主席的首次访问很成功，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



再次给江总书记当翻译

1991年1月28日至2月4日，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贡·奥其尔巴特率团访华。又一个奥其尔巴特，但此人并非上节所述的国家元首，而只是与其同名（蒙古同名的人很多，如名字相同，用不同的“姓”即父名来区别），他是通过党际关系途径来访的。因此次访问很重要，中联部“借调”我去参加接待，使我第三次有机会给江总书记当翻译。如果说前两次蒙国家元首奥其尔巴特和人民革命党中联部长林钦访问会见时间较短的话，这次访问共两场活动，时间较长，锻炼机会更多。

访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奥进行了会谈。宋平同志着重介绍了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情况，强调我党将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愿同蒙人民革命党继续扩大和发展全面交往，以进一步加强双边睦邻友好关系。奥对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表示赞赏，他还称赞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蒙愿学习中国改革和建设的经验。

江总书记会见时说，两党自1989年7月恢复关系以来，有不少的交往。他着重向客人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奥向江总书记表示，蒙将坚持对外开放。

会见后，江总书记设宴招待蒙党代表团。在交谈中，江总书记表现出了大国大党领导人的风范。他耐心地倾听蒙方关于本国政治经济等情况的介绍。



我力求准确地将他的话翻译成蒙文。宴会上,由于讲话时间比较长,我来不及动筷吃饭。过了一会儿,江总书记说:“翻译同志可以吃点东西,我用俄文来讲。”只见江总书记流利地与奥用俄语交谈,没有任何障碍,餐桌上气氛热烈友好,谈笑风生。兴致一来,他们还唱了一首俄文歌曲《喀秋莎》。宴会厅里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江总书记不仅学识渊博,精通外语,而且多才多艺,这些都给在场的蒙古朋友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过了许多年,曾参加此次访问的蒙古朋友仍向我谈起此次会见,津津乐道地谈起同江总书记见面的情景。

奥访问上海时,时任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同志宴请了代表团,向客人介绍了上海建设发展情况。蒙古同志对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表示钦佩,并希望同上海开展经济和人员交往。朱镕基市长平易近人,侃侃而谈,他还谈到与江总书记是同学,特别称赞江总书记有学习外语的天赋。最后,他在宴会菜单上给我们每位陪同人员签名留念。至今,这张有朱总理签名的菜单仍珍藏在我的书柜里。

1987年以来,我除了在接待蒙古党和国家高级别代表团访问中4次担任译员以外,还参加了蒙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兼人民革命党中联部长林钦、贡布苏伦外长、云登第一副外长等代表团访华和钱其琛外长访蒙的会谈口译工作。

总结多年翻译工作,我感到一名称职的外交译员,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二是要掌握政治、外交和有关经济、科技、历史、法律等方面的知识;三是要把握好信、达、雅这三个翻译的基本要素,并熟练地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四是要不断总结提高,永不自满。

第九章

三进蒙古

熟门熟路再“出山”

国内——国外，“两点一线”，这是外交部干部的工作特点。学非通用语的干部范围比较窄，出国一般只能到一个国家。领导认为你“熟门熟路”，到别的国家反而不好“发挥”，所以几次出国都到同一个国家。

在我们的圈子里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做出国“凭党性”；我们这些非通用语干部叫做“永久牌”干部。1992年5月，使馆急需用人，部里再次派我到驻蒙古使馆工作。此次“出山”，职务没有提升，仍是一等秘书。当干部司领导通知我时，我没有提出任何推辞的理由。因为我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学的是蒙古语，我的岗位就在蒙古国。就这样，我告别了妻儿，踏上征程，第三次来到使馆。

使馆的一切：办公楼、道路、馆员宿舍、车库、院子里的一草一木、馆内工作人员，我都十分熟悉。甚至从礼堂北门出来走几级台阶，我都清清楚楚。此时，张德麟参赞已提为大使。他对我表示欢迎，仍然安排我在研究室工作。我是研究室的“常客”，熟门熟路，工作要求、程序安排没有什么改变，几乎不必交接便可“上路”。

经历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转轨”时商品匮乏的困难，蒙古市场商品供应比前几年有所改善，一些食品如蔬菜、肉、奶等，在当地都可以买到，价格不是很贵。当然，一些生活必需品和专用食品，仍需到内蒙古去采购。



职务的变动

章式蒙

古蒙散三

1993年6月,外交部任命我为政务参赞,协助新任的裴家义大使工作,成为使馆的“二把手”。

从我选择蒙古语专业,进入外交部起,我只想着如何做好业务工作,做个合格的外交人员,从没有想过要“当官”,更不会伸手去“要官”。1989年至1991年我在外交部亚洲司一处(朝韩蒙处)工作时,曾任副处长和处长。对机关来说,处长只是个“基层干部”,自己也没有把此看做是“当官”。我尽职尽责地工作,在管好蒙古事务的基础上兼顾一些韩、朝事务,并且做好全处的“后勤”服务工作。

职务的变动,是我工作的新起点,说明事业和工作需要我,身上肩负的责任更重。裴家义大使注意发挥我的长处,让我主抓调研,同时协助主管馆内思想政治工作。我利用蒙古朋友较多的优势,对外工作有了新的拓展。

这一年夏天,裴大使回国参加使节会议,外交部指定我任临时代办。所谓“代办”,即在大使离开驻在国时临时代理馆长的职务,就两国关系和其他问题与驻在国进行联系,同时主持馆内的工作,负领导责任。

当我第一次任临时代办,坐上插有五星红旗的小轿车去参加会见或进行交涉时,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神圣感,因为我的一举一动,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国家。

就在这个时候,使馆内部出现一些不团结现象,有两位厨师因意见不合发生“肢体接触”,双方都到我办公室“讨说法”。对待这种情况最好是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我与党委委员、商务参赞洪刚同志研究后分别找他们两人谈话,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既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和长处,同时也对他们处理问题的错误方式进行了批评。经过工作,缓解了矛盾,促进了团结。我还注意发挥各个职能部门的作用,听取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在做好对外工作的同时,保证馆内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

裴大使回馆后,我的“代办”职责宣告结束,感到一身“轻松”。当临时代

办,使我提高了负责使馆全盘工作的能力,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锻炼机会。



重签友好合作关系条约

20世纪90年代初蒙古实行民主化、多党制,人们对政府不满,可以集会结社,游行示威。1994年4月,群众对人革党政府政策不当、官员腐败及经济形势每况愈下、人民生活没有提高表示不满,走上街头游行,政府的强硬立场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一部分群众在苏赫巴托广场支起蒙古包“安营扎寨”,采用绝食方式表示抗议,要求政府下台。一些极端分子甚至扬言要在即将到访的中国总理李鹏访问时“踏出一条血路”,气焰十分嚣张。

在此情况下,国内来电询问,蒙古局势究竟如何,要使馆研究并作出判断报告国内。接电后,我们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研究。讨论时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同志认为蒙局势相当复杂,部分激进分子矛头直指中国,涉及对华关系,为了总理的安全,建议访问延期进行。但多数同志则认为,蒙古出现的情况是暂时的,是其内部矛盾激化所致。部分群众的过激言论并不是针对我国,说“踏出一条血路”的人只是极少数狭隘民族主义分子。蒙各政党和广大群众都希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这是蒙古总的趋向,所以认为李总理仍可如期访问。

经国内和使馆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蒙古形势仍相对稳定,近期内不会出现不可逆转的事件,目前出现的“绝食”行动矛头是指向政府的,完全是内部矛盾,并不是针对中国。考虑上述因素,建议李鹏总理仍可如期访问。

果然,就在李鹏总理访问的前一天,蒙古民主派的代表人物贡其格道尔吉主动做其他民主人士的工作,撤出绝食队伍。由于他的带头,绝食行动终于宣告结束,苏赫巴托广场恢复了平静,为李鹏总理访蒙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1994年4月28日至29日,李鹏总理如期访问蒙古,这是一次重要的访问。陪同访问的有国务委员兼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国务院外办主任齐怀远、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力吉等。访问期间,李鹏总理同蒙古



总理扎斯莱进行会谈,会见了蒙古总统奥其尔巴特和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巴嘎班迪。两国总理签署了《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双方发表了新闻公报,签署了关于保护和利用边界水协议、文化合作协议、关于动物检疫和兽医工作合作协议、关于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关于保证进出口商品质量和相互认证的合作协定等,成果丰硕。

李总理在会谈中首次提出我与蒙古交往的五点主张:一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蒙发展面向 21 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二是中国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古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三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经贸合作,共同发展与繁荣;四是希望东亚地区保持和平稳定,赞赏蒙为维持本地区和平稳定所作的努力;五是表示中国政府愿看到蒙古与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这是我国对蒙古政策的一次全面总结和阐述,表明我重视发展与邻邦蒙古国的关系。蒙方对我方的主张给予积极回应,表示将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针”。

李鹏总理的成功访问再次表明中央决策的英明。此次访问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友好睦邻关系和相互了解。

《中蒙友好互助条约》于 1960 年签订,已过去了 30 多年。这个时期,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均有很大变化,双方认为有必要根据新情况重新签订新的条约。经过友好磋商,达成共识,重签友好合作关系条约。《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是中蒙关系史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新条约中写进了对发展关系的共同看法,提及对多边活动和国际形势的立场和观点。特别是我正式提出与蒙交往的五点主张,赢得人心,意义深远。在此后的访问中,《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连同 1998 年、1999 年两国元首访问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一起,成为两国关系的基本法律文件。



第十章

四进蒙古



时刻听从党召唤

我于1995年11月任满回国，在外交部国外工作局任参赞。国外工作局是部党委负责驻外使领馆内部工作的一个部门。在这里工作两年，使我熟悉和了解各使领馆内部工作，受益匪浅。

1997年底，干部司领导找我谈话说，现使馆沈庆沂参赞任期届满，目前尚未找到合适替换人选。现任大使不懂蒙文，需一个懂蒙文的干部辅助他，经研究，我是最合适的人选，希我“再披战袍”。听了领导的话，我面有难色。我刚回国两年，小儿子正上高二，明年要高考，眼下正是备考的关键时期。过去我欠孩子的太多了，本来我已答应一定在他身边多陪陪他，直到高考。此刻，京剧《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一句唱词“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在我的耳边回响。个人的、家庭的困难，在国家的需要和人民的利益面前，显得那样苍白无力，我没有理由推辞。终于，我还是克服了困难，安排好家务，义无反顾地准备了行装。1998年3月31日，我又一次踏上了赴蒙古的旅程，第四次到使馆工作。



“后勤部长”

第十章

西藏组四

说实话,在外交部,在同一个使馆两次任政务参赞的真不多见。两次出任参赞,职务相同,但工作和职责不同。上次主抓调研,做研究室工作。此次齐治家大使交给我的任务是主抓办公室,即后勤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个新的“挑战”。

办公室工作,好比“布机上的棉线——千头万绪”,除礼宾接待外,还有采购、会计出纳,国内团组,固定资产,总之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要管,琐碎繁杂。办公室是联系使馆各部门的纽带,同各个兄弟部门都要联络,上要对馆长负责,下要向馆员交代,涉及家家户户,联系广大馆员,做得好,得到大家支持;若稍有差池,便会怨声载道,成为众矢之的,甚至会影响馆员情绪和全馆的团结。所以,办公室工作,看似平常,实际上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作为“后勤部长”,不能有半点马虎,更不能出半点差错。

接受任务伊始,我首先认真阅读国内指示,理解外交部后勤工作的规定和各项规章制度。财务制度是重要的一块,过去知之不多,也没有仔细学习,其实这一制度特别重要,也特别细,与大家关系密切。我花了较多的时间首先“消化”了有关财务的规章制度和细则。

办公室主任老白是我在边界联合检查时的老战友,他在这里已干了两任,有丰富的经验。我注意向他请教,并通过他组织调动全室人员的积极性。俗话说,“牵牛牵鼻子——抓住了关键”。在我主抓办公室期间,抓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财务。我与会计和出纳一起具体研究采取措施,尽量做到收支平衡,既要保证外事开支的需要,又要贯彻勤俭办外交的方针;既不能过于寒酸影响我外交形象,又不能大手大脚浪费人民的血汗钱。二是采购。蒙古市场物品匮乏,过去都是到国内采购,开支较大。经研究,决定除必要的物品回国采购外,日常用品及蒙市场上可采购的物品,如饮料、蔬菜、水果等一律在当地购买,需回国采购的定期集中采购。三是修订规章制度。对已不适合当前情况的规章大胆进行修改,经过群众讨论和党委扩大会议通过后公布于众。

开展宣传教育,要求大家严格执行,在各室组掀起一个遵纪守法的热潮。四是广泛听取意见。办公室的工作是大家的事情,只有得到大家的支持,才能搞得红火,人气顺了,团结好了,全馆的工作才能蒸蒸日上。由于抓了上述四个环节,后勤工作有明显改进,很好地配合和促进了使馆的对外工作。



大使的助手

政务参赞是大使的助手。人们说,一、二把手是关键,如果一、二把手团结,使馆工作的成功就有了一半的把握;反之,形成派系,矛盾重重,工作就无法顺利开展。一把手的模范行动固然重要,但作为二把手,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摆正位置,既不“越位”,又要“到位”,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这里边就有“学问”。

作为副手,首先要尊重一把手,服从他的领导,这是最重要的一条。齐大使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他虽然不懂蒙语,但熟谙英语,且对蒙古情况熟悉很快。他对我这个“老蒙古”很尊重,遇到一些重大问题总是主动征询我的意见,这让我很感动,更加全力支持他的工作。我认识的蒙古朋友较多,每当大使在同蒙方联系方面遇到什么难题时,我就协助大使,通过蒙方朋友的帮助,顺利地解决了问题。所以,互相尊重,互相支持,这是合作的基础。

在馆内我负责党务和内部思想政治工作。为了减轻大使的负担,使他全力搞好对外,我尽量将内部事务负担起来。一、二把手之间的相互理解、信任与配合比什么都重要。

当然,不同看法和意见分歧不可避免。当出现不同看法时首先应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如还没能达成一致则要坚持馆长负责制的原则。有时群众因一时不了解事实真相,对领导有些意见,或有些误解,我都主动向他们解释,把责任揽下来。有时由于沟通不够,上级和下级都对自己不理解,“两面受气”的情况也发生过,但自己能正确对待,为了工作个人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

总之,服从对外工作的需要,做团结的模范,是我的宗旨。我两次当使馆“二把手”,与大使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保证了全馆工作的顺利开展,受到国

第十一章

出使蒙古



任命通知

记得我在亚洲司一处当处长时,王英凡司长在一次司务会上曾严厉批评一些“跑官”、“要官”的人,认为这同一名外交战士应具备的素质格格不入。王司长说,今后如发现,将推迟这些人出国时间,也不提职。他强调首先要将那些默默无闻工作,从不向组织伸手要官的同志提拔出国。我十分同意这种说法和做法。我想:职务提升是组织的事,未能提升,说明自己的工作水平还达不到上级的要求,应继续努力;若能提升,也并非说明自己有多大“能耐”,只是表明今后身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一名合格的外交战士,绝不能搞“跑官”、“要官”的事。

1999年7月3日上午,干部司刘正修司长约见我,正式通知说:“我代表部领导通知你,你已被任命为中国驻蒙古国特命全权大使。”刘司长语重心长地向我提出了今后工作的要求:努力学习,严于律己,依靠党委一班人和使馆业务骨干,把使馆的内外工作搞好。

我向司长表示:深感肩上责任重大,自己能力有限,尚有不少欠缺之处,一定要加倍努力,戒骄戒躁,不辜负部领导的期望与嘱托。

我明白,被任命为大使,是我人生的新起点,应倍加珍惜,好好工作,不辱使命。

出发前,我认真地作各种准备:聆听主管副部长王毅同志的指示;到亚洲司听取司处领导的意见;到中联部、经贸部、文化部、卫生部等部同有关负责人就中蒙合作交换意见;与一些在蒙中资企业取得联系;走访馆员家属。忙公事



的同时,也不忘多陪陪两个儿子,向他们交代一些事项……



赴蒙古履新

章一十第

古蒙外出

1999年8月31日,晴空万里,秋高气爽。这一天,我踏上了赴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征途。我的夫人何思红随我一起赴任。

这是我五进蒙古。也许因为我已多次到蒙古,行程中的一切都已习以为常。在飞往乌兰巴托的CA901航班上,我无心欣赏大好自然风光。我在静静地思考,想着我到使馆后的安排,如何同使馆一班人团结一心搞好对内对外工作,将会见一些什么蒙古朋友,举行一些什么活动……

当我还在沉思的时候,一个钟头40分钟悄悄地在我身边溜走。在不经意之中,飞机在乌兰巴托布彦特乌哈国际机场徐徐降落。近些年来,我也记不清在这个机场降落过多少回,每次都是匆匆忙忙、近乎机械地下飞机,办出关手续。而这一次,显然与以往不同,心中不免有些激动。我是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作为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前来履新的。此刻,乒乓国手容国团的一句话:“人生能有几回搏?”在我的耳边响起。是啊,现在是我回报党和人民的时候了!此时不搏,尚待何时?我从心底呼唤,祖国啊,您的儿子一定不会给您丢脸,他要为维护您的尊严,为把您建设得更强大而献出自己的一切!

在机场贵宾室里,首先见到迎接我的蒙古老相识——对外关系部礼宾司司长乌尔金勒洪德布,他曾任驻朝鲜、韩国大使,精通朝语。我馆临时代办李向阳参赞和使馆的同志们也来了,二秘高凤英代表大家向我们献鲜花,分别了三个月的战友们又团聚了,女同志拥抱在一起。寒暄后,乌向我简要介绍了递交国书的初步安排。之后,我们驱车回大使馆。

使馆的办公楼、会客厅、花园小亭、菜地和宿舍与我们已相伴多年,同志们是我多年认识的战友,一切一切都是那么亲切和熟悉。大使没有专门的官邸,办公和卧室就设在办公楼东侧的宿舍“综合体”内,办公室、卧室、客厅、过渡厅、厨房、浴室连成“一体”,设备一应俱全。

进入大使办公室,自有一番感慨。这里的摆设我并不陌生。过去我曾多

次来到这里向大使请示汇报,介绍情况或研究问题。如今当我成为这里的主人时,无疑有一种接班人的使命感、紧迫感。我不打算更换历任大使用过的办公桌,让它继续摆在那里。在这个被称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战场”上,我要接过前辈的班,继续为祖国和人民站好岗放好哨。

当天,李参赞向我介绍了这一阶段的工作情况,然后我便开始到各个部门与大家见面,了解最近工作情况。

递交国书前一般都有一个会见外长(或副外长),面交国书副本的程序。9月2日,我往见蒙对外关系部部长图雅女士,向其递交了国书副本。图雅女士是一个知识型的外交官,原是政策计划局局长,熟悉多边事务,英文顶呱呱,说话很得体。在蒙古这个女性领导人不多的国度,能一跃成为外长,可见其能力非同一般。她对我到任表示热烈欢迎,并特别提到我懂蒙语,长期在蒙古工作,熟悉这里情况,这对工作很有利。她还说,蒙古对外关系部将同大使和使馆密切合作,继续致力于发展两国关系。



递交国书

根据国际惯例,新任大使应由原任大使向驻在国提出征求同意。我的任命是1999年8月初由齐治家大使向蒙对外关系部提出的。大约过了10天,蒙方便答复同意。我于1999年8月31日抵蒙后,仅过了3天,9月3日,蒙方即安排我向巴嘎班迪总统递交国书。这么快就安排递交国书,突出地表明蒙方对蒙中关系的重视。当然,由于我多次在蒙工作,蒙方对我很了解,对方尽早安排,也是对我个人友好的一种表示。

所谓国书,即是派遣国元首为派遣或召回大使、公使致接受国元首的正式文书。惯常的做法是新任大使递交国书时一并递交召回前任大使的国书。内容基本上是固定的格式,如“为巩固和发展某国和某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任命某某先生为中国驻某国特命全权大使,我相信某某先生将尽力完成他所担负的使命,请你惠予接待并对他代表中国政府所进行的工作给予信任和帮助”等等。落款处由中方元首签字,外长副署。将递交的国书由我自己带



到蒙古,内有江泽民主席签字,唐家璇外长副署。国书正本当然是递交时用,副本要交蒙外交部。部里想得很周到,准备了两份副本,一份可让大使本人保留留作纪念。

当前各国举行使节递交国书的仪式趋向从简。蒙古的仪式也比前简化,但仍保留其鲜明的民族色彩。

到馆后,递交国书是首要任务。为此,我馆所有外交官于9月2日下午进行了一次“彩排”。由一名外交官“扮演”总统,所有人都按蒙对外关系部规定的程序和路线“走场”。一切排练合格后,才放心做别的工作。

9月3日上午11时45分,蒙对外关系部礼宾司司长乌尔金勒洪德布准时来到我馆等候。11时50分,由警车开道,我和司长乘坐蒙方准备的插有中蒙两国国旗的礼车,使馆全体外交官分乘几辆轿车陆续来到国家宫前广场。

来到苏赫巴托广场,只见国家宫正门上方悬挂着中蒙两国国旗。礼车和使馆的轿车停在国家宫正门东面。我们的正前方四五十米处是蒙仪仗队和乐队。下车后,我站在最前面,其他外交官按职务顺序站在我的身后。仪式开始,乐队奏中蒙两国国歌。仪仗队队长趋前用蒙语向我报告,请我检阅仪仗队。我和礼宾司长走到队列前,我用蒙语说“赛白茨嘎奴”(сайн байцгаана уу 你们好)向大家问候。然后,在司长的陪同下步入国家宫。

中午12时正。蒙古国家宫三楼礼仪厅。庄严肃穆的递交国书仪式即将开始。我和全体外交官在前厅等候。我默默地考虑着与总统谈些什么。几分钟后,礼宾司长引领我们进入礼仪厅。巴嘎班迪总统已站立在正中央,在他的右后方是总统办公厅主任巴亚尔,左后方是外长图雅。仪式开始,我径直向前走了几步,将国书递交给总统,然后不转身退回原地。我简单致贺词,总统致答词。致词后,我再次走上前去和总统握手,并将使馆的外交官一一向总统介绍。然后,总统及陪同人员与使馆全体人员合影留念。双方记者摄下了递交国书时和合影的镜头。

之后,我同总统进入内厅交谈,其他外交官退出等候。王福康一等秘书陪我进入内厅。为了节省时间,也为表示亲切,我们直接用蒙语交谈。

总统在谈话中首先谈到当前的两国关系,高度评价江泽民主席刚刚对蒙古国进行的成功访问。他说,蒙古人民对你很熟悉,知道你多年在蒙古工作,懂蒙古语言,了解蒙古的文化历史和风俗习惯,相信你接任大使职务后,会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为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感谢总统对两国关系以及对我本人的评价。我表示,在世纪之交,我被

任命为驻贵国第 12 任大使,深感光荣和责任重大。我曾长期在贵国工作和生活,对贵国有较多的了解。在任期内,我一定不会辜负国家和人民的重托,将竭尽全力为巩固和发展中蒙业已建立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为继续增进中蒙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而努力工作,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巴总统在谈话中还谈了当前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具体事项,希望新任大使关注并落实两国元首商定的关于中国向蒙古提供 1 亿元人民币贷款和 3000 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的问题以及中国在蒙援建锌矿项目的工作进度。我表示将会密切关注有关事项的落实情况,如有进展,即向总统通报。

按惯例,递交国书后新任大使即可正式开展工作。9 月 3 日以后,我就正式履行大使的公务。记得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接待来蒙古访问的我国民政部长多吉才让,出席我民政部与蒙民防局合作议定书的签字仪式及蒙方举行的宴会。

到任拜会

在外交活动中,拜会必不可少。递交国书后,我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先后拜会了总理、议长、副议长、议会常设委主席、政府所有九个部的部长、部分司局长、各政党与非政府组织负责人、驻乌兰巴托使团的大使、代办等 50 余人。拜会属于礼节性的,一天内最多有六、七起,少则四、五起,虽然忙碌,但我乐此不疲。通过拜会,会晤了老朋友,结识了新朋友,可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了解和掌握不少情况。

联盟政府总理阿玛尔扎尔嘎勒,也是前外长,我们早就认识,双方谈得很好。他属少壮派,参过军,新生代领导人。他谈吐自如,开门见山。在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坚信蒙中两国关系是蒙发展的重要依托,对发展双边关系持积极态度。他对现代科技及 IT 业很熟悉,精通计算机,主张开展经贸合作,认为中国发展了,蒙古将会受益。记得我到任不久,同年 11 月即陪同阿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通过此访,进一步感到蒙所有党派的领导人都重视两国关系,主张同中国世代友好。



健康与社会保障部部长索宁,在上届政府工作时我就认识他。老友重逢,分外高兴。他彬彬有礼,热情大方,对同中国进行医学交流很有兴趣。他提出,蒙古人十分相信中国的医学,尤其中医针灸常常妙手回春,令人赞叹。他说,现在许多蒙古人自费到中国医治肝、心血管和关节炎等病。“要是今后能在蒙古兴建一座中医院,请中国有经验的大夫来蒙就好了!”我表示赞同,允以后对在蒙开办医院的可行性进行具体研究。

基础设施部部长巴特呼是我第一次认识的“新朋友”。他体格魁梧,热情爽朗。谈话中我才得知,他还是历史学家楚·达赖的亲戚。巴说,蒙古中央各部中同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应是基础设施部,他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来蒙投资。他还称赞中国建筑工人技术高超,为蒙的建设作出了许多贡献。

我对国防部长图布登道尔吉过去并不熟悉。他是民主党主席团成员。蒙民主化后,按西方做法任命文职国防部长。图谈吐自如,十分精干,谈话中除希望发展两国军事关系外还不忘提及民主党与中共的关系。我根据我党对外关系四原则,表示中共愿与蒙各党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

自然环境部长门德赛汗是个新人,属社会民主党,高挑个儿,戴眼镜,典型的知识分子,说话条理分明,逻辑性强。他列举了两国自然环境领域关系的发展,指出从气象部门到边境防沙,都存在合作的可能性。我表示中国使馆今后愿为两国环境部门合作多做些实事。

新任乌兰巴托市长恩赫包勒德比我想象的年轻。在会见时我开玩笑说,我是以乌兰巴托市苏赫巴托区常住公民的身份来拜会你。同时我也不忘介绍自己曾给前市长蒙赫扎尔嘎勒当过翻译及与前副市长额奈比希的交往。恩介绍说,他是蒙功勋教师米耶贡布之子。据知由于他为人谦和,工作认真,深得党总书记额奈比希的赏识,上升空间很大。初次见面谈得很好,从此我们保持了经常的联系,成了好朋友。此后我们使馆与乌兰巴托市政府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经常应邀出席乌兰巴托市举行的活动。我馆也十分关心乌市的建设,给予适当的捐赠。而且,我馆与乌市政府互相邀请组织郊游活动。恩关注两国首都建立联系事宜,多次提出希大使起好桥梁的作用,邀请我北京市代表团访蒙出席乌市建市360周年活动。经联系争取,刘海燕副市长继张百发副市长、龙新民书记之后于2003年到蒙古进行了正式访问,促进了两国首都之间友好联系的发展。

2005年,恩赫包勒德当选人革党主席,被补选为大呼拉尔委员,并在新成立的政府中出任总理。2006年12月,他作为新任总理首次访华。由于我正

在广东探亲不在京，未能出席温家宝总理举行的国宴，与他见上一面。据知，他曾通过亚洲司的同志打听我家的电话，准备与我联系。

使团拜会，是到任拜会的重要部分。驻蒙古使团一共有 20 多个使馆和常驻代表处。我在到任后的 20 天内拜会了所有使节和常驻代表。通过拜会和会见，广交使团的朋友，并对蒙对外关系部组织使团活动的新做法有所了解。

日本国驻蒙古大使花田(HANADA)先生是我 70 年代就认识的老朋友，历史学者，精通蒙语，也懂汉语，自 60 年代起在日本驻蒙古使馆任职，历任二等秘书、一等秘书。这次来蒙前在我国沈阳任总领事。当年我们一同在蒙工作，都懂蒙语。他夫人曾在香港生活，略懂广东话。此次他一到蒙，便马上与我联系，我说他年长要先拜会他，他说他是晚到者，根据先来后到的规则，他应先来。结果我们两家热情相聚在中国大使馆，共叙友情，相见甚欢。谁能想到，两个好朋友，20 年后都成为各自国家驻蒙大使，再次相逢在蒙古，这可能是老天爷的故意安排吧。

与韩国大使崔英喆(CHOI EN CHEE)第一次见面，我们就一见如故。他曾在欧洲任职，英文很好，从小就喜欢学古汉语，读过《水浒传》等中国小说，会念很多中国诗词。他为人谦逊、沉稳，我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交谈内容包括蒙古见闻、半岛局势、东亚合作、10+3 会议等。我们还在业余时间不定期地组织中、日、韩三个使馆进行乒乓球友谊赛，我与崔大使、花田大使一起打球，切磋球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通过活动，增进了三个使馆之间的友情。

古巴大使莫兰·塔帕尼斯(PEDRO ARRALDO MORAN TAPANES)懂朝文，是个朝鲜问题专家，曾在朝鲜工作，为人正直坦诚，我们到任时间相近。由于对不少问题看法相似，我们很谈得来。加之其夫人的外婆是中国广东人，这又增加了我们的亲近感。我们彼此邀请到使馆做客并出席对方举行的双边或多边活动。记得一次莫兰先生在特列尔吉附近的一个旅游点举行使节聚会。一串烤肉，一杯啤酒，我与莫兰大使邀请的十几位使节愉快交谈。这种多边郊游活动是广交朋友的好形式。离任前，我准备将使团长的“差事”交给他，征得蒙外交部同意后就算 ok 了。在我举行的告别晚宴上，莫兰先生代表使团饱含深情地发表了欢送词，并将有纪念意义的银碗赠送给我。我们相约日后相聚在哈瓦那和北京。据说在我走后一年多，莫兰先生也离开了蒙古。

在拜会中，我还见到越南使馆参赞、俄罗斯领事参赞等懂蒙语的老朋友，没想到能在蒙古与他们再次相见，感到格外高兴。



出席人革党的宴请

1999年9月14日,曾在蒙古执政了70余年、作为在野党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恩赫巴亚尔会见了我,对我到任表示欢迎。9月24日,该党书记恩赫图布辛代表人革党宴请了我。

中国共产党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表示支持在蒙古发生的蒙古人民革命。1921年,我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发表署名文章,表示赞成外蒙古独立。1945年10月我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时评,对外蒙古举行关于独立问题的公民投票表示祝贺。1949年10月16日,中蒙两国正式建交,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党际关系及两国关系发展很快,党政代表团互访频繁,两国关系迎来了“黄金”时期。此后,中共与蒙人革党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与交往。60年代以后,经历曲折,1989年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开辟了道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20世纪90年代初,蒙古出现民主化运动,人民革命党于1996年大选中失败,沦为在野党。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与蒙古人民革命党有着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党,本着不忘老朋友的精神,继续与人革党保持接触和来往,相互支持,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我在使馆长时间负责党际关系工作,同人革党各级领导人均有联系。恩赫图布辛在党内属新生代,思维敏捷,十分健谈。会见时,他首先对我来蒙履新表示欢迎,并预祝两党的合作更上一层楼。从他坚定的目光中可以看到,人革党对前途充满信心。我也相信他们会东山再起,从头再来。果然,2000年大选,人革党一举获胜,再次赢得执政党地位。

我党对外关系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是十分明确和坚定不移的。我党与外国政党的接触坚持不论其是否执政党,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原则。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广得人心,受到各国政党的欢迎。在人革党执政的几年里,我党分别接待

了蒙古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团。2004年大选,人革党和民主党在大选中都未能获得多数,最终组成联合政府。由于我党同蒙古几个主要政党都建立了正常的、友好的关系,所以不管是哪个党执政,我们都能与蒙古政府保持良好的联系,进行有效的合作。良好的党际关系,对促进中蒙关系持续发展无疑起到积极的作用。



国庆 50 周年活动

对于大使馆来说,每年的国庆招待会是使馆活动的“重头戏”。1999年9月,我上任后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国庆招待会。由于这次是50周年大庆,国内指示规模可扩大些,多请些客人,但仍要坚持勤俭办外交的精神。如何根据本馆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贯彻外交部的指示精神,搞好招待会,是对使馆面貌与素质的一次全面检验。

在筹备招待会的过程中,馆内有少数同志为图省事,建议全部请乌兰巴托饭店准备饭菜,但大多数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认为,国庆是中国人自己的节日,外国人爱吃中国菜,愿意品尝中国菜肴,如让蒙古人去做就失去了中国节日的意义。况且,自力更生历来是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光荣传统,这样做不能发挥馆员的积极性,也不符合节约原则。经研究,决定主要饭菜仍由馆员和华侨雇员自己动手解决,部分主食、冷盘和器具则可请乌兰巴托饭店帮助解决。原则确定后,办公室即拟定计划,各部门负责人提出意见,经馆务会议通过后按计划执行。计划拟请客人300名(平年为200人)。为宣传我改革开放成就,节日期间,我们还将组织中国电影日开幕式和大型版画展览。

9月28日,我在蒙电视台用蒙语发表了国庆讲话,介绍中国5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中蒙关系的发展,并向蒙古人民致以亲切的节日问候。

9月30日,中国驻蒙古使馆大厅内外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派节日气氛。招待会于下午6时开始。下午5时40分,全体馆员在等候厅集合。我向大家作了“动员”,简单谈了国庆活动的意义,招待会的准备情况等,要求大家做到热情待客,积极宣传,了解对方,广交朋友。



下午5时55分,客人开始进场。负责摄像、计算入场人数的同志马上投入工作。

招待会在使馆大礼堂举行。舞台上悬挂中蒙两国国旗,舞台前面摆放两排鲜花(我馆专门设有花房,有雇员负责栽培)。礼堂中间和后部设餐桌。招待会为冷餐形式,设长型主桌,主桌外设十几张方餐桌,主桌摆椅子。

冷餐招待会的好处是宾客可以“自由流动”,可以见更多的人,谈话自如。招待会的菜是“6冷4热”,即6个冷菜,4个热菜,并备有足够的主食、小吃和水果。菜肴既有中餐的风味,又照顾到蒙古客人的特点。我们的方针是尽量让客人吃饱,不让他们饿肚子。

每年的国庆招待会均请华侨“友谊”学校女老师来当招待员。她们以能为祖国效力为荣,都争着来馆工作。由于招待会客人很多,我们还从乌兰巴托饭店请来了专职的招待员帮助端盘子。她们的态度很好,服务水平较高,工作很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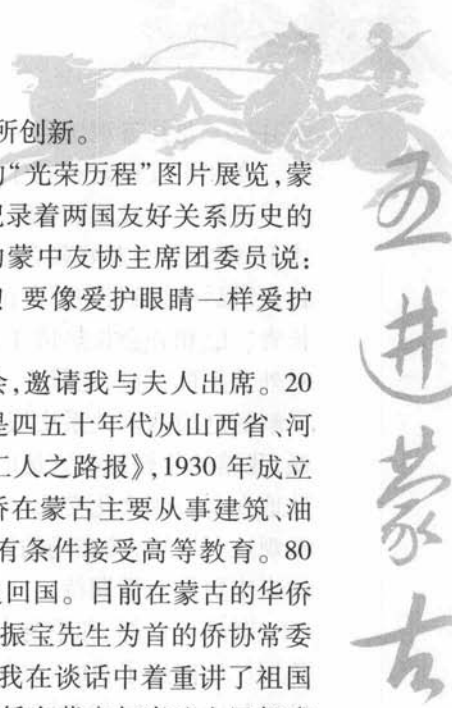
巴嘎班迪总统原答应出席此次招待会,但因已确定下乡视察,改由议长贡其格道尔吉和其他6名部长、十几位议员(偕夫人)出席。驻乌使节和夫人、中资企业、华侨、留学生代表也出席了招待会。

大使递交国书后一般要举行到任招待会,由于时间紧迫,我将国庆招待会与到任招待会结合起来。招待会开始,我发表祝酒词。这也是我到任后在公开场合首次“亮相”。因此,我对祝酒词格外重视,早在半个月前就开始作准备,三易其稿,并译成蒙文,对讲话稿中的遣词造句一再推敲。

祝酒词中首先对各位来宾应邀出席招待会表示热烈欢迎。我以较长篇幅阐述了我建国50年来取得的成就,叙述了当前两国关系的发展。最后为中蒙两国的繁荣昌盛、人民幸福,为中蒙友谊万古长青,为在场的各位朋友的健康举杯祝福。为取得更好的效果,我拿着两份讲稿,一份中文,一份蒙文,先念中文,再念蒙文。为了加强“感染力”,我尽量放慢速度,加大嗓门。我念完蒙文后,英文翻译再念一遍英文。

大使用当地语言致祝酒词,并非首次。我的前任张德麟大使精通蒙语,他也是用蒙语致祝酒词。此次我的做法只不过是其“翻版”。80年代两国关系“冰冷”时期,招待会来客规格低,不发表讲话,气氛可想而知。近年来,两国关系升温,招待会上开始发表祝酒词,气氛更加热烈友好。

从我的经历看,祝酒词并非纸上谈兵,大有文章可作,不应千篇一律,应能反映两国关系的变化和友好关系的“热度”。每年我们在国庆招待会的祝酒



词上都要花一番工夫,动点脑筋,力求有所变化,有所创新。

国庆 50 周年期间,我还出席了蒙中友协举办的“光荣历程”图片展览,蒙中友协主席额奈比希出席了开幕式。看着一张张记录着两国友好关系历史的图片,在场的蒙古朋友感慨良多。一位白发苍苍的蒙中友协主席团委员说:“两国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多么不容易啊!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他的话代表了蒙古朋友的心声。

10 月 1 日,旅蒙华侨协会举行大型国庆联欢会,邀请我与夫人出席。20 世纪 60 年代初旅蒙华侨有 7000 余人。他们大都是四五十年代从山西省、河北省来到蒙古谋生的劳动者。1929 年出版报纸《工人之路报》,1930 年成立中国工人俱乐部,1951 年成立华侨协会。旅蒙华侨在蒙古主要从事建筑、油刷活或修鞋业,社会地位较低,他们的子女大都没有条件接受高等教育。80 年代初,由于蒙古方面采取歧视政策,许多华侨被迫回国。目前在蒙古的华侨人数仅有 1500 人左右。我和夫人首先同以主席段振宝先生为首的侨协常委们见了面,之后在联欢会上向侨胞们发表了讲话。我在谈话中着重讲了祖国 50 年来建设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赞扬广大华侨在蒙古与当地人民打成一片,为蒙古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我鼓励他们爱国爱乡,关心祖国建设事业,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继续为蒙古的经济社会建设贡献力量。



中蒙建交 50 周年

到任不久,适逢两国建交 50 周年大庆。我在筹划国庆活动的同时也将此项活动列入全馆活动的议程。9 月下旬,我专门约见对外关系部政治局长贝赫巴特,商谈共同庆祝建交 50 周年有关事宜。由于这是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一次重要庆祝活动,同时考虑到双边关系的现状,双方对此活动都相当重视。中方决定派我对外友协会会长齐怀远为首的代表团赴蒙出席庆祝活动。

齐怀远会长原是外交部副部长,我们的老领导。陪同来蒙的还有中蒙友协副会长、前驻蒙古大使张德麟等。代表团的的活动有:出席图片展览开幕式;出席蒙对外关系部与和平友好组织联合会举行的庆祝酒会;到中央省蒙中友



好县——龙县参观访问；出席我馆举行的招待会。我全程陪同代表团活动。

在和平友谊宫举行了建交 50 周年大型图片展览。几百幅图片生动地记载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历程，其中包括不少两国领导人互访的珍贵照片。开幕式上，蒙古和平友好联合会主席巴特扎尔嘎勒和齐怀远会长分别讲话。齐会长在讲话中提到，中蒙友谊虽经历曲折，如今更加牢固，他祝愿中蒙友谊万古长青。巴和齐会长热情洋溢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前来参观展览的有对外关系部官员、老战士、各友协单位人员和年轻学生。一些年轻人对尚不太了解的这段两国关系史很感兴趣，他们驻足在一些图片下仔细观看，并相互交谈，我馆的年轻外交官适时向他们进行讲解。一位六七十岁的女演员饶有兴致地在看一幅文化交流的图片，深情地回忆起她 50 年代到中国演出的情景。参观这一展览，使在场的所有中国人、蒙古人重温了两国关系的历史，对美好的未来更加充满期待。

对外关系部、和平与友好组织联合会举行的酒会有近百人出席，图雅部长致词。她阐述了 50 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进程，重申蒙的对外政策，表示蒙把发展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方针。齐会长在讲话中表示中方重视同友好邻邦蒙古国的关系，将坚定不移地为发展中蒙传统友谊而作出不懈努力。

龙县离乌兰巴托 130 公里。50 年代，根据两国人民的意愿，双方商定互设友好县。1960 年，我河北省张北县的公会人民公社被宣布为中蒙友好公社，后改由内蒙古自治区达茂旗和蒙古中央省龙县互结为友好县。龙县经济发展在蒙属中等水平，主要从事牧业和农业。由于离首都较近，气候条件不错，加之有中方企业的资助，近年来经济实力有一定增强。我历任驻蒙大使都十分关注友好县的发展，经常派员到该县了解情况，联系国内一些企业与之合作，并给予力所能及的财力和物力支持。在我的任内，我曾用大使基金，向该县赠送了办公设备和器材、食品等。每年蒙国庆或春节，我馆都要派部分同志到龙县与该县群众一起联欢，举行体育比赛，共度节日，这已成为“传统节日”。

齐会长率团到龙县，受到以达瓦道尔吉县长为首的全体县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双方发表了友好的讲话。齐会长向该县十年制学校赠送了一台计算机。

10 月 16 日，两国建交日。当晚，我在使馆举办了建交 50 周年招待会，将整个庆祝活动推向高潮。即将访华的阿玛尔扎尔嘎勒总理夫妇、图雅外长等

及由齐会长率领的我友协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阿总理和齐会长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共赞两国友好睦邻关系和中蒙人民的深厚情谊。

代表团在蒙期间还参观蒙古办得最好的一所中文学校——育才学校。校长巴亚尔带着中文班的同学们载歌载舞欢迎中国代表团。近年来,在中蒙关系更加密切的大环境下,蒙全国兴起了“汉语热”,各种中文学校、中文班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据不完全统计,现在蒙全国中文学校或汉语学习班已达五六十个之多。育才学校已初具规模,这里有3个班,100多名学生,设备齐全,秩序井然。齐会长一行走进了几个班的教室,与同学们用汉语进行对话。齐会长看到他们汉语说得很流利,感到很高兴,他勉励学生们努力学习汉语,将来为两国友谊添砖加瓦。齐会长还同应邀前来教学的我河北大学的老师们进行了交谈。参观完毕,齐会长在留言簿上题词。

参观时,我发现该校缺少中文教材。我允诺通过文化处与我国教育部联系,今后在教材方面给予一定的帮助。



活跃的蒙古外交

经过20世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内发生的“民主运动”,蒙古吸取了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改变了过去“一边倒”的做法,奉行“多支点”、“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进入新世纪,在全球化大环境的影响下,蒙古国的外交更趋积极和活跃。

据我在蒙古工作期间的观察,蒙古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把同俄、中两大邻国“均衡”交往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针”;二是根据“第三邻国”理论积极发展同美、日、德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三是谋求加入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和多边组织,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积极参与东北亚和亚太地区的经济与安全合作,关注东亚峰会和10+3等多边活动,力图使蒙古得到安全保障,提升自身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与影响;四是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加快本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所接触的蒙所有政党负责人都毫不例外地一致表示支持业已实行的对



外政策,这说明这一政策方针符合蒙古实际,赢得人心,在各政党中达成了共识。

过去,蒙古国由于国家小,经济发展较慢,国际上许多人对它不甚了解。譬如我国内谈起蒙古时有些人竟然以为是我国的内蒙古。近年来,蒙加强了对外宣传,积极走上世界舞台,参与国际双边和多边活动,其国际知名度和影响正在得到提升。现在,一个正在发展中的蒙古国已被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所了解和熟知。

我在同对外关系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执政党领导人交换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时感到,在国际气候变化的情况下,蒙古领导人的思维也在不断更新和变化。

以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为例。起初,蒙认为此组织建立的初衷是中、俄与中亚国家共同打击跨国犯罪、维护边境安全。考虑到自身利益等因素,蒙方表示暂不加入,对此中方表示理解。但是随着该组织合作领域的扩大和在国际上影响的扩大,蒙古改变原先的立场和做法,表示愿意成为该组织的观察员国。2001年6月,对外关系部邻国局局长阿尤尔扎那约见我,提出决定派一名一等秘书到上海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我认为这是蒙方积极态度的表现,即报国内建议安排接待。但由于该组织有一个协商一致的原则,且蒙方提出的时间太晚,所以此次未能安排出席。2004年6月,在塔什干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上蒙古正式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蒙总统在峰会上发言支持该组织的活动,并提出了加强经济领域合作等积极建议。

又如关于启动中、蒙、俄三国磋商机制问题,起先,蒙考虑已分别同中、俄有双边协议和合作机制,认为目前尚无必要开启三国磋商机制,主张先从双边资源开发、环保等领域开展工作。经过与中、俄领导人的多次会见和会晤,三方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开启磋商机制,就具体的合作问题进行商谈,确有必要。蒙古最终同意并积极地参与了三国磋商。从已开启的磋商进程看,已取得明显的成效。



近距离接触蒙古领导人

作为大使,要同驻在国各方面、各阶层进行联系和交往。近距离接触驻在国的高层领导人,是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多次在使馆工作,与巴嘎班迪总统有过多次交往和接触。

巴生于1952年,毕业于莫斯科社会科学院,哲学副博士学位,是蒙古知识分子的代 表。他学识渊博,为人谦和。曾任人民革命党书记、党主席和国家大呼拉尔主席(议长)。1997年当选第二任民选总统,2001年再次蝉联。巴作为国家元首,经常要出国访问,但他平常在国内只要有空都要安排到各省巡视,深入城市和牧区,宣传中央政策,了解下情,因而受到群众的爱戴,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巴十分重视发展蒙古同中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亲自提出加强两国经济、文化科技与体育等领域的交流等具体指示。他多次作为国家、政党和议会领导人访问中国,同我国三代领导人都有过接触。在与我国领导人会谈中,巴积极主张扩大双方经贸合作范围,同时提出了加强两国边境省份交往等许多建议。

巴在百忙中总是尽量抽时间接见来访的中国代表团。谈话中,他强调蒙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针,并称这一方针不会改变。他高度赞扬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主张继续在各个领域发展两国业已存在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并真诚地感谢中国对蒙古国给予的无私援助。

巴每次在议会会议或其他重要集会上的发言,都经过缜密准备,讲话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可谓滴水不漏。我收集了报上刊登的巴的十数份讲稿,每篇都是文字华丽、语法严谨、用词讲究的好文章,是自己学习及给年轻人讲蒙文课和翻译课时的“范文”。

2000年4月,我与巴一起到苏赫巴托省出席图木尔廷敖包铸矿奠基仪式,分别致词。巴在讲话中提出,实施这个项目,将使苏赫巴托省经济实力得以提升,解决该省的就业问题。在我为奠基仪式举行的招待会上,总统与我进



行了交谈。他高兴地谈到两国开展经贸合作有广阔的前景,希望大使继续促成中国其他企业到蒙开发矿产资源,并提出双方今后可加强边防口岸的合作与交流。

2001年2月,我从国内休假回到蒙,即通过国家礼仪局提出与总统会见的要求。2月23日中午,总统在国家宫拨冗接见了,我向他面交了我国金台画院袁熙坤教授在总统访华时为其画的肖像画。袁教授是我国杰出的肖像画家,近年来他主要从事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给国际组织和外国领导人画肖像,至今已画了数十幅。这些画惟妙惟肖,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深受各国领导人的喜爱和欢迎。我代表袁教授将这幅画送给巴总统,同时还赠送了一幅袁教授名为《虎》的国画。总统十分高兴,要我回国后向袁教授表示谢意。借此机会,我还代表中国使馆全体成员向总统和他的家人祝贺“白月”节(цагаан сар,即春节)幸福美好。

这一年夏天,总统夫妇在他坐落在“大天口”国宾馆内的“夏宫”设家宴招待我夫妇,给予我们很高礼遇。在家宴上,他不抽烟,只礼节性地喝点酒。他态度和蔼可亲,思路极其清晰,询问了我国当前的政治、建设与改革情况,也很关心我本人的家庭和在蒙的生活。他愉快地回忆起曾多次访问中国,会见和结识了邓小平、江泽民、李鹏、宋平、乔石、万里等中国领导人的情景,称同他们的交谈受益匪浅。他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问到北京的一些新建项目是否已竣工。他强调,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证明邓小平先生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希我回国后转达对各位领导人的问候。

恩赫巴亚尔是蒙古曾担任议长、总理和总统三个职务的唯一领导人。由于工作关系,我结识了恩赫巴亚尔。

恩生于1958年,毕业于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曾留学英国,历任蒙作家协会翻译、政府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主席、文化部长。2000年起人民革命党重新成为执政党,恩当选总理。此后,我在许多外交场合,包括双边和多边场合多次受到他的接见,或在使节集体会见蒙领导人时曾与他进行交谈。

恩一派学者风度。他体格魁梧,在蒙古可以称得上是个“帅哥”。2003年,当他还是在野的人革党主席时,谈话中语气坚定、执著,对前景充满信心。果然,一年后人革党东山再起,成为执政党。

正如2005年他作为总统接受中国记者提问时所说,他是一个政治家、作家,又是一个普通人,在努力挖掘生活背后的寓意,挖掘事实,挖掘数字,同时他又是总统,要肩负起对人民的责任。我认为他确实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尽管他是学文科出身,但对经济也很熟悉。记得2000年我出席了恩任总理100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他介绍了当总理后所干的事情,当记者提问时,他对答如流,很多经济数字如数家珍,给我印象深刻。

恩对蒙中关系十分关心,尤其是对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很重视。在我的任内,有幸与恩一起出席了乌兰巴托住宅竣工和“千年之路”几个公路项目的交工仪式等活动。他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许,同时希望大使在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多做工作。随着中资企业更多地进入蒙古,蒙国内舆论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攻击中国企业进入蒙古是“企图掠夺”蒙古的资源。对于此种论调,以恩为首的蒙古政府态度十分明确,强调蒙古要继续坚持开放、给外资更优惠的政策,要为吸引外资创造更加良好的投资环境。

2002年1月,我陪同恩赫巴亚尔总理访华,在北京、深圳、香港进行访问。访问期间,恩同朱镕基总理进行会谈时着重强调加强基础设施、开发资源、口岸建设、边境地区交往方面的合作,希望中方企业更多地到蒙古投资,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项目建议。他对中国各地的建设成就尤感兴趣,在访问企业时,详细询问有关生产和科技的进展,并提出蒙方愿与深圳加强合作,学习中方开发和引资方面的经验。

离京前,我代表中方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宴请恩赫巴亚尔一行。恩平时不喝酒,那天高兴也只喝了一点酒。席间,我们聊到中国的一些风俗、生活趣闻。尽管他身为政府首脑,但平易近人,富有情趣。

2002年,我同恩赫巴亚尔总理一起视察了中蒙合股的“桑斯尔”有线电视台,了解了该台的工作情况。他对电视台的工作给予很高评价,并称他本人也经常看该台播送的节目。他询问了该台今后发展的有关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参观考察结束后,我们与股东、电视台人员合影留念。

据恩身边的官员介绍,他作风雷厉风行,对内外工作都全面管理,甚至包括出访、来访的细节都管得很细,一抓到底。在党内和政府内,他坚持原则,维护团结,经常告诫政府、各政党、非政府组织成员要以大局为重,和谐共事,因而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威望。



抓好经贸这一环

现在流行“政治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等等提法,说明经济和文化等在外交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大。实践表明,政治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当前中蒙政治关系良好,但经贸关系尚未达到预想的水平,相对滞后。如何抓好经贸这个环节,促进政治关系的巩固,是当前要把握的一个重要课题。

过去我们外交官眼睛只盯着两国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倾向,对经济贸易领域关注不够,而且并未系统学习过自然科学或世界经济理论,在这方面比较欠缺。如今世界已进入经济一体化时代,经贸问题更加突出。应该说,我们作为使节在思想上对经贸关系的发展是重视的,但缺乏知识,怎么办?需要“充电”,需要补上这一课。

首先,我从关注和了解中蒙经济合作项目开始。我与商务处的同志一起会见中资企业人员、专家,同时到“第一线”去了解情况,提出意见,并向国内反映情况,协助解决问题。

如前所述,2000年4月,我通过到苏赫巴托省出席中国援蒙图木尔廷敖包锌矿奠基仪式,直接了解了该矿的情况。该矿面积500公顷,距首都520公里,西南距我二连浩特560公里(公路340公里,铁路220公里)。离我边界比较近,产品运输较为便捷。探明储量757万吨,平均品位13.6%,年产品位50%的锌精矿约6.6万吨,矿山可服务25年。目前我国已投资了2亿人民币优惠贷款,执行单位是我有色金属建设股份公司。该矿已于2005年建成投产。

巴嘎班迪总统十分重视这个项目的进展,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此矿是中蒙首个合作项目,希望双方努力使之成为两国合作的示范性项目。参加该矿奠基仪式后,总统两次通过其办公厅主任向我询问该矿情况,对该矿寻找水源问题表示关切。鉴此,我向有色金属公司驻蒙代表古尔班先生了解情况后及时向总统作了通报。锌矿的顺利投产,大大推动了苏赫巴托省的经济的发展,增加

该地区的收入,同时也很好地解决了劳动就业问题。

中蒙较成功的项目还有东戈壁省那林苏海煤矿。该煤矿距乌兰巴托 849 公里,距东戈壁省省会 296 公里,距中蒙边境线仅 40 公里。矿采储量 8893 万吨,含硫量少,现由我内蒙古庆华集团与蒙古“黄金公司”合作开发,总投资约 1000 万美元。产品供应我甘肃省酒泉钢铁集团,年产原煤 8000 吨。此矿的开发,又给两国合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类似这样的项目还有塔温陶勒盖煤矿、图木尔陶勒盖铁矿、巴音高勒铁矿等。

特别提到的是,位于南戈壁省的塔温陶勒盖煤矿是一个大型炼焦煤矿,面积 250 平方公里,离中蒙边界较近(190 公里),储量为 70 亿吨,生产潜力为 50 亿吨。其中可产炼焦煤 15 亿吨,蒸汽锅炉用煤 35 亿吨,可考虑利用开采的煤建发电厂,再将电输往中国境内,其开采潜力大,前景很可观。

为了及时掌握第一手材料,我与中资企业人员保持了密切的联系,通过商务处了解他们营业情况,并定期会见他们的代表。2002 年 2 月至 4 月间,我在乌兰巴托和中央省省会宗莫德市走访了一些企业,包括香港“晶苑”、南京“南泰”服装厂及内蒙古的纺织袋厂、香港“维信”羊绒厂、陕西卷烟厂等,了解它们的经营情况和遇到的困难,并向企业负责人提出若干政策性的建议。

2003 年 6 月胡锦涛主席访蒙时双方达成以下共识:今后两国以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贸合作的主要领域。中方允诺向蒙提供 3 亿美元优惠贷款,用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合作项目。2005 年底蒙新任总统恩赫巴亚尔访华时双方就此贷款问题签订了总协议。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定。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两国经贸合作有着美好的前景,会给两国企业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第十二章 捍卫尊严

就台在蒙设“代表处”进行交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大肆鼓吹“台独”,推行“银弹外交”,派遣人员,以美元为诱饵,企图与蒙古发展“实质性关系”。陈水扁上台后,利用过去任台北市市长时同乌兰巴托市长那伦查茨拉勒特的“关系”,多次会见蒙议员,承诺向蒙提供援助和接受蒙劳务人员,双方关系进一步拉近。

近年来,台当局一改过去拒不承认蒙是独立国家的做法,准备承认蒙古为独立国家,并公然要向蒙“取经”,“学习”蒙古独立的“经验”。台对外经济协会顾问黄华、劳委会主委陈黄菊等人秘密到蒙商谈发展双方关系事宜。对于台种种阴谋与伎俩,中方曾多次通过各种途径向蒙方予以揭露,并晓以利害。但由于金钱的利诱与驱使,双方不仅没有停止接触的步伐,相反继续策划互设“代表处”事宜。

2002年6月4日,蒙对外关系部邻国局局长恩赫图尔约见我,通报称,蒙古最近与台“外交部”进行磋商,准备互设代表处。其目的是“协调非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的经贸活动”,蒙古了解中方的关切,代表处不会进行官方来往。

我严正指出,中方历来反对我建交国与台互设机构。与台“外交部”进行接触,本身就具有官方性质,希蒙方慎重对待此事。第一,不能出现“台湾”字样,只能用“台北”或“中国台北”的称谓。第二,不能出现伪国名、国旗和国徽。第三,蒙政府官员不得出席其举办的任何活动。

6月5日,我根据国内指示约见恩赫图尔局长,就我们了解的关于蒙古要

与台设立经贸与文化两个“中心”事提出交涉,要求蒙方予以澄清。我指出,如出现“台湾”字样,就具有“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的含义。蒙议员那伦查茨拉勒特和乌兰巴托市总管出席“中心”开幕式,这本身就意味具有官方性质。恩辩称,个别议员出席属个人行为,政府并未指示其出席,不能代表官方立场。对此,我进行了批驳。我再次希望蒙方以两国关系的大局为重,慎重对待此事,同时提醒蒙方不能让台方机构的称谓出现“台湾”字样。

交涉后,我馆发现台设立的机构仍用“台湾”称谓,没有摘牌的迹象。为此,我于7月1日再次约见恩赫图尔局长提出交涉,指出台机构的称谓必须改为“台北”或“中国台北”,重申我于6月4日提出的“三不”原则,希蒙方对此做出相应的承诺。恩称对中方立场表示理解,但又称更改名称要与台方机构具体商量解决。

与此同时,我分别约见了总统办公厅主任巴特赫希格、乌兰巴托市长恩赫包勒德、总理外事顾问奥特根巴亚尔等官员,向他们介绍我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希他们报告总统和总理,务必让台“代表处”改变“台湾”称谓。他们对此表示理解,并允即报告领导和有关部门。

7月3日,我从蒙古朋友那里得知,蒙方正在与台方交涉,估计不久后会摘牌。

7月中旬,我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访蒙。访问期间,傅司长再次就台在蒙设“代表处”问题向蒙方做工作。

8月2日傍晚,邻国局长告我,已指示外国投资局派人将牌子摘去。恩赫图尔局长解释说,刚成立经贸与文化两个“中心”(后改称“代表处”)时是以“台北”字样注册的,但在挂牌时台方单方面改写成“台湾”字样。蒙外国投资局已向其提出了批评,令其立即改正。

8月4日晚,我们发现台“代表处”的牌已被摘走。

9月4日,蒙副外长巴特包勒德约见我,正式对台“代表处”进行解释说,“代表处”纯属“民间性质”,不开展官方业务。蒙古已研究了其他国家的做法,不会超越中方所允许的范围。今后将会把有关情况及时通报中方。我再次重申中方对台在蒙设立所谓“代表处”问题的立场,强调绝不能允许与我建交国家与台发生官方关系,提醒蒙方一定要做到自己承诺的“三不”。

蒙台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涉及我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核心利益的敏感问题。尽管台“代表处”交涉事暂告一段落,但实际上台方一直没有停止对蒙的拉拢和利诱。蒙为了自身的利益有可能违背自己的承诺。今后,在台湾



问题上同蒙方的矛盾和斗争还会持续下去。



台北“主任”的喧嚣

台北在蒙“代表处”成立后，派出原驻韩国外交官黄清雄任“主任”。黄到蒙后，利用其在蒙的各种关系以及允诺对蒙给予援助等手法，积极“开展工作”，举行各种“活动”。黄甚至十分嚣张地声言，如今在蒙“有两个黄大使”，“一个是大陆的，另一个是台湾的”。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放厥词，介绍所谓“台湾国”的发展情况，并大肆渲染“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论调。令人不解的是，蒙主要报纸之一的《日报》也与之配合，刊登了黄清雄讲话的内容，报道中竟有6处称台湾为“国家”（蒙文为“улс”）。

针对此事，我紧急约见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嘎尼巴勒，向其提出严正交涉，希望其利用外交部及该司的影响，提醒有关媒体不要进行“两个中国”的错误报道，做有损于中国人民感情和两国人民友谊的事情。

嘎是我的老朋友，他是六七十年代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治局委员扎格瓦拉尔的儿子，曾任驻比利时大使。现除任新闻司长外还兼任蒙古外交协会（非政府组织）会长，经常组织有关蒙外交政策、国际形势的研讨会。他还多次率领蒙新闻代表团访华。

嘎表示完全理解中方的立场，说当前在许多媒体中有一些新手，他们政治素质不高，连最基本的概念都弄不明白，并称，新闻司会敦促有关媒体重视中方有关台湾问题的立场，今后尽量做到不再出现类似政治错误。

与此同时，我馆政务参赞王福康也给《日报》主编打电话，指出其问题的严重性，希望以后不要再犯类似政治错误。对方承认确有错误，决定给予撰写此篇报道的记者扣除当月奖金的处分。

我馆趁热打铁，于次日在蒙五大报纸上同时刊登使馆声明，宣传我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指出台方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不可能得逞。

利用媒体发表声明的做法收到很好的效果，进一步向蒙古群众宣传了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同时对别有用心者起到打击和警示的作用。



达赖 7 次窜访蒙古

自元朝始,蒙古与西藏在宗教方面就一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蒙古八思八文字在形体上与藏文相似。明朝以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得到迅速传播。其原因一是封建主力图用一种精神力量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二是藏传佛教教义符合和满足人民需要安定和平的要求。清政府对蒙古继续采取“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政策,以继续维护其统治。

1951年,作为西藏宗教代表的14世达赖喇嘛主张同中央政府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同意签署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17条协议。后来达赖还被选为人大副委员长,对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和我国第一部宪法表示拥护和积极评价。但是,1959年达赖到印度后,在外国某些势力和分裂主义者的怂恿下,思想逐渐起了变化,逐步走向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道路,也有违其列祖列宗传统宗旨的背叛行为。几十年来,达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顽固坚持其“藏独”立场。中央对达赖一贯晓以大义,给以出路,做到仁至义尽,多次表示只要他放弃“藏独”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我们可以与他谈判,欢迎他回到祖国。但他至今仍坚持其反动立场不变。

蒙古一直把喇嘛教(即黄教)作为主要宗教。现蒙古人口中有85%为信教人群。蒙信教群众把14世达赖奉若神明,对他顶礼膜拜,一再要求宗教团体邀请达赖访蒙。

蒙政府对达赖访蒙问题态度暧昧,以宪法规定公民有信教自由为借口,对达赖访蒙不仅不加以阻拦,反而大开绿灯。在此情况下,达赖从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开始直至2006年的20多年间已7次窜访蒙古“讲经”。1979年,蒙率先打破与我建交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邀请达赖往访的惯例,首先邀请达赖访蒙。对此中方进行了多次交涉,指出达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人士,而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分裂祖国活动的流亡者。我们要求蒙方尊重中国人民不容祖国分裂的民族感情,不再邀请达赖访蒙。然而蒙方继续我行我素,强调什么这是“人民的愿望”,拒不停止邀请,这就使得这场捍卫祖国统一和维



护民族尊严的斗争成为不可避免。

2002年11月,我亲历了蒙方第6次邀请达赖访蒙的全过程。

早在当年8月下旬,蒙方有关人员就非正式向我通报称,达赖访蒙由宗教团体邀请,政府无法出面干预,如不邀请,政府和人革党将会受到来自基层人民的“巨大压力”,对人革党2004年大选获胜“产生负面影响”。对此,我表明了中方的严正态度,指出这是个涉及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原则问题,希蒙方慎重对待。

此后不久,我们从外界多方面的信息中得知,达赖主要从韩、日、德三条渠道来蒙。我在与蒙政府成员接触时也得知蒙不准备阻拦达赖来蒙,具体时间在9月,可能经德国入境。但到了9月初,又得知达赖并没有来蒙。9月4日,蒙外交部官员正式告我,因各种原因,达赖不来蒙古了。接着,蒙媒体和一些群众组织发表文章攻击俄国和韩国未给达赖发签证,并称这是因为中国向韩国“施加了压力”。

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个多月以后,风云骤变。10月中旬,我同在总统与总理身边工作的官员见面时,他们并未就达赖肯定不来蒙事作出肯定承诺,相反一再强调蒙“国情”,说什么关于达赖访蒙问题“不能违背人民的意志”。果不其然,10月29日,蒙各主要报刊刊登了达赖即将访蒙的消息。尽管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但最终未能阻止达赖来蒙访问。

11月1日,我按外交部指示精神,就达赖访蒙事约见蒙副外长巴特包勒德提出交涉,指出若蒙一意孤行,必将对由此产生的后果负全部责任。

1995年达赖第5次访蒙。事隔7年之后,2002年11月4日晚11时20分,就在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达赖第6次抵达乌兰巴托。甘登寺住持乔依扎木茨等人前去迎接。有20多辆汽车及众多信徒高呼口号迎接达赖的到来。当晚到场采访的外国记者不多。我新华社记者到场了解了有关情况。

达赖访问期间,参观了甘登寺、宗教大学及其他寺庙,并为信徒讲经,蒙方还组织了与大学生、青年见面会。蒙国立大学和理工学院分别授予达赖名誉博士称号。达赖访问期间,蒙电台电视台都作了报道。从公开报道看,蒙古官方要员未会见达赖,达赖讲话中也未谈及政治问题。达赖访问期间,整个官方报道显得较低调,没有大加渲染,有关部门加以了一定的限制。达赖于11月8日早晨悄然离蒙。

11月5日,额尔登楚龙外长打电话给我,说扎门乌德车站已滞留了500

多个货运车皮,希中方说明情况。我表示尚不了解情况,允了解后答复。在此期间,蒙一些报刊宣传称,出现车皮滞留表明中方对蒙邀请达赖来访不满,这是在向蒙“施加压力”。11月7日,我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程永华约见蒙古驻华大使阿玛尔萨那,就达赖访蒙问题提出严正交涉。据我们所知,货运车皮滞留,完全是由于技术原因。一天半以后,车皮滞留问题得到解决。

我离任后3年,2006年8月,达赖第7次窜访蒙古。达赖访蒙始终是困扰着我们的敏感问题。为了祖国的主权和尊严,我们还将继续同蒙古进行交涉和斗争。真诚地希望蒙方以中蒙两国关系的大局为重,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关于口蹄疫“从中国传入”的猜测

2001年4、5月间,蒙古的畜群中出现了口蹄疫传染病。口蹄疫是偶蹄目动物的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急性传染病。一时间,蒙媒体中传出中国内蒙古一些盟也发生了口蹄疫,此病“可能从中国传入蒙古”。此后,蒙情报总局新闻发言人在讲话中提及此病“由南亚经中国传入蒙古”。这是蒙官方的表态,也是一个信号。而我们得知的准确消息是国内并无传染此病。

为了维护国家的声誉,以正视听,我奉命于5月2日在大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如下谈话:

最近,蒙古国发生口蹄疫后,蒙古一些媒体传出“口蹄疫可能来自中国”的猜测报道。近日,蒙古媒体又刊登了情报总局新闻发言人关于“口蹄疫由南亚经中国传入蒙古”的谈话。对此,中国大使馆向蒙古外交部提出了严正交涉,并向蒙古有关媒体发表声明,强调目前中国没有发生口蹄疫。蒙方不顾中方的交涉,无端猜测,此举严重损毁了中国的声誉。对此,中方表示遗憾和强烈不满。

中国政府对口蹄疫防治工作历来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中国政府按照国际惯例和中国有关法律规定,严禁从发生口蹄疫国家和地区进口偶蹄动物及其产品。中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动物疫情监测和预报体系,一旦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发生口蹄疫,就立即对边境地区的家畜进行



紧急免疫接种。

今年以来,蒙古国发生口蹄疫,使其经济遭受损失,人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作为蒙古的友好邻邦,中国政府两次决定对蒙古提供 200 万元人民币的紧急援助,以帮助蒙古人民克服困难,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与此同时,我在回答《世纪新闻》报记者提问时明确指出,关于“口蹄疫从中国传来”的说法是毫无根据和不负责任的,中国根据国际惯例和国内规定,如发现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存在疫情,即在离边界 30—50 公里地区采取严格措施,对猪、牛、羊广泛接种疫苗。1999 年中国福建、海南省曾出现过此种疫情。而这次,迄今中国并未发现疫情,所以蒙方的疫情与中国无关。我们希望蒙方有关部门尊重事实,慎重对待此事,今后不再出现违背事实、有损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猜测。

我方的严正声明以及中方对蒙的人道主义援助,赢得了蒙古人民的理解和尊重。经过我方的及时工作,这场风波终于过去。

第十三章

增信释疑



所谓“中国威胁论”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取得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冷战结束后,中国摒弃冷战思维,放弃过去“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作法,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实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赢得世界各国的广泛理解与支持。中国多次向世界表明,即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变得更加强大,也永远不称霸,永远与发展中国家在一起,为世界和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面对中国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造所谓“中国威胁论”,攻击我日益强大是为了取得“霸权”,说什么“中国巨人”、“中国龙”的强大,将对亚洲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这类谎言显然不值一驳。但在一些中小国家包括蒙古,这种言论尚有一定市场。

近年来,中蒙两国在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在扩大,力度进一步加强。在此情况下,一种“资源民族主义”的思潮在蒙悄然兴起。蒙一些媒体和报刊发表文章,说什么中国人“又打回来了”,中国的最终目的是要“掠夺”蒙资源等等。这种论调不攻自破。实践表明,中蒙经贸合作互补性很强,具有巨大潜力,不仅不会对蒙造成“威胁”,而且是一个对双方有利的双赢安排,将有利于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两国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

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后,蒙政府和主流媒体、报刊对此表示欢迎和祝贺。但就在此时,蒙个别报刊刊登“另类”文章,进行别有用心报道。有些文章



声称,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后,中国下一步要“收回台湾”,最终还将“收复蒙古”。这些言论令人咋舌。蒙主要报刊的一位记者在采访我时也主动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指出,中国与蒙古国早在1949年建交,1962年签订了边界条约,1994年中国总理访问蒙古时重签了友好合作关系条约。这些历史性的法律文件早就表明,中国一向尊重蒙古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讲这些话的人如果不是无知便是别有用心。

蒙古在历史上与我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8至19世纪,清朝派军阀入蒙及中国商人在蒙盘剥,对蒙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并使蒙长期保留落后的自然经济,无疑给蒙古人民造成过灾难和痛苦。蒙古人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憎恶中国军阀和商人,在许多文艺作品中屡屡出现经丑化的中国人的形象。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蒙古人中有一种对中国人的仇视、疏远的情绪。近代,蒙古人称中国人为“呼扎”(蒙语叫 хужаа,即“伙计”,是针对我的贬义词)的大有人在。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怂恿和蒙国内仇华分子的影响下,在蒙古一直存在一股针对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

应该提到的是,西方媒体的影响不可忽视。蒙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主要接受西方和苏联的影响。加之我工作开展不力,蒙一般群众对中国的发展变化知之甚少,还是多少年前的老看法不变。

由此种种,长期以来蒙人民对我的政治信任度不高,存有疑虑和戒心。据90年代蒙权威的研究部门的民意测验,在蒙古民众中对外国的认知度和信任度(百分比)的抽样调查中,中国仅列在第4或第5位,在美国、日本、俄国甚至韩国之后。针对这种情况,做细致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对蒙古广大人民开展增信释疑工作,增加信任,解释疑惑,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交媒体朋友

增信释疑,首先要做好媒体的工作。第一步是做各宣传机构和各主要报社负责人的工作。主要方法就是“走出去,请进来”。

走出去。我主动拜访了广播电视管理局局长冈包勒德、蒙古通讯社(简

称蒙通社)社长巴桑苏伦、《世纪新闻报》主编策策格楚龙、《今日报》主编巴勒道尔吉、《蒙古新闻报》主编桑德格苏伦和《真理报》代主编冈巴特等。一方面了解广电局、蒙通社的宣传方针及各报经营情况,同时参观了各报社的室处,还应要求作了访谈录。

请进来。2000—2003年期间,我在使馆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每个季度要轮流请各个报社的有关负责人(主编、副主编、部处主任、首席记者、财务总监等)到使馆做客一次。每次见面,我都要同他们谈谈当前蒙古的一些情况,介绍最近中国的大事,并议论一下国际大事。会见时,他们可以向我提出任何问题,我尽量给予回答。同时我也要提出一些感兴趣的问题让他们回答。当然,我不会为难他们,若不好回答也可不回答。如今已过了好多年,我们见面时的友好热烈情景仍历历在目。与我一起参加会见的有我馆政务参赞、新闻官等。他们也负责回答问题。见面次数多了,彼此之间比较熟悉和了解,大家很随便,会见时气氛融洽。这些会见对我很有益处,很有收获。除邀请他们到使馆外,我们还相约假日一起到郊外休闲,共享自然风光。当我们一起垂钓、一起打球、一起野餐时,可以以朋友的身份,自由交谈,轻松研讨。通过这些活动,我不仅广泛结交朋友,还可以比较及时地了解蒙古的国情和民情,增加了对驻在国的感性认识。

举行记者招待会,也是我馆与媒体直接交流和接触的重要形式与渠道。每逢我国重大节日、重大事件或为介绍我国原则立场,我馆都要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在我的任内,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共举行了十多次。

不打“无准备之仗”。举行记者招待会要作充分的准备:一方面要对将介绍的数据或材料进行认真的阅读,不清楚之处要查阅有关书籍和资料参考;另一方面是要准备回答记者提问。为了回答好提问,要把对方可能提出的问题都列出来,预先准备答问。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全部用蒙语回答问题。为此,我不仅要细看有关同志为我准备的讲稿,进行修改,同时我还自己准备部分蒙文译稿备用。

在蒙举行的“蒙外记者招待会”以蒙古记者为主,外国记者不多,一次仅有二三十人。起初我对举行此种记者会心里没底,生怕被记者“刁难”,准备得很详细。“功夫不负有心人”,招待会举行多了,对回答问题做到应对自如。我的体会是:要开好记者招待会,一要对本国情况和政府立场弄得清清楚楚;二要认真准备回答的问题;三要掌握好回答的分寸和技巧。做好这三个方面,就能达到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的预期目的。



把青年学生请到使馆来

青年是我们的希望和未来。要使中蒙两个好邻居永远和睦相处,使中蒙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要靠青年一代。做好青年工作不可或缺。

我在蒙古国工作期间很注意与青年交朋友。我每年都组织两至三次“定期”的活动,邀请约 200 名留华学生到使馆来做客,出席冷餐招待会。

在每次招待会上,我都要发表讲话,介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情况以及中蒙两国关系的进展。我馆的各级外交官亦广泛与青年们接触,与他们进行交谈。招待会上,我馆青年外交官与蒙古青年共同表演精彩的文艺节目,还举行交谊舞会,共唱卡拉 ok。

把蒙古青年请到使馆来,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可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当代蒙古青年人的情况,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有什么需求,通过友好活动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中蒙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青年工作从文化处做起。文化处同志每年都在蒙各大专院校组织学中文“看谁懂得多”为题的汉语或汉语歌咏比赛,结识了许多到过中国的留学生。只要有时间,我都尽量出席各种比赛颁奖大会和演出活动。2003 年,以蒙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巴特其米格为首的留华学生联谊会正式成立。我馆立即向他们表示祝贺。此后,我们通过联谊会,同众多的留华同学进行联络。

与此同时,我们还定期或不定期地到大学院校参观,广泛接触中文班的同学们。

2000 年 4 月的一天,我应邀到我馆的近邻——蒙古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参观,并在院长包尔的陪同下在大教室作了题为《中国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的讲演。为了使同学们更容易理解我讲演的内容,我全部用蒙语来讲。演讲前我认真修改了中文讲稿,并对蒙文译稿进行了多处润饰。

上午 9 点整,大教室座无虚席。大概是这里从来没有听到过中国人作报告的缘故,大学生们对我到大学演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目光中充满了期待。我在演讲中用数字和实例介绍了中国外交政策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

的成就,同时也用相当篇幅介绍了近年来中蒙两国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为了增加针对性,我在解释中国外交政策时特别强调“和平自主”的内容。为了达到最佳效果,我讲话放慢了语速,注意抑扬顿挫,力求用我所掌握的最生动、最地道的蒙语来表达要说的内容,学生们不断点头表示理解。当我介绍到双边关系的进展时,教室里多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结束前,我留出了提问的时间。我原以为同学们与我不熟悉,提问的人不会太多,但出乎意料,竟有十几个同学提出了各种问题,可见蒙古国的年青一代思想多么开放,多么朝气蓬勃!学生提问大多围绕中国形势和两国关系,其中也有“尖端”的。一名学生提到,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蒙古与“台湾”交往应属正常范围,中方为何要就台建立“代表处”事进行交涉呢?另一名学生提出,蒙古是个信教国家,信徒们对达赖喇嘛十分尊崇,中方对达赖访问蒙古问题一次次地提出反对,甚至就此事进行交涉,这不是“干涉”蒙内部事务吗?对学生出自善意提出的问题,我一点都不反感,且都有准备。我说,非常欢迎同学们提出各种问题,其实这也是我想向大家介绍的问题之一。接着,我针对他们的问题耐心地进行了讲解,用具体事例揭露了台湾当局及达赖的真实面目。

一次讲演,不可能完全解除同学们的疑惑,但我相信,这样的交流与沟通是有益的。我许诺日后有机会一定再到学校来与同学们见面。可惜直到我离任前都未能抽出时间再到该校去作第二次讲演,想起来仍很遗憾。



“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提法的由来

进入 21 世纪,中国外交空前活跃,硕果累累,经济实力逐步增强,我在国际上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我国同各国分别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关系,比如有“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战略互惠关系”等等。这些提法表达方式各异,用词不同,实际内容也有所区别,表示了我国同该国关系的特点和现状。

我国同蒙古国的关系定位的提法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



段。第一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蒙关系转入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称为“友好睦邻关系”。第二阶段:1994年李鹏总理访蒙时重签了友好合作关系条约,这是1960年友好互助条约的发展和更新。李鹏总理在会谈中正式提出同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第三阶段:1998年12月,巴嘎班迪总统访华时发表的中蒙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健康互信的友好合作关系”。1999年7月,江泽民主席访蒙时双方再次重申建立这种关系,指出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稳定。第四阶段:2003年6月胡锦涛主席访问蒙古,访问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正式宣布中蒙两国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这四个阶段是逐步深化的过程,其中主要的内容仍然是睦邻和互信,这是核心。

2003年5月,王毅副外长访蒙,为胡主席访蒙作准备。王副外长在商谈联合文件的过程中,首次向蒙方介绍了我关于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提法的含义。“睦邻”表示两国是友好邻邦,蒙古是我国北部的重要邻国,提“睦邻”符合我党十六大提出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正如蒙古朋友所说,邻居不能选择,是“上帝的安排”,但搞好睦邻关系取决于两国的政策。“互信”是两国关系的基础,政治互信对两国关系又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中蒙两国过去曾出现过不愉快的事情,关系曾出现低潮,其原因是双方缺乏政治互信。近年来,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中蒙两国的政治互信度明显提高,为两国关系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新的世纪宣布建立“互信”关系,表明要使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相处的决心。

关于“伙伴”的提法,蒙方开始时不太明白,曾询问其含义是什么。我方作了这样的解释:“伙伴”就是合作者的关系。现阶段双方实际上已是伙伴关系。我国保持了在蒙第一大投资国和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这本身就是合作伙伴。我国现对亚洲许多国家均称为“伙伴”,譬如东南亚、南亚国家泰国、印度等。总而言之,“伙伴”表明了当前关系的现状,并没有特定的政治含义。我方的解释得到蒙方的完全理解与响应。双方商定在联合声明中确定“伙伴”关系的提法。后来蒙领导人访问俄国时双方在联合文件中也使用了“伙伴”关系的提法。

我2003年离任回国后,中蒙两国关系又有了许多可喜的发展:2004年蒙古总统巴嘎班迪再次访华。同年我副总参谋长兼战略学会会长熊光楷上将率团访蒙,同蒙军方首次进行防务安全磋商,两国军事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



五井蒙古

2005年两国成功地举行了中国文化周和蒙古文化周活动。同年我国吴仪副总理访问蒙古。2006年11月,蒙新任总理恩赫包勒德访华。2007年6月,我新任外长杨洁篪访问蒙古。两国高层互访的延续,使两国政治互信进一步加深。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将会继续发展和深化,以造福于两国人民。

特 约 稿 文

蒙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角色

蒙古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蒙古国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是连接东亚、中亚、南亚和欧洲的重要陆路通道。蒙古国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蒙古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建立了广泛的贸易和人文交流。蒙古国的经济结构以畜牧业和矿业为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蒙古国可以进一步拓展其国际市场，促进其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同时，蒙古国也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蒙古国的积极参与，不仅有利于其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

蒙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蒙古国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东亚、中亚、南亚和欧洲的重要陆路通道。蒙古国的积极参与，不仅有利于其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蒙古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和人文交流，促进其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同时，蒙古国也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增进与沿线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蒙古国的积极参与，不仅有利于其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蒙古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和人文交流，促进其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同时，蒙古国也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增进与沿线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第十四章

友好邻邦



半个世纪的中蒙关系

蒙古原称“外蒙古”或“喀尔喀蒙古”。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取得成功,7月11日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11月26日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于1949年10月16日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当时的蒙古称为“蒙古人民共和国”。1992年2月,蒙古人民共和国改名为“蒙古国”。中蒙两国建交,揭开了两个邻邦国家友好关系的新篇章。至今,中蒙关系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

回顾中蒙关系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脉络,这就是:睦邻友好始终是两国关系中的主流。具体地回顾这段历史,大致可划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的“黄金”时期。两国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这一友好关系,有着深厚的政治和历史基础。

两国建交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得到全面发展。1950年6月,蒙古首任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抵京赴任。7月,我首任驻蒙大使吉雅泰乘汽车到乌兰巴托赴任(大使乘汽车赴任,这在中国外交史上也许是头一回)。

50年代,中蒙苏三国政府签订组织铁路联运协议;中蒙签订了邮电、航空、互供货物、经济和技术援助以及派遣中国工人参加蒙古生产建设等协议。1957年蒙古在呼和浩特设领事馆。

1960年两国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这是两国关系中有里程碑意义的

法律文件。

此期间,蒙古党政领导人泽登巴尔、桑布、丹巴等相继访华;我国领导人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等访蒙。高层互访,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其中,周恩来总理于1954年、1960年两次访蒙,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发展中蒙关系的高度重视。

已故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同志曾用“像蒙古晴朗的天空”来形容这一时期的两国关系。蒙古一年有三分之一强的时间是万里无云的美好晴天,许大使这一比喻十分生动和准确,既表明两国关系当时正处在“黄金”时期,也表明它具有无限生机和美好的前景。

第二个时期是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的“冰冷”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严重分歧,国家关系恶化,但仍维持着外交关系,保留了贸易、铁路、气象等少数部门的往来。

第三个时期是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的“冷而不断”时期。双方意识形态分歧依旧,但关系开始缓和,互派大使和常驻记者,人员往来增多,解决了边界联合检查等双边事务,贸易有所恢复。

第四个时期是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的“解冻”时期。随着中苏关系解冻,中蒙两国恢复了党的关系,外长进行互访,签订了领事条约等重要文件,两国关系逐步转入正常化。这一时期主要有以下事件:

1984年,泽登巴尔主席在回答日本《东京新闻》记者提问时谈到,中蒙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并说蒙古人民“尊敬伟大的中国人民”,蒙中两国人民“有着共同利益和愿望,这就是和平繁荣、互相尊重及和平合作”。泽的讲话,是改善关系的一个信号。

同年8月,蒙方恢复交还对方越境人员的惯例,在布尔干边防站向我新疆塔克什肯边防站移交了我越境人员5户44人,表现出改善关系的诚意。同月,中方向蒙方表示同意将华侨子弟“培才”学校纳入蒙教育体系。

10月,蒙领导人巴特蒙赫在苏联访问时称赞中苏关系正常化“对亚洲局势产生积极的影响”。

1986年6月6日,中断了近20年的乌兰巴托—北京航班恢复通航。8月,两国签订了第一个重要的法律文件——《领事条约》,达成了互免因公签证和简化因公签证手续的协议,同时签订了当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

这一年,蒙方派部长会议副主席策伯格米德出席我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这是两国关系恶化以来蒙方首次派副总理级别的官员出席我招待会(过



去是副部长或部长级)。

1987年,彭冲副委员长访蒙,两国恢复议会之间的交往。蒙古东戈壁省省长米吉德率与我毗邻省代表团访问内蒙古,恢复边境省份的来往。

这一年,蒙古领导人巴特蒙赫、索德诺木致电我国领导人祝贺我国国庆。这在多年来属首次。继《边界条约》后两国签订了另一个重要的关于边界问题的法律文件《关于中蒙边界制度和处理边境问题的条约》。

1988年,蒙古大呼拉尔主席、蒙古人民革命党中联部长林钦访华。

1989年7月,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朱良率团访蒙。朱良部长访问期间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联部长林钦进行会谈,阐述了我对国际共运的看法,表达我党和政府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诚意。朱良部长此访,宣告两党关系正常化。

1989年后,两国关系全面改善,各种代表团互访增多,两国领导人出席对方使馆招待会的规格明显提升,双方恢复了部长级代表团的访问,蒙古恢复驻呼和浩特总领事馆。

第五个时期是90年代初至今的“成熟”时期。1990年蒙古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奥其尔巴特访华和1991年杨尚昆主席访蒙,标志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

进入21世纪,两国政治关系达到新高度,进入稳定发展和成熟时期。双边关系增加了新的内涵,经贸、文教、军事等领域合作进一步扩大。至2007年底,两国贸易额达到20.87亿美元,我在蒙投资企业已达3769多家,投资额突破11.81亿美元。我已成为蒙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投资国。

毋庸置疑,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或不同看法。然而,正如中蒙领导人多次重申的那样,两国都有发展睦邻友好互信关系的诚意,都把发展互利双赢的合作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针,承认双方不存在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这些都是两国关系得以顺利发展的基础。

我多次对蒙古朋友说,半个世纪以来,中蒙关系虽经历曲折,但睦邻友好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这种友好合作的局面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蒙古各界人士表示完全赞同,双方领导人在多次会谈和会见中也就此达成共识,看法一致。



中国人民的“礼物”

两国建交后,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对兄弟的蒙古人民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仅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就给予蒙古数亿卢布(旧卢布,下同)的无偿援助和贷款。比如,1956年我援蒙1.6亿卢布,援建14个项目;1958年,贷款1亿卢布;1960年又贷款2亿卢布。我国当时利用这三笔援款为蒙古建成20个项目,其中包括两个发电站、50000平方米住宅和7座桥梁以及一些生产性设施。有资料提到,1955年至1960年,我国平均每年派出9000名工人到蒙古帮助建设,其中1960年时曾达到1.6万人。

当我们漫步在乌兰巴托街头,乌兰巴托到那莱赫煤矿的公路、和平桥、百货大楼、体育馆、体育场、“大天口”国宾馆、友谊医院(现创伤医院)、“培才”学校(现财经学院)等建筑屹立在我们的面前。不少蒙古朋友热情地向我们介绍说:“这些都是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工人建设的”,“中国建筑工人的技术是一流的”,“蒙古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送给蒙古人民的礼物”,“中国给予的援助是真诚的”。是的,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物,是中国人民给蒙古人民的珍贵“礼物”。

多年来与蒙古朋友的接触中,我们深深感到,这些无私的援助已深入人心,几经风雨,愈久弥坚。

1956年,蒙古《真理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的宝贵援助》的社论。蒙古领导人多次发表谈话,感谢我为蒙建设了公路、桥梁和酒精厂、砖瓦厂、玻璃厂、养鸡场等设施。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泽登巴尔称赞中国人民对蒙古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丹巴称我的援助是“全面无私的”,“兄弟般伟大的援助”。

桑布主席称中国是“爱好和平的伟大邻邦”,蒙古人民和政府为中蒙友谊“感到自豪”。他评价中蒙友谊是蒙古“自由和幸福生活的稳固基础和向社会



主义道路顺利发展的保证”。

中国历届领导人对发展与我们的邻邦蒙古的关系一直给予了很大的关注。50年代,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对蒙古的援助是“小小的”,我们是在“还债”,“不是援助”。周恩来总理说,援蒙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和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

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继续给予蒙古以力所能及的援助。据不完全统计,90年代以来,中方给予蒙古2.2亿人民币和405万美元无偿援助,给予无息贷款1.3亿元,优惠贷款2亿元。这些援助尽管是有限的,但它是真诚的、无私的和不承担任何条件的,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兄弟的蒙古人民的友好情谊,受到蒙古政府和人民的欢迎和积极的评价。



友谊的纽带

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必然要落实到经贸关系之中,而经贸关系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政治关系的巩固。从这个意义上说,经贸关系是两国友谊的纽带。

回想50年代的“黄金”时期,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据统计,1951年至1960年的10年间,两国贸易额增长了59倍之多。1960年,两国贸易额占当年蒙古贸易总额的20%。60年代以后,两国关系经历“冰冷”时期,贸易额降到最低点。1967年两国贸易额仅有61万卢布,只是1960年时的五分之一。90年代以后,两国关系升温,经济贸易关系恢复,贸易额由几千万美元扩大到几亿美元。以2002年为例,当年蒙古向我国出口2.17亿美元,从我国进口1.39亿美元,进出口共3.5亿美元。我对蒙出口以纺织品、机电产品为主,其次是成品油、大米、副食品、水果等;我自蒙进口产品以铜精矿为主,其次是初加工羊皮、羊绒、马皮、绵羊皮等。

近年来,蒙古政府采取对外开放政策,从加强自身经济实力和巩固经济基础出发,采取了积极吸引外资、营造良好投资环境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2002年,蒙古宣布为“投资年”,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投资者论坛”国际

会议,补充修订了《外国投资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从这一年的有关统计数字看,在蒙投资企业2399家,投资额1.6亿美元。据有关统计数字,从1990年至2003年,共吸收外资11.3亿美元。投资主要行业依次为餐饮服务、工程建设与建材、矿产资源开发、食品加工、轻工生产、畜牧业加工。

随着思维与观念的改变,蒙在吸收外资的法规方面做法更加灵活。1991年通过的《外国投资法》至今已修改3次。经修改后,其投资方式更为灵活多样,赢得更多外国投资者的响应。譬如在投资方式方面可独资、合资、购买蒙企业股份与有价证券、租赁、购买特许证等方式,外国投资者享受“一条龙”、“一站式”服务,政府提供税收等优惠,减少管理方面的限制等等。这些积极灵活的做法为鼓励和吸引外国投资者创造了更加优越的条件。

经过多年风雨的考验,中蒙两国的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应该说,两国经贸合作尚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在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很多课题需要研究和解决。



两国“国门”

两国“国门”——边境口岸城市二连浩特和扎门乌德的友好交往,是两国友谊的生动缩影。

我作为使馆工作人员曾多次路过这两个边境城市,也曾到实地进行过参观访问,亲身了解两城的发展变化和它们之间的友好交往。

二连是我国边境“重镇”。1956年,中、苏、蒙三国铁路联运通车,因设立边境口岸而建立此城。60至70年代,二连只有五六千人。这里原是个十分荒凉的地方,也是个刮西北风的“风口”,气候恶劣,昼夜温差大。建城之初,只有一两条主要马路,房屋大多是平房,最高的只有两三层楼。这里缺水,且水质差,颜色发黄,泡起来的茶带咸味,不好喝。全市除一个小型萤石矿外没有像样的工厂企业。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二连大地。1986年经内蒙古自治区批准为计划单列市。1992年,被批准为全国13个沿边开放城市之一,并设立边境经济技



术开发区。由于有改革开放特殊政策和全国各地的支持,二连城市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现在二连有 11 平方公里土地,20 余万人口。城内有多条宽敞的柏油马路,工厂林立,高楼鳞次栉比。

边城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原来由于生活条件艰苦,该城对外地来工作的干部采取特殊政策,工资较高,实行轮换制度。但我认识的不少“支边”干部,他们从 60 年代开始,就一头扎到边城,一干就是二三十年,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给了边陲的建设。原二连旅行社主任、英年早逝的内蒙古自治区外事办公室接待处处长贾贵臣同志就是一个楷模。他是汉族,生在蒙汉聚居的地方,主动学习蒙语,同蒙族同志友好相处,被评为民族团结模范,工作干得有声有色,从二连一直干到自治区政府外办,还兼任内蒙古宾馆总经理。又如我所熟悉的二连原外事处处长孙世谦同志、外事处干部李斌同志和银行干部贾锡文等同志,他们本不是本地人,因工作需要扎根边城,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埋头苦干,为边城的繁荣和中蒙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他们从不以此向国家和人民索取什么,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啊!像这样的同志还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

如今二连口岸已成为中蒙 8 个通商口岸中最大、最重要的一类口岸。经过多年努力,直至 1999 年,口岸铁路过货能力已达 158 万吨(设计能力为 300 万吨),另有公路过货能力 100 万吨。出入境人数保持在 60—70 万人次。这里还是我国对蒙商品出口的集散地。二连有一个大型贸易市场,这里商品品种齐全,琳琅满目。每天,数以千计的蒙古商人通过铁路和公路来到二连采购各种商品,包括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水果蔬菜、家用电器等等,应有尽有,一应俱全。在这里,蒙古人可以买到适合蒙古人使用的价格便宜、适销对路的商品,然后他们又将这些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往蒙古首都及各省省会和中心城市。

谈起中国商品,蒙媒体曾发表过一些文章,指责中国商品是假冒伪劣品,一些带有仇华情绪的人甚至公然污蔑我国产的白酒“毒死人”,大米“吃了会得病”等等。其实中国的商品适销对路,价格便宜,是衣食住行所需的生活必需品,深受蒙古人民的欢迎。而一些外国的高档商品价格太高,一般蒙古群众不敢问津。1998 年,我驻蒙古使馆商务参赞就中国商品质量问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澄清事实,驳斥了蒙境内出现的一些攻击我商品质量的不实之词,蒙有关部门负责人也表态予以响应。

话又说回来,我们并不否认有极个别中国投机商人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对此我国政府将通过法律予以严惩。但这同中国商品长期以来赢得信誉是截然

不同的两回事,不能因出现的个别问题而对中国商品的整体质量进行歪曲。

早就听说在这里经商的大多是浙江温州人。2000年冬我到二连考察参观,当在这个偌大的贸易市场漫步时,随意询问一个商人,果然是温州人,他对经商十分娴熟,并能讲简单的蒙语,对数字特别熟练,令人惊叹!

二连作为中国的“国门”,既是宣传中国的一个窗口,也是中蒙友好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当我们离开二连准备前往扎门乌德时,只见车站货场人头攒动,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一列列车皮、一辆辆货车,满载中国货物,正整装待发。令人感到新鲜的是参加“一日游”的中国和蒙古的旅客。在两国尚未签订旅游目的地合同时,双方旅游部门已开始组织这样的旅游。2005年有关部门签订了旅游目的地合同,相信今后通过两国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前往两国组织的游客会大大增加。

蒙古“国门”扎门乌德,蒙语是“道路之门”的意思,是进入蒙古国的必经之路。进入该市可以见到边防检查站大楼,与我二连边检大楼遥遥相对。扎市也是两国铁路连接后建成的边城。这里是一个沙窝,是一个沙的世界。每当冬春季,沙尘扑面。它同二连一样都面临着同沙尘暴作斗争的治沙任务。由于这里绿化程度不如二连,治沙的任务更加繁重。

扎市原有千把人,城市虽小,“五脏俱全”。除了边检部门以外,还有县市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全市只有一条贯穿全市的柏油路,工厂、商店和学校不多。不过这些年来,由于蒙古实行开放和分区域发展政策,扎市也发生了不小变化,成了边陲省份——东戈壁省乃至全国的一面旗帜。在日、德等国的援助下,建起了扎市口岸联检区,并改造了扎市铁路口岸换装站,其综合作业能力大大提高,整个城市的电话系统得到改造,可以说是面貌焕然一新。

2003年8月,我应扎门乌德市市长达希朝的邀请,乘北京—莫斯科4次国际列车来到阔别多年的蒙古“国门”扎市进行访问。刚一下火车,我就发现,扎市同80年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我有点认不出来了。道路拓宽了,新修了马路,建起了不少高楼,新的学校、公司、医院等机构拔地而起。我们下榻的扎门乌德宾馆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客房宽敞明亮,服务热情周到,餐厅里各式菜肴准备齐全,走入宾馆,有一种宾至如归之感。

达希朝市长热情地接待我夫妇和我的同事,介绍了扎市近年的发展变化。他还让我们参观了该市最大的商贸公司和学校,了解了公司对外开展业务的情况,在十年制学校观看了孩子们的歌舞表演。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看到蒙古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正在创造新的生活,真为他们感到高兴。



沙漠化问题长期困扰着蒙古人。据资料表明,蒙古土地面积的47.3%为戈壁地区,土地中有76%有沙漠化现象。而地处东戈壁省的扎门乌德更是首当其冲。为此,扎市政府已经几次在乌兰巴托举行“防止沙漠化”的研讨会。当我们参观市园林局最大的防沙工程时,不禁为这个市领导的魄力与决心而感动。在这个被黄沙所包围的城市,治沙工作涉及千秋万代,他们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治沙工程的使用上,显示了其所具有的战略眼光。达市长带我看了种有防沙树苗的苗圃。他特别强调扎市与二连市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二连市一直给予扎市有力的支持和宝贵的援助。现在,每到双方节日,各个层次的人员相互祝贺,进行联欢,建立了长期紧密的联系。二连向扎市提供了电力,同时应扎市的要求向他们提供了治沙的树苗。他希望我转达扎市人民对二连市人民的亲切问候和感激之情,还提出了加强两边城交往的一些建议与要求。

从扎门乌德坐上二连外事处的小轿车,走在中国援建的连结两个“国门”的柏油马路上,转眼功夫就到二连。从扎门乌德到二连,可以看到它们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反差”,如今的二连真是“风景这边独好”。这里的绿树更多,道路更宽阔,城区更热闹,高楼大厦更多,城市更现代化。映入眼帘的是2003年建成的造价为5000万元人民币的边检大楼,庄严雄伟,体现了北部边城的现代化水平。走出大楼广场,看见一条连结两面建筑的“彩虹桥”,整个布局显得简洁而大气,是改革开放后边城崭新风貌的一个缩影。

原东戈壁省省长、现大呼拉尔委员(议员)奥登其米德先生高兴地告诉我,近年来,东戈壁省扎门乌德市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中、日、德等国的援助下,特别是在二连的支持下,基础设施有了很大发展,文化教育、社会服务蒸蒸日上,在发展速度和建设规模等方面均走在全国各省的前列。一些蒙古朋友直率地对我说,得到开放政策实惠的二连和扎门乌德在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这种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蒙古各省人民特别是扎门乌德市人民的支持,包括蒙古大量购买中国商品,就不会有二连今日的飞速发展。相反,扎门乌德从二连的发展中也获益良多。二连的同志对我说,蒙古朋友所言不假。实际上,地理环境相近的这对“国门”互为依托,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达到双赢,成为两国睦邻友好合作的典范。

2003年,蒙古大呼拉尔通过了关于将扎门乌德建成自由贸易区的决定。二连市领导得知此情况后,亦向商务部提出在二连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

二连市建议的内容有:将自由贸易区定位为“境内关外、加工贸易、综合

开发”为基本模式的综合性边境自由贸易区。其功能：一是发展区内出口产品加工业；二是利用区内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客商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国际贸易；三是开展保税仓储及商品展示业务；四是根据 WTO 规则和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扩大中外金融、保险、运输等行业的经营服务领域；五是发展适合于中蒙两国市场的生物工程、绿色食品加工领域的高新技术产业；六是形成中蒙经济贸易信息中心。此建议目前尚在研究之中，尚未付诸实施。

不过，相信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扩大和两国经济的发展，两个“国门”之间的经贸合作与交流将会更趋活跃，两个边城的发展具有无限美好的前景。



内蒙古和“外蒙古”

过去我国曾把蒙古国称为“漠北蒙古”或“外蒙古”。当谈及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时，自然要把内蒙古与“外蒙古”联系起来，这是不言自明的。从地理环境、历史渊源、人文习俗、语言文字到文学艺术，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都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同宗同祖，同一语言，同一环境，两地之间有着特殊的亲切感和相互认同感。

发展两国关系，离不开发展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的关系。90年代杨尚昆主席和李鹏总理访蒙时都强调了首先发展内蒙古与蒙古国关系的必要性，强调内蒙古自治区是加速两国关系的“前沿阵地”。

内蒙古是我国最早与蒙古国开展经济合作的省区。1985年和1989年，分别开始边境贸易和经济合作。目前在内蒙古与蒙古国的3210公里的边界线上共有8个边境口岸进行贸易和开展各方面的交流。这是两国开展合作的重要平台。截至2004年，双方贸易额已达到20.17亿美元，共签订各类投资协议和合同387个，总金额为66341万美元，完成营业额9024万美元，外派劳务8156人次。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到，内蒙古自治区在两国贸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更可喜的是，进入21世纪，双方的合作已逐步由单一的日用消费品和原材料的进出口扩大到资源开发、加工装配、农业种植、畜产品加工及工程承包等多个领域。



内蒙古与蒙古国开展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加之有交通便利、语言相通等优势,合作效果好,前景十分可观。内蒙古自治区已在蒙古成功地举办了多次出口商品展销会,内蒙的农副产品和轻工产品的知名度在蒙进一步提高。目前在中蒙经济和科技混委会中设立了内蒙古与蒙古国的“中蒙常设协商工作小组”,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双方合作的有关问题,进展顺利。

目前,内蒙古与蒙古国的人员交往频繁。除了从事经商、劳务者外,每年到蒙古国探亲访友者为数不少。蒙古人到中国治病者中不少去的是内蒙古,因为去内蒙古路途更便捷,费用更低廉。他们有的通过我们使馆联系,有的是自己通过熟人联系。专门为蒙古朋友治病的内蒙古中蒙医院和呼和浩特市中蒙医院被蒙古朋友亲切地称为“友谊医院”。很多经我内蒙古大夫治愈回国的蒙古朋友对我医务人员的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赞不绝口,并请我馆转达对他们的谢意。据知,现在内蒙古自费留学的蒙古学生约有500人,他们主要学习汉语、英语、畜牧、农业等专业。在内蒙古自费学习的各方面条件比在其他地方更为优越。

在60年代困难时期以及我国“文革”时期,我国一些蒙古族和汉族人到了蒙古国。当时,蒙古国经济生活情况较好,教育程度较高。内蒙古同志的一句口头禅是要“赶超外蒙古”。但自20世纪70年代我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蒙古朋友每次到我国来访问参观,对我国的发展变化均表示赞叹,他们之中出现了一句新的口头禅,就是要“赶超内蒙古”。这种说法的改变,反映了两国经济社会情况的巨大变化。

9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之间的文化艺术往来不断。内蒙古乌兰牧骑等文艺团体不只一次地到乌兰巴托等地演出,拉苏荣、腾格尔、德德玛、金花等蒙族艺术家精湛的表演在蒙古引起了轰动,取得了巨大成功。蒙古各类演出团也相继到我国内地和内蒙古访演,他们具有鲜明特色的歌舞受到我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双方艺术家还对蒙古族的歌舞艺术和民族文艺理论进行切磋,达到了共同提高的目的。



“桑斯尔”和《索伦嘎》

近年来,在中蒙两国文化交往中,出现了“桑斯尔”和“索伦嘎”两个“品牌”。两个“品牌”均来自内蒙古,也代表中国,是中蒙文化交流的丰硕成果。

中蒙合资“桑斯尔”(蒙语 сансар,“宇宙”的意思)有线电视有限公司创建于1995年,总投资50多万美元,中方占股份70%,蒙方占30%。目前主管有线台及其网络,电视网已覆盖乌兰巴托市区楼房住户的95%,安装户达6万户,成为蒙古家喻户晓的有线电视台。该台最初只能传输12个频道的节目。2000年启动光缆系统改造工程,于2002年底完成,建成了覆盖70平方公里的光缆线路,现可传输50套节目,传输质量和信号质量得到改善,市场竞争优势明显。2005年,还创办了“桑斯尔”数字电视公司和因特网,实行数字电视节目传输,并成为乌兰巴托第三大宽带网公司。

“桑斯尔”电视台除传输我中央电视台、凤凰台节目外,还传输我内蒙古、新疆、星空等电视台的节目,使蒙古人民及时了解中国和世界的情况,达到“天天传友情,日日办商展”的效果,并为蒙古群众到我国旅游、购物、上学、探亲访友、求医等提供了大量信息,受到蒙古各界人民的欢迎。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该台还自办了4个频道,即STV综合频道、电影频道、儿童频道和文艺频道。2004年,蒙古议会在该台建立微波点对点发射台,对蒙古议会会议进行现场采录,对及时介绍和宣传蒙古国内大事起了很好的作用。

如今,“桑斯尔”是在蒙古知名度和信誉度很高的电视台,已真正成为加强中蒙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及增进人民的信任与友谊的桥梁。

2002年5月16日,我在使馆会见了双方股东代表蒙方的恩赫巴亚尔和中方的林栋。他们向我谈及公司运营情况及当前资金短缺的困难。会见后我即向国内反映该台情况,建议请有关部门协助解决资金问题。我馆从加强两国文化交往的角度出发,十分重视“桑斯尔”电视台所起到的对外宣传和辐射作用,曾给予该台力所能及的指导与帮助。



《索伦嘎》(蒙语 солонго,“彩虹”之意)月刊是内蒙古自治区主办的对外宣传刊物,创办于1993年,主要介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介绍内蒙古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人文地理、民族宗教、风土人情和秀丽山川,报道中蒙两国领导人互访、两国经贸往来和民间交往的情况。

《索伦嘎》创刊初期为新旧蒙文对照、小16开、64页、12个版面彩页的月刊。1999年改版为小16开、48页全彩印刷的双月刊,发行俄文、新蒙文两种版本;2002年第一期起再次改版为大16开月刊,全彩印刷,取消原有的俄文版本,并将新蒙文版本由过去的48页增加到64页,文字由过去的单一新蒙文改为增加汉文内容摘要和汉文图片说明。

目前设置的主要栏目有《世界视点》、《中国视点》、《中华大地》、《可爱的内蒙古》、《友好往来》、《西部大开发》、《经济纵横》、《民族大家庭》、《人物》、《文化艺术》、《文物古迹》、《科教园地》、《信息之窗》、《为您服务》、《学汉语》等固定栏目和《中国与WTO》、《港澳台之窗》等非固定栏目。同时还根据读者的需要,不断推出新的栏目和新的内容。

在《索伦嘎》创刊10周年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为《索伦嘎》题词:“空中彩虹,友谊之桥”。

《索伦嘎》刊物改版后,内容更加丰富、设计更加美观、发行量不断增加,在蒙古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蒙古国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重要渠道之一。

蒙古驻华大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赞《索伦嘎》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发展的一面镜子,是两国人民彼此了解的桥梁”。蒙古前驻呼和浩特总领事说,他是《索伦嘎》的忠实读者,经常在此刊上关注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就等方面的文章。他说,《索伦嘎》刊物已成为蒙古读者“最喜爱的刊物”。据了解,在蒙古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都把《索伦嘎》作为研究中国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进行收集。一些有影响的报纸,如《世纪新闻报》、《今日报》、《真理报》等在报道中国时,都转摘《索伦嘎》的内容。在蒙古出版的一些书刊中也经常引用《索伦嘎》上的数据。许多蒙古读者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形式向《索伦嘎》了解情况,咨询问题,还有的人到呼和浩特直接与编辑部联系,要编辑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目前,《索伦嘎》正在不断开拓境外发行渠道,增加境外落地率,在巩固已有发行渠道的基础上,开拓了蒙古国航空公司发行渠道。蒙古国际列车建立了《索伦嘎》乌兰巴托工作站。现在,每期有几百册刊物由工作站负责人发往

蒙政府各部门、大学和书店。通过工作站进入蒙古中央邮局报刊订阅的正规发行渠道,蒙古全国各地都可通过邮局订阅到此刊物。同时,通过二连等口岸进入蒙古的刊物大量增加。在二连海关、检疫局、物业管理中心等窗口单位都摆放有刊物,每期2500册《索伦嘎》由这里进入蒙古国。由于采取了多种措施,《索伦嘎》在境外落地率达70%。

今后,随着《索伦嘎》在内容和形式上进一步创新,增加针对性、可读性、趣味性,在图片和文字的处理上提高其艺术性,它将会更加受到蒙古人民的喜爱,真正成为中蒙友好关系的一朵奇葩。



第十五章

接待元首



邻居需要互访

邻居需要互访,友谊需要积累。中蒙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政治互信与日俱增,经贸合作不断加深,两国关系有了长足发展。其中高层互访,特别是元首互访,对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蒙关系的“黄金”时期,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没有访问过蒙古。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3位国家元首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主席相继对蒙古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表明中国不分国家大小一律奉行睦邻政策的坚定决心,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蒙古人民的深厚情谊,在中蒙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十分幸运的是,在蒙古工作的外交官中,我是全部参与了3位国家元首访问接待工作的几个人之一。参加3次接待工作的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



慈祥的老人

1991年8月26日至29日,杨尚昆主席访蒙。这是中蒙两国建交41年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我们的邻国蒙古。双方均认为此访具有重大意义,对访问非常重视,为访问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当时我是外交部主管蒙古事务

的一处处长兼杨主席的翻译,参加了代表团访问准备工作的全过程。

元首访问的文字材料准备工作包括:访问国的背景材料、政治会谈谈话提纲、宴会祝酒词和集会讲话稿、共同文件中方稿、新闻消息稿。礼宾活动部分由礼宾司负责,具体事项由我地区司主管处与蒙驻华大使馆及我驻蒙古使馆与蒙对外关系部的相应部门进行联系沟通。

为完成好这一重大政治任务,我司在访问的一个多月前便开始启动准备工作。在主管蒙古事务的人员较少的情况下,我处同志发扬全处“一盘棋”的精神,不分彼此,这已成为我们司、处的光荣传统。从开始准备工作的第一天起,负责朝、韩事务的同志就与我们负责蒙古事务的同志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

经过夜以继日的工作,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我们开始做出国前的具体准备。出发前几天,在国务院会议室召开了代表团全体人员联席预备会议。外交部和主席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向每个同志介绍了整个访问活动的日程安排和注意事项。每人手头都有一本访问日程的手册。开过会后,我们各自分头做临行前的最后准备。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家元首政治会谈的翻译工作,心中既激动又有些担心,怕万一翻译不好,“砸了锅”就无法交代了。为了万无一失,临行前的夜晚,我几乎没有合眼,将所有材料反复阅读,尽量熟记于心……

8月26日,我们所有陪同出访的工作人员早早就登上了专机。在专机上,我们终于见到了过去只能在电影或荧屏上才能见到的杨尚昆主席,近距离见到国家元首,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专机平稳地在蓝天飞翔。过了一个半小时,顺利地降落在乌兰巴托布彦特乌哈国际机场。奥其尔巴特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杨主席一行。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仪式后我坐上了早已准备好的1号轿车,我和蒙方翻译普勒布扎尔嘎勒一起给两位主席当翻译。在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国宾车队只用了十几分钟就到达此次杨主席将要下榻的“蒙古钓鱼台”——“大天口”(Их тэнгэрийн ам)国宾馆内的贵宾楼。

“大天口”国宾馆贵宾楼是一座两层欧式洋楼,是专门接待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宾馆。一层是接待厅,二层是卧室和餐厅。二楼的家具都是朝式的,听说金日成将军访问蒙古时曾下榻在此楼,这些家具是金主席赠送给蒙方的。

到达宾馆,已近正午时分,蒙方礼宾官立即安排杨主席在二层一间宽敞的客厅内用餐。一张方桌,4个人吃饭:杨主席和他的女儿、中方礼宾司司长江



康和我。我坐在杨主席的身旁，把吃饭的要求告诉蒙方服务员。为了让杨主席吃得更好，我馆专门派了一名厨师到宾馆为主席做饭。听说杨主席喜欢吃烧肘子，我们预先从北京买来了烧好备用。蒙古厨师也使出十二分解数，除了拿手的蒙古菜肴——烤羊腿、牛排和奶食品外，还尽量做了一些接近中餐风味的菜点供主席挑选。服务员说，饭菜已准备好，不知主席想吃蒙餐还是中餐。杨主席说，客随主便嘛，先尝尝蒙古饭菜，再上中餐。就这样，开始上菜。一道道菜上来后，主席都问我这是什么，有什么特色。我特别向主席介绍了烤羊腿的做法和蒙古人喝奶茶的习惯。主席看到沙棘汁很感兴趣，问我这是什么。我给主席介绍说，蒙古属干旱地区，同我国甘肃、宁夏的气候相近，那里的沙棘果特别多，在一些省专门成立研究所进行研究和种植试验，现好几个省都生产沙棘汁，这种汁营养价值很高，可供航天员使用。蒙古人十分喜爱沙棘汁，这是高级饮料，一般只在重要宴会或国宴时才摆放。杨主席听我讲解后马上尝试喝了一杯，称味道不错。

主席一边吃饭一边与我聊起了家常。他说，听我的口音像是南方人，问我是哪里人，在哪个大学毕业，在哪里学的蒙古语，有几个孩子，都在读书还在工作等，问得十分仔细。主席与我拉起家常，这样的一问一答，一下子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我的紧张心情也烟消云散了。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与我这样一个普通干部拉家常，问得那么细，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在同我聊天时始终带着慈祥的微笑。他既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位慈祥的老人。这次陪同杨主席访问蒙古的过程中，主席那种勤奋工作、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性格、工作作风以及他慈祥的微笑，印象特别深刻，令我终生难忘。



当主席联络员

1999年7月15至17日，时隔8年后江泽民同志以国家主席身份对“草原之国”蒙古进行国事访问。此时我刚从使馆调回国内不久。由于人手不够，使馆请求国内“支援”，经研究，部决定临时抽调我和其他两名同志到使馆协助工作。

访问从15日开始,我和我部杨庆东、中联部孙京国3人于11日飞抵乌兰巴托。当晚就参加由齐治家大使主持的使馆全体人员会议。会议热烈而紧张,完全处于一种临战状态。齐大使对各部门和每个人都布置了任务,同时亦专门向我交代了任务。考虑到我的具体情况,决定由我当“主席联络员”,这是一个特殊的差事。我的主要任务是在宾馆负责与代表团和蒙方礼宾官进行联络,保证首长访问过程中的礼宾安排和衣食住行畅通无阻。虽然这是一项不上前台、专门负责后勤事务的差事,但只要可以为访问做点事情,做个“无名英雄”,我很乐意。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与其他联络员于两天前便到江主席将下榻的“成吉思汗”宾馆同其负责人会晤,了解对方准备情况,向对方提出生活、饮食和安全方面的具体要求,并逐个房间进行察看,发现问题马上找对方人员落实解决。

“成吉思汗”宾馆坐落在乌兰巴托城东。此宾馆最初由南斯拉夫援建,后因资金不足停顿下来。最后,由蒙企业家出资继续建完。宾馆既有欧式洋楼的特点,又融入了蒙古的民族特色,造型美观大方,硬件设施先进,在蒙古国内属一流水平,被定为蒙古的“五星级”。自从建成以后,逐渐取代了设施相对落后的“大天口”国宾馆,几乎所有外国元首访蒙时均下榻在这里。但严格说,宾馆的硬件尚可,软件还达不到要求,同我国内的五星级宾馆相比,差距很大。

江主席访问时间是7月份,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间。蒙古无霜期短,冬天漫长,夏天凉快,一般不需空调设备,宾馆连电风扇都没有。考虑到近日天气炎热,房间内无空调设备会影响首长的休息。为确保访问成功,我馆决定“破例”增设空调,决定后,我们立即与二连市联系速购一台空调机,并请求他们顺带两名技术人员火速赶到乌兰巴托。两位师傅抵蒙后,马不停蹄地立即在宾馆进行紧张试装,只用了半天时间,便大功告成,工作效率确属一流。

宾馆用的是软钢丝床,对年纪大的老人不合适。我馆在接待其他领导人时也遇到过此情况。于是,我们立即换上了使馆质量最好的木板床。考虑到首长不太习惯蒙的饮食,使馆派厨师郭海峰(从天津来的特二级师傅)到宾馆待命,并提前与国内有关部门联系确定了用膳菜单,有些用料预先派人到内蒙古采购。

7月15日,风和日丽,但天气有点闷热。江主席一行乘专机抵达乌兰巴托布彦特乌哈国际机场。原定的访问日程是:11时30分抵蒙,12时05分抵



宾馆,12时15分用午餐。但前方突然通知飞机提前15分钟抵蒙,因此决定于12时整用餐。指示一到,我即告知郭师傅。这一决定通知郭师傅后他有点犯难,因浸泡的材料都有时间规定,时间不够会影响菜肴质量。另外我们送饭都是通过两部电梯,有时运行不太正常,会影响准时送饭。但郭师傅二话没说,闷着头加速备料。我和招待员同志随时准备做好搬运工作。

江主席到达宾馆后,我和招待员及临时抽调的两名馆员夫人一起把餐具摆放进房间。经过大家努力,郭师傅准时于12时将一道道饭菜准备好,由招待员送进房间。郭师傅手艺高超,在天津宾馆工作时曾为中央首长做过饭。我们事先得知江主席夫妇喜欢吃清淡的饭菜,要求郭师傅做菜尽量清淡。郭师傅做的午餐咸淡适中,江主席夫妇很满意。郭师傅还在夜宵中加了一道莲子羹,受到主席夫妇的称赞。

江主席访蒙期间共在宾馆吃了5顿饭。我馆接待组4位同志通力合作,尽量周到地为首长夫妇服务,首长对此很满意。江主席主动地询问两位女同志来馆多少年了,原来在国内做什么工作。江主席见到我时,也问我是第几次来使馆。我愉快地告诉江主席我曾于1991年蒙人革党主席访华时给他当过翻译,至今还记得他与蒙古客人用俄语交谈和唱《喀秋莎》的情景。江主席想了想说:“哦,我记起来了,你是学蒙语的,广东人。”我暗想,主席的记性真好!

访问快结束时,我们接待组向主席的随行人员提出了一个请求,即希望访问结束前能与主席夫妇一起照一张相。主席夫妇满足了我们的意愿。就这样,我们接待组除了参加江主席接见全馆同志的合影外,还单独与江主席夫妇合影留念,感到十分自豪和幸福。至今,与江主席的合影照片一直珍藏在我的影集中,成为我的一段美好记忆。

江主席夫人王冶坪同志,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为“王阿姨”,她身体不太好,每次跟随江主席出访,十分辛苦。照理她是“第一夫人”,我们想象她一定“难以接近”,但实际上她态度和蔼,一点架子都没有。我们问她有什么特别要求,她说很好,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参加宴会时同大家一起吃蒙方准备的饭菜。7月16日,江主席一行按计划到乌兰巴托市那莱赫区参加小型那达慕活动,并到一户牧民家做客。由于早晚天气变化大,我们为主席夫妇,特别是王阿姨准备了一些用品,但他们都没有使用。临别时,王阿姨为了表示对我们服务工作的感谢,给我们参加服务的每个同志赠送了一个小闹钟。至今,这个小闹钟仍然摆放在我的房间里。每次看到它,都使我想到了江主席访蒙的往事。



全程陪同胡锦涛主席访蒙



五
井
蒙
古

2003年6月4日至5日,胡锦涛主席对蒙古进行国事访问。这一访问无疑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蒙关系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一次,我有幸作为驻蒙古大使陪同胡锦涛主席访蒙,经历和见证了这一重大外交事件的全过程。

下面我愿将使领馆接待胡主席访蒙前后的大事记录于后,读者从中可大概了解我驻外使馆是如何做接待国家元首访问驻在国的准备工作的。

2003年4月11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在北京约见蒙古国驻华大使阿玛尔萨那,正式提出胡锦涛主席计划于6月份访蒙。

4月14日,按国内指示,我在乌兰巴托约见蒙古外长额尔登楚龙,正式通知胡锦涛主席即将访蒙。额表示,蒙方认为胡主席当选为国家元首后第一次出访就决定访蒙,表明中方对中蒙两国关系的重视,蒙方感到荣幸和高兴。蒙外交部将与中国大使馆密切合作,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以保证访问圆满成功。

同日,使馆召开各部门负责人出席的馆务会,我就胡主席访蒙的政治意义向各部门负责人进行动员,并提出馆内各筹备小组的分工计划。

4月22日,我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张云率7人先遣组(包括礼宾、新闻、安全、后勤方面的官员)先期访蒙,进行“踩点”,同蒙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鲁赞商定访问初步日程、参加各项活动的双方人员名单、有关礼宾程序安排等,并到所有活动的地点了解情况。蒙副外长巴特包勒德接见了先遣组。

蒙方在同我商谈时提出以下建议:一、访问结束时发表联合公报;二、希胡主席在议会发表讲话;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张司长表示将立即把蒙方建议报告国内,另行商议。

5月6日,使馆成立接待胡主席访问领导小组,由我牵头。下面分新闻、简报、礼宾、联络、后勤等小组。各组的负责人分别由政务参赞、经济商务参赞、武官和文化处、领事部、办公室负责人担任。我要求各组尽快订出实施工作细则。



这个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相继出现“非典”,蒙方在边境地区采取严厉的应对措施,以防止疾病向蒙古蔓延。由于中方采取了有力的措施,“非典”疫情得到了控制。胡主席访问的准备工作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继续有条不紊地进行。

5月16日,使馆馆务会对各组的准备工作进行逐项检查。

5月19日,承担胡主席飞越蒙古的我专机组进行试飞,整个过程十分成功。

5月21日,王毅副外长访蒙,同蒙外交部邻国局局长恩赫图尔商谈访问结束时发表的共同文件——联合公报(后改为联合声明)问题。蒙方原则同意在共同文件中提出两国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强调双方以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两国经济合作的主要内容。22日,蒙古总统巴嘎班迪、总理恩赫巴亚尔分别接见了王副外长。他们在谈话中对胡主席即将访问蒙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访将推动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

5月26日,使馆召开全体联络员会议。各组联络员分别由懂蒙文、英文的外交官担当。会后,全体联络员进入“临战”状态,具体落实有关事项。

5月29日,使馆全体人员、在蒙企业家、华侨、留学生代表到使馆礼堂进行机场迎接胡主席仪式的最后“彩排”。

5月31日,我与夫人何思红到“成吉思汗”宾馆胡主席即将下榻的房间进行检查,发现了窗帘、噪音等问题,要求宾馆负责人立即解决。

6月3日,我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先期抵蒙。我陪同傅司长到议会大厅等几处场所检查落实,并同蒙古外交部邻国局局长恩赫图尔就会谈中的几个具体问题进行磋商。

同日,我分别接受香港亚洲电台、无线电台和电视台记者采访,就胡主席访蒙的意义、中蒙两国关系现状回答了他们的提问。

6月4日,清晨,我馆除留守同志外,全体“进驻”“成吉思汗”宾馆。后勤组的同志向各房间分发有关食品、饮料等。礼宾联络先遣人员到机场待命。

下午2时25分,胡锦涛主席和夫人刘永清一行乘坐的专机徐徐降落在乌兰巴托布彦特乌哈国际机场。我和蒙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鲁赞登上专机邀请胡主席夫妇下飞机。我对胡主席说:“胡主席,我代表驻蒙古使馆的全体同志、旅蒙华侨、中资企业家和留学生热烈欢迎您和夫人应邀到蒙古国访问!”。胡主席说:“谢谢。”然后,我与鲁赞跟随胡主席夫妇走下专机。巴嘎班迪总统夫妇早已迎候在舷梯旁。两个蒙古儿童向胡主席夫妇献花。接着,机场上举行

了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两位元首检阅仪仗队后,胡主席同蒙方政府、议会官员和我驻蒙使馆外交官及其夫人握手。由中资企业、华侨和留学生代表组成的中方欢迎人员举着“热烈欢迎胡锦涛主席访问蒙古”的大幅标语不断高呼欢迎口号。胡主席高兴地走向中方欢迎人群,同他们前排的代表一一握手。然后,国宾车队在几名摩托车手的护卫下缓缓地驶向城区。

下午5时,巴嘎班迪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在国家宫中的蒙古包式的国家礼仪宫举行了礼节性的会见。接着,在国家宫二层B厅举行了正式会谈。会谈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举行,双方对两国关系的现状给予高度评价,并就两国经贸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下午6时30分,两位元首出席了经济合作协议等文件的签字仪式,并共同会见了记者。双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均谈到,在会谈中双方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会谈富有成果,双方对此次会谈的结果均表示满意。

6时45分,巴嘎班迪总统在“大天口”国宾馆举行盛大国宴招待胡主席及其一行。两位元首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冷盘上毕,巴嘎班迪总统请胡主席切羊背,这是蒙古对最尊贵客人的传统礼仪。宴会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

6月5日上午,胡主席在成吉思汗饭店七楼大厅会见了我使馆全体工作人员和中资机构、华侨和留学生代表。接见时,我首先讲了几句话。我说:“应巴嘎班迪总统的邀请,胡锦涛主席夫妇从昨天起正式访问蒙古国。访问期间,同巴嘎班迪总统举行了正式会谈,并签署了重要文件。胡主席当选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就选择了蒙古国,表明中央十分重视中蒙关系,这次访问将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和重大的影响。胡主席亲访蒙古,对我们这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全体同志来说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现在,请胡主席给我们作指示。”

胡主席首先谈到国内的大好形势,接着简单介绍了访问的情况,并对所有驻蒙人员表示亲切的慰问。他还语重心长地勉励全体使馆工作人员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加强学习,加强调研,广交朋友,深交朋友,进一步做好对蒙工作。胡主席讲话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代表全体驻蒙人员感谢胡主席的讲话,表示我们一定要学习胡主席的讲话,遵照胡主席的指示,努力做好对蒙工作。

10时15分,胡主席一行抵达国家宫三楼议会大厅,出席同蒙古议员的会见会。胡主席在图木尔奥其尔议长的陪同下,在贵宾席就座。图首先致欢迎



词。然后,胡主席走上讲坛,作了题为《携手共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讲话。会议厅座无虚席,除议员外,各国驻蒙使节列席了会见会。胡主席在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中蒙关系和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出了两国在政治上要相互信任,经济上要互利合作,安全上要加强合作。胡主席的讲话受到与会会员的热烈欢迎,会场响起了阵阵掌声。

11时40分,胡主席会见了人革党主席兼总理恩赫巴亚尔,并出席了恩主持的午宴。席间,恩与胡主席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双方谈到进一步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等具体问题。蒙外长等出席宴会作陪。

下午3时10分,胡主席结束对蒙古国进行的24小时的访问,在机场与巴嘎班迪总统亲切话别。话别时,我和夫人在场。

下午4时整,胡主席乘坐的专机离蒙回国。蒙外长、驻华大使等及我驻蒙人员代表为主席送行。胡主席乘坐的专机起飞后,巴嘎班迪总统夫妇与我夫妇进行了交谈,共贺访问圆满成功。

6月11日,各接待小组进行接待胡主席访蒙工作总结。经过从90年代以来对我国几位领导人的接待工作,我馆在礼宾、新闻、安全、后勤准备工作及访问现场安排等方面逐渐摸索出一些经验,为今后搞好接待工作打下了基础。当然,以更高的标准要求,我们尚有不少缺点和不足,如机场迎送人员的组织、代表团行李接运、记者招待会安排等方面尚有一些技术问题有待改进。

6月16日,我馆向国内报回了蒙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对胡主席访蒙的反应情况。蒙古主要舆论对以胡锦涛主席为首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给予很高评价。他们称胡主席“态度诚恳,平易近人,思维敏捷”“对蒙古民众亲切和蔼”“体现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崭新风采”。

第十六章

祖国亲人



一次严格的“中考”

加深两国睦邻关系,除了保持高层互访之外,还需增加双方各种团组的往来,密切各部门和地方之间的交流,使人员的往来经常化。这些多层面的交流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由此可逐步形成一个“立体”的、全面的友好关系格局。

蒙古地处较偏僻地区,来蒙古访问的团组相对较少,代表团组都是祖国亲人,因此,我馆对他们的来访都很重视,将此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每次到访,馆领导亲自出面,各个处室有专人负责,对他们的行程安排,甚至饮食起居都尽量给予照料。代表团组访蒙后说:“驻蒙古使馆的同志们特别亲切,接待很周到”,“来蒙古以后使馆的接待使我们有宾至如归之感”。这些评价无疑是对我馆工作的鞭策和鼓励。

20世纪80年代,中共和蒙人民革命党中联部长的互访,揭开了两党关系正常化的序幕。此后,两党各种级别代表团互访不断。1990年我中联部副部长朱善卿、中央统战部部长张声作分别访蒙。同年,中央委员王群赴蒙出席蒙人革党二十大和人民革命胜利70周年庆典。1994年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占率友好代表团访蒙。这一系列访问,促进了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友好联系和相互理解。

2000年10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尉健行同志访蒙。这是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到蒙访问的中国最高级别的党代表团。

蒙方给予了高规格的、热情的接待,采取二级(相当于国家副元首)警卫



措施。蒙古总统、总理、议长分别会见，人革党总书记与尉健行同志举行会谈。尉健行同志不忘老朋友，分别会见了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主席。访问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增进了相互理解与信任。我党对外关系四原则更加受到蒙各党的理解和赞许。

我全程陪同代表团访问。为了更好地向首长介绍蒙古的情况，每项活动我都与首长同车。

尉健行同志精力充沛，身体很好。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清晨都要进行散步锻炼，且步行的速度很快。访问期间，他仍坚持清晨从下榻的成吉思汗宾馆快步走到苏赫巴托广场，然后再返回宾馆。我决定跟随他一起散步。但他的秘书和警卫员说服我不要去了，原因是未经锻炼的人难以跟得上他的步子。我只好作罢，另派一名负责安全的武官助理随行。这位年轻同志跟首长步行了两天，脚上竟然起了泡，而首长一点问题都没有。由此可见，首长的散步锻炼功夫之深！

起先，我们安排访问日程时，时间较为宽松，但尉健行同志提出希望利用访问之机，尽量多看看，多做做政党与人民的工作。根据首长的意见，我们在日程中增加了不少参观的内容。首长严格按照日程进行访问，参观博物馆时，看得很仔细。每到一单位，都很尊重主人，并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会谈会见中，首长除介绍我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和国内经济形势外，还仔细听取对方的介绍，并不时提出问题。

早就听别人说，高级领导人来访，对我们使馆要求特别高，一次访问，犹如一场考试。有些使馆的负责人在首长提问时回答不出来，甚至一问三不知，结果受到部里的批评。

如果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访问比作“大考”，部司级代表团访问算作“小考”的话，那么政治局常委这样级别的党代表团来访应该算是“中考”。此次尉健行同志访问时果然对我这个新任大使进行了一次严格的“中考”。

访问过程中，尉健行同志向我提了许多有关蒙古的问题。他问得很详细，涉及面很广。譬如，首长问：蒙古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多少？年增长速度是多少？人民生活状况怎样？最低的贫困线收入是多少图格里克？人民群众对现在的社会制度和过去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看法，对过去的制度是否留恋？对外方面，首长问：蒙古对中、俄、美、日等国态度如何，有没有区别？对此我根据自己平时掌握的情况向首长一一作了介绍。

小轿车在乌兰巴托市区行驶时，尉健行同志指着国家宫、文化宫和全市最

高的乌兰巴托市银行大楼问我有关情况。当他指着眼前一座粉红色建筑问我是什么大楼时,我告诉他这是国家歌剧舞剧院。他又问是哪一年建成的,这一下子我卡了壳,回答不出来了。首长没有再问什么,但我一直为回答不出来而自责。晚上回馆后我马上向有关同志了解,第二天立即将了解的情况告诉了首长。

尉健行同志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我觉得这次“中考”只能算及格,尽管能回答首长的提问,但对一些问题只知皮毛,知之不深,今后还需要提高。



“中国政协是什么团体?”

我馆接待过乔石委员长及不少人大代表团访蒙,但尚未接待过政协代表团来访。为此,我们与蒙外交部、大呼拉尔等部门联系,拟安排政协代表团来蒙访问。在介绍过程中,蒙古朋友问我们,中国已有一个人民代表大会,是个议会机构,为何还出现一个政治协商会议的机构呢?它与议会有何不同?我们向他们介绍说,中国人民政协成立于1949年9月,当时曾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举行第一次会议后,全国政协不再代行人大职权,但它仍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政协是人大决策前的协商机构。了解有关情况后,蒙方表示愿意接待我政协团。

经我馆做工作,政协代表团终于成行。2000年8月15日至1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首次率领政协代表团访问蒙古。访问前,我馆与蒙大呼拉尔办公厅进行多次商谈,最终确定了日程。

8月15日,我到机场迎接叶副主席。在代表团下榻的成吉思汗宾馆,我向叶副主席汇报了蒙方的安排及蒙古的基本情况。谈话中,叶副主席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广东南海人。他高兴地说,他也是南海人,祖籍是南海县叠窖乡,真是“他乡遇故知”。攀谈起来,他还是我的“校友”,是佛山一中的前身华英中学毕业生。我们用广东话谈了起来,几句话,就拉近了距离。

访问进行得很顺利。蒙古总理和议长分别接见了叶副主席。会见时,中



方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并着重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蒙方也介绍了本国走上民主化道路以来经济社会所取得的发展和变化。双方对当前两国议会和人民团体之间的美好交往均表满意。叶副主席代表中国政协正式邀请蒙古议会代表团回访中国。

8月的蒙古,天高气爽,万里无云。代表团到森林公园游览。蒙古主人用“浩特浩克”(焖罐羊肉)接待尊贵的客人。叶副主席说,他曾访问过欧美和亚洲多个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此次访问的蒙古、朝鲜都是尚未到过的国家。来到蒙古发现,尽管这里属欠发达地区,但本身也有不少有利条件,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他还谆谆教导我们要积极开展工作,与当地人民开展友好交往,取长补短,努力发展睦邻关系,为我国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

临行前,叶副主席让秘书将他在广东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我,叫我什么时候回广东时可去找他。至今叶副主席的访问已过去多年,但他作为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平易近人的风格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年后,蒙古大呼拉尔代表团回访了中国政协。双方保持了很好的联系,为两国的睦邻友好谱写了新的篇章。



何副委员长来到蒙古草原

2000年,我国各种高级代表团纷纷来蒙,其中就有一位何鲁丽女士。她是应蒙古和平友好组织联合会(简称和友联)的邀请,以中国人民保卫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的身分到蒙古访问的。由于她又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蒙方按国家领导人的规格予以接待,如迎接车队、贴身警卫等的安排都按国家副元首的二级警卫来安排。来访前,国内向我馆提出了要求,我亲自与对方进行了多次商谈。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2000年9月5日,蒙古草原以最温暖和煦的阳光、最热情友好的笑脸迎接中国客人。我和夫人何思红、办公室主任周伟民到机场迎接何副委员长一行。

何副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见到她,我们既钦佩又有几分拘谨。不过她

的平易近人很快使我们消除了隔阂。拉了几句家常以后,我们一如早已认识的朋友。

访问期间,蒙古和友联主席巴特扎尔嘎勒、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利格登同何副委员长举行会谈。双方通报了本国的发展情况,同时就加强两国和平与裁军组织之间的交流进行了商谈。中方邀请蒙和裁会派团回访中国。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儿齐飞翔”。这是一首描写草原美景的脍炙人口的歌。没到过草原的人们可能难以体会歌词的美妙之处。9月初,蒙古的早晨还有点凉意,但太阳升起之后,身上立即暖烘烘的。这一天,天是湛蓝湛蓝的,没有一丝云彩。我陪代表团来到中央省省会宗莫德市。该省籍议员敦道格和省政府秘书长早早就来到省界迎接贵宾。喝了下马酒,接受了哈达,代表团径直来到搭好帐篷的一块草地上。主人请客人们坐到帐篷内的椅子上。客人落座后,小型“那达慕”便宣布开始。穿着蒙古袍、能歌善舞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演出了极具蒙古民族特色的歌舞。望着偌大的天空,看着茫茫的大草原,闻着芬芳的青草味,听着悠扬的歌声,你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地飞翔。在这一刻,那“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草原景象在你的脑海中就显得具体而生动。该省摔跤好手们为客人表演了精彩的比赛。

接着,牧马人进行了套马表演。所谓套马,就是牧马人骑着马,拿着套马杆追逐着未经驯服的烈性马,直至把马套牢为止。这一表演体现了蒙古族人马术之高明,也充分表现出他们的骁勇和刚毅。何副委员长和代表团成员们对牧民们的表演感到很新鲜,看得目瞪口呆,热烈鼓掌表示赞赏。何副委员长说:“这里的秋天太好了,草原真美!”是的,草原的景色很美。任何一个烦恼的人来到大草原,来到大自然之中,一切烦恼皆可抛,马上可以变得心旷神怡!你不信,可来大草原一试!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代表团来蒙古一般不去全国最大的寺庙——甘登寺参观。但此次和裁会代表团属民间组织,决定去看看。该寺住持乔依扎木茨和众喇嘛热情迎接代表团并介绍了蒙宗教政策。何副委员长耐心地听取介绍,并询问了寺庙的活动情况。最后,住持等与代表团一起合影留念。

访问期间,何副委员长来到我们使馆看望大家。她介绍了国内的形势,唯独没有谈自己。她鼓励我们在使馆这个阵地好好为国家的外交事业作出新的贡献。短短的一席话,对我们这些为国站岗放哨的同志们是个巨大的鼓舞。

访问结束了。我和夫人到机场为代表团送行。临行前,何副委员长对我



们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并称回国后还要赴俄罗斯等国访问,之后会给我们带来信息。我们以为她说的只是客气话,她作为国家领导人怎会有空发来信息呢?谁料到了9月末,她真的给我们夫妇捎来一信。信中写道:

“黄大使和夫人:

你们好!我们返京后旋赴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访问。回京才能给你们去信。

和裁会代表团这次访问蒙古能顺利完成任务,受到高规格接待,离不开大使馆的安排和协调。尤其大使精通蒙语,对当地官员相当熟悉,有联系,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谢谢。

替我们问候使馆的诸位同志。这次访问,思红夫人、办公室周主任辛苦了。多谢。致

敬礼,并致国庆的祝贺。同庆,同庆!

何鲁丽

2000年9月29日”

至今,何副委员长的信仍摆放在我的书架上。应该说,我们与她只是一面之交,但她在百忙中仍没有忘记给我们这些普通的外交战士来信鼓励,这使我们十分感动,它一直激励着我们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三任外长做客蒙古

为了发展中蒙友好关系,开展对蒙工作,我们的三任外长都到蒙古进行了访问。我作为主管蒙古事务的一员,有幸以不同的身份参与和经历了他们的访问过程。

1989年8月31日至9月4日,钱其琛外长应蒙古政府的邀请对蒙进行正式友好访问。1989年春天,我国出现了“六四”风波。此时,国际风云突变,西方国家开始制裁和孤立中国,各种政治势力掀起了反华恶浪。然而此时中俄、中蒙关系正在出现转机。这一年的3月,蒙古外长贡布苏伦访问中国,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为表示我们的诚意,钱外长于5个月后对蒙古进行

了回访。

此时,我在亚洲司任二等秘书,司里让我任钱外长的翻译,陪同出访。

蒙方对钱外长的访问给予了高级别的接待。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即国家元首)巴特蒙赫和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索德诺木分别接见,双方签署了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钱外长是坚定老练的外交家,他以前一直主管苏俄,也兼管蒙古事务。过去我曾见过他,但从没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钱外长对蒙古情况很熟悉,会谈中,他语气坚定,立场鲜明,态度温和,既回顾过去,更着眼未来,向蒙古朋友介绍了我国的外交政策,表达了中国对蒙古实行睦邻政策的真诚愿望。从他的谈话可以看到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完美结合的谈判艺术。他是学俄语的,讲话用词精炼准确,也能为翻译着想,讲一段就停下来让我翻译。休会期间,我跟随张德麟大使陪钱外长等代表团同志在“大天口”国宾馆内散步。平时我们感到部长很严肃,没想到他实际上挺随和的。趁这个机会,我与部长留下了合影。

回国前,钱外长到使馆看望同志们。他不忘问大家生活得怎样,蒙古供应是否有了改善。钱外长在讲话中谈到国内形势,要求同志们忠于职守,坚决执行国内的指示,同时指出,蒙古是我们的近邻,在这里工作意义重大,他亲切地勉励使馆的同志们要继续做好蒙古工作。

说起来,唐家璇外长是我的校友,他也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进入外交部以后,我们又是翻译队的同事,他还当过我们队党支部的负责人,早就是我的“领导”。后来,他当了亚洲司副司长,更是我的“顶头上司”。进入部领导班子后,唐部长仍十分重视蒙古工作,就蒙古问题对亚洲司一处直接作过多次指示。在当部长前,他到过两次蒙古:一次是陪刘述卿副部长访问,另一次是作为李鹏总理的随行人员访问蒙古。

2001年7月3日至5日,唐家璇外长正式访问蒙古。我全程陪同唐外长活动。访问期间,唐外长与蒙外长额尔登楚龙进行会谈,就如何深化两国关系同蒙方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唐外长拜会了巴嘎班迪总统、恩赫巴亚尔总理和宾巴道尔吉副议长,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他还参观了“戈壁”羊绒衫厂,到“特列尔吉”旅游点访问牧民,观看了赛马表演。唐部长访问蒙古绝不是“象征性”的,他利用访问之机,认真地做工作,宣传我国外交政策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方针,使访问更富有成果。

访问结束前,唐外长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耐心、详尽地回答了记者的提



问。提到两国分歧时,他既谈我国的原则立场,又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进行具体分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时间到了,记者们还有问题要提问,唐外长答应延长时间,继续回答他们的问题。唐外长对记者的友好真诚态度和亲和力,使记者很感动,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他们在媒体上发表的报道称:“中国外长热情友好,具有外交家的风度”,“中国外长接受采访,详细耐心地解答了我们的疑问,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对蒙古的友好感情”。唐外长访蒙后,几份主要报纸都破例详细地报道了记者招待会的情况(一般惯例对外国外长访问只作简要报道)。唐外长通过访问积极做蒙方工作的精神,成为我们使馆学习的好榜样。

2004年,蒙总统巴嘎班迪访华时,授予唐外长“北极星”勋章,以表彰他多年来对两国关系发展作出的贡献。这充分表明蒙古政府和人民对他的认可。

李肇星外长也是我北大的校友。他曾任新闻司长、外交部发言人,知名度很高。在他当部领导以前,我们曾同坐部里一辆班车,有时我与他坐在一起,聊聊天。他是美国问题专家,很博学,也很健谈,大家常常向他请教一些问题。

2003年6月4日,胡锦涛主席访蒙,李部长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当晚参加完蒙方举行的活动后,李部长对我说:“走,去你们使馆看看。”蒙方早就邀请李部长访蒙,但因故未能成行。此次他陪胡主席访问,是第一次来蒙。

抵馆后,他到几个办公室转了转,与同志们打个招呼,碰到熟人聊上几句。那天正好在文化处有一个新闻报道问题,我们正好请示部长哩!

看完办公楼一层的办公室,李部长要我带他去看看活动场所。我告诉部长,部对我馆很关心,已建成一座馆员公寓。原来的宿舍楼已拆掉准备建体育馆。院子北边有一个原食堂改建的俱乐部,离得较远,今天不去了,就带部长去大礼堂后面的乒乓球室看看。李部长表示同意。到了乒乓球室,只见有三位同志正在打球。李部长兴致一来,也挥拍上阵。我见他上场,也与另一位同志组成一对与李部长打起双打。李部长确实“训练有素”,一会儿削球,一会儿抽杀,打得很“狡猾”。比赛以李部长取胜而结束。

临行时,李部长送给我一本他写的诗集《李肇星诗选》,在书的扉页写道:“请家骅校友指正。祝贺接待成功,祝健康、愉快。59届同学 李肇星 2003年6月5日”。

翻开《李肇星诗选》,一首《重托之下》的短诗是这样写的:

“爱的执著,

派生着辛苦。

爱而知渺小，
做而知不足。
五十载跋涉，
一百年一遇。
知我者，
历史的峡谷。
我信然，
时空的大度。
沉浮千钧
派生着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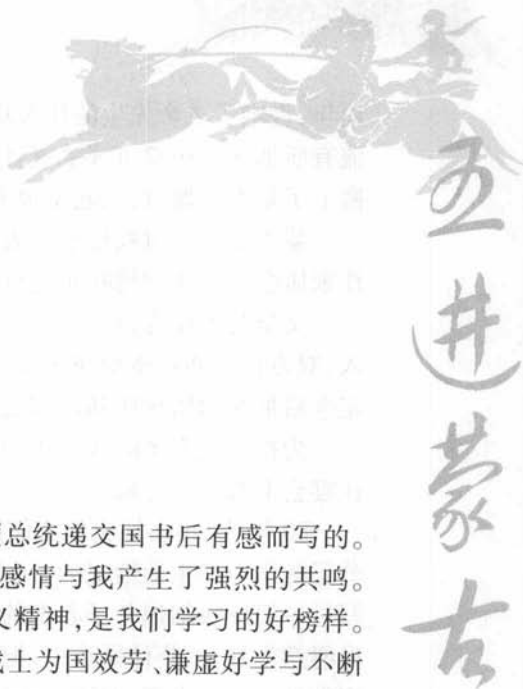
这是李部长于1998年3月16日向克林顿总统递交国书后感而写的。作为与他在同一条战线的战友，诗中所抒发的感情与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它表达了一个外交使节的宽广胸怀和乐观主义精神，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爱而知渺小，做而知不足”，不正是一个外交战士为国效劳、谦虚好学与不断探求精神的写照吗？

和著名作家谈天

我从小就羡慕作家，也梦想成为作家、文学家，由于阴差阳错，未能如愿。尽管如此，我对作家始终怀有一种特别崇敬的心情。我常常注意银幕、荧屏上或媒体介绍的名作家的行踪，了解他们的活动和近期新作。遗憾的是我始终未能有机会与作家“零距离接触”。天赐良机，2002年9月初的一天，我实现了多年的梦想。

应蒙古作家协会的邀请，中国作家代表团来蒙进行友好访问。代表团团长是海南文联主席、著名作家韩少功，团员有著名女作家、心理学家毕淑敏和广西艺术中心的作家田代琳。

中蒙关系友好时期，中国蒙古族著名作家玛拉沁夫等作家曾访问蒙古。1984年两国关系开始改善，蒙报刊发表文章纪念我国作家老舍先生诞辰85





周年,肯定了老舍先生的伟大功绩。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文化艺术的交流有所加强。1992年蒙古艺术家将中国著名戏剧家曹禺的名著《雷雨》首次搬上了蒙古的舞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过,作家代表团的互访仍不多。

蒙方文艺界对我作家代表团的访问很重视。我馆文化处一秘王大奇同蒙作家协会副主席僧德扎布进行了沟通,细致地安排了日程。

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是很容易相通的。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入,双方作家亦希望加强来往。我代表团访问时同对方进行了深入的磋商,决定今后加深两国作协和作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双方对此访都表示满意。

为祝贺代表团的成功访问,我和夫人在使馆举行晚宴招待了作家们。我在宴会上敞开了心扉:

80年代,我在外交部工作期间,业余喜欢写点什么,内容大都是介绍知识分子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的。《北京晚报》有一个栏目叫“一分钟小说”。我曾写过一篇反映知识分子心态的小说,向报社投了稿。我的小说内容是主人公虽愿意为社会、集体做点事,但因太教条、太形式主义,脱离实际而劳而无功。字数是符合要求了,但语言不够生动,情节不够动人,结果报社把我的稿子退了回来,这时我的心情很不好,心想:一个曾考取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写一篇小说都那么困难,从此有点心灰意冷,再也没有勇气向报社投稿了。然而我特别佩服你们大作家们,大笔一挥就洋洋万言。在座的各位确实不简单,你们的脑袋好像是一台特别的机器。

韩少功团长说:你这是刚学习写作,还不大掌握写小说的要求和规律,写多了就熟练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行行出状元嘛,你在外交上不就取得成就了吗?

心理学家毕淑敏女士笑着说:这里有一个实践和心理问题。当时你还年轻。如今你做了那么多年外交工作,积累多了,就可以写些东西了,准没有问题。你以后再写作品,我可以帮助你出版。

田代琳同志说:写作是个厚积薄发的过程。你可能觉得我们很容易就写下不少东西,其实并非如此,有时我们也很难,真是挖空心思地写,并不比你们搞外交容易。

是的,做任何一项工作想要取得成就,都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当初我以为自己是学文科的,写点东西不成问题,自我感觉良好,太幼稚了。同作家们谈天,给了我很多启发,使我获益匪浅。



“军民一家亲”

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军方交往明显增加。过去蒙方曾将我国比作假想敌的历史已彻底成为过去,随着双方政治互信的增强,军事交往进一步深化。其中,高级军事代表团的互访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自2000年以来,到蒙古访问的军事代表团可谓接踵而至,且级别都不低,起码是少将,有几位中将,一位上将。十分有趣的是,有些将军访蒙回国后,都晋升了军衔,有的还成为中央军委委员。我风趣地对来访的代表团同志说,蒙古国是个福地,希望他们多多来蒙,以便回去“官运亨通”。

众多军事代表团的来访,是我们使馆的幸事,使我们有机会接触“钢铁长城”的各位领导,得到向解放军同志学习的难得机会。“军民一家亲”,每当军事代表团来访,我们都组织他们与馆员会见,请他们作报告。这种活动对全馆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和国情教育。

2000年9月1日,由粟裕将军的儿子、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粟戎生中将率领的代表团来蒙古出席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5周年活动。代表团成员中包括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等高级军官。

蒙古国防部长古尔拉格查和总参谋长达希泽伯格分别接见代表团。双方除回顾了二战后国际社会的变化以外,还相互介绍了各自军队建设的经验,共祝两军交流进一步加强。

粟将军相貌酷似粟裕将军,一眼便可看出。粟副司令员十分谦逊,与蒙方会谈时不时问我,这样讲是否合适。闲谈时,粟将军幽默地对我说,他本不太愿意当团长,因当团长要不断地发言,而在出国访问时的发言要求就不一样,要谈两国关系,涉及外交,谈不好还可能犯错误。我说,粟将军太谦虚了,您的讲话很得体,完全符合外交要求。

粟将军来我馆做客时,还特地会见了我的夫人何思红,对外交官的妻子表示敬意,这使我夫人特别感动。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军人,而且是高级军人。他们忠于职守、朴实谦



逊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1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正式访蒙。这是关系正常化后我军到访的最高级代表团。迟部长乘坐的班机从韩国首都汉城(现称首尔)起飞时就晚点了,到了乌兰巴托已是晚上7时半。蒙国防部国务秘书(职务相当于副部长)巴桑呼少将和我到机场迎接。

迟部长下榻在“大天口”国宾馆内一幢单独的楼内。次日,迟部长参加了一整天的紧张活动:上午举行欢迎仪式,同蒙国防部长举行正式会谈,签署我军方给予蒙军800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的协定,晚上出席蒙方宴会。蒙古总统和总理分别接见了代表团一行。这一天,下起了中雪。国宾馆内两旁的山上白雪皑皑,真是“一派北国风光”。中午,我和使馆负责接待的同志们利用出发去参加活动前的间隙争相同迟部长合照一张雪景。迟部长欣然同意,甘当“模特儿”。由于照的人多,迟部长在外面站了好一会儿,我们很是过意不去。迟部长那么平易近人,体察下情,着实令人感动!

迟部长除向我询问有关蒙古的情况外还很关心我本人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当他得知我多次在驻蒙古使馆工作长达20年之久后,深情地对我说:“我曾到过许多驻外使馆,接触过不少外交官,你们常驻国外很不容易,肩负重任,我理解你们的酸甜苦辣,你们为国家增了光,作出了贡献。我要代表军队的同志谢谢你们。”

1月25日,迟部长在回国前到我馆接见全体同志。讲话中,迟部长介绍了国内大好形势,给我们作了指示。谈话中,还专门以我到蒙古工作20余年为例,鼓励使馆全体人员在蒙古国这个特殊环境下为外交事业多作贡献。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话语对我们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2001年3月14日,以成都军区司令员廖锡龙上将为首的我军友好代表团到蒙古访问,出席蒙建军80周年庆祝活动。

廖将军是四川人,说起话来有些口音,一看就是一个性格十分豪爽的人。他在会见蒙军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时,说话很得体,水平很高,很会使用“外交辞令”。可以看得出,他在外事方面很有经验。交谈起来,得知他已好几次率领军事代表团出访了,此次赴蒙对他来说是驾轻就熟,会见时介绍我军和我国政治经济情况及谈双边关系都谈得很好。我陪同代表团参观了蒙军150部队,出席了蒙建军80周年庆祝大会、音乐会和招待会。经过5天的访问,完全达到增进两军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的目的,廖将军邀请蒙军领导人到中国和四川访问。

短短几天,我们从廖团长那里学到了过去难以学到的政治与军事知识,我为结识到像廖将军这样的军界领导人深感自豪。不久,得知廖将军已被提升为中央军委委员,我真诚地为他感到高兴。

2001年11月26日,以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周坤仁上将为为首的军事代表团一行6人,对蒙古国进行友好访问。一年内,3个高级军事代表团来访蒙古,可见中央对加强两军友好工作的重视。代表团访问期间出席了蒙古宣布成立共和国77周年活动。

周将军早年曾从事医务工作,后一直在总后勤部任政委。他说话和气,语速稍慢,态度谦和。从他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既精通军事,也精通政治。我首先向他汇报了蒙古及使馆情况,他称此次纯粹是友好活动,代表团要接受使馆“领导”。我表示我馆一定全力配合,使代表团访问圆满成功。

蒙方日程中原没有总统接见,经我与总统身边的朋友做工作,蒙方决定安排巴嘎班迪总统接见我团。巴总统在讲话中强调两军应加强合作,同时要加强边防部门的联系。他称赞中方为培训蒙古军事人员做了很好的工作,并表示蒙方将尽力用好中方的军援款项,将有关援助用在实处。周将军表示同意蒙方意见,愿将总统阁下的建议报告国内有关部门。

11月29日晚,我在使馆宴请了蒙古国防部的各位领导和我们代表团全体同志。席间,双方人员共祝中蒙两军的友谊与合作与日俱增。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多喝了一些茅台酒。周将军得知我馆在宴请时用酒量有规定时说,今天宴会搞得很好,增进了相互理解,多用的酒我回国后送还给你馆。我说,将军不必介意,我馆可自行解决。

这一年的年底,我与夫人回国休假。我们刚回到北京,周将军就让他秘书与我们联系,说首长为感谢在蒙古时受到使馆的热情接待,专门请我俩去海军大院做客。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外交官,能在国内再次见到总后勤部的各位领导,心中既激动,又很感激。

2002年7月19日,以济南军区政委张文台中将为为首的我军友好代表团开始访蒙。

在机场见到的张文台将军是一位“山东大汉”,五十多岁,确是一位“最可爱的人”。他不愧是一位长期从事军事政治工作的领导。首先,他要我转达代表团对全体驻蒙人员的问候,并询问了我们在蒙工作和生活情况。当晚,达希泽伯格总参谋长宴请代表团,宴会气氛热烈而友好。宴会后,我陪同张将军回到宾馆,向他介绍了蒙古有关情况,特别谈到使馆武官处的工作。谈话时,



张将军始终拉着我的手不放,我们好像是多年没谋面的老朋友、好兄弟,谈得很投机,相见甚欢。

代表团离开蒙古之前,我在使馆宴请了代表团全体同志。宴会上,张将军知道我长期从事对蒙古工作,提议为我举杯祝酒。将军为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外交战士祝酒,使我非常感动。

回国后,张将军与廖将军一样,被提升为上将,任总后勤部政委。我同样要衷心地为他祝福。



老家来的“父母官”

2002年4月,老家佛山市外办副主任何思敬同志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我们佛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韩英同志应蒙古作协的邀请,准备到蒙古访问,游览一些省份,时间大约20天,回国后拟写一本介绍蒙古国的书,他希望我能给予韩主任一行一些帮助。我立即表示没问题,请韩主任确定时间后告我。过了几天,韩英同志给我来了电话,并发来了他拟定的到蒙古访问游览的“路线图”,叫我提提意见。我首先表示很欢迎韩主任到蒙古访问,并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对访问的“路线”给予了答复,提出了若干建议。韩英同志十分高兴,即发来传真,表示感谢,提出到蒙后一定到使馆拜访。我欣然接受,热烈欢迎。

6月份,这时广东佛山已是炎热难耐了,而远在数千里以外的蒙古却是凉爽宜人。地方官与作家系于一身的韩英同志与其随行的中共佛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东海及翻译阿赫林三人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乌兰巴托。他们是从二连先乘汽车后换火车赶来的。为方便同我馆接触,他们选择了使馆附近的“青年”旅馆住宿。来乌的第二天,他们就来到使馆与我们夫妇见面。陪同会见的有我馆文化处一等秘书王大奇。我们的会见很亲切,很愉悦,真是“一见如故”。

韩英同志是辽宁人,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长期在我的老家佛山市工作,历任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广东省人大常

委会委员。他除做好本职工作外，坚持文学创作，发表了大量作品，尤其是在微型小说的创作方面成效显著，被称为微型小说“十大高手”之一，曾获中国作协“星座杯”奖，被誉为“从政从文、珠联璧合的两栖公仆”。韩主任是我们老家的“父母官”，我生在南国佛山，而长期在北方生活和工作。毕业后更是远离南方，来到蒙古国，被人们称为在“在贝加尔湖畔牧羊的当代苏武”。而他生在北方，毕业后又定居南方，习惯了我老家的生活甚至于语言。真没有想到，进入 21 世纪，分别工作于南北两地的两个同龄人能够在我们的邻邦——蒙古国相识相聚。

韩英和徐东海同志合著的《苍茫蒙古国》一书中对我们的会见是这样描写的：

前边就是大使馆的大门。旁边有警卫室。正门墙柱上挂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铜牌。正门两侧墙壁上的橱窗中，张贴着介绍中国各方面成就的宣传图片。

阿赫林用蒙语向警卫说明来意，警卫立即向大使报告，并请我们用墙上的对讲机与大使对讲。大使说，欢迎光临，请从大门进来（大门旁边有小门）。

这时，黑色的大门自动打开了。我们一眼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国特命全权大使黄家骅及大使夫人何思红，站在主楼门口恭候。

我们赶紧走过去。热烈握手。大使和大使夫人，满面春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在高高的旗杆上迎风飘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高悬在主楼上方。

进入会客厅，黄家骅在正面左侧落座，韩英在正面右侧落座。徐东海在右侧，何思红在左侧，阿赫林、王大奇（大使馆一等秘书）等在对面，纷纷落座。

会客厅正面的墙壁上，是一幅大型中国画——《万水千山》，气势恢宏。

“韩英同志，你们来，实在是欢迎啊！你们什么时候到乌兰巴托的？”

“今天上午。”

“坐飞机？坐火车？”

“不是坐飞机，是先坐汽车，后坐火车。”

“先坐汽车？”

“我们从二连浩特出国门，进入蒙境。在扎门乌德包了一辆越野车，通过戈壁荒漠到赛音山达。在赛音山达连夜赶坐火车，赶到乌兰巴托。”

“这可是一段艰苦的旅程啊！”

“我们此次应蒙古国作家邀请，前来访蒙，目的就是要深入采访、考察，回



去写一本连续性的散文游记，留作纪念。”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方面的书极少。孙一先同志写了一本《大漠那边》，是披露林彪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事件的，专题性的。西方人士写的文章，多是片段的。”

“孙一先同志写的《大漠那边》，我们仔细拜读过。有关蒙古国的中文资料，很难找到。”

“韩英同志，你以前写的书，我和思红看过一些，觉得挺好。特别是那些微型小说，写得有味道，可读性强。那本《苍茫西藏路》，描写山川，评说古今，意味深长。”

“此次来蒙，想写一本《苍茫蒙古国》。这本书由我和东海（中共佛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两个人合写。两个人签了合作出书的备忘录。”

“我们一定尽力帮忙。”

“请大使帮忙的，是这样几件事情：

书稿写成后，拟送大使审读，请不吝赐教。

请大使为本书题字，请不要推辞。

请大使馆同志帮助找一些有关蒙古国的中文资料……”

“这些都没有问题。你们寄来书稿，我一定拜读。题字，毛笔字写不好，写钢笔字。中文资料，大奇、思红帮你们找。

还有，访问蒙中友协、旅蒙华侨协会、友谊学校等，由大奇同志帮助联系。今天晚上，我有别的宴请。你们看，安排哪一天晚上，请你们吃饭？”

“我们想，明后天赶去温都尔汗，看一看当年林彪出事的现场。”

“那就等你们回来，大后天——刚好星期五，周末，请你们吃饭。”

“能不能连同访问蒙中友协、旅蒙华侨协会、友谊学校一起安排？”


“好。访问这三家，连同吃晚饭，连成一气。”

黄大使等，一直把我们送到大使馆大门口。边走边谈，在大院里，在铜牌前，又和大家照了相。

韩英同志回国时，我本想去机场送行，但实在因工作忙分不了身，由夫人代办了。

韩英、东海同志的工作效率奇快，一个多月后书稿已寄到使馆。我认真拜读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

如今，精装本的游记《苍茫蒙古国》摆在我的书架上。感谢韩英等同志经过辛勤采访，使中蒙友谊的花园中绽开出一朵艳丽的鲜花。我已把这本书送



给我的中国和蒙古朋友。他们认为这是一本介绍蒙古国自然风光、歌颂中蒙两国传统友谊的好书。



来自内蒙古的亲人

20世纪80年代,一直靠“大家庭”支持的蒙古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经济遇到了困难,市场上商品匮乏,许多商店的柜台空空如也。我们使馆也受到“牵连”,许多吃的和用的东西这里买不到,只好派人回国内,特别是内蒙古去采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本着一切服从外事的精神,对我馆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与协助。特别是自治区外办的同志们不辞劳苦,亲自陪同我馆人员去采购,保证了我对外活动和生活的物资供应。内蒙古真是我们可靠的“大后方”。为了表示我们的谢意,我馆历来对内蒙古来的团组都给予最热忱的款待,并在与蒙古联系、办理有关案件等方面尽量提供协助,给予方便,以回报这些来自内蒙古的亲人们。

在众多从国内来访的代表团中,有不少是来自内蒙古的亲人们。这些年来,两国关系更趋紧密。内蒙古自治区作为离蒙古国最近、联系最多的省区,其与蒙古的各方面来往与日俱增,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桥头堡”,日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90年代开始,开通了乌兰巴托至呼和浩特的铁路和航班(旅客列车由双方派出,民航由蒙古航空公司负责),两国人员往来与日俱增。在此期间,内蒙古与蒙古国的经贸、法院、边防、友协、少年宫、民间歌舞、铁路、体育运动、友好旗县等团组相互访问,如走亲戚一般,十分频繁。

2000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和呼和浩特市派出大型代表团赴蒙古调研,举办经贸洽谈会和展销会,扩大了我内蒙古在蒙古国的影响。边境地区往来进一步密切,促进了两国睦邻关系的发展。

2001年5月底,以呼和浩特市市长柳秀为首的呼市代表团访蒙,在蒙举办“呼和浩特周”活动。活动期间,举办了经贸洽谈会和展销会、图片展览、电影周、呼市民族歌舞演出等。乌兰巴托市政府和议会分别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欢迎内蒙客人。



代表团来访时,柳秀团长几次到使馆见我,介绍活动情况,参加我们宴请乌兰巴托市领导的活动。

展销会获得了成功,受到蒙古观众的好评。特别是内蒙的日用品、食品、保健医疗器械和农牧加工产品引起了蒙公众的兴趣。举行展销会的两天内,不少蒙公司前来洽谈和订货。展销会的成功进一步说明,我内蒙古与蒙古由于地域、民族、语言等诸多优势,开展合作潜力很大。

呼市歌舞团表演充分体现出蒙古族艺术所具有的水平。鲜艳的蒙族服装、悦耳悠扬的歌声,加上听得懂的蒙语,一下子就吸引了观众,场内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歌舞剧《婚礼》,使整场演出达到高潮。我跟随乌兰巴托市长恩赫包勒德、呼和浩特市长柳秀上台向演员表示祝贺和感谢。

会见柳市长时,我首先对内蒙古与呼市领导对我馆长期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介绍了蒙古当前经济形势及我馆最近开展的工作。柳市长说,内蒙古是使馆的大后方,我们过去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今后使馆需要什么,我们会继续努力为使馆服务。他谈了今后欲加强呼市与蒙有关地区来往的考虑。我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使馆一定尽量做好牵线搭桥工作,你们有什么要求和问题,随时与我们联系。分别时,我们相约今后在乌兰巴托和呼市再见。

2002年6月,根据中央和商务部的有关指示精神,以岳福洪副主席为首的内蒙自治区政府代表团来到蒙古进行调研,同蒙有关部委接触,了解蒙开发资源的政策及探讨与蒙方开展商业交流,包括在乌兰巴托开设商店的可行性。我馆经济商务参赞处根据内蒙古的要求预先同蒙有关部门联系,进行了安排。

岳主席是从北京调到内蒙古的领导。代表团的副团长是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后调至呼和浩特任市委书记)牛玉儒同志。

从与代表团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内蒙古这几年在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过程中的发展情况,进一步体会到中央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同时,也看到内蒙古在加强与蒙古国的联系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我与商务参赞宋学军一起会见代表团,向他们介绍了蒙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情况,提供最新的信息,并谈及蒙在开展资源合作、引进外资的政策法规方面存在的若干问题。我们着重提醒内蒙同志,当前蒙采矿许可证掌握在少数矿主的手中,他们用低价买入、高价售出的办法牟取暴利,有关媒体又进行炒作,这种做法对我们不利。我们建议到蒙古开矿的公司一定要寻找有资信、有实力的蒙方伙伴,中国



五井内蒙古

的公司之间要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以大局为重,互相通气,不要相互压价。

我从随行的同志处得知,牛主席是位优秀干部,他长期在内蒙古工作,对本地情况十分熟悉。在与他交谈中,对此深有体会。我询问他内蒙对外经贸情况,他介绍得很详细。若干年后,牛主席在任呼市市委书记时不幸以身殉职,自治区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干部。我们也为失去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位益友而感到十分痛惜。

人烟罕至，可因是产人产了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very faint, illegibl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第十七章

蒙古风情



蒙古人不是匈奴人或突厥人

最近,有朋友看了电视剧《汉武帝》后问我,汉朝长期与之征战的匈奴人是否就是蒙古人?也有的朋友在谈论中几乎肯定突厥人就是蒙古人。我虽不是研究历史的专家,但从我多年从事对蒙工作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我告诉他们,这些看法不妥。蒙古人就是蒙古人,而不是匈奴人或突厥人。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翻开历史看看。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谈起蒙古,人们往往喜欢用这一名句来加以描绘。这确是蒙古自然风光的生动写照。如今在我国内蒙古或蒙古国,由于沙漠化和牧场被破坏,真正能看到“风吹草低见牛羊”景象的牧场已不多,只有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和蒙古国东方省的部分地区可以见到。

蒙古民族历史悠久,富有传奇色彩。关于蒙古族的祖先是誰,众说纷纭。我国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蒙古出自东胡,与契丹、鲜卑同为东胡的后代。东胡人生活在我东北地区,后来东胡与匈奴发生战争,战败后逃到额尔古纳河流域,由此逐渐形成蒙古民族。“蒙古”一名最早出自《旧唐书》,叫做“蒙兀室韦”,是“大室韦”的一个成员,即12世纪时所称的蒙古人,同契丹、鲜卑均为东胡后代,后来分成几支向西、向南迁徙,形成各个部落。《史记·匈奴列传》中写道:“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公元前5世纪至3世纪,东胡各部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形成东胡人的部落联盟,与匈奴对峙。公元前3世纪,匈奴逐渐强大,灭东胡各部。至此,东胡受匈奴统治达三个世纪之久。

突厥,也曾是我国北方众多民族中的一个民族。隋唐时曾在我国北方建

立了强大的政权,后被唐军打败,被迫西迁。土耳其民族应是突厥的后裔。在突厥的史料中称室韦为“鞑靼”。因为当时蒙古诸部中,塔塔儿部最强盛,人们称“塔塔儿”为“鞑靼”,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鞑靼成为蒙古诸部的总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前,根据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鞑靼”被分为黑鞑靼、白鞑靼、生鞑靼、熟鞑靼,成吉思汗所在的部落就被称为黑鞑靼。但成吉思汗统一各部后,鞑靼完全被蒙古所代替,突厥各部也逐步被蒙古化。但突厥的文化对蒙古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的作用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蒙古人既不是匈奴人,也不是突厥人,而是东胡的后代,室韦的一支。从族源学来说,蒙古族属东胡—鲜卑—契丹—室韦。

史书里对蒙古族的形成是这样叙述的:蒙古族的先人室韦发展成众多部落。随着部落的繁衍,他们沿着额尔古纳河,从呼伦贝尔草原西迁、南迁。到了13世纪,这些部落终于形成了一个以“蒙古”为名的新的民族共同体。

当蒙古各部迁徙到漠北草原时,那里还生活着匈奴、突厥的后裔。他们长期生活在一起,包括互通婚姻,因此蒙古族的语言、生活习俗中也多少包括匈奴、突厥的成分。从这种意义上讲,蒙古人虽不是匈奴人或突厥人,但蒙古与匈奴、突厥的关系密不可分,它们之间有着诸多的相互影响与联系。在我们研究蒙古民族的时候,应将曾生活在我国北方的众多的少数民族一起加以分析与观察,这是不言而喻的。



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

谈起蒙古,谈起蒙古国,谈起蒙古民族,就不能不提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他是蒙古民族的英雄,曾一度被神化。不可否认,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所统一的蒙古各部落和他所创建的“大蒙古国”,将名留千古,永世传诵。

2006年,蒙古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纪念“大蒙古国”建立800周年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纪念800周年庆典、哈拉和林建都785周年和标准城市奠基仪式;修建成吉思汗纪念群;举办成吉思汗巡回展;举行国



际蒙古学者大会;编写蒙古通史5卷本等。联合国还作出决议,对蒙古纪念“大蒙古国”建立800周年予以支持,使这一活动更具规模和国际性。作为“大蒙古国”的纪念之年,各国都对蒙古的历史,对成吉思汗的业绩,甚至对他墓葬地到底在何处,是在中国的鄂尔多斯、六盘山,还是在蒙古的肯特山这样一个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从这一角度来看,2006年的确可称为“大蒙古国年”或“成吉思汗年”。在全世界范围对蒙古国、蒙古民族以及成吉思汗的关注度大为增加。

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蒙古乞颜部人,孛儿只斤氏。少年时代的坎坷生活练就了他坚忍不拔的性格,赋予他超凡的生命力。9岁时,其父也速该被塔塔儿人害死,他成了孤儿。此后他与母亲和兄弟们靠渔猎维持生计。后来,他被泰亦赤兀部酋长追捕,历尽艰辛,投奔克烈部首领,收集亡父离散旧部,实力逐渐强大。后遭篾儿乞人袭击,妻子孛儿帖又落入敌人手中。几经曲折,与札木合结为兄弟,两人又合又分。公元1189年,被推举为汗,称汗后相继战胜塔塔儿、乃蛮等诸部,成为蒙古高原最大的汗。公元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今鄂嫩河)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建立“大蒙古国”,并当选为汗,尊称“成吉思汗”。从1205年至1209年,3次进军西夏,1211年率领大军攻金,1215年占领中都(今北京)。1218年灭西辽。1219年率20万大军西进。西征后,其占领的版图已扩展到中亚和鞑罗斯(后称俄罗斯)。1226年出征西夏,次年西夏灭亡。1227年夏历7月,成吉思汗病逝。之后,他的子孙继承其事业,继续扩大其疆土,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建立了横跨欧亚的4个汗国。

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统一了国家,使东西方文明得以交流和传播,其功绩不容抹杀。然而,西征使许多国家的人民受到残害和蹂躏,被欧洲人称为“黄祸”,亦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1279年,他的孙子忽必烈灭南宋,建立了统治全国的元朝,称“元世祖”,而成吉思汗被尊称为“元太祖”。元朝经历了162年(15个皇帝)的兴衰成败,随着元朝最终被明朝所灭,一部元史成为中华民族史中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蒙古国国内对于成吉思汗的评价曾有过不同的阶段。上世纪90年代以前,在苏联的影响下,蒙对成吉思汗全盘否定,对赞扬成吉思汗的观点加以限制和压抑。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治局候补委员图木尔奥其尔曾因提出纪念成吉思汗的建议而被革职。进入21世纪以来,蒙对成吉思汗的评价有了根本的转变,宣传他是蒙古的祖先,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发扬先辈的精神,努力建

设国家,把成吉思汗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加以赞扬。应该说,蒙领导人对成吉思汗的这种正面评价,对国家稳定,凝聚民心,促进团结及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热情好客的蒙古人

多年来在与蒙古朋友的交往中,蒙古人热情好客、淳厚纯朴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极为良好和深刻的印象。

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的蒙古人过的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在茫茫的草原上,每一户人家都相隔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相互间要骑马(现代则可乘摩托车)才能到达目的地。所以蒙古人见到客人和朋友都十分热情,真诚待客。

一般来说,见面要相互问候。客人进门后,主人端出奶茶、“查干伊德”(цагаан идээ,奶食品)招待,同时还要敬酒(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主人还会一边唱祝酒歌一边敬酒)。除专程来访者外,对过路人也会热情相待。记得我们在郊游或外出参观时不必事先联系,随便进入一个蒙古包,主人都无一例外地热情款待我们。他们毫不吝惜地倾其所有,拿出食品招待客人。如果客人从远道而来,主人会提供食宿。如遇贵宾,男女主人要出迎,甚至邻居也出动相迎。问候语十分庄重,如“您平安健康吗?”“向您请安!”还会拿出银碗、奶茶,并向客人献上哈达(藏语音译“礼巾”之意,表示敬意或祝贺的长短不一的白、蓝、黄色绸带)。献哈达是蒙古人留传久远的习俗。迎接客人或贵宾,敬拜神灵,或节日祝贺,都要献上哈达。

蒙古人为了对客人表示尊敬,要向客人敬酒(与俄国“伏特加”酒一样,蒙古自制的白酒,蒙语叫“阿尔黑”архи),请宾客畅饮。递酒杯时一般右手举杯,左手托肘,恭敬地把酒送到客人手中。酒过三巡,主客人谈话渐欢,此时主人会完全向你打开心扉,畅叙友谊。而且蒙古人还要宰羊敬客。先牵羊至客前,客人同意后,才可杀羊。宰羊后先将羊头羊尾敬佛,然后大家共飨之。相互见面问安时首先问家中牲畜如何,这显然同蒙古族从事畜牧业有关。



同蒙古朋友进行过业务谈判的同志反映,同蒙方谈判一般都比较顺利,这同蒙古人的直率坦诚的性格特点不无关系。这当然不是说双方没有矛盾和分歧,也并非蒙古朋友不坚持原则,但双方开诚布公,坦诚相待,可以使谈判较容易取得成果。



绿地毯上镶嵌的白珍珠——蒙古包

谈起蒙古族,不能不提到蒙古包。所谓蒙古包,同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匈奴人住的尖顶毡包明显不同,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蒙古人并不是匈奴人,其使用的包有自己的特色,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毡包。

蒙古包,又称“穹庐”,蒙语称“格尔”(гэр)。蒙古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它呈圆形,圆顶,用柳木支撑,伞形骨架,羊毛毡子覆盖,马尾绳拉紧。顶开天窗,门向南,大小不一。蒙古包主要由“乌德”(үүд,即门)、“哈那”(хана,即围壁)、“乌尼”(унь,椽子)和“陶脑”(тоон,天窗)四个部分组成,其结构安全防震,拆搭方便。根据蒙族牧民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大的特点,蒙古包夏季搭在高坡通风处,冬季设在山弯洼地向阳处,随季节而变,颇具科学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蒙古包的规格发生了很大变化。围壁规格分别有10、8、6、4个“哈那”的。最大的包可供大型展览或用作宴请,包里摆设各种高档的展品和装饰物。在乌兰巴托“成吉思汗”旅游点里陈列了主人的猎获品如熊皮、豹子皮、羊羔皮、旱獭皮等。可以说,包内陈列何种物品,可反映出主人的富裕程度。

有意思的是,进入蒙古包要有规矩。骑马接近包时要慢行,骑马用的鞭子不能进包,要放在帐外,更不能用鞭子打狗。跨入包时不得踏门槛。包内如有人生病,则会在门外左侧系一条绳子,客人就要“知难而退”。蒙古族习惯尚右尚西,一般西北放佛像制品,北面放床桌,西南挂马鞭和骑马工具。长者、男人、贵宾坐在西边。客人进入蒙古包后,须盘腿而坐。男子请安,单屈右膝,女子则屈双膝。

别具一格的蒙古包,无疑是世代蒙古民族精妙绝伦的独创,它像一件巧夺

天工的艺术品,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有些作家把蒙古包比作广袤天宇上闪烁的群星。我更爱把广阔的草原比作一张美丽的绿地毯,而各式各样的蒙古包犹如镶嵌在绿地毯上的颗颗璀璨的白珍珠。每当夏日,我们驱车驰骋在大草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错落别致的蒙古包,这些如在地毯般草原闪烁着的珍珠,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夺目的光彩,令人陶醉,煞是好看!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世代居住在蒙古包的蒙古人开始逐渐进入定居和城镇化的时代。这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结果。我第一次来蒙古时以为现在恐怕看不到多少蒙古包了,殊不知,乌兰巴托近郊还有不少蒙古包和简易的平房。据知,现蒙首都郊区仍有 20% 左右的市民居住在蒙古包,即使平常不再住蒙古包的居民,在夏日也要在郊区建起一座蒙古包式的“夏宫”尽情“享用”。由此可见,蒙古包将不会离开蒙古人的生活。

2006 年 8 月,我到内蒙古锡林浩特开会。汽车在广袤的草原上飞奔,我突然看见不远处的蒙古包。啊!像白珍珠般美丽的蒙古包,看到你,我恍惚又回到了我所熟悉的蒙古国,一阵亲切、激动之情在我心中涌动。多少年了,我永远忘不了蒙古草原,永远忘不了蒙古民族的“专利品”——别具特色的蒙古包。



蒙古人离不开羊肉和奶食品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饮食习惯世代相传,难以更改,因为这与生活环境密不可分。蒙古人的饮食相对简单。概括起来,羊肉和奶食品是须臾不可缺的。牧民生活在草原,每日放养五畜(山羊、绵羊、牛、马、骆驼),当然以食羊肉为主。最常见的、也是最出名的做法是“手扒羊肉”。蒙古族宰羊采用掏心法,剥皮取出内脏后,去头和蹄,切成小块,加水放锅里煮,不加任何作料。这种肉鲜嫩可口,再喝上白酒,真是妙不可言。

尊贵的客人,要吃羊背子。我代表团访问时,蒙礼宾司要向客人详细介绍吃羊背子的做法。羊背子用大铜盘盛之。我代表团团团长执餐刀画羊背成十字形,这是行礼。然后,由对方服务人员切成几条,供客人享用。



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蒙古有用“全羊”招待客人的习俗。做法是把羊切成几段,煮好后按全羊形摆放,放到木盘中插上刀。主人在全羊上划个“十”字,请客人品尝。热情的主人将肉切成一块块,送到客人面前,同时举杯祝酒,喝“阿尔黑”。双方一饮而尽。

吃全羊的另一种做法是烤全羊。做法是宰杀后将整只羊入炉烧烤(用微火),反复多次,烤好后放入漆盘,先向客人展示,然后由厨师切块送上宴席。烤全羊是对最尊贵的客人,即高级代表团时才选用。

由于吃全羊费时费力,近代蒙古人又发明了一种新的吃羊肉法,叫做“霍尔霍克”(xopxor)。我问过很多蒙古朋友,这一种作法究竟从何时开始,由哪个省发明的。他们都称无法确定,不得而知。如今在全国已十分流行的这种羊肉做法,各省做法大同小异。其做法是:用一个罐子(盛水或盛油),其口须密封,类似高压锅。将羊掏出内脏,切成块,内放上葱头、圆白菜、土豆,再加盐、大葱、姜、味精等作料。然后将经挑选的鹅卵石子烧热后放入罐内。一切停当后将密封锅放在火上燃烧,时间约一个钟头(视火力大小而定)。由于放在类似高压锅的罐内,又放了作料,味道当然鲜美可口。时间到了,小心地将铁罐打开,一股肉香扑鼻而来。主人先把十分油腻、味道浓郁的“高汤”盛出来让客人品尝。接着大块吃肉,也可喝点“阿尔黑”。这种吃法,肉煮得烂,且没有膻味,我馆许多南方来的从不吃羊肉的同志都能接受。根据它的特点,我们使馆同志将之取名为“焖罐羊肉”,这样的冠名倒也很贴切。现在蒙古朋友招待客人往往用“霍尔霍克”代替烤全羊,既省时又省事,中国人又欢迎,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每当中国团组来访,我馆大都推荐这种食品,蒙古人不管哪个部门都很乐意做这种肉来招待中国客人。

我们下乡到各省时,可以吃到各显神通、风味各异的“焖罐羊肉”。经过对比,觉得还是乌兰巴托的作料更全,更好吃。不过,巴彦乌勒盖省做的也很好吃,挺烂,别有一番风味。我馆的华侨雇员由于耳濡目染,也学会了这一手艺,且做得一点也不比蒙古人差。休息日,我馆同志到近郊游玩休闲,雇员们就给我们做带有中餐风味的“霍尔霍克”,受到全体馆员的热烈欢迎。

蒙古朋友吃肉真是闻名遐迩。有趣的是,蒙古朋友曾对我说,只有吃牛羊肉才算吃肉,吃猪肉、鸡肉等均“不算”吃肉。两天不吃羊肉就痒痒的,难受。乌兰巴托一户三两口之家的市民一冬要从乡下买一头牛、四五只羊储存过冬。冬天,阳台就是天然大冰柜。由此可见蒙古人吃肉“潜力”之大。蒙古人很爱吃牛肉,也善于做牛排,喜欢吃牛肉汤面。也有人吃马肉和骆驼肉,虽不如牛

羊肉好吃,但营养丰富,不过用量相对较少。

“查干伊德”,上面已有叙述。奶食品也是蒙古人须臾不可或缺的常用食品。奶食品由牛奶制成,包括奶酪(奶豆腐)、奶皮子、奶渣。

奶酪的做法是将奶的上层脂肪及所剩的凝结乳在锅内煮沸,加上酸奶,使乳水分离,将乳块放入布袋,用木板挤压,在太阳下晾干。这种奶豆腐携带方便,饥饿时随时可食用,酸酸的,有嚼头,咬后有浓香的奶味,蒙古朋友十分爱吃。我开始时不太习惯,但后来越吃越爱吃,还自己到商店购买。

奶皮子(蒙语叫“乌如姆”,өрөм)的做法是:将鲜奶放入锅内煮沸,并用勺子不断翻滚,使奶沫浮在上面。待奶沸后,让其冷却,奶上结起了一层皮子,这就是“乌如姆”,实际它是蜂窝状面奶饼。此种食品非常讲究,营养价值高,香甜可口,略加些糖更好吃。记得小时候在故乡佛山时,母亲带我去“谈强记”牛奶店吃“双皮蛋奶”,是顺德县的特产。这种奶上面的一层就是奶皮子,下面是鸡蛋羹。这种奶很贵,母亲让我吃时从来不管多少钱,她特舍得。从小我就特别爱吃奶皮子。

奶渣(蒙语叫“额吉格”,эзгий)是做皮子后所剩熟奶制成。做法是:将熟奶加少许酸奶子,使乳水分离,再用慢火煨,余下部分将水煮干,盛入木盘晒干,即成。这种“额吉格”另有一番风味,味道有点酸,是蒙古人一年四季都爱吃的“零食”,既有营养,也可充饥。

马奶酒(蒙语叫“艾尔格”,айраг)的做法是:将新鲜生奶倒在木桶内,置向阳处,用木杵搅动,使其发酵脱脂,再把剩余的奶浆倒入锅。锅上罩一个形如蒸笼的木桶,桶上端放双耳瓦罐。锅下猛火烧,蒸气散出后,酒精凝在锅底,就成马奶酒。这种略带酸味的酒,度数不高,营养丰富,对治疗肠胃病有特效。夏日喝上一碗,清凉可口,可防暑降温。起初我喝不了马奶酒,经过锻炼,也可以喝上一碗。初到蒙古的同志一般不太习惯,因味道太酸。据蒙古同志说,此种酒不易醉,但它后劲很足,如喝过量,可使人酩酊大醉,难以醒来。我们都提醒初次饮用者切不可多喝。

谈起蒙族,不能不提到的是奶茶(蒙语叫“苏台才”,сүүтэй цай),这是蒙古人的传统饮品。历史上它也是祭祀的供品。它由砖茶和奶煮成。同是喝奶茶,但各地稍有不同。我国内蒙古地区往往要加炒米(并放黄油、奶皮子)。蒙古国一般只喝茶,不加炒米,加少许盐或白糖,但各地也不尽相同,中部地区喜欢甜些,西部地区喜欢多加盐。奶茶又好喝,又有营养,我们使馆的同志们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的同志都能接受,有些人还很爱喝。我的夫人在吃的方



面属比较“顽固”的人,她也能喝奶茶。可以说,奶茶是雅俗共赏的“蒙外”饮品。



“那达慕”大会

谈到蒙古族,不提“那达慕”(наадам),那绝对是个疏忽。“那达慕”据说最早起源于13世纪的蒙古首领举行的“呼拉勒台”(хуралдай,即聚会之意)。“那达慕”本意是“游戏、娱乐”,后来发展成“体育游艺大会”,亦称男子3项竞赛,即摔跤、赛马、射箭比赛,是蒙古人十分喜爱的盛大节日。在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每年不知要举行多少次这样的大会。据我所知,蒙古国每个县、市在夏季国庆、“白月”(即春节)期间都要因地制宜地举行本地区的形式多样、规模各异的“那达慕”。我代表团访蒙时,接待方总要千方百计地组织“贝色尔格那达慕”(бэсрэг наадам,即小型那达慕)比赛,进行摔跤、赛马的表演,这些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节目,受到代表团成员的热烈欢迎。

如果说“那达慕”之最,那就是每年7月11日蒙古人民革命胜利日(即国庆节)在乌兰巴托中央体育场举行的全国性的“那达慕”大会了。这个盛大的比赛日要举行开幕式。大会持续3天,3项运动选手要从基层逐级竞争挑选,参加全国赛的都是“精英”。摔跤是“重头戏”,经过精挑细选,到全国赛时只有512名摔跤手,经过多轮角逐最终产生一名全国冠军。

“那达慕”大会开幕式十分隆重。驻蒙使节夫妇都被邀请到主席台左边的看台上观看。开幕式上,总统要致词,然后进行富有蒙古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和田径比赛。每年7月,除了常驻的使节外,许多外国兼驻蒙的使节也赶来递交国书并同时出席“那达慕”开幕式。开幕式上,引人入胜的定点跳伞表演将大会推向高潮。中央体育场为主会场,主要进行摔跤比赛,另两项射箭和赛马则分别在其他分场地举行。

蒙古式摔跤与世界自由式摔跤及桑勃式摔跤不同,摔跤手不分年龄,一律为淘汰赛,一次性摔倒对手就算赢(肩触地算输)。

摔跤的胜者有严格的称号区分。首先是全国的等级:进入第五轮者为

“国家隼”；进入第六轮者为“国家鹰”；进入第七轮者为“国家象”；进入第八轮者为“国家雄鹰”；进入第九轮以上者为“国家狮子”。再往上是“国家冠军”、“大冠军”、“全国冠军”、“国家荣誉冠军”。省级有：“省级隼”、“省级象”、“省级狮子”等等。此外，县级和军队还分别有本部门的称号。这种精细的区分，充分显示蒙古摔跤运动历史之悠久和水平之高。

在全国那达慕摔跤比赛中，优胜者均要向台前9面“苏鲁特”(сүлд)白旗处绕一圈，做出雄鹰状。“苏鲁特”白旗象征威严与权力，用白公马的马尾制成。传说在成吉思汗时期，卫队的9名骑士高擎9旌白旗矗立在成吉思汗身后。每年那达慕大会前，9名骑兵将9面“苏鲁特”白旗从国家宫护送到举行“那达慕”大会的中央体育场。大会结束后，又将旗护送回国家宫。

摔跤淘汰赛持续两天，风雨无阻。一般从7月11日上午开始，持续到12日傍晚才能结束，总统要亲自为3项运动得奖者发奖。由于蒙古式摔跤无时间限制，决赛阶段的比赛往往比较“消极”，稍弱者在拖延时间，只要肩不着地就不算输，因此有时摔到天全黑下来还结束不了。有一年7月12日在国家宫宴会厅举行的国宴需等总统到来后才能开始，而总统还在体育场尚未向优胜者发奖。许多外宾和使节从7点等到8点，再从8点等到9点，总统才姗姗来迟，大家意见多多，在外交场合也很失礼。为此，外交部礼宾司决定将国宴时间由12日晚改为11日晚。因11日晚摔跤尚未摔完，总统能准时出席宴会，这样就不必为等总统而得罪外宾了。因摔跤影响宴会时间，这也是“具有蒙古特色”的事件。

作为“马背上的民族”，骑马是蒙古族的一大特色，赛马当然也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专利”。谈起马，我想没有哪个民族比蒙古民族对马匹有那么深厚感情的了。有草原就有马群，有人就有骑马的人，即便在现代的乌兰巴托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上，随处都可以看到单匹马或马群悠闲地走在大街上，这可以说是蒙古国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使馆的大轿车不慎在回馆的路上将一头正在“散步”的牛压死。这在其他国家的使馆大概是不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学蒙语的同志都清楚，蒙语词中“马”的说法分得很细，从小马驹到一至四岁的马都有不同的叫法，其他牲畜也一样，可见蒙古畜牧业发展程度之深！

赛马分1岁、2岁马比赛，选手大多是10岁左右的男女少年。赛马，让这些“马背上的民族”的后代得以充分展现其勇敢刚毅的性格特点，这些少年们（尤其是少女）的飒爽英姿，使人为之惊叹！



赛马精彩的部分出现在7月11日国庆节当日下午4时。赛马终点设在离机场路不远的赛马场。这一天,临时搭起了许多帐篷供宾客使用。其中最大的一个帐篷是领导人和各国使节等候和休息的地方。下午3时,领导人和各国外宾、使节陆续来到这里等候,先观看跳伞表演。4点快到了,在人们的一片喝彩声中,迎来了接近终点的选手们。说时迟,那时快,我们首先见到的是一片扬尘,然后选手们便陆续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越接近终点,争夺越激烈。一个个汗流满面、脸颊像红苹果一样的小英雄们开始最后的冲刺。头两名往往是比肩而过。前10名之间相隔都不远,10名以后才渐渐拉开距离。这一刻,引来了阵阵掌声。

蒙古朋友特别喜爱看摔跤。这些“摔迷”们一早就带着干粮走进体育场,准备“长期战斗”,整日泡在体育场里,非要看到最后决出冠军为止。我们若问他们摔跤比赛的形势,他们总是绘声绘色、津津乐道地向你详尽讲解。他们十分喜爱摔跤冠军,把他们奉为英雄。如今在蒙古五星级“成吉思汗”宾馆路上的拐角处,悬挂着历届摔跤冠军们的大幅画像,过路的人们用亲切和钦佩的目光注视着他们。

说起有关蒙古摔跤技巧的词汇,真是琳琅满目、丰富多彩,有抱、踢、绊、缠、推、压、提、捉等30多种动作,100多种招法。两强相争勇者胜。你如果细心,就可以看到报纸上对于比赛的详细描述,简直让人大开眼界,有许多不熟悉的蒙语词。只有懂得具体技术和术语的记者才能准确生动地描写摔跤的场面和过程。

我们使馆同志原来不太懂看摔跤,但由于长期受到这里气氛的“熏陶”,不少同志耳濡目染,也开始会看摔跤,并且越看越爱看,有的已成为“摔跤迷”。试想,从500多名摔跤手中产生一位冠军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们从他们的雄姿中可以看到蒙古人民顽强、勇敢、质朴的民族特性。由一项摔跤,推而广之,到男子的3项运动,不仅给我们以五官的愉悦,而且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蒙古民风点滴

一个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一个特定自然环境中,经历几十年或几百年,自然就会形成其独特的风俗习惯和礼仪规矩。我在蒙古国生活多年,耳闻目睹许多蒙古族习俗方面的趣闻轶事。如今想起来,仍饶有兴趣,不妨挑选若干记于后。

蒙古人信奉天神,每次举行大型活动都要祭天,以酒食敬祝天地。过去,人死后,称为“升天”,把尸体运到偏远之地,扔给鸟兽,叫做“天葬”。现代则主要实行土葬。敬重火神,认为火神是幸福与财富的源泉,也是家庭的保护神。一切不洁之物均可用火净化。蒙古禁止用刀触火,不许在火旁用刀斧砍东西,都是敬重火的表现。

见面互递鼻烟壶,也是传统习俗。鼻烟壶小巧玲珑,有元宝形、桃形、葫芦形、瓶形等,现代的鼻烟壶做工越来越讲究,越精细,有玛瑙的、玻璃的、水晶的、银的,还有玉的、石的、木制的,甚至金的,不一而足。为何草原地区要使用鼻烟壶?我询问了一些专家,他们的解释是因为在草原、山区,纸烟运送和保存都不方便,如用鼻烟壶,可以防潮,适合牧民在放牧、狩猎中使用,受到牧民的欢迎,这就传承了下来。

交换鼻烟壶并不是真正让对方吸烟,而只是一种礼仪,与献哈达一样,有时是同时进行。壶内可装有香料的烟粉,也可装药品。见面后,两人同时掏出鼻烟壶。一般用右手递过去,对方用左手接住,放于右手中,各自倒出一点鼻烟,用手指抹于鼻孔上品闻一下,品毕进行交换。如是平辈,双手略举互递;如是长辈给晚辈,则晚辈要双手接过,跪一足以示敬重。如是晚辈给长者,则反之。

我第一次用鼻烟壶是到中蒙友好县龙县做客时。每位县领导都一一向我们递送鼻烟壶。开始时我们不知用哪只手接,一时显得忙乱,这时老同志及时教我用左手接送,换至右手,用鼻子闻后再还主人。后来交换多了就渐渐熟悉起来,动作也自然很多。同样的道理,接主人送的茶也是很讲究的。主人送茶



时,客人应欠身双手去接,如用单手,就显得失礼。

祭敖包,这是来源于蒙古族信仰的萨满教所保留的习俗,表明蒙古族对长生天、大地、山川、江河及祖先的崇拜。随着时间的变迁,蒙族人民把祭敖包纳入了喇嘛教的范畴之内。敖包是蒙语的译音(ОБОУ,是“堆”的意思),佛教认为最高的石堆是山的象征,应作为神物来供奉。现代蒙古人堆砌的敖包一般为圆形石堆。祭祀时间一般在每年的6至8月。祭祀时,敖包上插树枝,上挂布条或纸做的旗子。祭祀仪式有血祭、酒祭、火祭几种。血祭是杀牲畜来祭天地;酒祭是用酒水祈求平安;火祭是祭自己的亲人。大型活动时还要请喇嘛来念经。祭祀者要绕敖包3圈。祭祀活动还和那达慕活动结合起来,声势更大。现代的敖包往往设在一些交通要道,过路人可以此作为路标,起到认路和确定方向的作用,同时也可在这里歇息一下。经过敖包时要添上树枝和石头,也有放几枚钱币的。然后,在此绕3圈,表示如意吉祥,祝愿一路平安的意思。这样,祭敖包的含义同过去相比有了扩展。近年来,蒙古领导人在重大的节日和吉日良辰时也要组织盛大的祭敖包和祭“圣山”活动,一方面表示其尊重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同时也把祭祀活动搞成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表明人民美满和谐,并祝福这一年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兴旺。

蒙古民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同蒙古朋友一起联欢或聚会时,不用我们邀请或提议,他们就会主动地唱起来,跳起来。一场宴会,一个多小时吃饭后,大家就开始文娱节目,轮流表演,一个人唱一个歌,如不唱也可跳一个独舞。蒙古朋友懂得的歌实在太多了,一个接一个,如果忘了,别人可“提词”。蒙古近代民歌,调子优美,清新悦耳,主要内容是歌唱牧业牲畜,歌唱牧民的美好生活。蒙古长调歌则充满生活气息,其曲调高亢浑厚。我国著名歌唱家胡松华先生在《赞歌》里就十分精彩地演绎了长调的精华。我更喜欢听蒙古的现代民歌小调。至于长调,我们中国同志学起来较困难,只是哼着调欣赏。蒙古国还有一绝叫做“呼麦”(хүмай),即为一种“喉音”曲调,用喉咙的和声来唱出各种调子,唱时要用“丹田之气”,一个人唱如同合唱一般,共鸣特好,令人拍案叫绝,有人称这种唱法为“天籁之音”。最近蒙古国已将此种艺术唱法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假日,使馆的同事们一起外出游玩,同大自然亲密接触。沿途可以饱览草原的美好风光,很是惬意!公路上车不多,使馆的大轿车一下子就开出几十公里,在茫茫旷野,找不到一个“方便”,即“看马”的地方。于是汽车停了下来,我们就约定俗成地实行“男左女右”的做法,男同志到左边的沟下方,女同志

到右边的沟下方,各得其所地完成“方便”任务。刚来的同志开始有点不习惯,但“习惯成自然”,在地广人稀的蒙古国不可能建那么多厕所,只能入乡随俗。每当你外出旅游住在蒙古包时,外面也不可能有厕所,到时便可走出离包远一点的地方去“方便”了。在外省的一些单位参观时,看见一个简陋的厕所,往往是不分男女的,你进门后闭上眼就行,这些都算是蒙古“特色”。

当我尚未去蒙古时听老同志说,蒙古朋友喝酒特别“诚实”,到了蒙古后发现,果然如此。蒙古朋友告诉我,喝酒,特别是喝烈性“伏特加”酒是向苏联老大哥学的,不过,蒙古朋友有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酒量相当大,用小酒杯喝都不过瘾,往往用玻璃杯来喝才“解馋”。且蒙古朋友喝酒一般不用下酒菜,什么也不吃,咕咚一下就一杯,真神!由此,报纸上曾批评蒙古国成了“酗酒”之国。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蒙古亦开始提倡文明喝酒,很多年轻人都不喝烈性酒。且由于蒙近年患肝病的人增多,都与喝酒有关,这不能不引起大家的注意,政府亦采取了若干措施,如不准未成年的儿童去商店买烈性酒等,不少人对喝酒都自觉加以限制,在一些酒席上开始不劝酒。现在许多年轻人不喝白酒,爱喝红酒和啤酒。从喝酒的变化,也可看出社会前进的步伐。



第十八章

千里巡访



寻找“蒙古海”

蒙古人赞美库苏古尔湖是“蒙古海”，每当谈及，都充满自豪与激情。这样的称呼对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家而言，完全可以理解，同时也赋予它特定的含义。它表明蒙古人民对大海、对水资源的一种渴求与祈愿。当我们介绍“没有到过万里长城就等于没有到过中国”时，蒙古朋友也用同样的话告诉我们：“没有到库苏古尔湖就等于没有到过蒙古国。”

库苏古尔湖位于蒙西北部。库苏古尔省就是以此湖命名。库湖是中亚最深的湖，也是世界第14大淡水湖。这是一片高山湖泊，平均海拔2000米，面积2760平方公里，水深262米。湖水清澈见底，四面群山环抱，草地与森林萦绕，与其他地区的景色形成鲜明的对照。来到“蒙古海”，可以领略湖光山色和大自然风光；可以饱览鱼群在湖中生息；可以观看各种绵羊、山羊、熊、驯鹿及各种鸟类自由栖息的情景，真是美不胜收，使人陶醉！令人惊叹的是，听说竟有96条河流汇合于此，只有额金河从这里流出，流进贝加尔湖。

带着对库苏古尔湖的向往，我第一次到了“蒙古海”。那是1984年9月，我跟随张德麟参赞夫妇前往，交通工具是安—24客机。时值9月下旬，我们要赶在国庆前回馆，行程相当紧凑。

飞机可载乘客50人。飞机在空中几次因强烈的气流而盘旋颠簸，不禁使人紧张起来。尽管听同志们说，坐安—24飞机安全系数比较高，不过蒙古飞行员的粗犷动作，加之蒙古朋友爱喝酒的习惯又确实让人有点担心。但我们的担心看来是多余的，经过3个小时的飞行，我们乘坐的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库

省省会木伦土质机场上。

库省是全国一个大省,全省大约有6万人。木伦市也显得比其他省的省会要大些。不过蒙古的省会不管多大,大概就相当于我们边远省份的一个小镇。主要街道有四五条,高楼不多,最高的只有四五层。不过这个小城与其他省会相比,给人比较大气的感觉,由于人口多,主要街道上显得比较热闹。

我们一行下榻全省最大的宾馆——“木伦”宾馆。主人十分热情地欢迎从首都来的外国客人。副省长和主管外事的秘书长向我们介绍了本省情况,并宴请了我们。回到宾馆,准备洗洗脸,但打开水龙头,别说热水,连凉水也没有了。一打听,原来是管道出了故障,只好作罢。

半夜醒来,虽然盖着毛毯仍感到凉气袭人。从窗户往外看,原来下起了雪,外面的世界真奇妙,白雪皑皑。在蒙古,9月雪,8月雪,是司空见惯,6月雪也见怪不怪。这里海拔高,自然下雪下得早。常言道,“高处不胜寒”,到了库省就有了深切的感受。从乌兰巴托到木伦,气候足足早了一个季节。对此我们早有准备,第二天,几乎是“全副武装”——用上了呢子大衣、羊皮帽、带毛的皮鞋、羊毛围巾。

在库省,我们参观了一户牧民家庭,主人是牧马人,家中有夫人和两个女儿。孩子在读中学。全家生活算中等水平,蒙古包里有电视机、缝纫机。主人有10多匹马,700多只山羊和绵羊。喝过奶茶,吃过奶食品后,我们观看了主人的精彩驯马表演。蒙古民族的勇猛刚毅、豪气冲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都说库省的白鱼好,是蒙古大型宴会上必备的菜肴,这次来到库省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在这里,我们品尝了白鱼。这种淡水鱼,肉质嫩,味鲜美,烹调起来煎、炸、炖皆可。尤其是垂钓者若将刚“猎获”的鱼收拾好后放入锅中做汤或用油煎,其味更佳。

从库苏古尔湖再往北走50多公里,有一个“查腾”部落(цаатан),这里有类似我国鄂伦春族的“查腾人”(цаатангууд),他们放牧和繁殖一种叫“查布格”(цаа буга,驯鹿)的鹿。这里海拔高,天气严寒,驯鹿人特别能适应冰天雪地的气候环境和放牧狩猎的生活。他们以打猎为生,能吃生的肉,特别剽悍神勇,能牧能射。他们穿一身像盔甲一样的蒙古袍,但并不显得臃肿。我们本来准备到村子里去看看他们的家。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临时改变了计划,不去了。我抽空与几个“查腾人”聊了起来。他们的蒙语与乌兰巴托的喀尔喀语有些区别,但能听得懂。



我问一个40来岁的中年男人：“你们靠什么为生？”

“我们主要是打猎，养驯鹿。”

“你们常到乌兰巴托吗？”

“没有去过。我们只去过木伦市。”

“你们习惯冷天吗？”

“我们喜欢在凉爽的气温中生活。”

“你们知道中国吗？”

“我们从报纸上知道你们是个人口很多的伟大国家。”

“你家有几个孩子？”

“两个孩子。女儿在省中学读书，儿子在家从事畜牧业。”

“你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我们希望买辆高级的摩托车，那样来去就方便多了。”

从这个淳朴的“查腾人”的讲话，可以了解蒙古西部这一部分“特殊人群”是怎样生活的。

1987年夏天，我随李举卿大使夫妇第二次前往“蒙古海”——库苏古尔湖。随行的有一秘南文锦同志。我作为翻译兼秘书同行。交通工具是汽车。大清早，我们从乌兰巴托出发，到了郊区，人明显少起来。走了十几个小时，我们就到了布尔干省的省会布尔干市。沿途是一片杭爱草原的景色。整个小城恬静安详。我们在这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又继续出发了。人们说，草原可以说没有路，也可以说到处都是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人走多了，就成了路”。草原路如有草皮就好走，但如果是光秃秃的石子路，凹凸不平，沟沟坎坎，要绕道而行，车速只能放慢，走三四十码。且草原路一条路常常分好几条岔路，样子都差不多，极不好认，容易迷路。

司机郑刚同志原是哈尔滨市领导的司机，技术很好。由于我不会开车，不能帮忙，全程只有他一个人开车，特别累。更令人惋惜的是，奔驰车的底盘太低，不像俄“伏尔加”车那么高，一旦碰到沟坎处，不仅颠簸难耐，且把新车的底盘刮出了一道道裂痕，令人惋惜。

走了近两天，第二天下午4点多来到库省边界，省里派来了一名副省长迎接我们，给我们每人献了哈达，喝了下马酒。再走两个钟头，终于到达省会木伦市。经过两天的劳顿，当晚就住下歇息。

从木伦往北再坐两个小时车程到达哈特格勒(Хатгал)，就来到库苏古尔湖。我们在省领导的陪同下坐上了“苏赫巴托”号轮船游览了“蒙古海”。过

去在国内去参观游览一个湖,是极普通的一件事,但在蒙古国,一个很难看到海的国度,这是多么难得的经历啊!我们坐在轮船上,看到湖水清澈如镜,碧波粼粼,再往前看,岸上空气清新,远处山峦起伏,真是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坐在这里,恍惚身在我国江南!我不禁暗自叫好,这个时候,我想新编一首歌,歌词改为:“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库省处处赛江南……”。



“大蒙古国”遗址——哈拉和林

到了蒙古国,不去哈拉和林,是一大遗憾。现代蒙古人会对你自豪地说,不去哈拉和林,等于没有去蒙古。到蒙古旅游的人大都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去一趟哈拉和林,一睹“大蒙古国”古都的风采。

哈拉和林是历史名城,也是中亚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位于杭爱山南麓,鄂尔浑河上游东岸,离鄂尔浑河大约10公里的距离。1220年,成吉思汗平定河北诸郡,定都于此。1235年,窝阔台建造了以万安宫为中心的宏伟壮观的城墙和宫殿。到了蒙哥汗时代,这座都城更具规模,成了蒙族与其他民族交流的场所。城内有各族商人聚集的回回街,汉族工匠聚集的汉人街和衙署,东南西北门分别有粮食、车、牛、羊、马市场。此后历时40载,这里都是蒙古帝王的首都。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建元,迁都北京,这里遂成为一座真正的名胜古迹。1380年,哈市毁于大火。1948年起,蒙古国开始在废墟上挖掘出土墙、街市、宫殿、房屋等遗址。

哈拉和林内有称为蒙古第一寺的额尔德尼寺。这座寺于1586年在蒙北喀尔喀土谢图汗的阿巴岱汗建造,面积约0.16平方公里。这个正方形的寺庙有4个门,附近有4棵银制的大树,树旁有银狮。四周土墙上有108座佛塔,四个角落各有一只石龟。像中国寺庙一样,正殿入口有哼哈二将,殿内有8大金刚和18罗汉。殿内还供有释迦牟尼各个时期的塑像。院内有许多蒙古包,昔日为召集会议的场所。

我曾多次来到这里,或是陪同国内代表团,或是同馆内的同志一起前来休闲参观。每当来到这座古城,总要引起我的许多遐想。看到古城,我们恍惚又



回到 800 年前的 13 世纪,我们好像看到了成吉思汗称帝大典的情景,似乎目睹了他和众将在这里召开“呼勒尔台”大会的场面……

应该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不只是一位“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英雄,还是一位横扫欧亚二洲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他创造了蒙古的历史,做出了举世无双的惊人业绩,在这里建起了疆域辽阔的大帝国,令人肃然起敬。如今,被蒙古人自豪地称为其伟大祖先的国土,已发生了巨变。自上世纪中叶起,蒙古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加入了社会主义“大家庭”。90 年代开始,又跟随国际潮流走上了民主化道路。现在,蒙古族分布在世界几个国家,它们在各自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帮助下不断发展,努力前进,正在创造新的历史和生活,取得日新月异的变化。

每当来到这个古城,我都感触良多:首先,从这些历史古迹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蒙古民族与我国汉族等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回顾任何一段历史时,不能割裂任何一个时期去进行研究和分析,应全面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才能得出正确的、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其次,从建筑艺术而言,是汉族的建筑促进了蒙古族建筑的发展。蒙古族人民在学习和借鉴汉族建筑经验的过程中,在汉式宫殿楼阁模式和草原毡帐风格结合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新兴城市,这是蒙古族人民的创新成果。不难看出,蒙古族人民不仅勇敢剽悍,而且心灵手巧,当年在建筑方面已达到相当水平。

再过几十年,我们再相会。我们的邻邦蒙古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或许不能准确地加以描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社会在进步,蒙古国在发展。“一代天骄”所展现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将会在辽阔的草原上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永不停息。



“总统的摇篮”探秘

位于蒙古西部的扎布汗省没有特别抢眼的地方。但它有扎布汗山、扎布汗河,崇山峻岭,山水相连,风景秀美。蒙古其他省,如科布多、乌布苏省也有类似景色。那么,该省有何独特之处令人神往呢?从 90 年代蒙走上民主化道

路,由全民直选总统以来,两任总统都是扎布汗省人。其中,奥其尔巴特是布泰县人,巴嘎班迪是图德亚尔县人。人们说,扎省是“诞生国家元首的宝地”“总统的摇篮”。参加边界谈判时,老朋友达希达瓦少将曾多次自豪地向我介绍他的故乡扎省的情况,说我到蒙古国十多年没有到过扎省,实属遗憾,他劝我一定要去一趟。

在朋友们的鼓动下,带着探寻“总统摇篮”奥秘的欲望和渴求,2001年7月中旬我踏上了赴扎布汗省的旅途。蒙教育科学文化部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长)米希格扎布先生陪同我前往。有这样一个“高级向导”,我的行程就顺畅多了。

我们一早从乌兰巴托出发,经过巴嘎诺尔煤矿和旅游胜地哈拉和林,这一段道路平坦宽阔,杭爱草原的美景一览无余。不过,过了哈拉和林后,道路开始崎岖不平,越来越不好走。坐了近一天的车,经过长途跋涉,我们一行于当晚深夜抵达前杭爱省位于湖畔的一个旅游点。这里有米希格扎布先生的熟人,经他联系安排,我们一行顺利地住在这里,进行休整。次日一早,我们又匆匆赶路。越野车在路况各不相同的地段行驶,车速时快时慢。沿途可以看到一些草场和畜群。这一年比较干旱,雨水不足,草有些发黄。经过无数崎岖不平、蜿蜒曲折的山路,直到傍晚,我们才到达目的地扎省的省会、蒙古的历史名城乌里雅苏台。省政府秘书长走出十多公里到省界来迎接我们。来到这个早已慕名的城市,我真想马上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可惜天色已暗淡下来,什么也看不清。

次日上午,扎布汗省省长巴特蒙赫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们,并介绍了该省的历史和近年发展情况。巴40来岁,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粗壮。他说,扎省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这里有深厚的文化与历史底蕴,教育发达,近年来全省畜牧业发展得不错。他说话十分实在,坦言该省囿于地理和自然环境的原因,离首都遥远,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经济与社会发展存在不少困难。他希望通过使馆联系更多的中国公司和经济实体来该省投资,帮助扎省摆脱困境,使社会经济获得发展。我代表使馆向该省人民提供300万图格里克(相当于3万元人民币)的资助。对于省长提出的联系我国有关公司的要求,我表示如有可能将提供帮助。

在扎省,我们参观了省地志博物馆。蒙古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个很值得倡导的做法,就是各地均十分重视对青少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教育,都设立地志博物馆,组织年青一代参观学习。扎省博物馆面积不大,但设备不错,各种模



型、实物、图片、幻灯片等一应俱全。解说员自豪地介绍说,从历代各种文物中可以看到,古代蒙古汗国的许多活佛“呼图克图”(хутуагт)中,扎布汗省占多数。活佛是佛教中转世制度继位的高级喇嘛,他们是至高无上权力、智慧与道德修养结合之象征。当活佛一要有文化,熟读经书;二要对佛教忠诚;三要修身养性,有各方面的素养。活佛多,从一个角度看出其文化根基,从中可以领略为何扎省人才济济之“奥妙”。

记得过去读历史书时多次接触到乌里雅苏台这个历史名城的名字。早在清朝,我派驻漠北的将领和官员曾在此驻扎。乌里雅苏台也是通商要地,是个“买卖城”,也是“友谊城”。当地老百姓熟知中国商品的名称,不少中国商人来到这里与蒙古人打交道,蒙古人向汉人学会了汉语。乌市市长是女中豪杰,她的名字叫图木尔巴特尔,名字中有“图木尔”(Төмөр,蒙文,即铁的意思)。许多人称她为“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她是一位从基层一直干上来的干部,干练沉稳,作风泼辣,对本市情况了如指掌。她会见并宴请了我们,并特意叫人钓了几条白鱼来招待我们。在蒙古能吃上白鱼,一饱口福,真是难得的机遇!“铁娘子”与我们谈了很久,从历史到经济,到文化,希望我国边境省份加强同乌里雅苏台的交流,其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参观省第一中学,是我们日程中的重要安排。刚进入校门,前厅悬挂的一幅列宁的口号“学习,学习,再学习”首先映入我们的眼帘。学校虽已建多年,显得有点陈旧,但教室、办公室、走廊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们先参观校史陈列室。这里有两任蒙古总统奥其尔巴特和巴嘎班迪在该省学习和生活的照片。校长不无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说,巴嘎班迪总统就毕业于这个学校。他每次到省里来视察,都要到母校看看,与老师和同学们见见面,了解学校教学情况,并就教学问题作指示。

从校长的介绍和我们参观了解的情况看,该校校风正,管理严,十分讲究教育方法和教书育人。建校数十年来,已是桃李满天下,培养了各个领域成百上千名国家栋梁之材。

走出第一中学,我们又来到省少年夏令营。这是一个设备齐全的青少年培训基地。每年暑期,从各校抽调一定数量的学生来这里度假和训练。营内有简易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室和各种活动室。学生们可以在这里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和文娱活动,并在美术、歌咏、乐器、手工等学习班学习。这里的食堂为同学们准备了很好的饭菜,品种虽不算很多,但数量保证供应。可以看得出,食堂很注意饮食卫生。我们看见学生们吃到两个热菜和充足的酸奶、奶

茶。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在这里喝到在乌兰巴托喝不到的“地道”奶茶,这里的奶茶成分讲究,配料精良,浓郁可口。陪同我们来扎省的人民日报记者杨涛来后有点感冒,嗓子疼,那天他在这里一连喝了几大碗奶茶,第二天嗓子就不疼了,真神!一路上,他逢人便夸扎省的奶茶好。

在扎省的参观访问只有短短的两天,但从参观的博物馆、十年制中学和夏令营,我们似乎可以找到关于“总统摇篮”奥秘的答案。去扎省之前我也去过别的省,但还是感到扎省具有与其他省不同的特点,不同的文化底蕴。把在扎省的各种印象积累起来,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一个具有传统民族文化、至今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活生生的蒙古国的缩影。



走访林彪折戟沉沙的地方

1971年,中华大地出现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九一三”事件。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副统帅”林彪企图谋害毛主席未遂,阴谋败露后,不得不携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及亲信共9人乘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结果机毁人亡,折戟沉沙,葬身于蒙古肯特省温都尔汗,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成为永远被中国人民唾弃的罪人。

这一事件至今已过去30多年。在80年代和90年代,蒙古一些报刊曾多次援引外电外报评论与消息,企图对此事件进行“翻案”,称林彪是被我“用导弹打下来”的。在我接受记者采访时,一些记者竟然说中国的报道“不真实”,“与事实有出入”。我对此均用事实予以澄清。

我没有经历“九一三事件”,一直很想利用在蒙的机会亲自去肯特省温都尔汗跑一趟,看看林彪飞机坠毁的现场,以获得“第一手材料”。但由于工作忙,我一直未能寻觅到机会。1994年7月,我陪同上海市法院代表团到肯特省访问参观,终于有机会得以了却我的心愿。

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位于乌兰巴托的正东面,距乌市340公里,坐落在克鲁伦河的北岸。

清晨,我坐上使馆越野车,跟着代表团迎着太阳向东方进发。按一般规



律,轿车走了半天平坦的草原路之后,又要进入凹凸不平的环山路。汽车时而在平缓的土路上行,显得很平稳;时而在波状路上驶,像骑上了放荡不羁的野马,不断地颠簸着。直到下午3点多,才抵达目的地温都尔汗。

温市给人的感觉是小巧玲珑。作为一个省的省会,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四五条柏油路。这里的气候与布尔干省的省会布尔干市相仿,其规模比中央省省会宗莫德市要大。街道倒也干净整洁。

第二天,代表团安排了一整天活动。会见了一位副省长,并同当地的法院同行们进行会见,就具体业务进行了切磋。代表团在温市还参观了工厂和文化设施。晚上省法院举行宴会。宴会上以牛羊肉为主,没有猪肉。代表团的同志大都是上海人,吃不惯,向餐厅要鸡蛋又没有,只好作罢。

说起饮食,到蒙古访问的中国同志有的吃不惯蒙古的饭菜,特别是羊肉,嫌有羊膻味。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许多人来蒙都要自带方便面或咸菜之类,大包小包的,很不方便。不过到了2000年以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变。蒙古市场供应有了改善,除羊肉外,其他食品比较丰富,乌兰巴托和其他大城市相继建起了不少中餐馆,来访的同志们可到中餐馆去吃饭。后来几乎没有人再带方便面之类的食品了。

第三天,代表团就要离开肯特省,继续到东戈壁省省会赛音山德访问。我把代表团送走后,独自留在温都尔汗。

我说明了下一个访问的“目标”后,陪同我们访问的该省政府的一位年轻人就带着我出发了。这一天天气阴沉沉的,没有太阳。这也好,凉快,正好赶路。飞机坠毁的地方离温市70多公里。汽车疾驰在沙土路上,沿着克鲁伦河岸行驶。

克鲁伦河,蒙古最著名的河流之一,她其实并不宽,河中央出现一块块沙渚,把水劈成一段段的细浪。青年人介绍说,克鲁伦河很长,比乌兰巴托的图拉河要长得多,河床宽度有三四百米。河的下游一直通向东方省上游的哈拉哈河(又称哈勒欣河)。

和青年人聊着聊着,转眼到了贝尔希矿区。这是一个大萤石矿。青年人说,再往东南方向走约10公里就到了。他很年轻,20多年前发生的事当然不清楚,也是听人家说的。为了保险起见,他带我去见一位熟人,我们走了大约20分钟,来到一个蒙古包前。在我眼前出现的是一位50多岁的慈祥老牧民,我们说明了来意,请他带路,他说没问题,找他算找对了。30多年前发生的事他正好知道。当时他听到一声巨响,不知发生了什么,赶紧通知他们“巴克”

(村)的领导。后来才知道是中国的一架飞机在这里坠毁了。

走了一阵,我们离开土路,走入草丛小路,来到一个叫巴彦塔拉的地方。只见这里一片塔形的盆地,北边窄,南边宽,一马平川,视野马上开阔起来。往地上看,果然看到不少飞机残片散落在草丛和沙地上。我赶紧捡了几片。听老人说,现在剩下的都是小的碎片,大的零部件和残骸碎片已看不到了。我又捡了十几片,用手绢擦拭后小心翼翼地放进我的提包内,准备带回使馆分给其他同志。

我问老人:“当时埋葬时竖的小木牌还在吗?”

老人说:“以前看见过,过了那么多年,早已没有了。听说来过不少人,不知是否处理了,一点儿不见踪影。”

听了老人的话,我很扫兴,看来除了残片外,别的什么痕迹也找不见了,只好快快离开。

蒙古地广人稀,最初,这些散落在3000平方米草地上的巨大的发动机及诸多零件残骸,静静地躺在茫茫的原野上,无人去管,任凭风吹日晒,经过许多年,不少已生了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有了变化。人们将对历史的研究探讨同商业经营、市场经济巧妙地结合起来,达到高度的统一,其手段之高明,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据知,一些公司和个人专程到这里来收集残骸零件,既可以交送有关部门保存研究,同时也可以获取报酬。后来,有些人由于金钱的驱使,干脆成麻袋成麻袋地将残片收集起来拿去卖。一位温都尔汗的工作人员收集了大量残片,来到中国驻蒙古使馆提出要向中国博物馆提供,结果经我们联系,军事博物馆表示愿意以一定的价格接收。再以后,不少公司、私人企业,甚至从台湾也有人“到此一游”,买走了大量残骸。现在那个林彪折戟沉沙的现场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残片所剩无几了。

如今,游客来到乌兰巴托,想看看飞机残骸,不必亲自到温都尔汗,而只需到离市中心20多公里的“成吉思汗”旅游点就可以看到一个飞机发动机,听说这是3个发动机之一。这个发动机是一个叫查希松赫尔的公司拉走后放到这里的。另两个发动机分别被俄国人和贝尔希矿区拉走了。

林彪“九一三事件”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年轻一点的同志压根儿不了解那久远的事情。如今再到肯特省温都尔汗,已物是人非,没有人再提起那件事了。且不说“九一三事件”本身的政治含义和对中国的影响,仅从林彪的飞机坠落蒙古荒野,直至人们用麻袋将飞机残片运出蒙古,亦可看出世事沧桑与时代的变迁。



像是到了另一个国家

作为驻在接受国的大使,到各地旅行,了解该国国情与民情,是本职工作的一部分,很有必要。我到蒙古国已年头不少,但因各种原因,外省去得不多,只有十几个省(蒙全国共有21个省),尤其是蒙古的西北部和南部地区,尚未涉足。我有一个愿望,在我离任前去西北部和南部几个省走一趟。哈萨克族议员桑德勒汗多次提议我去一趟巴彦乌列盖省。我对他们的劝说动了心,决心跑一趟。此次可能是在蒙最后一次到外省访问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此访有三个目的:一是了解西部蒙古风情;二是亲自会见该省领导,对该省给予一定的资助;三是了解边境口岸情况,为该省与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牵线搭桥。

2002年7月初,赶在蒙古国庆前,我“忙里偷闲”,去了一趟巴省。我馆经济商务参赞宋学军等陪同前往。据说这是中国大使首次访问该省,杰克议员陪同前往。桑德勒汗议员先期赴该省安排并迎候。

巴彦乌列盖省在蒙最西端,离乌兰巴托有1800多公里。由于是边远省份,与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尔泰专区毗邻。从乌市去该省省会乌列盖市路途遥远,无法坐汽车前往,只有“华山一条路”——从天上飞,乘“安—24”是唯一的选择。过去我馆曾有同志到过该省,都说由于飞机在山区上空盘旋,飞起来后有些“悬”,不过,我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也想当一回“英雄”。听说为我们驾驶飞机的是蒙古原领导人乔巴山之子,技术一流,就安心多了。当我们坐上“安—24”以后一切并不那么可怕,空姐十分热情,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服务。飞机在乌里雅苏台降落休息了一个多小时,在这里加油。我再次有机会见到久违的西部名城!休息过后,旅客有序地登机。

这一天天气十分晴朗,万里无云,能见度极高。飞机在蒙古高原上空自由飞翔。飞机的平稳飞行使我们心情舒畅。越往西行,山越高,岩石越陡峭。突然,一股气流冲击了机体,机身立刻发生强烈的颠簸,机上广播叫我们系好安全带,我心猛然紧缩,不好,难道有什么危险?还好,过了几分钟,飞机又开始

平稳起来,继续在崇山峻岭中飞行。一座座高山在我脚下掠过,白云在我身边飞舞。高山、蓝天、白云,都离我那么近。我想,在几千米的高空,孙悟空的一个跟斗,就可以走十万八千里,是那么轻而易举,而我们“凡人”上一次蓝天,去一趟1800公里以外的地方,就没那么容易了!

经历3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来到蒙古最西部的省份巴彦乌列盖省省会乌列盖市。省长巴德勒汗、议长赛劳等领导热情地接待我们,给我很高的礼遇,对我远道而来表示欢迎。他们还提到前大使张德麟先生40年前曾陪同新疆代表团访问过该省。我们在巴省参观了省地志博物馆、木材加工厂、医院、广播电台,观看了民族歌舞表演。访问时间虽然很短,但我们看到了许多具有特色的单位和项目,在这里的两天,我们感到很新鲜,过得很愉快。

过去我们以为,蒙古国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都是蒙古族嘛。但实际上,蒙古国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里除了喀尔喀蒙古族以外,还有布里亚特、杜尔伯特、巴雅特、厄鲁特、达尔扈特、哈萨克、乌梁海、达斡尔、回族等众多民族,还真不少!在蒙古除喀尔喀外都称为“少数民族”。历届蒙古政府对少数民族都采取相当宽容、不加任何限制的政策。以哈萨克族为例,哈族目前约有15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左右,哈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由于哈族与蒙族长期一起生活,共处一个社会,他们也会说蒙语,与蒙族相处融洽。蒙政府容许哈族成立自己的各种协会,设立了“哈萨克族民族发展中心”,定期进行活动,研究本民族文化传统,探讨本民族的发展,并负责开展蒙哈文化交流。另外,在每届大呼拉尔中都有一定比例的哈族议员,他们有充分的发言权和表决权。政府和执政党对哈族人口较集中的巴省一视同仁地采取发展经济与社会的方针政策。总的来说,蒙在少数民族问题上采取民主、开明的政策,因此并未出现过少数民族纷争和冲突的事件。

不过据我所知,近年来在哈族协会活动中,对政府和议会的工作开始颇有微词,上层经常可听到一些批评意见和不同的声音,报刊上也偶有披露,主要是批评政府不重视哈族社会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哈族地区仍比较落后等。在地方政府和议会选举中,除政党派别之争外,也夹杂一些民族之间的矛盾,并曾喊出“争取哈族人权”的口号,这不能不引起蒙高层领导的重视。

90年代初,苏联解体,建立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近年来,受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影响,巴省有些哈族人愿意到对方国家“寻根”。据知,已去了1万多人,但由于找不到合适工作,且不习惯那里的环境,部分人去后又回到蒙古。为此,蒙哈两国领导人在多次会晤中就此问题进行了磋商,得到较好的解



决,未引发重大政治问题。

在乌列盖市访问的几天,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仿佛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国家。因为我听到这里的官员们之间的对话不是用蒙语,而是用汉语,他们的对话是那样的亲切、热烈、和谐,谈话时简直旁若无人。宴会开始时主宾都用蒙语致词,我们大家都能听得懂,但致词完毕,进入自由交谈以后,我们又重新听到汉语的热烈对话。和我同行的科教部国务秘书也无可奈何。当主人突然发现尚有不懂汉语的人在旁边时就马上操起蒙语,过了不久,又讲起了汉语。由此我联想到,在我国南方人也有类似情况,如广东人、上海人老乡见面时操家乡话,对此,北方人很有意见,因这样往往使他们感到尴尬难堪。当遭遇批评时我当时还有点不以为然,但如今在偏远的巴省遇到此情,感到北方人的批评是多么中肯。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应考虑你所在的环境和你周围的人,要出于对对方的礼貌和尊重,尽量使用大家通用的语言,以免使你的同事、朋友及在场的人感到不便和尴尬。

在离开巴省之际,省议长、秘书长为我们送行,在边界附近的农牧社,我们再次听到各方领导向我们提出希望开辟甘其毛德口岸代替原来的老爷庙口岸(这个地区唯一的口岸)的建议。他们提出的理由是道路不通,如不改道难以通行。蒙方再次希我将其建议向本国的有关部门反映。同时,蒙方还提出了加强巴省同我新疆阿尔泰专区经贸文化往来的建议。我答应回国后向有关部门反映。

临别时,热情好客的主人用“浩特浩特”(焖罐羊肉)招待我们,同时还摆上了清淡带甜味的冷盘、热菜和自己酿造的“阿尔黑”白酒,桌上食品很丰盛,表达了主人的盛情。令我惊奇的是,这里的“浩特浩特”别有风味,煮得很烂,味道特别鲜美,比乌兰巴托的还好吃。回到首都以后我一再向蒙古朋友介绍乌列盖市的“浩特浩特”之妙处。

这是一次不平凡的、令人难以忘怀的旅行。至此,我在蒙古国旅行过的省已达到15个。这次旅行增加了新的经历,了解了哈族人民的生活和哈族地区的风貌,同时使我对地域辽阔的蒙古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 and 了解。



重访达尔汗乌拉省

达尔汗乌拉省省会达尔汗市位于乌兰巴托北部,在鄂尔浑河的支流哈拉河的河谷,是蒙古第二大城市。达尔汗,在蒙语中是“神圣之地”、“尊严之地”的意思。

达尔汗是个新兴工业城市。70年代,蒙古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经互会”的推动下,民族工业有了迅速发展。“大家庭”中苏、波、匈、捷、保等国分别援蒙建设了发电厂、皮革厂、水泥厂、瓷砖厂等,对确立蒙古经济建设的基础起了重要的作用。蒙古人十分感谢各国的无私援助,称达市为“友谊城”。

达尔汗离乌兰巴托约230公里,海拔约700米,气候温和湿润,年降雨量400毫米。由于地理环境优越,这里是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理想之地。

达市在蒙古属于较繁华的城市,离乌兰巴托又近,我馆的同事们大都到过达尔汗市。使馆在每位离任同志回国前都组织他们去达市参观游览。夏日的达尔汗,绿树成阴,碧绿的草地就像一张绿地毯从南部的乌兰巴托一直往北延伸。奔流不息的鄂尔浑河宛如一条银色的玉带环绕着大地。这里美景如画,令人陶醉。

2003年7月,我偕夫人第四次访问达尔汗。此次重访达尔汗,是应达尔汗乌勒省长哈彦夏尔瓦之邀前往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当我再次见到达市时这里已换了新颜,真是认不出来了。过去只有五六万人口的城市现在发展到10万,翻了一番。该城的规划与原来的第二大城市—东方省省会乔巴山市相似,由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城市布局合理,考虑长远安排,分为工业区和住宅区两个部分。登上南山向远处眺望,一边是工业区,烟囱林立;另一边是住宅区,环境幽雅。工厂企业集中在一起,符合环保要求,不会对非建设性设施造成污染。我们到新建的住宅区去参观,看到这里高楼林立,各种风格的高楼错落有致,绿地面积比例不小,体现出现代城市的风貌。

达市除了工业较为发达以外,文化科技方面在全国来说也属先进之列。达尔汗青年剧院是全国有名的大剧院,演员阵容强大,有近百人,以演出现代



舞著称,在全国会演中屡屡获奖。在达市值得提到的文化设施还有省市地志博物馆、婚礼宫、农牧学院分院,其规模之大、设备之先进在全国应属一流,与乌兰巴托的博物馆、婚礼宫和农牧学院均可媲美。70—90年代,我曾3次到过“友谊城”,每次都感到这个城市在变化。这个年轻的城市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

这次来达市的一个突出感受是,达市同蒙古其他城市一样,正经历着市场经济的洗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这里最大的是“达尔汗”旅馆,现已显陈旧。城里建起了许多相当规模的宾馆和旅馆。此次我们一行住的是一家私人旅馆,在乌兰巴托来说可以算得上“三星”级,设备先进齐全,服务热情周到。仅从入住的这家旅馆就可看到城市的发展和变化,真是今非昔比。

参观达市以后,我把一个新的达尔汗与过去的达尔汗进行对比:第一,人口明显多了。遇上周末,街上市民熙熙攘攘,好不热闹。第二,人们穿戴更趋现代化、西化了,穿着质量明显改观,年轻人穿起了名牌服装,穿蒙古袍的人更少了。第三,作为商品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的各种公司、商店、宾馆、饭店比比皆是,美国、德国、日本的名牌汽车随处可见。第四,卫生状况不如从前。随着人口的增多,管理跟不上。可以说,达市的变化是蒙古整个社会变化的缩影。90年代后,蒙古走上民主化道路,实行开放政策,与外界接触增多,经济、文化、科技均有较快发展,人均GDP增长很快,城市现代化步伐加快。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不论是在企业还是事业单位,使用计算机和手机的人大大增加,听说大城市人均使用计算机、手机的比例比中国还高。参观裘皮厂时,我们已看不到上个世纪80年代保加利亚援建的羊皮制品厂时的模样。这里全部用美、德的设备和生产线。生产上摒弃了计划经济时的模式,全部根据订单来确定产量。厂领导人坦率地告诉我们,由于资金紧缺,需更新的设备尚未来得及更新,全厂生产能力远未达到设计水平。由日本援建的钢铁厂变化不大,基本上是老样子。主要产品完全由市场来调节,由于资金尚未落实,该厂基本是维持现状。

社会在前进,蒙古在发展。中蒙两国经济交往的加强在达市也得到体现。记得七八十年代,在这里尚无一家中国企业。这次我特意参观了两家中资企业——天鹏和创盈制衣厂。这些厂都是我国内企业利用国际上对蒙无配额限制的机会在蒙建立起来的,使用蒙古工人,经短期培训后就可上岗,生产的服装销往美国和欧洲。

我在这两个厂参观了车间、食堂和有关辅助设施,并同中、蒙方科室人员

和工人进行了交谈。我肯定了这些厂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勉励中方人员继续恪守诚信原则,与蒙方人员搞好合作。谈到企业存在的困难时,我建议中资企业负责人同蒙方有关部门,尤其是所在区的有关部门多沟通,特别提醒他们一定要遵守蒙古法规,特别是要认真执行《劳动法》,多关心工人的生活。同时要牢记我们是中国人,不能给祖国丢脸。

这些厂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一切生产程序都有章可循;二是关心蒙工人的权益,专门设食堂,交通有班车,保证其休息,照顾其休假等;三是注意加强与蒙地方政府和各部门的联系,使地方从其经营中得到实惠,也注意参与地方的一些公益事业;四是中资企业按双方合同严格遵守当地法律与法规,树立自身良好形象,为当地的发展和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开展工作。尽管中资企业在蒙古的经营仍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但它对蒙古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祝愿这一朵中蒙合作之花更加茂盛地绽放。



三访“铜城”

地处布尔干省的额尔登特市在蒙古语是“宝地”、“有宝藏之地”的意思,离乌兰巴托370公里。70年代,苏蒙专家在杭爱山麓、鄂尔浑河流域“额尔登特”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大的铜钼矿床。后来确定此矿为世界十大铜矿之一,两国签订了共同开发协议,蒙苏两国合股比例是51%和49%。在合营股份公司中,由苏方任第一把手。平地一声雷,在这个矿山的基础上,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一座新的“铜城”拔地而起,并迅速发展成为蒙古第三大城市。

这些年来,额市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从仅有一两万人发展到近7万人。现该市除铜钼矿采选矿厂外,还有发电厂、地毯厂、食品厂等全国重点的工厂,年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例逐年增加。

额市东山头伫立着一座蒙俄友谊纪念碑,碑上雕刻的图案是两只手托起一个齿轮,两手臂上分别用蒙、俄文写有“友谊”的字样。是的,如同其他许多城市一样,这座“铜城”与苏联“老大哥”密不可分,一座座纪念性的建筑物,都



在诉说着苏蒙、俄蒙友谊的历史。80年代,走在额市的街道上,可以看到明显的苏俄“烙印”,俄国人随处可见,许多企业都有苏联专家,到处听到的是俄语。是的,苏俄对蒙古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是深入的、多方面的。

应该说,从五六十年代开始至80年代,苏联给予了蒙古大量的援助。乌兰巴托合营铁路局、蒙苏合营有色金属公司、乌兰巴托发电厂等企业,都是两国友谊的象征。至今蒙西部省份的供电仍由俄方提供。过去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曾根据国际分工让蒙主要发展畜牧业,变成“大家庭”的一个畜牧场,使蒙古国经济产生畸形发展的倾向,影响了蒙国力的提升,对此蒙方政府颇有微词,民众中也出现过“反苏”的呼声。不过,平心而论,苏俄对蒙的援助是大量的,一座座厂房、一幢幢学校、一条条输电线路,至今仍摆在人们的面前。蒙古人民不会忘记苏俄人民所给予的援助和曾经使蒙古发生巨大变化的蒙苏友谊。蒙古朋友不止一次地、真诚地向我表达了这一点。蒙俄关系和友谊有悠久的历史,早已深入人心,不容否认。“铜城”的建设,表明苏俄的援助和蒙俄友谊的力量。如今额市年产约12万多吨铜精粉和1100多吨钼精粉,该市矿产品的出口占了全国出口总额的70%左右,在蒙全国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难怪额市领导在会见我时都无一例外地、自豪地介绍该市的巨大变化和成就。

我第一次到额市是1976年,那次是随经济商务参赞到这个新兴城市了解开发情况的。我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采选矿厂。蒙俄两国专家一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向我们详尽地介绍了该厂的生产情况。据我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同志说,工厂的设备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

第二次到额市是1993年。我们应额市领导邀请到该市访问参观。本来应由裴家义大使带队,但他因故未能成行,由时任政务参赞的我带队前往。我们再次参观了铜钼矿采选矿厂,该厂基本保留了原规模,但因已过十多年,设备略显陈旧。

在额市,我们受到市领导的热情接待。在该市举行的欢送宴会上,双方共同高唱《东方红》和《十五的月亮》,气氛达到高潮。在这里,我们体会到中蒙友谊的感人力量。

参观访问中,我们慕名来到离额市不远、位于色楞格省的阿玛尔巴亚斯嘎朗特寺(庆宁寺)。这座据说已有300多年历史的寺庙建于清代。走近这座古寺,依山傍水,气势不凡,很像中国北京的汉式建筑,其面积甚至比乌兰巴托的甘登寺还要大。这座寺庙已显破旧,但三层大殿轮廓分明。看到这座落在

荒凉山谷的雄伟建筑,我再次被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和智慧所折服。

在回乌市的路上,我们经过一条宽阔的河滩。我馆一辆日本越野车驶到河中心时突然灭火了。怎么办?幸好另一辆日本越野车备有救援挂钩。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司机马上将挂钩利落地挂在灭火的越野车前方,在同志们的齐声呼喊中,“陷入泥潭”的越野车一步步地艰难前行。过了10多分钟,越野车终于被拉上了岸。同志们立即齐声高呼“乌拉”。我们在蒙古旅行或郊游时有一个经验:每次出门不能只出一车,而要有两辆以上的越野车同行,以备救援之需。茫茫草原,远离城镇,车在冬天突然抛锚,若只有一辆车,就相当危险了。这或许又是一个“蒙古特色”吧!

第三次到额市是1995年,同文化处的同事们一起出席我馆在该市举办的中国文化日活动。主要内容是中国图片展,放映中国电影。我们放映的是一部家庭伦理故事片,由于事先翻译好解说词,观众对故事内容很容易理解,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场内响起了阵阵笑声。开幕式上我用蒙语致词,向额市市民问好,同时也谈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最后祝该市繁荣昌盛,人民幸福。观众对我用蒙语致词很感兴趣,鼓掌表示欢迎。随着开放的深入,额市与我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增多,因而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与普通市民的接触中,他们对中国的发展了解之多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年轻人对我说,他曾经到过我国的南方上海、广州等城市。他能说出不少中国领导人的名字,同时还了解我国“五大菜系”都是什么。文化是相融共通的。文化日活动,收到具体的效果,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

可惜此后我虽几次路经额市,但没能抽出时间进去看一看,成为我的一件憾事。

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国际关系,其中包括蒙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额尔登特铜铅矿要生存下去,一要资金,二要设备。蒙古人强烈要求更换该矿第一把手,要求更多的经营权,“友谊之城”也并非全讲友谊,不可避免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2005年,双方在解决蒙欠俄“巨债”(约为100亿美元)问题的过程中,亦将额矿股权问题列入双方谈判议程。

改革开放的中国对矿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近年来,我国的一些企业相继与额矿进行接触,在该市建设了炸药厂。我不少公司通过各种途径购买额矿的铜精矿产品。据了解,目前我与蒙及其他外国公司协议从蒙进口的铜精矿产品已占蒙总出口量的85%之多,进口额达到1.28亿美元。除此以外,中国筑路工人直接为建设额尔登特—达尔汗公路作出了贡献。我多次乘车在这



条新近竣工的宽阔沥青路上行驶,感到平稳而舒适。蒙古朋友也伸出大拇指称赞这条公路质量很好。这是由我国黑龙江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于1998年使用科威特给蒙的贷款修建的公路项目,全长184公里,于2002年建成交工。

随着中蒙全面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法律部门的交往也开展起来。我内蒙古自治区法院与额市法院建立了业务往来,双方代表团多次进行互访。相信不久的将来,额市将成为蒙古各城市中同中国交往最多的城市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蒙中“友谊之城”。

第十九章

蒙古友人



我的“珍贵财富”

我在蒙古国工作和生活的20年里,广泛接触了从官方的高层领导、中层干部到普通工作人员;从高级知识分子、大中学生到普通农牧民。我与他们用蒙语进行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情况,向他们谈及对蒙古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看法与感受,直面人生,畅谈理想,畅叙友谊,并毫不客气地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向他们提出意见或建议。我接触过无数从事各种职业、性格各异的蒙古人,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了我的朋友。

“朋友,是人生中至为珍贵的财富。”(瑞士谚语)在蒙古工作和生活的日子里,我所认识和熟知的蒙古朋友曾给予我很多帮助和支持。可以说,在蒙古,我有许多“珍贵的财富”。直到离开蒙古回国后,有些朋友仍与我保持联系,请我帮助办事。当他们来到北京时,我都要尽一下“地主之谊”。

有的蒙古朋友说:“在蒙古,没有不认识黄家驷大使的”。这话显然太夸张,不过我将此看作是对我的鼓励,对此我很感激。说实话,我就是从与众多的蒙古朋友的交往中认识了蒙古这个国家,认识了蒙古这个民族。这些淳厚坦诚的蒙古朋友使我工作中获得很大的动力,更加明确了在这个“草原之国”工作的意义,并由此产生了深深的“蒙古情结”和割舍不断的“蒙古情怀”。我将深深珍藏这份“珍贵的财富”。



职务最高的“赛乃兹”

章武十第

人文档案

在蒙古语中“赛乃兹”(сайн найз)是“好朋友”的意思。达希云登曾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总书记,职务很高,近期曾任驻保加利亚大使,现任期届满已回国。我一直简称他为“达希”。在我的许多“乃兹”中,达希算是蒙国内位居高官、资历较深、影响较大的一位。

我与达希结识是在我任使馆二等秘书的时候。当时我负责党际交流事务,与蒙人革党各级机构特别是外事机构的负责人联系颇多,十分熟悉。作为人革党资深领导人,他曾多次会见我,后来,我们有时还同另一位好朋友巴特赫希格一起聚会。尽管我们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甚至有差异,都毫不例外地坚持本国本党立场,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交往和友谊,我们可以自由争论,以诚相待,对共同关心的两国关系和国际问题交换看法,共同探讨,增进了解。

达希云登1946年出生于库苏古尔省,1968年毕业于国立大学历史专业,并在该校任教。1978年起在党中央先后任巡视员、高级党校副校长、副部长。1990起在人革党任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1992年在党的21上当选副主席,当年10月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他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并结合蒙古历史和人革党党史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蒙古发生民主运动,人革党失去执政地位,宣布放弃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达希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从哲学的角度向全党提出了关于“中道”的理论。“中道”实质也是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一种哲学主张,主要内容是提倡调和折中,不偏不倚,走中间路线。“中道”思想受到党内的广泛支持,避免了党在政策方面走极端。这一理论对维护党内团结,使人革党继续发展进步,并参与国际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任大使期间,达希云登任总统政治顾问,并兼任总统宗教政策协调员。我多次同他就互派宗教代表团和开展两国佛教界人士交往事进行磋商。1998年11月,达率领蒙古宗教代表团访问北京、西藏和内蒙古自治区,恢复了两国

宗教界的来往。访问取得圆满成功，达本人为此作出了贡献。从内蒙古回国后，他显得十分兴奋，在向我介绍访问情况时一再称赞中国的宗教政策和改革开放的成就，并表示理解中方关于达赖问题的立场。

2001年，我们从自己的渠道得知蒙宗教团体已邀请达赖访问蒙古，蒙国内信徒也采取各种方式向人革党和政府施加压力，敦促高层准许达赖来蒙。为此，我找到达希，希望他向总统转达中方立场，请总统利用自己的影响阻止达赖访蒙。过了几天，在一次外事活动中，他告已向总统报告了此事，总统理解中方立场，不会同意邀请达赖访蒙。听到达的通报，我才放下心来。这一年，经过我方和韩国方面的共同努力，阻止了达赖来蒙“访问”的企图，维护了我国的统一和尊严。在我的任内，当我遇到一些重大事件时，都会找达希聊聊，了解蒙方的立场和看法，进行沟通和交流。应该说，“达希乃兹”长期以来对我馆的工作给予了有益的支持和帮助。



友协主席额奈比希

额奈比希毕业于建筑专业，曾任乌兰巴托市副市长。1989年，应北京市的邀请，由蒙赫扎尔格勒市长率领的乌兰巴托市代表团访问北京。额是副市长，随团来访。当时我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被派去当翻译，由此认识了额。

额体格魁梧，性格开朗，能喝点酒，有突出的“将军肚”。他待人诚恳，在同我方人员交往中很有人缘。

20世纪90年代，额升任乌兰巴托市长。上任后，他力促两国首都之间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加强交流与合作。在双方努力下，实现了两国首都代表团的互访。1990年，张百发副市长率团访问乌兰巴托，双方就中方援助修建和平桥一事达成了协议。额作为首都行政长官，对中蒙关系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

自1997年起，额被选为人革党领导委员会成员（相当于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领导层，2001年还当选为党的总书记，2004年当选为大呼拉尔主席（议长），职务一再升迁，成为“重量级人物”。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因此而疏远我们，在与我们接触时还是那么随和、热情。此时，我的职务由中级外交官升



为使馆第一把手——大使。这样，我们在新的平台上继续保持联系和接触。我们之间不仅是一国领导人与使节之间的会见和交往，更多的是朋友之间的交情。随着交往的增多，我对额的性格和品质有了更多的了解。

额作为一国最高领导人之一，为人平和，不卑不亢，对所有外国代表团一视同仁，以礼相待，确实难能可贵。他曾以各种身份多次访问中国，每次回国以后都有很多感慨，有许多新鲜见解。他熟悉建筑，尤其对我国经济建设成就赞不绝口。

额从1990年任乌市市长起就担任蒙中友协主席一职，一直致力于促进两国民间往来的工作。额当选为议长后，我们本以为，日理万机的新职务可能会使他辞去蒙中友协主席这个“虚职”。但令我们感动的是，额认为中国是蒙古最重要的邻国之一，蒙中关系对蒙至关重要，既然是个民间职务，兼职不要紧。就这样，他作为和平友好组织联合会的所有友协主席中职务最高的领导人，一直保留了自己的职务，继续兼任蒙中友协主席。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总要抽出时间出席我使馆举办的各项活动，并几乎一个不落地接见我国所有访蒙的重要代表团，进行亲切友好、富有具体内容的谈话。

2000年3月3日，额作为人革党总书记设午宴招待我和使馆政务参赞李向阳。我们坐小轿车驶入了大天口国宾馆山坳中“三巨头”居住的“夏宫”。

午宴吃得很丰富，有牛排、鸡肉、摊鸡蛋、青菜和蒙古包子，喝了酸牛奶、“阿尔黑”和啤酒，还上了供宇航员饮用的沙棘汁。

由于多年的交往，相互熟悉，我们的谈话一点也不局促，天南地北，内容广泛。我们谈到两国关系的现状、发展趋势，谈到中共与蒙人革党的交往。他还谈到会见中国领导人的情景，询问我们使馆的一些老人如今在哪里。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额在谈话中强调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是蒙古坚定不移的方针，任何党，包括反对党也没有异议，并且可以肯定此方针不会改变。额还结合自己多次访华的体会赞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成就，说“稳定压倒一切”的看法是正确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少经验值得蒙古学习和借鉴。

令人感动的是，额对他的下属十分关心。他提出准备介绍一个很有才华的大学生用我专门为外国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去中国留学。我答应通过文化处与国内联系一下。我们以为这个年轻人是他的亲戚，但后来得知，这个学生与他非亲非故，只是他下属一个干部的儿子。不久，这位年轻人到了北京大学学习。

2001年9月28日下午6时，我在大使馆主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2周年招待会。额奈比希议长和3位部长等蒙古各界人士出席我馆招待会。我致祝酒词后,与额边用餐边交谈。我过去与额一起去郊游时就知道他是一名“好猎手”,曾打过黄羊、旱獭、狗熊。他的下属都很佩服他的枪法。我也曾对他说过很想见识见识打猎是个什么滋味。此次谈及,额主席决定约我几天后于10月3日一起到中央省打猎,我欣然同意。因有急事,额提前离馆。我把他送到大门口,临别前,他说:“10月3日见。”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然是我们的永诀!

由于国事繁忙,长期患高血压的额奈比希于9月28日当晚同人革党的其他领导人还忙于讨论党和国家大事,直到深夜才回家,回家后突患脑溢血。遗憾的是他的夫人此时刚好不在国内,治疗不及时,额奈比希先生不幸与世长辞。

次日我惊闻噩耗,甚感悲痛。28日额在我馆招待会上与我交谈的相片成为中蒙友谊的“绝唱”!我馆将此照片提供给蒙各报刊登,以作永恒的纪念。

额奈比希先生生前为加强和巩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不幸逝世,是两国关系中的巨大损失。额逝世后,李鹏委员长向蒙古大呼拉尔发出唁电。唁电称,主席阁下是蒙古著名国务活动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发展中蒙睦邻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宝贵贡献。与此同时,中蒙友协也向蒙古和友联发出唁电。布赫副委员长、中联部长王家瑞、副外长王毅于30日到蒙驻华使馆吊唁额主席逝世。

额奈比希离开我们已整整6个年头。至今他的音容笑貌还长久地萦绕在我们的心间;他所致力发展的中蒙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所工作过的乌兰巴托市更加繁荣漂亮。我们相信,由额和其他蒙古朋友所共同培育的两国友谊的花朵一定会灿烂地绽放。安息吧,我的朋友!



“巴特”老友

被我称为“巴特”老友的巴特赫希格,他的全名是巴达木道尔吉·巴特赫希格(前面为父名,后面为自己的名字,有了父名后,同名者基本能区分开;如



父名也相同,那就写上父名的第二个字母加以区分)。为了叫起来方便,平常我喜欢称呼他为“巴特”或“老巴”。在我离任前,巴任总统办公厅主任,后被任命为驻保加利亚大使,他曾任人革党主席团委员、副主席,也是蒙领导层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巴特赫希格 1956 年生于乌兰巴托,毕业于乌市十年制学校。1979 年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经济专业。1990 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 年,人革党成立了由 15 名学者组成的改革小组和由 11 名经济学家组成的制定转入市场经济政策构想的专家小组,巴为小组成员。1998 年获副教授学衔。他曾在蒙古师范学院任教员、学术秘书和党委主席(相当于书记)。1992 年起,巴在国家政策研究中心、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及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任首席研究员。1997 年巴嘎班迪当选蒙第二任总统,巴被任命为总统经济顾问。2001 年 7 月,巴又接替到俄国出任大使的巴亚尔任总统办公厅主任,并当选人革党领导委员会(相当于政治局)成员。

巴是个学者,尽管公事繁忙,但仍忙里偷闲,笔耕不辍,著作颇丰。他单独或与别人合作撰写了关于经济方面的著作有 10 余本。

我与巴特是在 1990 年蒙人革党主席贡·奥其尔巴特访华时相识的。当时,他是代表团成员,我是中方翻译。访问期间,我向其请教一些蒙古经济问题的同时也向他了解人革党组织情况,他十分热情地满足了我的要求。

1996 年,人革党在大选中失利后,我馆主要同执政的“民主联盟”联系和交往。但根据关于党际关系的四原则,我党不忘老朋友,同包括人革党在内的在野党都保持了联系和交往。为了解蒙有关经济政策,当时任驻蒙古使馆一等秘书的我曾到行政管理学院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拜访巴,同他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每次见面,他都热情接待我。他性格直爽,十分健谈,开门见山,我们海阔天空,谈古论今,谈得很投入,渐渐地,成为好朋友。

我曾到巴特家做客。他的夫人叫宾巴苏伦,是个经济师,在银行工作。他们的家是个和睦的家庭,有一女一子。他的妈妈已 70 多岁,身体很好,还能做饭,且做得很好,她做的包子味道很香。1997 年 8 月,我第二次到使馆接替沈庆沂同志任政务参赞,对外身份不变。到蒙古后,有些蒙古朋友对此有点误解,有人偷偷问我,这次职务没有提升,是否“犯了什么错误”。但巴特很了解中国国情,他说,这样的安排在中国很平常,对我服从国家安排很钦佩。他知道我在蒙古国一共干了 10 多年,干得不错,绝不是上级的“惩罚”。在我 1998 年 5 月离任前为我饯行的宴会上,他作了一个“大胆”的预测。他说:“黄参赞

回国肯定是另有任用。凭我对你在蒙工作多年的了解,知道外交部是信任你的。我坚信你将会成为继张德麟大使之后第二个学蒙语的中国大使。”两个月后,他的预言“不幸言中”。

我任大使后,同巴特见面的机会更多了。他是总统经济顾问,并在不久后提升为总统办公厅主任。我们不论是公或私,经常通过各种渠道会见,有时一起吃饭。我遇到什么“难题”,都可以通过“热线”联系求得他的帮助。譬如,我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司令率军事代表团访蒙时,蒙军方开始并没有安排巴嘎班迪总统的接见,我向巴提出请求,介绍了代表团两位团长均是正在上升的将军,强调军事代表团访蒙的重要性,希蒙方尽量安排总统拨冗接见。结果,经他做工作,我们的将军受到蒙元首的接见,使访问获得圆满成功,代表团十分满意,行前一再对我表示感谢。当然,他若有什么问题需要了解,或希赴华见什么人,个人有何要求也毫不客气地向我提出,我尽可能给予帮助。

巴特是经济学家,对苏联的经济史颇有研究。他将苏俄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对比分析,认为邓小平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正确的,中国的经济通过一步一个脚印,“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是可取的,在宏观调控和发展第三产业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百闻不如一见”,每次陪同巴嘎班迪总统访华归来,他都在报刊和答记者问中发表对中国经济状况的见解,对我建设成就进行正面的评价。他还积极支持蒙中深化两国的经贸合作,提出具体的建议和意见。2000年4月,我和总统共同参加苏赫巴托省图木尔廷敖包锌矿奠基仪式。巴特也陪同总统出席了仪式。之后,总统一直关心锌矿进展情况,通过他向我询问有关情况,我都将项目的进展及时向总统进行了通报。

巴特多次向我表示,蒙古很感谢中国给予的援助。他认为中国的援助是真诚的,不附带任何条件,世界上这样的国家不多。他对蒙国内有人传播所谓“中国威胁论”给予驳斥。他多次说,只有同中国加深合作,蒙古才能得到发展。有些人在那里光说不干,这也批评,那也不满,其实这种人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得不到。如果按他们说的办,蒙古将继续贫穷落后下去。一些人自诩是“学者专家”,但他们根本不懂得蒙中合作有许多互补性,具有很大潜力,合作的结果是取得双赢。

2003年我退休回国后,还保持了与巴特老友的联系。他路过北京时,我们见了面,大家都很高兴。我像过去一样询问蒙古国又有什么变化,我的一些老朋友近况如何。后来他告诉我已被任命为驻保加利亚大使,我表示真诚的



祝贺。即将赴任的前两天,他给我来电话,告诉我要走了。我希望他如有机会再到北京看看。我真诚祝福他“一路平安”,在新的岗位上捷报频传。



“金刚石”阿勒玛斯

阿勒玛斯,在俄语和蒙语中是“金刚石”,顾名思义,是刚毅、强硬的意思。我的好朋友阿勒玛斯确实名如其人。他个子不高,但十分粗壮,浑身是肌腱,“硬邦邦”的,充满了力量。

他不是喀尔喀族,是达斡尔族,属“少数民族”。在我国,达斡尔族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和新疆等省和自治区,在蒙古国达族更是少数。阿勒玛斯年轻时曾在我国东北“满洲国”当兵,既懂日语,又懂汉语,中、日文能写会说,均有较高水平,是一个难得的翻译人才。

阿起先在蒙古和平与友谊组织联合会(简称“和友联”,相当我国的对外友协)任蒙中友协理事(在蒙日友协兼职),与我使馆联系颇多。我馆在中蒙节日期间均组织各种活动,阿经常充当翻译。他翻译时流畅的中文和地道的蒙文,使我们与蒙古人交流没有任何障碍。他之所以能有高超的翻译水平,得益于曾在中国东北生活过。与当地老百姓混熟了,中文自然说得流利。由此可悟出一个道理:不在当地与老百姓一起“摸爬滚打”,就难以学到地道的外语。他不仅说起中国话很“溜”,而且会说我们的骂人话,让人惊叹不已。翻译中,他能在第一时间选择一个恰当的词语来表达意思,这就比我们这些单从书本中学出来的翻译官明显技高一筹。所以我们都佩服他,当翻译中遇到难题时经常当面或打电话请教他。他总是慷慨地给予帮助,使我们屡屡顺利渡过“难关”。

1982—1983年,我俩参加了两国第一次边界检查联委会的工作,并一起分到了技术组。这样一来,我们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有时为了谈判,一个月要见上几次面。无疑,他是我们小组中的“活宝”。他热情幽默,风趣横生。小组里有了他,气氛就变得活跃起来。他常常拿专家拉格查寻开心。因拉的名字前面字母的发音带有颤音,他叫拉时往往变成“阿拉格查”,逗得大家笑

得前仰后合。

经过在边界联检技术组工作的接触,我与阿成了好朋友。我了解了他的不少情况。妻子因病去世后,他又找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舞蹈老师其其格玛。他们组成的新家和谐美满,其其格玛与他原来的孩子们关系融洽。阿夫妇多次邀请我到他家做客。可以说,阿是20世纪80年代两国关系开始恢复时期第一位“勇敢地”邀请我馆外交官到他家做客的蒙古友人。阿除了用蒙古人特有的羊肉包子和饺子招待我们外,还特意炒了一些我们爱吃的“中国菜”如青椒肉丝、木犀肉等来招待我们。到了他家,犹如到了中国老百姓的家,客厅和橱柜里到处可见地道的中国商品,如中国瓷器、漆器、茶具和木制家具等,倍感亲切。在他的家里,一边品着中国茶,一边看着照片,一边回顾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一起工作时的情景,十分惬意。特别是看到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取得的进展,憧憬着未来,心中无限感慨。这时,屋子里洋溢着兄弟般的情谊。

我们的友谊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我当大使以后,阿因年事渐高,早已不在和友联工作。退休后,他经常到中国和日本旅游,会见老朋友,也联系一些商业业务,或去学校当教员。他仍然十分关心两国关系的发展,不忘我们之间的情谊,关注两国文化交往情况和我们使馆人员的变化。每逢中蒙节日前夕,他都主动给我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主动组织老朋友的聚会,并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他知道我工作十分忙,一般都在中午或晚上给我打电话,且语气都十分客气,生怕耽误我的时间,影响我的工作。作为老朋友,我从不拒绝接他的电话。有时确因工作太忙无暇交谈,也会再约个时间通话。所以,我在蒙古工作的最后一个任期内,仍然保持了与阿的联系。我每次在使馆举行大型招待会,都邀请阿出席。在我任大使期间,多次将阿和其他参加过边界联检谈判的朋友们请到使馆团聚,共叙友情。通过他们,我了解了许多蒙古的“民情”。直至我退休后,我仍然同这些老朋友或他们的亲属保持了联系与交往。我为有这些可爱的蒙古友人而骄傲!



测绘局长拉格查

拉格查就是阿勒玛斯常说的大名鼎鼎的测绘局长,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在我的蒙古朋友中,拉是个比较典型的蒙古人:颧骨高高,眼睛较小,嘴巴不大。他博学多才,口才甚佳。说起话来,口若悬河,用词严谨,幽默风趣。我们是在边界检查联委会会议上相识的。由于我在技术组任翻译,而拉又是技术组的主要成员,他发言最多,因此我最早熟悉他。更让我特别敬重的是他为人耿直不阿,敢于直言的性格。对于他来说,第一次联委会时两国关系的现状可想而知,尽管两国关系处于低潮,但他很乐观,对前景寄予很大期待。会谈休息时,他又是蒙代表团的另一个“活宝”。除了和阿勒玛斯打闹外,他常常讲些笑话,或名人轶事,语出惊人,逗得大伙儿笑声连天。

技术组的谈判有时遇到一些关键的问题,双方各不相让,谈判气氛显得很沉闷。就我们翻译而言,用的词往往就这么些,老在那里重复“倒腾”,感到有些乏味。就在此时,拉就拿出他的“绝活”,引经据典,讲些笑话,使会场的气氛立马活跃起来。拉是测绘专家,双方谈判时蒙方一些关键问题最终由他“说了算”,会谈议定书蒙方稿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也是他,他经常要拿主意。所以他总是显得“骄傲”而自信,在决定重大问题时他要“咬文嚼字”,提出一些“决定性”的“权威”意见。

他为人谦和,对部下人员很和善,对中方代表团人员也很尊重。在谈判过程中,拉亲身感受了中方的诚意,他多次表示,政治原则问题双方都应坚持,但在一些非原则的、细节的问题上可以互谅互让,这样才能使谈判顺利进行下去。在他的倡导下,蒙代表团中国科学院、军队和外交部等部门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拉的性格特点使他成为我们代表团的好朋友好伙伴,增加了我们对他的亲近感和信任感。会议结束后,我们相约以后在乌兰巴托相聚。

2001年冬我任大使期间,他曾几次试探能否请我到他家做客。我想,我们是老朋友,没有问题。于是,我和阿勒玛斯相约到拉的“冬营地”做客。这是乌兰巴托郊外大概30公里远一个山坳内的两个蒙古包。由于下了雪,路特

别滑,我没穿防滑鞋,几次差点滑倒,经过“千难万险”才找到他的家。刚一趋前,一条气势汹汹的狼狗汪汪吠叫,欲向我们扑来。说时迟,那时快,主人立即出来叫住狼狗,把我们引进了热气腾腾的蒙古包。一杯茶,一口奶食品,我们拉起了家常。聊天漫无边际,天南地北。热烈的交谈把我们带回到20年前的边界联检的其人其事,从中国和蒙古各地的见闻,中国和蒙古朋友的近况,到两国关系的前前后后。当然这顿饭总少不了奶茶、“阿尔黑”、羊肉和包子。

席间,拉谈起了20世纪80年代我曾到他在市内的家中做客的情景。我当然没有忘记。那是一个普通公务员两室一厅的标准住房。在这里,一瓶“阿尔黑”,一碗奶茶,一盘“手扒羊肉”,我们促膝交谈,亲密无间……在中蒙两国关系尚未正常化的时期,邀请一个“非友好”国家的外交官到家中做客,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勇气的。后来,拉为此遇到过一些麻烦,但他坦然面对,不以为意。拉说:“中蒙人民都是友好的,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退休离开测绘单位后,拉到一所大学任教,教的仍然是他的老本行。与我见面时他不忘送给我一件“礼物”:一幅最新版的蒙古地形图。这是我所需要的珍贵礼物。

通过与拉的交往,我对他的为人更加敬重。他不仅是一个精通业务、治学严谨的测绘专家,而且是一个具有正义感、值得信赖的人!正是有无数像拉格查这样的蒙古朋友用自己的行动为中蒙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默默地工作,日复一日地添砖加瓦,才使中蒙关系的大厦更加牢固和坚强,迎来今日美好的艳阳天。



蒙古的“赵忠祥”

在当今蒙古电视台,最有成就、声望最高的资深广播员和节目主持人要数巴特巴亚尔了。这位起先当广播员后涉足电视界的著名主持人嗓音洪亮,吐字清楚,充满激情,每逢蒙古或政府发生重大变动,需要发表重要文件或新闻消息,大都由他播音。我最先是从广播中“认识”他的。每当听到他那带有磁性的浑厚的嗓音,觉得很带劲,总有一种模仿和学习的冲动。为使蒙语学得更



像,于是我就录下他念的许多精彩段落,然后对照报纸大声朗读,学习他的语调语气,同时咀嚼文章的内容。就这样,巴特巴亚尔早就成为我“熟悉”的老师。

我一直很想能当面请教他,但遗憾的是,我并没有认识巴的机会。直到2003年一个外交场合给了我机会。当同参加活动的蒙古朋友握手时,我一眼便认出这位在电视中常出现的面孔。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巴说:“大使是我们蒙古人民熟悉的朋友。”我说:“你是蒙古著名的广播专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是蒙古的代言人。你也是我的蒙语老师,我早就认识你了!”他说:“不敢当。也可以说我早已认识你了。在蒙古估计不认识你的人很少。”

我给他介绍说,我们使馆的同志把他叫做“蒙古的赵忠祥”。接着我向他解释了原因:我国有一位家喻户晓的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叫赵忠祥,最初他也是个广播员,也有很洪亮的嗓音。我说,你在蒙古电视台中的地位与赵忠祥先生在中国电视台中的情况很相似。他听后哈哈大笑。我说,我们之所以把他比作中国的赵忠祥,说明他在蒙古荧屏和媒体舆论界的知名度和广播水平之高。第一次谈话,我们谈得很投机,真有点相见恨晚之感。此后,我们相互邀请出席对方的活动,我还请他到使馆做客。

每年中国国庆前夕,我在电视台用蒙语向蒙古观众发表谈话,大多都由巴来主持播发。一次播发前,他告诉我,能在中国国庆这样的重大节日前播发大使的讲话很荣幸,“我一定会用饱满的热情播好音。”巴对我说,作为一个广播员和节目主持人,能够亲自为增进蒙古和各国人民的友谊而工作,感到十分荣幸。他在台内也主张增加介绍友好国家如中国、俄国等国的建设成就及先进经验的栏目和内容,更好地发挥电视媒体的宣传效果。

巴的夫人眼睛不好,希望到呼和浩特医治。我得知后马上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外办联系,安排他夫人去呼市治疗。经治疗后,他夫人的眼睛有了好转。回乌市后不久,巴带着夫人和孙子来我馆做客,对我表示谢意。实际上我为蒙古朋友联系到国内治病的次数很多,数也数不清,这都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我又一次能为我的蒙古朋友做了一件好事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我离开蒙古前夕,巴特巴亚尔专程赶到使馆为我送行。他送给我一条象征吉祥如意的黄色哈达和一个十分精致的马头琴。

我问巴,一般蒙古朋友都送蓝色哈达,为何他送一条黄色的呢?他解释说,黄色在蒙古来说也是吉祥的颜色,黄色的哈达表示对有知识有学问的年长者的最良好的祝愿,并说:“马头琴是蒙古族最具特色的乐器,但愿马头琴使您

的退休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如今,这条黄色的哈达和马头琴就在我的身旁,每当看到它们,我又想到那个声音浑厚的蒙古“赵忠祥”!

曾在使馆文化处工作的北京大学姚克成老师告诉我,去年蒙古举行了一个“特殊”的活动——庆祝巴60寿辰的文艺晚会,活动盛况空前,出席者尽是文艺传媒界的知名人士,由此可见,巴在蒙古的影响是多么大!我在北京遥祝巴特巴亚尔先生健康长寿,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



“中国通”尼玛苏伦

在蒙古外事部门的中文翻译中,论翻译水平和实践经验,尼玛苏伦当属首屈一指,无人能超越他。尼毕业于蒙古国立大学中文系。他十分勤奋,经过长期的实践,中文造诣相当高。他先后在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邻国局、驻华使馆任职,并在人革党中央任负责中国问题的巡视员(相当于司局级干部)。由于长期工作的磨炼,他成了一个出色的中文翻译。他中文讲得很地道,能掌握丰富的汉语词汇,甚至谚语,加上有比较博学的知识,这就使他翻译起来如鱼得水,成为蒙古国少有的“中国通”。

我是在驻蒙使馆工作时认识尼玛苏伦的。我陪大使或参赞会见蒙外交部或人革党领导人时,尼当蒙方翻译。后来我回到外交部亚洲司工作,他又陪同蒙人革党代表团访华。就这样,一来一往,我们接触的机会很多。

论年龄和资历,尼都可以称得上是我的前辈和老师。借工作之便,我经常向他请教有关词汇的中译蒙或蒙译中的翻译方法、一些蒙语词义,有时还就某些蒙古人和事向他请教,我的要求他都一一予以满足,并给予详尽的解答。尼是一个诚恳正直的人。他经历了中蒙关系的风风雨雨,世事沧桑,日转星移,他对中蒙关系的过去有深刻而独到的认识和见解。他常常用向前看的观点看待双边关系,对双方合作的发展持积极的态度。他既对我文革时期的极“左”做法,如我“红卫兵”砸蒙古驻华使馆汽车和殴打蒙古司机的行为表示厌恶和反对,同时对当时蒙古什么事情都跟随苏联表示不敢苟同。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20世纪90年代后,两国关系转暖,两党关系恢复,人员交往增加,尼对此十分高兴。每当他访问中国回到蒙古,都主动向蒙古民众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北京等地日新月异的变化。尼在驻华使馆任参赞期间,突发心肌梗塞,由于抢救及时,他转危为安。为此,他不止一次地称赞中国大夫的高超医术,并激动地称是中国大夫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回国以后,他更积极地做促进两国关系的事情,为中蒙关系的发展续写新的篇章。1999年江泽民访蒙时,年过七旬的尼玛苏伦宝刀未老,再次“出山”,充任蒙方翻译,圆满地完成了谢幕之作。

尼在蒙外交部邻国局工作期间,为促进年轻翻译人员的成长,在他的倡议下同我使馆联合举办了一个翻译技巧研讨会,就中蒙文互译中存在的问题及翻译方法进行了研讨。我作为使馆参赞也参加了会议并结合自己多年工作的体会发了言。双方在会议上列举了大量例子,对翻译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剖析,特别是将对方翻译时出现的错误、不妥之处和解决的办法向对方作了详细的说明。年轻人反映,这样的研讨会很及时和有效,是一个能立竿见影的会议,对年轻干部的成长很有益处。

如今,尼玛苏伦可以安心在家颐养天年。因为蒙古各个部门新一代的中文翻译人员已逐渐成长起来,堪当大任。他所孜孜以求的中文翻译事业后继有人,他应该感到欣慰。



学者外交官楚龙·达赖

这里说的达赖并非14世达赖喇嘛,而是蒙古著名历史学家,他的全名叫楚龙·达赖(父亲叫楚龙)。达赖精通清史,著有五卷本《蒙古通史》等著作,现任蒙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他也是一个汉学家和外交官。20世纪60年代我在北大攻读蒙古语专业时,达赖正好在北大历史系留学,比我高两届,我当时就认得他,但接触不多。“文化大革命”时期,达赖在蒙古驻华使馆任外交官,亲眼看到我国“文革”初期“红卫兵”对外国驻华使馆的极“左”行为,对此他明确表示反对。回国后,他按国内指示,写了一些批评我国政策的文章。

对于此,他并没有回避。他曾对我说:“在当时两国关系的政治背景下,大家都要按上级指示去办。”

中蒙关系正常化以后,他多次应邀访问中国,到了我国许多地方,对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表示敬佩。他说,中国现在是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富足,社会安全稳定,形势一片大好。情之所至,他在蒙报纸刊物上发表过一些介绍我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成就的文章,并接受记者的采访,谈及其在中国留学和工作的情景,对向蒙古人民宣传中国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我们见面时,达还几次回忆起20世纪50年代他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的场景。他说,在蒙古曾受过毛泽东主席接见的人并不多,他感到十分幸运。尽管已过了数十年,至今仍很动情,他的讲述也深深地打动了我。

上个世纪80年代,达赖再次被派到蒙驻华使馆工作,而我正好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同他接触较多。达对人直率和开诚布公,我们可以就两国关系、历史问题以至文化交往等自由地交换意见。他明确表示,对历史问题两国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应加强交流和沟通,这不应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记得在他离任时我们设宴为他送行,谈得很热烈,我们相约在乌兰巴托再见。

90年代以来,达曾在乌兰巴托大学任教,组建过东北亚研究所,也曾在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研究的领域很广,但从未离开过对中国的研究。他的女儿也学中文,也搞中国的研究。这一切都归功于达赖先生的“中国情结”。

近年来,蒙古与“台湾”人员来往增多。达赖作为学者也应邀到台访问讲学并进行学术交流,发表有关成吉思汗及历史问题的演讲。关于台湾问题,我们曾进行过直截了当的讨论和争论。我多次提醒他应注意台方利用“学术活动”的幌子达到其政治目的。对台湾之行,他没有向我们隐瞒,每次见到我,都主动向我介绍在台活动情况。他强调台湾之行纯属学术活动,绝无政治成分。他说,台湾的发展不能与大陆相比,他接触的台人士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不赞成台湾搞“独立”,实际上主张搞“台独”的只是极少数。

毋庸讳言,达赖是个历史学家,他的史学观点和看法与我国学者存在分歧。但我们在两国关系和国际形势等重大问题上也有不少共同点,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在与他的交往中,并未因学术观点不同而影响我们的友谊。达对中蒙两国文化交往作出了许多努力,是有贡献的人。他对我馆及对我本人也有过不少帮助。我为结交了一个学者外交官的朋友感到高兴。



蒙古“体育之父”玛格旺

沙格达尔扎布·玛格旺绝对是当代蒙古的名人，全国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扎布汗省人，生于1927年，毕业于国立大学师范专业。曾在扎省任省委第二书记、人革党中央组织员和巡视员等职。1965年开始从事工会工作，1969年涉足体育领域，任国家体委主席和蒙古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1977年起当选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从此，这个创立了蒙古国家奥林匹克组织的老人同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为蒙古的体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获得多枚勋章与奖章，并在世界体坛代表蒙古从事体育友好交流事业。他往返于世界各国，成为体育友好使者和蒙古的“体育之父”。

20世纪70年代，我馆文化处负责两国体育交往，与玛交往颇多，我经常当翻译，自然就认识了玛。后来，每逢双方的节日，我馆与蒙体委相互祝贺并邀请对方参加我馆组织的活动。遇上老人寿辰，我们登门送上生日蛋糕表示祝贺。

玛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体育事业的发展表示由衷的钦佩。他还多次提到会见我领导人的情景。1993年9月，江泽民主席接见了玛，他深感荣幸，把江主席接见的照片放在自己撰写的专著《了解世界的奥林匹克之路》中，并多次向我自豪地叙述当时激动的情景。

中蒙山水相连，开展文化体育交流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互补性。90年代以来，在玛格旺先生和蒙古奥委会主席扎格德苏伦先生等体育界人士的大力倡导下，中蒙体育交流蓬勃地开展起来。中国篮球、排球、国际象棋、自行车、摩托车等项目的运动员先后到蒙古访问比赛；蒙古摔跤、柔道、射击运动员也分别赴华比赛。这些互访，有力地促进了两国体育水平的提高。在玛的推动下，蒙古属于先进项目的摔跤、柔道教练曾到我国工作，帮助我提高运动水平。

作为中国的近邻，蒙对我国申办奥运会持十分积极的态度。因为蒙运动员到中国很方便，可大大节省各项经费，且双方可以组织运动员到对方国家培

训,有更多的交流机会。蒙古朋友说,中国如果申奥成功,就等于蒙古申奥成功,蒙古人民一样高兴。早在1993年我国首次提出申奥时,蒙方就全力支持。玛格旺先生表示将在国际奥委会范围内作出努力,也希望中方通过自己的工作争取更多成员国的支持。他还不断地向我们通报有关申奥的进展情况,以便我们掌握。那时候我们都认为蒙古的一票是最有把握和最可靠的。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在“只差一步到罗马”的情况下战至第4轮少悉尼2票,首次申奥以失败告终。玛先生同我们一样对这个结果感到十分遗憾。事后玛向我们介绍了有些国家“倒戈”的“内幕”,我们听后都十分气愤。

时光过了8载,2001年,中国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再次开展申奥工作。这一次,中国的国力更加强盛,并做好了更多的筹办准备工作,我们的支持者更多。这一年4月,我在使馆宴请玛格旺先生时,他再次表示蒙方立场不变,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中国申奥,我对他一贯的支持表示感谢。此后我继续不定期地与玛接触,了解有关申奥的进展情况,玛先生继续在国际奥委会为中国申办而作出努力。他告诉我,他找过许多奥委会的朋友,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

2001年7月13日,是永远难忘的、激动人心的一天。当天晚上,我们使馆全体同志在大礼堂集中观看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体会议决定奥运会举办地的投票实况。当萨马兰奇主席宣布2008年奥运会由中国北京举办时,整个大使馆沸腾了!我们大家都忘情地相互击掌,拥抱,欢呼雀跃,打开了香槟酒,为祖国,为北京干杯!正在此时,我的手机响了,谁来的呢,我已经预感到是谁,果然是他,一个可敬的蒙古老人!

“黄大使,你好,我是玛格旺,我现在莫斯科,你已经知道投票结果了吧!”

“玛格旺先生,您好,我们刚刚看了现场直播,我们知道结果了,很鼓舞人心,太高兴了!”

“是的,这是个十分令人兴奋的特大喜讯!所以我要立即去电话告诉你。这次中国很幸运!”

“对。我们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取得成功。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蒙古人民的胜利。”

“完全正确。这是我们共同的胜利!我要向你们表示祝贺!”

“谢谢!我要代表中国人民,代表中国大使馆全体人员向蒙古国有有关部门,特别是向玛格旺先生您致以崇高的敬意,并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接到电话后,我立即向在场的所有同志们转达了玛格旺先生的祝贺。整个礼堂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每当我看到2008年筹办奥运的最新消息,都会想到2001年大使馆申办奥运时的日日夜夜和那激动人心的一天,也自然要想到玛格旺先生为此作出的杰出努力和贡献。

此刻,玛格旺先生赠送给我的著作《了解世界的奥林匹克之路》一书就放在我的桌前。我望着封底一幅玛格旺先生的照片,仿佛又重遇这位饱经沧桑的八旬老人,听到他铿锵有力的讲话,看到他和蔼慈祥的笑脸。敬爱的蒙古“体育之父”,祝您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同行“老普”

“老普”,这是我们对他的“爱称”。他的名字叫普勒布扎尔格勒,一个很长的名字,蒙文的意思是“星期四幸福”,改这个名字,大概是因为他在星期四出生的吧。对于不懂蒙文的人来说,蒙古人的名字确实很难记。但只要懂得他的含义,就不难记住了。由于名字太长,我们喜欢按中国的习惯称他为“老普”。

老普比我小六七岁。他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驻华使馆为蒙通社(蒙古通讯社)记者当翻译。开始时由于在苏联学的是书面语,口语说起来较吃力。后来实践多了,就熟练起来,进步很快。由于他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被分配到外交部,从此中国外交部亚洲司的“黄”和蒙古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局(后叫亚洲二局)的“普”两个同行之间就建立了经常和紧密的联系。在整个80年代,我俩几乎同时任两国领导人、外交部和其他部委代表团的翻译。一次我应邀到普的家中做客。普拿出了他任翻译时的一本影集,一看照片,我也很惊奇,这些照片同时也是我的“工作照”,照片中“我中有他,他中有我”,我俩都坐在领导人的后面充当翻译,这也是中蒙友好关系的写照。

由于同时出任双方翻译,作为同行,我们个人关系很好,经常相互切磋,取长补短。我遇到不太好翻译的地方都向普请教,普有一些不明白的问题也经常问我。在一场场翻译现场中,我们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很好地完成了各自的任

老普个头不高,近视眼,学者型,说话慢条斯理,对人诚恳坦率,做事认真真,工作兢兢业业,是个十分随和而又守纪律的人。作为外交部工作人员,他绝不会随便向我们介绍一点“内部情况”。我们深知他的特点,都不会令他“难堪”。但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为难事的时候,普都毫不犹豫地给予我们以帮助。

据我所知,普对外交工作认真负责,但对个人的职务升迁却从不刻意追求。当和他同时工作的同志职务得到升迁时,他并无怨言,服从领导的安排,表现出很高的素质。我在蒙古任大使期间,他同时在驻华使馆任公使衔参赞,当使馆的第二把手。回国以后,以他的资历完全可以提为邻国局的副局长,但由于某种原因,过了一段时间才得以提升。听说他最近再次被任命为驻呼和浩特总领馆的第二把手,职务还是参赞级,没有提升,他再一次毫无怨言地服从了。这就是我认识的“老普”,一个朴实无华、忠于职守的外交官,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蒙古同行。

普的夫人诺尔吉浩尔洛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很凑巧,她与我的夫人又是同行,都是搞幼儿教育。两人认识后谈得很投机。在普夫人的引领下,我馆的妇女同志们兴致勃勃地到蒙的一些幼儿园进行参观,了解了蒙古幼儿教育的近况,为进一步开展交流打下了基础。如今,她已是蒙教育科学文化部一个很有成就的儿童教育专家,写有若干有关教育的专著,同时她在家庭教育中也是个很具权威的家长,孩子们在她的教育下已长大成人。



我们的朋友遍蒙古

在这里我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1999年5月7日,发生了美机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这样震惊世界、耸人听闻的事件。美机的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义愤,也受到世界舆论的同声谴责。我部在第一时间组成了代表团立即奔赴南斯拉夫处理有关事宜。代表团要乘专机前往,为此要立即向蒙等有关国家申请飞机飞越领空许可。外交部发来特特急电,指示我馆要在当晚24时以前办妥并报回国内。



这一天是星期天,蒙各机关都休息,不办公。怎么办?齐治家大使召集我们商量,指示我们务必完成这一“特殊”任务。办法只有一个:及时向蒙有关人员进行解释,依靠各方面朋友的关系,通过“非正常”途径完成任务。

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是武官处同志找国防部一位老朋友,通过他找到负责审批飞机过境事务的官员联系,让他们同意先口头审批,后再补发照会。另一路由时任政务参赞的我和研究室同志一起找外交部邻国局局长阿尤尔扎那,通过他与礼宾司主管人员联系,同国防部一起火速履行审批手续。说时迟,那时快,9点多钟,我们就分头出发了。

到了阿局长家,真不巧,他到了郊区度假。邻居也不知他到了哪里,这下子我们没辙了。幸亏办公室的同志认识礼宾司负责此事的老朋友,立即转向他的家。几番周折,在半路上把他“截获”。我们立即到了外交部。有这位老朋友,事情就好办多了,他立即与国防部主管官员进行联系。由于武官处预先做了工作,对方答应先口头审批,次日再补发照会。

从早晨忙到黄昏,当夕阳西下时,我和我的蒙古朋友都累得满头大汗。为酬谢蒙古朋友的支持与帮助,我们在日本“花”餐馆设“便宴”招待了所有蒙古朋友。在一片“干杯”声中我们为完成这次“特殊”任务而欣慰。当晚,我馆准时将蒙方同意我飞机过境的消息报告了国内。

这次完成紧急飞越领空申请的“特殊”任务的过程,使我们深切体会到广交朋友十分必要。在国外,没有朋友,几乎是寸步难行。

我们为开展交流、加强友谊来到蒙古。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结交了许多蒙古朋友,拥有十分“珍贵的财富”,这对我们的工作大有裨益。

说起我的蒙古朋友,真是数也数不完!当我们使馆馆舍的水电遇到问题,我们得到外交部服务局局长伊娜女士为首的朋友们的帮助;当我国公民在蒙古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立即找到外交部领事司和以布彦巴达拉赫为首的移民局朋友,问题逐一得到解决;当我们的留学生在学方面存在困难时,我们得到教育科学文化部部长仓吉德等朋友的帮助;当中资企业经营中遇到具体问题时,我们得到贸易工业部和有关职能部门的及时照顾;当我们需要采购大量食品和物品时,又得到蒙古各大商场和超市的大力支持;当我们需要将一些大件物品托运回国时,又是乌兰巴托车站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给予了方便;当我馆有同志生病时,部长医院的医护人员真诚地给我们诊治;当我们到外地访问时,我们又结识了许许多多给予我们具体帮助的朋友……总之,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朋友遍蒙古!

第二十章

故地重游



一个创意的诞生

2003年9月,受蒙中友协的邀请,我国前驻蒙古国的5任大使组成一个“友好代表团”到他们曾工作和生活过的国度进行访问,故地重游。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成为中蒙友谊的佳话。

这个“故事”的“始作俑者”就是蒙中友协主席、蒙著名音乐家、作曲家姜仓诺罗布先生。姜原是蒙中友协副主席,蒙古前议长额奈比希先生去世后,接替此职。

姜仓诺罗布先生是当今蒙古乐坛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他又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写有多部交响乐曲和马头琴协奏曲。他的女儿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马头琴独奏演员。2003年五六月间,姜突然萌生了一个创意:蒙中友协决定邀请历任驻蒙古国大使来蒙古访问,故地重游,让他们看看蒙古经济社会发生的变化,会见蒙古老朋友。我对此建议表示赞赏和积极支持。把所有能走得动的前大使请到蒙古,是一件好事。这些大使都是我的前辈和上司。他们已离开蒙古多年,最长的达20年之久,最短的也有4年多。此期间蒙古变化很大,他们都很愿意再到蒙古来看看。当我们把这个决定告诉他们时,他们都很高兴。我决定通过大使基金资助蒙中友协,促成此行。

事情进展顺利。7月9日,蒙中友协执行秘书米德策耶来馆见我,具体商谈大使团来蒙事宜,双方商定于当年7月29日至8月5日来蒙。具体活动有:到蒙中友好县——龙县参观,会见外交部老朋友,在乌兰巴托市游览市容,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蒙总统接见等。



7月16日,其突然来馆见我,转达了姜主席的歉意。姜因患脑动脉硬化需到北京住院治疗,我表示理解,决定将大使团访蒙推迟一个月。

就这样,先产生一个创意,又筹划一个全新的计划。经过双方的努力,即将付诸实现。



我的老前辈

我的老前辈——前任大使们都是资深外交官,长期在外交部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他们坚决服从组织调动到蒙古工作,在蒙古工作期间恪尽职守,孜孜不倦,为中蒙友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而辛勤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每一位都有许多感人的“外交故事”。

孟英大使是最年长的副部级大使,他于1978—1985年任第7任驻蒙古大使,现为中蒙友协会长。20世纪50年代他曾任驻蒙使馆参赞,后任驻中非大使。我曾在孟大使手下工作。他主张广泛与蒙古朋友交往,主动学习蒙语。他治学严谨,对部下要求很严格,重要的文电都要亲自字斟句酌地修改。至今,孟老的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仍是我们所提倡和学习的榜样。孟老已是九旬老人,精神矍铄,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当我询问他身体如何保养得那么好,他说坚持运动锻炼和活动腰腿,这就是“秘诀”所在。

李举卿大使是第8任驻蒙大使。如前所述,我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5年,受到他的直接教育和帮助,得到许多锻炼。他在工作中坚持原则立场,又善于运用策略,体现出一个老外交官的坚定和睿智。

张德麟大使是第9任驻蒙大使,也是学蒙语的第一位大使。他祖籍河北,长在上海,说话略带一点南方口音,性格融合了南方细腻和北方的刚毅。他就读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后留学蒙古国立大学攻读蒙语,毕业后与同班同学乌嫩一起分配到驻蒙古使馆工作。之后,他们终成眷属,成为使馆蒙语的骨干力量。张大使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手把手地教我学蒙语,教我搞调研,也教我做人。蒙古人称他会说“最地道的蒙语”,“说的蒙语比蒙古人还强”。特别是他对蒙语的语法和遣词造句很有研究,造诣颇深。至今在我保存的学习资料中

还有经张大使修改的蒙语文稿,我一直作为范文来阅读。

裴家义大使是第10任驻蒙大使。他也是河北人,朝语专业,是朝语的“高翻”,朝语界的“权威”之一。来蒙古工作前,我有幸与他夫妇同在亚洲司一处工作。他熟悉朝韩和朝鲜半岛事务,多次被派驻朝鲜使馆工作,曾任政务参赞、驻韩联络处首任副主任。特别令我感动的一件事是,由于我家庭出身等原因,直到80年代初仍未加入中国共产党。裴大使夫妇离京去平壤使馆工作之前特意向亚洲司一处党支部提出了重点培养我入党的建议,可见他们对年轻同志的关心。长期的调研工作使他在文字方面有深厚功底。我们写的调研材料经他修改后,增色不少。他在文稿中只需加一个词或一个字,便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令人拍案叫绝。

齐治家大使是第11任驻蒙大使。他学的是缅甸文,曾在驻缅甸使馆和泰国使馆工作。他过去没怎么接触过蒙古事务,来蒙古之前,看了很多书,作足了各方面的准备。他能准确无误地将蒙古人长长的名字说出来,可见其下的工夫之大。他的钻研好学精神也为人称道。他过去曾任办公室主任,主管过礼宾工作,具有十分丰富的经验。我馆接待江泽民主席访问蒙古时,齐大使指挥若定,胸有成竹,很好地发挥了组织者和指挥者的作用,圆满地完成了接待国家元首的任务,受到国内的来电表扬。



回“娘家”

经过双方精心的策划和准备,由孟英大使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将要抵达乌兰巴托。

9月中旬的蒙古已进入秋天,以往到了此时早已秋风瑟瑟,寒气袭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那么多“友好的使者”要来蒙,这一天天气特别暖和,天公也变得特别慈祥与和气。9月12日,万里无云,微风吹送,季节整整推迟了半个月。蒙古国以热情的笑脸欢迎曾经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大使们。

中午12时,代表团抵达布彦特乌哈机场。我与夫人何思红和蒙中友协执



行秘书其米德策耶到机场迎候。

代表团下榻在一家私人旅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蒙古私人开设的商店、旅馆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旅馆的主人知道是前任大使来蒙都表示十分欢迎,并给予了优惠。客房安排在二层标准间,房子虽不大,但干净整洁,窗明几净,周围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大使们住下后感到很舒适。

13日,第一场活动开始,我们把大使们请回了“娘家”。使馆全体同志在主楼前厅欢迎我们尊敬的老前辈们,我首先向大家逐一介绍了他们。

接着,我们卖了一个“关子”,没有直接安排大使们进楼内,而是在院子里散步,“游览参观”。他们已多年没有来蒙古,院子内的变化使他们惊异。整个院子成了一个工地。近年来,在外交部的关怀下,我们馆作为旧馆开始了新的建设。原来馆员宿舍即“后楼”已全部拆掉,在院内锅炉房前面建起了两幢馆员公寓。在室外篮球场以南建设的领事部签证楼已建成交工,在原食堂基础上建设的大使官邸正在动工。为满足馆员的文化需求,按计划在原“后楼”基础上施工的多功能体育馆正在挖地基。考虑到蒙古蔬菜和水果供应已不成问题,院子原来的菜地计划改成绿地。大使们看到这一切变化都异常兴奋。为了看个具体实例,王福康参赞还带领大使们到公寓楼内参观了他的“家”。这些面积70至100平方米的公寓房,室内家具电器等一应俱全,具有单独接待外宾的条件。大使们想起了原来的“后楼”,经历几十年的“洗礼”,已显陈旧,部分地板已塌陷,不改造不行了。大使们说,外交部领导果断决定,破旧立新,是英明的决策。如今的公寓设备比较超前,为馆员创造了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是部领导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

接着,大使们去看了新的锅炉房。我馆原是旧式烧煤锅炉,这种锅炉污染严重,蒙方已多次提出改造建议。部里为关心馆员生活,决定改现锅炉为烧油锅炉,为此建起了新的锅炉房。改造后经费虽增加了不少,但更符合现代化要求,卫生状况明显改观。当夫人们看到暂时存放在锅炉房内的一些旧衣柜时,一下子就认出是从大使宿舍房中搬出来的。为不错过这一难得的机会,夫人们在衣柜前面留下了合影。

从院子进入“前楼”即主楼后,我带领大使们走上二楼东侧大使宿舍“综合体”进行参观。这是大使们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他们当然很熟悉。

进入大使办公室,他们兴致很浓,对各种陈设仔细端详。大使们看到,办公桌后面的一排书柜已全部换成新的。历任大使用的办公桌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只是换了把“老板椅”。房间的沙发因太旧已换成新的。年代不同了,

电视机和电话都已更新,电话机是数码的,可直接与国内通话。来到办公桌前,大使们自然而然地坐在了椅子上,我立即请使馆同志“抢拍”了下来,让每位大使都留下一张“标准相”。

主楼一号会客室,历任大使都在那里会见客人,是主要的对外场所。现在的布局是“土洋结合”,既有大幅中国的山水画,又摆放着西方色彩的皮沙发。我还利用红木家具开辟了第二会客室,这里具有古色古香的特色。明、清时期的官窑古瓷器,墙上挂的描绘春夏秋冬四季的国画衬托出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氛围。

一层东头会客室对面,是个中型宴会厅。大使们都说认不得了,感到很新鲜。原来这里是电影放映间,现把它和隔壁的仓库连起来扩建为可接待20多人的中型宴会厅。进入厅内,几盏中式的大吊灯马上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过去没有此宴会厅时,凡超过10人的宴会都要在等候厅举行,现在有了此厅,比以前方便多了。现50人左右的宴会才在等候厅举行。以后大使官邸落成后,大型的宴会又将移在那里举行。随后,我在这间宴会厅以基围虾、牛羊肉、猴头蘑鸡及稀饭、面条等家常饭招待了各位国内来的“特殊贵宾”。



与媒体接触

大使团来访的消息不胫而走。早在8月份的报纸上,就开始有这方面的预报。报道说,此次大使之行包括了从1978—1999年在蒙工作的大使,此举在蒙外交史上“实属罕见”。蒙报把此次访问称为“友谊使者之行”。我觉得这样的比喻很贴切。

大使们活动的第一天,各报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采访。《日报》女记者额奈勒尔赶在代表团到后的第二天就同大使们见面,请他们畅谈重回蒙古的感想。下面是《日报》刊载访谈录的片段:

孟英:我50年代在蒙古工作时,俄中、蒙中关系都很好。中国刚解放不久,正在加紧建设。蒙古经济发展速度较慢。这个时期两国元首进行互访,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以后有一段时间关系不太好。1992年以后,在国际关



系变化的影响下,两国关系又有了改善。

李举卿:我在蒙古工作的时期正是两国关系刚刚有所改善的时候。当然不可能像现在关系那么好。但在当时已开始了高层互访。我任职的1983—1989年间两国外交部副部长进行了互访,这是两国关系恢复的表现。同时也开始了边境贸易,两国人民的友谊进一步发展。我记得我离任时,蒙古外长接见了我,通过我转达了对中国外长访蒙的邀请。此后两国的高层互访才逐渐开展起来。

张德麟:我是1989年8月赴任的。两国关系正在迅速发展。1989年是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时期,我受命开展工作,以促进正常化的实现。我在蒙古工作的20多年间从未进行的元首访问最终实现了。1990年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奥其尔巴特访华,1991年杨尚昆主席对蒙古进行了回访。1992年蒙古总理宾巴苏伦、外长贡布苏伦访华,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实现了访华,通过这一系列访问,两党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这个时期从未中断的人员往来、文化教育科技交流以及贸易都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至80年代末,两国关系有了长足发展。我本人在蒙古学习和工作了25年。1954—1958年在国立大学学习蒙古语言文学,然后到驻蒙古使馆工作。今年已71岁了,人生的三分之一是在贵国渡过的,回想起来很有意义。

裴家义:我想高兴地指出,我出任大使的时期两国友好关系已走上正轨。在我的任内,我国总理李鹏首次访蒙。这一访问,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访问期间,双方进行了很好的会谈,重签了友好合作关系条约。这一条约开辟了双边友好关系发展的新阶段。两国关系的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在我的任期内我的工作并未出现过任何困难。

齐治家:在我的任期内,蒙古国内民主力量执政。哪个党执政本来不是主要的,关键是要保持政策的稳定。在我的任内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和江泽民主席先后访问了贵国,同时巴嘎班迪总统正式访华。在我的任内有这么多的高层访问,这就充分说明两国关系已达到什么程度。



难忘的相聚

9月17日,大使团在蒙古演出了一场“重头戏”。这一天,使馆举行了大使们同蒙古老朋友聚会的招待会。这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

早在大使们到达乌兰巴托时,我们就让他们每人将自己最熟悉、最想见的蒙古朋友列个清单,由礼宾官进行核对,并发出请帖。有些人如今已退休或不在原单位,就用电话进行联系。总之,我们千方百计去寻找,力求把所有的朋友请到使馆来。

招待会定于下午6时开始,但到了5时半,蒙古朋友就陆续来到使馆。我和5位大使一起作为主人在主楼门口迎接。

总统办公厅主任巴特赫希格来了。外交部部长额尔登楚龙来了。前外长贡布苏伦来了。接着,外交部前副部长云登、前服务局局长伊娜、外交部官员强查拉、图门来了。前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奥其尔、查希勒冈来了。前总统奥其尔巴特夫妇、前总理扎斯莱夫妇来了。和友联与蒙中友协的朋友巴特尔嘎勒、比列格特、扎木斯楞、其米德策耶来了。我的老朋友尼玛苏伦、达赖、阿勒玛斯、拉格查等来了。文化艺术教育界老朋友塔玛尔、冬嘎来了。政府各部门的老朋友来了。军界的朋友们来了。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来了。

招待会开始。我发表了简短的、充满热情的祝酒词。紧接着,孟英大使、蒙中友协主席姜仓诺罗布、外长额尔登楚龙分别致词。所有讲话表达了同一个心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畅叙友情。大家对两国关系发展到如今的高水平均表满意,说此次活动堪称创举。外交部一些同行认为蒙驻其他国家使馆也可考虑仿效此种做法安排老朋友会面。

朋友,你或许难以想象10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重逢的一刻是个怎么样的场景。握手相拥,相互问候,谈笑风生。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憧憬未来,信心满怀。

使馆懂蒙文的年轻同志全部出动充当翻译。相信他们会从中感受到中蒙友谊是何等深厚,何等珍贵。



一些人回忆起两国关系恶化时的“怪现象”；一些人重温一起到蒙古外省参加活动的情景；一些人畅谈如今关系正常化后达到双赢的成果；一些人拉起了家常，询问了对方子女和孙子的情况；还有一些人相约2008年在北京一起看奥运。

一个半小时的招待会过得太快了，在充满友好情谊的热烈气氛中，招待会延续到两个小时。为了录下这一难忘的时刻，使馆动用了所有的摄像机和照相机。闪光灯在不停地闪烁着，各种组合、各种留影，记下了这难忘的时光。

招待会结束后，蒙中友协执行秘书其米德策耶和夫人抓住机会，把所有大使夫妇请到一起，在等候厅照了一张“合家欢”。他非常高兴地说，这将照片对他来说是极其珍贵的，将永远保存。




高规格的接待

蒙官方对大使团来访十分重视。整个日程安排虽比较宽松，但规格很高。访问的第一天，原安排大使团到蒙中友好县——龙县参观，考虑到老人出人不方便，达瓦道尔吉县长带领领导班子的成员来到宾馆会见了大使们，让他们品尝了牧区的马奶酒和奶食品。第二天，总统办公厅主任巴特赫希格在温都尔旅游点宴请了全体成员。随后，额尔登楚龙外长在汉城餐厅举行欢迎宴会。16日晚，人革党总书记依德活赫腾宴请，他在宴会中高度评价大使们为两国关系作出的贡献，并介绍了两党两国关系的近况。席间，大使们动情地回忆起双边关系中许多值得记载的一幕幕往事。

9月18日，访问达到了高潮。这一天下午，巴嘎班迪总统在百忙中拨冗会见。会见在国家宫三楼“三巨头”专门的接见厅举行。巴总统同每位大使一一握手，致以亲切的问候。他还单独同他更熟悉的、会讲蒙语的张德麟大使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总统对大使们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化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回忆起访华时与我党领导人邓小平、杨尚昆、江泽民、李鹏、乔石、万里等会见的情景。他强调两国高层互访促进了友好睦邻关系的发展，介绍了蒙



古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最后,总统祝愿大使们继续为中蒙友谊作出新的贡献,并请他们常到蒙古看看。

孟英大使代表大家对总统的接见表示衷心感谢。他谈了时隔20年后来到蒙古的所见所闻,对蒙古发生的巨大变化深感欣慰,并祝愿蒙古人民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18日晚,蒙中友协主席姜仓诺罗布先生为代表团举行饯行宴会。宴会上,大使们高兴地畅谈此次访蒙的观感。李举卿大使风趣地说:“黄家驛,我对你简直有点嫉妒,你的任期内两国关系那么好,好事都让你赶上了。”李大使的一席话,引起大家一阵会心的笑声。所谓“千里送君,终有一别”。宴会在亲切和依依惜别的气氛中结束。双方相约在北京和乌兰巴托再次相聚。

19日,代表团满载蒙古人民的深厚情谊离开乌兰巴托。这是一次不平常的、“历史性”的访问,将在中蒙关系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成为两国人民友谊的佳话。



第二十一章

接受采访



频繁出镜的“明星”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蒙媒体对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更加关注。作为中国驻蒙古国的使者,蒙媒体对我本人的关注程度自然也在增加。同志们有时打趣地说我是频繁出镜的“明星”。的确,在4年的任期内,我不时在蒙电视台、电台和报刊上“曝光”。其中,蒙中央4大报纸《世纪新闻报》、《蒙古消息报》、《日报》、《真理报》记者先后多次对我进行过采访。采访方式有几种:一是我到报社进行座谈;二是记者到使馆造访;三是我请记者共进午餐或晚餐。迄今我在蒙报刊上共发表过20余篇访谈录。这种近距离接触,拉近了我与蒙古媒体、各界人士和普通老百姓的距离,增加了相互的理解和信任。我很珍惜这些见面与接触的机会。通过访谈,我介绍了中国的发展变化和改革开放成就,与蒙各界朋友进行思想交流和心灵沟通,达到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的目的。

我十分重视采访。每次采访前均进行认真准备,有时因时间紧,要挑灯夜战。除写好中文发言稿外,将讲稿全部译成蒙文。蒙文稿力求口语化,符合蒙古朋友的习惯。每次刊登的访谈录我都将其装订成册,妥为保管。

中蒙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需要用互信去加强;中蒙人民的传统友谊需要用真诚去巩固。每次访谈都是我与蒙古朋友一次真诚的交流与沟通,是中蒙人民友谊进一步加深的体现。现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几次访谈录附后,以飨读者。



《我想当演员》

时间 2000年2月19日

采访人 《日报》记者额奈勒尔

额奈勒尔(以下简称“额”):蒙中关系有悠久的传统,请您谈谈在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时,第一任大使是什么人?他的工作条件怎么样?

黄家骅(以下简称“黄”):1949年新中国成立,贵国是同我国第一批建交的国家之一。乔巴山致电我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第一任驻蒙古大使是吉雅泰,蒙古族人。据说吉大使是坐汽车到蒙古赴任的。当时两国还未修铁路,更没有飞机通航。蒙古驻我国首任大使是贾尔卡赛汗老先生。

额:您是北大蒙古语专业毕业生,为什么要学蒙语呢?

黄:当初我考入北大中文系。大概因为我俄语学得不错,学校把我调到东方语言文学系。那时,我还想学越南语,因越语与广东话较接近,但可惜越语不是每年招生,那一年不招。东语系还有阿拉伯、印地、日语招生。我当时想,日语是“军国主义语言”,阿拉伯语很难学,而蒙古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进了蒙语班。此后,我的一生就与蒙古国、蒙古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1960年入学,1965年毕业,毕业时成绩不错,被分配到外交部。

额:您在哪里学的俄语?

黄:我的俄语是在中学学的。我父母亲教育我要好好读书,做个诚实的人。当时我家里经济条件还可以,自己也比较用功。我13岁那年,父亲去世,是我妈妈把我拉扯大的。母亲对我十分疼爱 and 关心,从不打骂我,只用语言和行动来教育我。

额:你是家里最小是吗?

黄:是的。我有两个哥哥、四个姐姐,我排行老七,是个“老疙瘩”。我哥哥姐姐大都受过高等教育,父母对我要求很严,这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

额:听说您在蒙古呆了15年,几乎成了蒙古人。在这里喜欢什么,不喜欢



什么？

黄：1973年我第一次来蒙古。那时天气很冷，也缺蔬菜、水果，而现在蒙古市场情况大大变了样，蔬菜、水果样样都有，我对这里的天气、饮食都已习惯。1980年回广东，我还嫌那里的天气潮湿哩。我现在能像蒙古人一样吃羊肉、喝马奶。我喜欢蒙古人坦率直爽的性格。

额：您到过乡下吗？

黄：我去过15个省。还有6个省尚未去。很想到南戈壁省走一趟。你大概知道，什么时候去那里最合适吧。

额：6月末7月初去较好。可能还有一点热。

黄：我是南方人，不怕热。

额：您除了语言外，还喜欢什么？

黄：我还是一名音乐爱好者。二胡、扬琴、三弦都会拉会弹。60年代我在外交部工作时还参加过民乐队，演奏过三弦哩。当学生时表演过广东的秦琴（广东特有的一种四弦琴）。我不会马头琴，想学习一下。

额：弹琴是您妈妈教您的吗？

黄：不是。我从小就喜爱文艺，当时家人不主张我去当专业演员。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小时候有一个愿望就是当我们老家一个地方剧种——粤剧的演员。剧院的人同意了，但家人反对，最终我还是听了他们的话，没有当演员。

额：如果您现在选择呢？

黄：当然我还想当演员。哈哈……不过，后来情况变了，我选择了外交工作。一个人凡是选定了一项职业，就应该坚持到底。如果我当了演员，也会当个好演员。这就是我的性格。

额：1999年，您被派到您所熟悉的蒙古国当大使，感觉怎样？

黄：到一个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工作，当然很高兴。我对蒙古的风俗习惯比较了解，还有很多朋友，这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每当我遇到什么困难，我就会找我的朋友。

额：一段时间，我们两国关系遇到了困难……

黄：是的。在历史的一段时期经历过曲折。现在情况已大不一样了，两国关系处于高水平。两国的大使馆、外交部官员和政府各个部门都为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本人也为此出了一份力量。今后，两国关系将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要强调的是，新闻界和媒体对双方关系的发展亦起到重要的作用。

额：几天前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爆炸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
黄：据我们了解，搞爆炸的人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他不属于不同政见者，神经有毛病。

额：3月18日台湾将进行“总统”选举。中国方面的立场如何？
黄：中国对台湾的立场是一贯的。大陆和台湾是一个整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企图加入联合国没有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围绕着“总统”选举制造的所谓“两国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如果台方接受外国援助动用武力的话，我们不会坐视不管。我们希望下个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不要破坏台海的稳定局面。



《我对中蒙关系的前景充满信心》

时间 2001年4月18日

采访人 《真理报》记者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谈话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蒙中关系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您怎样评价蒙中关系？

黄家骅(以下简称“黄”)：中蒙建交50年来，有过顺利发展的时期，也经历过曲折。但友好和合作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近年来，双边关系全面顺利地发展，保持了高层互访的势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尉健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中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国防部长迟浩田等领导人相继率代表团访蒙；蒙古议长贡其格道尔吉、外长图娅对我国进行了访问。两国经贸合作有了很大的进展。中国是蒙最大的贸易伙伴，第一大投资国。去年底，中国政府为实现锌矿项目，决定再向蒙提供1亿元人民币优惠贷款。相信这一项目将为两国经贸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与此同时，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正在发展。2000年在华留学生人数达60余人，比去年有了增加。今年两国关系又有新的发展。去冬蒙古遭遇严重雪灾，为表达对蒙古国的同情，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向蒙古政府和红会提供了25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为防止口蹄疫的蔓延，中国政府向蒙古政府提供了200万元人民币无偿援助。



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条约原则的基础上,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在新的世纪将会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理解将进一步加深。我对两国关系的前景充满信心。

记:蒙古人民十分理解大使先生对两国友好关系所作出的贡献。

黄:谢谢。作为两国友谊的使者,我正在努力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今年是我在贵国工作的第17个年头。我于1965年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就将自己的命运同蒙古人民紧紧连结在一起。17年来,我努力为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与相互理解而工作。1999年,我被任命为第12任驻蒙古国大使。我将竭尽全力为实现我国发展与蒙古国友好睦邻关系的目标而工作。

我很高兴有许多蒙古朋友。我同样深切地感受到了蒙古人的热情、好客和淳朴的性格。中蒙关系达到今天如此高的水平,确实来之不易,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值得我们加以珍惜。借此机会,我要向曾经给予过我支持与帮助的蒙古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记:去年蒙古出了一首《未来从今天开始》的歌曲,您对此有何看法?

黄:对不起,我不太注意这首歌。当然我对未来从来都充满信心。也知道要创造未来,要从现在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中蒙两国是近邻,同属东北亚国家。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无论从过去、现在和将来,中蒙两国人民没有理由不携手共创明天。在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深化的今天,只有真诚信任,相互理解,才能使友好合作关系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进展。

记:20世纪下半叶两国关系经历过不如意的时期,您认为这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教训?

黄:众所周知,历史上中蒙关系经历过曲折。相信两国人民都不愿意这段历史重演。历史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各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只要我们遵循友好合作关系条约和1998年联合声明的精神,中蒙友好合作关系就能够稳定发展,两国一定能够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我在蒙古工作期间有过许多难忘的经历。1982—1983年两国首次边界联合检查时我任技术组的翻译。蒙方的翻译是当时和平与友好组织联合会工作人员阿勒玛斯。他精通中、日文。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我与蒙古专家一起工作,成了好朋友。回想会议刚开始时气氛并不是很友好,我们经常相互激烈争论,经过多次会谈,增加了信任,终于达成了谅解。实践表明,只要坚持友好合作、互谅互让的原则,增加彼此的信任 and 了解,就能妥善解决边界等历史遗

留问题。

我还想告诉你,我在这段期间里曾收集了有关边界测绘方面的近 1000 多个词汇(中、俄、蒙对照),汇编成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两国友谊和合作的“副产品”。

记:我想向您了解一个问题。当今国际上有些公民旅行需要签证,有些不要。蒙中两国在实践中出现了一方要签证,另一方不要签证的现象,这是怎么回事?

黄:你说得对。现在的确有这种情况。蒙古朋友到中国去通常不必办签证,而中国人来蒙古要办签证。1989 年两国签订了关于两国公民相互旅行条件的协定。根据此协议,持外交、公务和因公普通护照者可免签证。这是双方根据 90 年代初本国居民出国旅行的具体情况确定的。双方在领事磋商时曾就此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目前可维持此规定不变。

记:现在常常提到“一极”或“多极”。您认为我们两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会赢得什么,失去什么?

黄:是的,当前世界上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我们不主张搞“一极”或“单边主义”,因为这不合国际社会发展的潮流,也不符合世界人民的意愿。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加快了科技的发展,它使世界范围的生产因素进一步有效地配置,加快了世界经济结构的改革,促进了国际竞争,使生产带来更大的效益和最优化的选择。

但也应该承认,这一进程会使世界发展出现风险和不利后果。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始终处于领导地位,从中获利最多。由于历史原因,经济相对薄弱的国家由于缺乏资金,技术落后,经济发展不成熟,这种情况的发展会逐渐加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别。

尽管如此,面临全球化挑战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做好本国的事情,坚持改革开放,完善经济体制的建设,完善必要的法制,建立合适的信贷环境,培养高素质的干部,认真学习外国经验,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有效地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开放的商品、资金和服务市场。同时要慎重处理有可能出现的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确保经济安全。为了共同发展,发达国家应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贷款,消除贸易壁垒,减免债务。

记:关于 21 世纪,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个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亚洲的世纪”,您的看法呢?

黄:人类已进入 21 世纪。现在亚洲形势总的较为缓和,亚洲经济已进入



良性发展的轨道。今年亚洲经济增长 6.7%。亚洲是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亚洲的地区合作在不断扩大,只要继续保持发展和稳定,政策上进行积极的调整,并且继续完善发展模式,发展地区合作,亚洲的前景是光明的。

中国在过去的 20 多年来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使本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水平不高,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要根本实现现代化,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中国早就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即使今后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这一宣示赢得了各国人民的支持和赞扬。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人民发展平等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

记:公众媒体在各国关系中起到重要作用。想听听您对此有何评价?

黄: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毫无疑问,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媒体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健康真实的报道是深化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信任的桥梁,其作用不可估量。我十分尊重媒体的各位工作人员,对你们怀着深深的敬意。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在填报大学志愿时,第一个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我十分羡慕新闻工作者,对他们有深深的敬意,自己也想成为其中的一员。遗憾的是,我未能如愿,最后学习了蒙古语专业,从事外交事业。我始终很关注你们的报纸办得怎么样,每当读到贵报介绍两国两党关系和人民友谊的报道时感到很欣慰。

记:最后,您想对我们的读者说点什么?

黄:贵报在蒙古读者中有较大的影响。作为贵报的忠实读者,对贵报在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在此谨代表中国人民通过贵报向友好的蒙古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祝蒙古人民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蒙古人民生活美满幸福!



《藏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在繁荣发展》

时间 2001 年 5 月 29 日

采访人 《蒙古新闻报》记者

记者(以下简称“记”):尊敬的大使先生,请您谈一下西藏和平解放 50 周年在西藏人民的历史中具有什么意义。

黄家骅(以下简称“黄”):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1 年 2 月达赖喇嘛派遣全权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协议上签字。这就是著名的“17 条”。在这个协议中指出,不向西藏人民使用武力,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从西藏赶出去;西藏地方政府支持和保证人民解放军入藏;在西藏执行民族自治政策以及中央政府实行不改变西藏现有政治制度,不改变达赖、班禅的地位、职务和权利及对各级官员一视同仁和宗教自由的政策。同时中央政府将监督和解决尊重西藏人民的信教、风俗习惯、民族语言文字,逐步发展教育、牧业和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以及西藏同外国交往等问题。

西藏各族人民欢迎和支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1951 年 9 月,西藏地方政府专门组织有喇嘛、官员和三大寺庙出席的会议,讨论上述协议。会议指出,“17 条”的签订对达赖喇嘛的事业,对西藏的宗教、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都有好处,应该贯彻执行。同年 10 月 24 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说,双方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于 1951 年 5 月 23 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喇嘛、信徒一致拥护这一协议,表示将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支持和保证解放军进藏,加强国防,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赶出西藏,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同年 10 月 26 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的支持下顺利地进入拉萨。

1954 年,达赖和班禅到北京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会议。达赖在会议上发言中积极评价了贯彻“17 条”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并表示坚决支持本次会议所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中规定的关于实行地方民族自治制度的原则和条文,使西藏逐步成为繁荣发展的地区。在此次会议上,达赖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常委会委员。根据宪法,他们享有参与领导国家各项事务的权利。

由于西藏实行了民主改革,改变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实行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按照新中国的宪法,西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成了国家的主人,享受法律所赋予的一切政治权利。

西藏于 1965 年确立了民族自治制度,1965 年 9 月召开西藏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



记：您能简要介绍西藏的社会发展情况吗？

黄：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为了发展西藏经济，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国家共向西藏预算补助了 157 亿元，向西藏重要项目的基本建设提供 42.7 亿元资金，一共斥资 200 亿元。

1996 年—2000 年，西藏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0.7%，高于全国平均增长率。去年西藏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17.4 亿元，比前 5 年增加 1 倍。税收和预算收入同步增长，年增长分别达到 21% 和 20.1%。西藏人民的食物、食油和肉基本自给，有 43 万贫困人口脱贫。

最近召开的西藏人大七届四次会议提出了使西藏 2001—2005 年增长率达到 12% 的任务。

记：西藏自古是文明之地。目前西藏在文化教育方面进行了什么工作？

黄：西藏解放以后，文化教育取得很大发展。过去西藏教育方面十分落后，没有一所真正的学校。50 年来，政府为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投资了 11 亿多元，采取了义务教育，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费用由国家负担的优惠政策。西藏过去和现在都存在传统的文化。如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医学、天文等学科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政府重视保护和发展藏族优秀的、传统的文化，因而使西藏的文化传统得以发展。藏族语言文字是西藏自治区的统一语言文字。

我们广泛尊重藏族的风俗和文化。在西藏大部分城市和牧区，人们保留了自己的穿戴、饮食和居住的传统习惯。每年藏族同胞按传统庆祝白月（春节）和其他节日。

记：中国政府在宗教信仰方面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呢？

黄：你们都清楚，绝大多数藏民都信佛教。西藏自治区只有 2000 多人信伊斯兰教，近 600 人信天主教。尊重和保护信教自由，是中国基本政策。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西藏各级政府都严格执行宗教自由的政策，对此西藏的信徒们都表示赞同。现在西藏根据宪法和其他法律有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完全自由。

近年来，西藏宗教机构独立地开展各种宗教活动。中国佛协西藏分会于 1983 年成立了西藏宗教学院，在一些寺庙开设了经文班。

政府尊重和保護各种宗教流派的傳統活動和習慣，在西藏嚴格執行信教自由的政策。這就使西藏各種宗教之間、各種流派之間、寺廟之間、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之間能夠彼此互相尊重，和諧相處。西藏的宗教團體和信徒積極發

展同外国宗教团体和信徒的友好交往。

记:请大使先生介绍一下中国政府关于达赖喇嘛问题的立场。

黄:谈到西藏宗教问题时,就不能不提及14世达赖喇嘛。1959年,西藏上层某些人为了谋取私利,反对进行改革,企图永远保留旧的制度。他们蓄意违背“17条”协议,不断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达赖喇嘛逃到外国以后,在外国反华势力和西藏分裂主义者的庇护下背叛了自己承诺的爱国立场,进行了分裂祖国的活动,公然声称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建立傀儡“政府”,并再次建立非法武装。

达赖喇嘛的言行暴露了他并非仅仅是个宗教人士,而且是一个长期在外国进行分裂祖国活动的政客。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希望达赖停止分裂,采取爱国团结的立场。至今达赖尚未放弃“藏独”立场,还在国内外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因此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的谈判没有取得成果。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只要达赖喇嘛放弃分裂思想,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团结,为了西藏人民的富裕生活和幸福,准备随时同达赖喇嘛进行谈判。



《让我们携手共同发展》

时间 2002年10月1日

采访人 《真理报》记者布德呼

布德呼(以下简称“布”):首先代表读者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53周年。我们知道中国正在奉行加快西部建设的政策。贵国西部发展何时能与上海这个沿海城市同步?

黄家骅(以下简称“黄”):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同沿海地区相比,水平还比较低。为了缩小这种差别,实现经济改革,使全中国人民共同富裕,中国政府制定了西部大开发的30年战略。根据这一战略,我们加快这一地区的基础建设,改良生态环境,改善生产结构,发展科学文化教育。有一个说法是,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从这一意义来讲,中国政府关于全面发展国家的政策



是正确的。

布：中国的这一发展对邻国蒙古会产生什么影响？

黄：我国政府正在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加快发展西部地区。这个地区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在大力发展对外关系、引进外资方面具有巨大的可能性。我国领导人十分重视中蒙合作。中蒙两国地理位置邻近，民族习惯和语言文化相通，双方合作具有许多有利条件。中国的发展，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发展越是加快，对蒙古国的影响就越大。中国的发展当然会给蒙古经贸发展带来福音。

布：当前两国经济合作在政治关系基础上在逐步向前发展。为使这一合作更有成效，您认为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黄：经贸合作同两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经济互补程度密切相连。近年来中蒙经济合作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其中一个原因是两国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都积极吸引外资。中国企业对蒙的投资在逐步扩大。与此同时，蒙古的企业也在中国进行投资。这是经济合作的土壤与根基。

布：您刚才提到投资问题。中国现在是蒙古国第一大投资国。我国政府明确提出投资的主要领域。中方出于何种目的在促进这种投资呢？

黄：贵国最近召开了全国投资大会。我认为这是加快引进外资的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有 100 多家企业的 150 多人出席了大会。许多中国企业对蒙矿山、农牧产品加工、建筑、建材、旅游等行业感兴趣。我相信此次大会所取得的成果将会在今后逐渐显示出来。据知，会上双方一些公司已达成了某些协议。如色楞格省乌兰敖包煤矿、奥尤陶勒盖铜矿开发以及“千年之路”建设项目等，双方都表示关注并已开始进行接触。

布：您任驻蒙古大使以来两国关系明显加快。您对近期内两国关系有什么设想？

黄：我这次来蒙古国工作已有 3 年。这个时期两国经贸合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刚到蒙古时，只有 400 多家中蒙合资企业，现在已达 600 多家。举一个例子，我国投资兴建的苏赫巴托省锌矿项目正在执行。2000 年我有幸同巴嘎班迪总统一同出席了该矿的奠基仪式，并致了词。蒙古政府在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引进外资方面正在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步骤和措施。随着双方经济合作的扩大，促进了政治关系的稳定发展。我想，在吸引外资方面除了需要有良好的经济与法制环境外还需要摒弃冷战时期的旧思维、旧观念，这是非常必要的。

布：您对蒙中合作的前景有何期待？

黄：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了贵国。在同贵国政府领导人会见时也谈到这个问题。中蒙两个友好邻邦之间没有任何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都在致力于加快发展本国的事业。我们两个东北亚国家应携手共同发展。我在任的3年内，两国关系得到全面发展。我认为经济合作还有很大的潜力，只要双方共同努力，这一合作的潜能将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蒙古是我常驻的唯一国家》

时间 2003年1月20日

采访人 《乌兰巴托时报》记者

记者(以下简称“记”)：上世纪90年代两国关系经历了一段停滞时期以后开始了积极的恢复时期。2002年两国关系是一种怎样的状况？

黄家骅(以下简称“黄”)：90年代以来，中蒙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并得到逐步发展。也就是说，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关系都得到顺利发展。我想说的是，最近恩赫巴亚尔总理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过去的一年，不仅对蒙古，而且对中国都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年。最近中共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领导人，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

中国政府向蒙古政府提供了1亿元人民币新的优惠贷款，进一步表明两国关系是一种良好的伙伴关系。60年代两国确实经历过困难时期，产生了不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气氛。经过双方的不懈努力，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我们相信今后两国会更加友好地相处。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两国没有理由不携手合作共同前进。

记：您作为大国的大使，认为在两国关系中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

黄：我的结论是：两国没有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双方政治上应互信，经济上应互利。在两国关系中不仅政府之间的联系，而且在人民之间的交流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媒体的人士，其中包括贵报在内，也起着特殊的作



用。

记:贵大使馆今年内对两国高层互访有何计划和设想?

黄:高层互访是发展两国稳定关系的基础。恩赫巴亚尔总理成功访华是一个例子。蒙古总理也邀请中国总理访问蒙古。因为今年我国要召开人大会议,组成新政府,工作很忙,我估计我国总理明年有可能应邀来访。

记:听说在乌兰巴托将举行中国文化日。

黄:蒙古政府和教科文部通过我们使馆向中国提出了这个建议。我馆十分支持,已正式向我文化部提出此问题。我想有关部门会积极考虑。

记:关于中国投资开发图木尔廷敖包锌矿的合同已签订多年,这方面有什么新的信息?

黄:巴嘎班迪总统对此十分关心,多次向我打听。我也通过有关部门进行了解询问。此锌矿是目前中国向蒙古投资的最大项目,已投资2亿元人民币,由中国有色金属股份公司负责建设。由于此项目是大型项目,现在还在准备阶段,具体来说要确定水源,建设生产和生活设施,进行探测研究。此矿如能在短期内高质量地完成,不仅对苏赫巴托省,而且对整个蒙古的经济都会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记:中方投资在乌兰巴托建设住宅问题进展如何?

黄:近年来,蒙古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将在乌市巴彦郭勒区投资建设住宅,其中有3个公司具体负责。蒙古人民对中国建筑工人的技能给予高度的评价。相信今后将会为乌市的市民建起更多的高层住宅楼房,为蒙古人民生活的改善与提高作出贡献。

记:两国企业家在什么领域进行合作更为有利?

黄:我认为当前在采矿业,特别是在有用金属开采方面进行合作具有优势。同时,在开展旅游方面的合作前景也看好。

记:蒙古开办了投资银行,中国金融部门能否开展这个领域的合作?

黄:两国银行部门的合作开展得不多。蒙古政府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是个正确的步骤。尽管中国尚未在蒙开设投资银行,但我国农业银行同蒙古投资开发银行已建立了关系,可开展人民币元与蒙图格里克互兑业务。不久以后,中国内蒙古农业银行将在乌市建立分行。

记:两国人民在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方面相近,大使先生在这方面有什么考虑?

黄:两国宗教联系已有所恢复,这方面不能不提到总统宗教事务协调员达

希云登先生所作的贡献,他率领宗教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西藏自治区同蒙古寺庙的住持们一直有联系和交往。已开始互换喇嘛访问团。

记: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外交生涯?

黄:1965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在亚洲司负责蒙古国事务。在蒙古国工作的外交官中,我是生活时间较长的一个,已近20年。我曾到世界其他国家短期工作过,但蒙古国是我常驻的唯一国家。

记:能否评价一下您对蒙中关系所作的贡献?

黄:我作为第12任驻蒙古大使,正在为完成祖国赋予我的使命而努力工作。外交生涯的这20年是我作为一个外交战士为祖国努力奉献的历程。

记:蒙古人称您为“中国籍的蒙古人”,您业余时间是怎样渡过的?

黄:谢谢,我还做得很不够哩!我的业余时间喜欢运动和活动。大部分是小跑或速度快的散步。打乒乓球、打太极拳是我的爱好。我还得过大使馆乒乓球单打冠军。遗憾的是我乒乓球输给了总统办公厅主任巴特赫希格先生。我还不舒服气,今后要努力争取战胜他。

我有许多蒙古朋友。春节后我想与蒙古朋友一起到外边走走,打打猎。听说这是一项十分有意思的运动,为此我正在作各方面的准备哩!

《蒙古国在我心中留下难忘的记忆》

时间 2003年5月10日

采访人 《真理报》记者普勒布、扎尔格勒

普勒布、扎尔格勒(以下简称“普、扎”):大使先生在蒙古一共工作了20年。我们对您从何时起初涉蒙古事务并取得如此成就很感兴趣。

黄家骅(以下简称“黄”):谢谢。首先我想通过贵报向所有读者表示感谢并致以亲切的问候。1973年,我第一次来到蒙古国工作,至今已过去了30年。在这30年里,我在蒙古国工作了20年。这也是我人生的约三分之一。这一段时光在我的心中确实有许多难忘的往事。1973年的蒙古同今天相比,真有天壤之别。30年来,蒙古有了巨大的进步。社会制度、精神生活、经济领



域均得到全面发展。我亲眼目睹了蒙古国在这个时期取得的发展和进步。

普·扎：蒙古同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优越的地方和不足呢？

黄：蒙古国在人文和地理位置方面具有优势。它保留了鲜明的蒙古民族特点，这是十分宝贵的财富。我相信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能赶上人类发展的步伐，克服暂时的困难，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到达理想的彼岸。蒙古领土辽阔，人口稀少，矿产丰富，人民热爱祖国。如果说有什么不足，气候相对恶劣，基础设施薄弱，接受外部的信息相对较少，开放程度不够高，这是不足之处。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蒙古竞争力的提高受到不良的影响。不过我完全相信，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弥补存在的不足，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下，可以使蒙古经济获得高速发展。这里有一点是极为重要的，这就是要保持社会的稳定。稳定压倒一切。

普·扎：蒙古政府正在开展“千年之路”工作。一些人却认为修路不是首要的任务。您如何看呢？

黄：贵国政府提出的“千年之路”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我认为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中国有一句名言，叫做“要想富，先修路”。这就说明基础设施在本国的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千年之路”的实施，将对蒙古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也有利于挖掘本国的潜力。据我所知，正在修路的人员 100% 是中国工人。另外，中国投资银行计划投资帮助你们修建乔依尔—扎门乌德硬面公路。现在两国正在讨论投资开发蒙古资源问题。如果乌兰巴托——扎门乌德公路全部竣工，可以扩大中蒙之间的交流，前景十分可观。

普·扎：这样一来，来蒙古旅游的客人会更多了吧？

黄：那当然。今年是蒙古旅游年，来旅游的人越多，投资额就会更多，蒙古的影响会更大，声望会更高。据我了解，不少中国人有兴趣到蒙古旅游。两国旅游部门将进一步进行讨论并将达成原则协议。我们大使馆一向十分支持开展两国旅游方面的交流。

据我们所知，贵国驻中国大使馆正在做大量工作，开展旅游方面的宣传。目前中国游客更喜欢到东南亚旅游，相信以后到蒙古来旅游的人会增加。我想，我国虽是蒙古的近邻，但我国公民对蒙古国的了解还不够。两国旅游部门组织公民相互旅游很有必要。去年，中国有 9 万人次到蒙古旅游、探亲或从事商业活动，而蒙古差不多有 30 万人次到中国旅游、探亲或从事商业活动。如果两国旅游部门能加强接触，尽早签订合同，双方人员的交往会进一步增加。要想吸收更多的旅客到蒙古来，我想一是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我在一些报

纸上也谈过这个问题。到特列尔吉要经过一条木桥,已坏了,应尽快修好。到成吉思汗旅游点途中有一段土路,路况不好,游客就难以达到休闲的目的。一切工作的质量与数量是统一的。二是旅游的服务必须加强。现蒙古还没有一个五星级宾馆,已有的宾馆首先要提高服务质量,才能吸引更多的旅客。三是要加强旅游的宣传。开展宣传工作,以宣传开路,要出一些高质量的宣传品,使更多的国外游客了解蒙古,有兴趣来蒙古旅游,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普、扎:中国是蒙古最大的投资国。今后,中国增加投资的可能性如何?

黄:2002年中国有850家企业在蒙投资,投资额达到2.8亿美元。它们主要分布在轻工、社会服务等部门。当然这还不够,今后还需要继续发展,增加一些新的领域。恩赫巴亚尔总理访华时同朱镕基总理进行了会谈。两位总理主要谈了经济合作,探讨了合作的主要领域和双方有影响的企业进行投资的问题。目前中方在蒙投资的数量增加了不少,但质量不理想。只有质量和数量同时提高,才能产生效益。今后随着经贸关系的改善,前来投资的企业会逐步增加。随着投资的增加,也可逐步改善合资企业的质量。去年贵国召开的投资大会,对提高外资企业质量是有益的举措。

普、扎:现在蒙古青年学生很愿意到中国留学。在这方面贵国有何计划?

黄:是的。蒙古到中国留学的学生在逐步增加。据我了解,现有近千人在中国学习。据说在呼和浩特学习的蒙古学生约有200多人。但蒙古在中国的自费留学生究竟有多少人,具体数字还不太掌握。他们学习的专业包括语言、医学、文化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每个学年招收的专业不同,语言专业收费一般1500—1800美元,社会科学1800—2200美元,自然科学2000—3000美元,医学和文化艺术4000—5000美元。

普、扎:近来,蒙古人到中国特别是到呼市就医的人不少。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中方有无可能在蒙古建立医院?

黄:是的,蒙古朋友愿意到中国治病。我也知道,呼市两家中蒙医院受到蒙古人民的欢迎,成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我经常听到这方面的消息,朋友们要通过我去转达谢意。

如在蒙古设立医院,对蒙古人民当然有利,贵国有关部门也有这方面的意愿,可减少来往的各种费用。但据了解,一个公司要在蒙古建这类医院,投资起码需1000万元人民币。而且建医院并不是一件易事,除资金外,还要进设备,进药品,蒙方在这方面有极为严格的规定,无疑应遵守蒙有关保健和环境卫生法规。所以在这方面的确存在一些实际问题,要解决费用支付问题,设备



药品的人境问题等。目前较为现实的做法是进行医务人员的互访与交流,中国医师可向蒙古医务人员传授医务知识。

普、扎:在蒙古即将召开联合国民主和新兴民主国家大会。中国代表出席此次大会吗?

黄:我馆已报告国内,迄未收到答复。

普、扎:中国领导人更迭了。中国人民对新的领导人有何期待?

黄:中国人民十分尊重和信任新的领导集体。新选出的新一届领导人有以下特点:一是均受过高等教育;二是都是工程师、经济师等专业人员;三是都出自工农兵等部门,曾在基层单位工作,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事实表明,从基层单位一步步地上来的干部求实精神好,决断能力强,这些领导人相对较年轻。

普、扎:“非典”疾病惊动了全世界,在中国有所蔓延。大使先生能否作一些通报?

黄:可以。中国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抗治“非典”的措施。对工作不力的北京市和卫生部领导人进行免职处理,现已有效地控制了此病。5月9日,中国25个省出现了疫情,有4850人得病,1582人已康复,230人死亡。现在有2993人正在治疗,2566人疑似病人正在接受治疗。我国政府在防治、预防和限制此病方面采取了严格的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现在北京郊区建起了拥有1000张病床的防治医院。这所医院在短短的8天内就建成。这是预防“非典”的一个重要部分。政府拨出20亿元,建立了专门基金。同时建立了紧急措施的机制,政府准备拨款35亿元。经过科研攻关,现已确定“非典”的病因,正在进行预防药品的生产工作,约需1—3年。我国还注意同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已到我国了解病情。我们极其注意学习各国机构与专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我们相信依靠国际的参与,定能控制疫情。目前中西医结合的预防药品已生产出来。

普、扎:我国公民正在形成更完备的法律氛围。如根据土地法,公民可无偿拥有家庭所分得的土地。在这方面,中国有许多经验,能否介绍一下?

黄:蒙通过土地法是个重要的决定。现中国农民个人也可以拥有土地使用权,如何使用土地由个人决定。但仅仅是使用,不能进行买卖。我建议蒙古公民亦可利用土地种点蔬菜,可食用,同时对改善环境也有好处。

普、扎:您从事外交工作多年,外交人员有何苦和乐?

黄:外交职业是一项很不平常的特殊工作,也可以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素养。就我而言,我是学语言出身,我掌握蒙语,能与蒙古朋友自由交流。在蒙古工作,会你们的语言,工作起来较为方便。但我不懂英文,除同蒙古朋友外,在使团内我要借助于翻译的帮助才能工作,这也是我的苦恼。

普、扎:您的蒙语是在哪里学的?

黄:我在北京大学蒙语专业毕业。学生时代打下了理论基础。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时间没有讲蒙语,只是到了贵国以后才有实践机会。学习任何一门外语,只有在当地学习,经过长期的实践,才能学得好,这是我的亲身体会。

普、扎:您的夫人会讲蒙语吗?

黄:她不会。我教她一些简单的词汇。但因我会蒙语,她有依赖性,就不那么积极学了。

普、扎:您会打猎吗?

黄:不会。我对乒乓球更感兴趣。我吃过库苏古尔湖的白鱼,味道很鲜,鱼肉很有营养。

普、扎:您会做饭吗?

黄:还行。不过我的手艺一般,做太复杂的菜还不行。但我的两个儿子爱吃我做的菜。我夫人做饭当然不错。但夫人回北京后,我在这里别无他法,只有自己下厨了。这也好,这样一逼迫,烹调术还有所提高。这就叫做“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普、扎:您对什么艺术感兴趣?

黄:蒙古朋友能歌善舞,我已领教过了。我很喜欢蒙古长调民歌,也很喜欢听马头琴,很有韵味。我认为蒙古人除此以外,对学习语言,学习外语也非常有天才。

普、扎:您会什么蒙语歌?

黄:我只会唱一首《色楞格河》(唱了起来)……

普、扎:您是否在儿时经过艺术训练?

黄:学校上过音乐课,并没有专门训练。

普、扎:喜欢跳舞吗?

黄:跳得不好。可能我压根儿就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普、扎:在蒙古走了多少个省?

黄:加起来走了16个省。我想所有省都应该去,因为每个省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地理位置、风土人情都不一样。譬如,扎布汗省,我认为它在教育方面



有优势,由此培养了国家的总统。布尔干省牧业搞得好,其酸马奶品质最佳,全国有名。库苏古尔省环境特殊,有山有水有鱼,是旅游者向往的地方,“查腾人”(驯鹿者)的生活使人印象深刻,能耐零下50度的严寒,十分刻苦,令人敬佩。9月份去的库苏古尔省,已下了雪,冻得我直打哆嗦。在巴彦乌列盖省就像到了另一个国家。东方省则是农业出名,气候宜人,你看那黑黑的土地,是多么的诱人。总之,你们的每个省都各有千秋。我发现每个省的朋友都有“地方主义”,都在极力宣扬本省的优点,为本省的种种事迹和成就而自豪。

看来我在离任前实现走遍所有省份的愿望已不可能,但我很希望去一趟南戈壁省。听说那里别具特色,夏天十分漂亮,是个旅游的好地方。

普、扎:当然应该去。

黄:最后,我想通过贵报向蒙古人民表示最美好的祝愿,祝大家幸福美好,祝中蒙关系更上一层楼!



《二十年》

《日报》记者策伦皮勒 2003年6月19日写的访谈记

“如果出席500人参加的宴会,我要同其中的200人握手问好”,这是黄家骅亲口对我说的。这生动地比喻他认识我国人口的五分之二。这位先生从1973年开始涉足我国,此后在乌兰巴托呆了20年,在北京生活了10年,一直负责蒙古国的事务。由于这种原因,黄家骅先生能与我们零距离接触,感到分外亲切。能说一口流利蒙语的中国人60年前出生在遥远的热带地区——广东省。

他自小聪慧,有语言天赋。俄语学得很好的黄先生希望在大学学习中文,以便将来从事文学工作。但事与愿违,他被分配到蒙语班,就这样,他的命运开始与我国连结在一起。

他对我说,现在广东的天气十分闷热。广东是中国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摇篮,黄的家乡是属于古代南宋的属地。在这里出生的黄先生爱唱歌,会拉二胡,他还会唱《色楞格河》歌曲,他十分喜欢蒙古的曲调。一个朋友送给他一

个马头琴。他想学习弹奏,他有这方面的天赋,大概不难学。他还十分喜欢蒙古的蓝天和焖罐羊肉。

不过蒙古寒冷的冬天对他来说是难过的。他曾对蒙古朋友描述了在寒冬的寂寞和惆怅。是的,妻子在北京,两个儿子不在身边,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黄家骅作为南方邻国驻我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我国人民都知道他。他已完成了两任参赞、一任大使的公职,即将离任回国了。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满清的性格”,是敢于直接批评我们的少数大使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蒙古性格”。可以举个例子。他说,中国之所以来蒙古旅游的人不多,是蒙方的原因。你们的基础设施薄弱,公路不好,飞机票价又贵,去旅游点路途遥远,坐汽车很困难,并且旅客的安全又没有保障,警察对中国人采取区别对待的歧视性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会有很多人来蒙古旅游呢?他还说,你们连最起码的漂亮的宣传手册都没有。今年是蒙古的旅游年,希望你们为此多做一些事情。这是毫不吝惜的肺腑之言。除了黄之外,有哪位先生说这样的话呢?

在我国有些官员和大呼拉尔“高官”随便到台湾游逛,对此黄先生认为这是“没有远见之举”。黄解释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那里在搞“独立”,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去那里,将面临“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的问题。黄严正指出,中国的正式立场是任何国家可以与台开展经贸与文化科技的合作,但不能与其进行官方的政治来往。但我国的一些人打着“个人途径”的幌子到台活动。

统计数字表明,中国是蒙古贸易和投资的第一大伙伴。但大使先生提出应把投资搞得更好,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蒙方应作出更大的努力。

中国朋友正在积极参加我国的建设。他们在修建“千年之路”,建设乌兰巴托的许多建筑物。他们还在修建中央省额尔德尼县至乔依尔的200公里长的公路和阿尔拜赫雷214公里长的公路。此两条公路的款项由亚行和蒙古政府提供。亚行该给的已给了,但蒙方自己没有钱,造成有时修路工人的工资发不下来。大使先生提请蒙方注意此问题。

黄大使任职期间,我们两国的关系达到新的水平。中国胡锦涛主席刚刚访问了蒙古,把两国合作关系提到伙伴的地位。此前,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访蒙,我国巴嘎班迪主席、恩赫巴亚尔总理及前任几位总理都访问了中国。黄大使及前任大使们对准备与安排这些访问,做了大量的工作。黄大使开玩笑地说,曾到过蒙古访问的不少中国代表团成员回国后都提了职,这里是个“福



地”，他劝国内的朋友多到蒙古来访问。精通蒙语的黄大使是这样评价两国关系的：“60年代，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90年代初，两国关系正常化；现在应该说处于最佳时期。我是一个亲历者。”人们有理由称他为“中蒙关系的活字典”。他为自己对两国关系的改善所作出的贡献而自豪。他打算回国后撰写自己外交生涯的回忆录。

第二十二章

再见蒙古



接到调令

2003年8月13日,我到二连浩特市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中蒙边界第815号界标大型揭幕仪式并访问蒙古边境城市扎门乌德,于17日回到乌兰巴托。8月19日,我便接到外交部的调令。调令的内容是:高树茂同志已被任命为新任驻蒙古国大使,请黄家骅即照会蒙方征求意见(按照外交惯例,新任大使均需先征求驻在国的同意方可派出),并适时安排辞行拜会事宜,于10月上旬回国。

有一首歌的唱词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打起背包就出发”。《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唱段中有“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甘洒热血写春秋”这样一句话。这些唱词,是对我们这一代人一切听党的话,服从上级命令的写照。关于我的调离,此前已有所闻。随着“六十大寿”的到来,我已作好了离任的各种准备。

外交人员的轮换有这样一个惯例:参赞以下的各级外交官的到离任交接都在大使馆举行。即接任人先到馆。到馆后,离任人按规定同其进行交接工作。具体时间15天到20天不等。然后离任人离馆。大使则不同,离任大使先行离馆,新任大使得到驻在国同意后适时赴任(到任时间同与驻在国关系的程度有关,如关系密切,应尽早赴任),向驻在国国家元首递交本国元首关于派遣新任大使和召回原大使的国书。大使的交接工作在国内进行。

接到正式通知,我便开始安排离任工作。首先,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提出我离任拜会的计划,请同志们予以配合。



按部指示精神,我于8月20日约见了蒙外交部副部长巴特包勒德,提交了新任大使高树茂的简历,并同时提出我辞行拜会蒙方领导人、各部委负责人及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的计划。

9月11日,蒙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约见我,面交了蒙方照会,确认蒙方同意接受高树茂为新任驻蒙古国大使。我速将蒙方意见报回国内。

至此,新任大使到任前的外部“手续”已告结束。



辞行道别话友谊

从8月21日开始,转入辞行拜会的阶段。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我先后向蒙古政府各部委负责人、司局长、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及驻乌使节共80多人进行了辞行拜会。现将拜会期间写的日记的主要内容抄于后:

8月21日,向移民局长布彦巴德拉赫辞行,布宴请了我。布是我多年熟悉的好朋友。他精通中、俄文,曾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和北京外交学院学习、进修。80年代他在驻华使馆任随员时我们就相识。他曾在外交部任三秘、二秘,在呼和浩特蒙古总领馆任副领事,后任驻二连浩特领事办公室主任兼领事。在任国家移民局局长期间,布就我公民非法入境,我劳务、探亲等人员在蒙境内滞留或违法事多次同我和我馆领事部官员进行商谈,给予我馆许多具体的帮助与支持。席间,我们重叙友情,回忆过去,展望未来。布希我回国后继续为加强两国友谊而工作。我说,你是“蒙古籍的中国人”,女儿也会讲中文,我肯定,你迟早都会再来中国,我们一定有见面的机会。果然,2005年布被任命为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我们在北京重逢,倍感高兴。特别是当我得知,布在来京前,领导曾就派他去台北“代表处”当代表一事征求他的意见,他明确说不去台北,希望到北京驻华使馆工作。这种精神与勇气着实令人肃然起敬。

8月25日,向蒙古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海桑代博士辞行。海愉快地回忆起我馆同该所之间进行的学术交流和友好交往。我谈到被该所授予名誉博士称号的往事,再次表示感激。我们都认为,双方学术部门的往来对加深了解和

友谊有积极意义,希望以后延续下去。

8月27日,到国家宫向总统办公厅主任巴特赫希格和总统几位顾问辞行。巴对我几年来为加强两国关系所做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对我离任表示惋惜。他通报称,巴嘎班迪总统决定授予我“北极星”勋章。为此蒙外交部已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正等待中方的答复。巴还提到,总统的家乡扎布汗省亚流县经济发展缓慢,生活很贫困,希大使通过基金给予适当援助。我表示积极考虑。

8月28日,上午向农牧业部部长那桑扎尔嘎勒辞行。双方谈及开展农牧业合作问题。我表示两国农牧业部门开展合作还有很大潜力。今后在农作物种植和畜牧产品加工方面可开展合作。

下午向财政部部长乌兰辞行。双方谈及进一步落实中方的无偿援助问题。

8月29日,分别向蒙古法院大法官冈巴特和总检察长阿勒坦呼亚格辞行。阿检察长回忆了自己近期访华的感受,表示希望加强两国检察部门合作,再次邀请我检察代表团访蒙。

9月2日,向战略研究所所长莫洛木扎木茨退役中将辞行。莫是我馆的老朋友,曾任国防部长,多次同我馆外交官就国际局势、当前亚太地区重大事件以及中蒙双边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提出了有一定深度的见解。我曾多次宴请过该所的专家,听取他们的意见。

9月3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高陶布辞行。高原为总统顾问,也是我的朋友。会见时双方对两国关系现状表示满意。高希望我离任后“常回蒙古看看”。

同日,向宪法法院院长姜仓辞行。该法院是一个仲裁机构,在议会与总统出现分歧时进行仲裁,成员都是法律专家和权威。过去在外交场合认识了姜,他对中国近年来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表示有机会愿到中国访问,我答应予以联系。

9月4日,向教科文部部长仓吉德辞行。仓向我赠送了礼物——马头琴。我谈起原希在2003年蒙举行中国文化日事。他说,因今年互访代表团很多,他十分忙,建议文化日推迟至2004年举行。我表示赞同。

9月5日,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巴特巴亚尔辞行。巴谈及最近到中国访问的感受。并称两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的合作处于初始阶段,合作前景广阔。



同日,向环境部部长巴尔斯包勒德辞行。巴是现部长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提出两国开展防沙治沙方面的合作问题,希我协助联系中国一些公司同蒙方合作植树。10日,巴为我饯行。

当晚,出席总统办公厅主任巴特赫希格和顾问道勒高尔扎布、勒哈格瓦、那木海姜仓、巴亚斯嘎楞、达希泽维格在温都尔旅游点举行的欢送活动,气氛自始至终热烈友好。活动于下午3时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9时。宴会除备了中式小菜外,还准备了“焖罐羊肉”。首先,巴主任介绍了我就任4年来两国关系的进展及我的工作情况,评价我是“蒙古人民认可”的大使。我对任职以来主任及各位顾问对我工作的支持与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席间,大家畅叙友谊,引吭高歌。与我一同出席的夫人何思红和政务参赞王福康、商务参赞宋学军同蒙古朋友们轮流唱歌,并一起分别用汉语和蒙语合唱了《十五的月亮》和《东方红》,表达了两国人民友谊的心声,活动达到高潮。最后,双方互赠小礼品。

9月9日,蒙监督委员会主席扎布兹玛会见我,双方回顾了两国监督检查部门交往的历程,并回忆扎陪同我去他的家乡布尔干省访问的情景。

9月14日,蒙中友好县龙县全体领导到我馆与我话别。达瓦道尔吉县长再次感谢中国使馆对该县的援助、畅谈龙县与我内蒙古的联系以及两国人民的友谊。达授予我该县名誉公民证书,并赠送我夫妇每人一条哈达,一件蒙古袍。双方共祝蒙中友谊万古长青,最后我们夫妇穿上蒙古袍与朋友们合影留念。

9月17日,向蒙古民防局局长乌尔金少将辞行。乌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在蒙古遭遇灾害时给予的真诚与无私援助。双方称赞正在卓有成效地开展民防合作。

同日,向蒙古海关总署署长巴特尔辞行。巴谈到两国海关代表团互访及希中国海关援助一套检测设备的问题。25日,巴特尔署长设宴为我送行。

同日,分别向外交部服务局副局长勒哈木苏伦、多边合作局局长恩赫其格辞行。勒提到最近应中国外交人员服务局之邀到中国访问的情景,对中国的快速发展表示赞叹。会见时她们提到,外交部的司局是与中国使馆联系最多的部门,我在任期间,双方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我借此机会向蒙外交部深表谢意。

同日,向国家银行行长楚龙巴特辞行。楚称,两国金融部门合作已步入正轨,相信合作前景广阔。

9月18日,向外交部政策协调局局长巴特巴亚尔辞行。巴原为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是研究对日、对华问题的专家,著作颇丰,也是我的老朋友。他高度评价我在蒙古工作期间两国关系的进展,表示蒙古愿意参与亚欧会议和东亚峰会。他告诉我即将到驻华使馆任参赞,我表示祝贺,并约定届时在北京相聚。

9月19日,向蒙古交通警察局局长阿木格楞包勒德辞行。他对两国交警部门的合作表示很满意。向我赠送礼品。

同日,向民主党主席、前总理恩赫赛汗辞行。我重申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四原则,指出中共愿意继续发展同蒙各政党的交往。恩表示希望今年内能实现访华。会见时,恩还介绍了目前民主党、民主新社会主义党和公民意志共和党3个有实力的在野党已就明年联合参加议会大选达成一致。

9月20日,向蒙商会会长登贝尔勒及其助手辞行。登设宴款待我夫妇。登重申对我申办世博会的支持。他还谈了今后开展两国商会合作的设想。

9月22日,向广播电视局局长包勒德辞行。包指出,两国媒体的交流对发展两国关系特别重要。他感谢中国使馆对该局的支持与帮助。我对蒙古媒体多年来对发展中蒙关系及宣传中国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并祝他们在今后工作中取得更出色的成绩。

同日,向前总统奥其尔巴特辞行。奥愉快地回忆起他首次访华时我任翻译的往事。奥作为多次出席博鳌论坛的嘉宾,谈了对该论坛前景的看法。我表示希望他继续积极参与,为亚洲多边经贸合作作出贡献。

同日,向大呼拉尔秘书长鲁布桑扎布、外事司司长乔依道尔吉两人辞行。鲁、乔两位是议会机构中年富力强的“新秀”。我们就两国议会的交流及近期进行友好议员小组和常设委的互访交换了意见。鲁任秘书长后尚未访华,希尽早成行。

同日,向人革党总书记依德活赫腾辞行。依上任后同我馆交往很多,是我们的老朋友。见面时,双方回顾了近年来两国两党关系的新发展,祝愿两党关系更加密切。次日,依设宴为我夫妇送行。

9月23日,向大呼拉尔常设委主席奥其尔呼辞行。奥是我新近结识的一位经济专家。他向我介绍了今年蒙的经济形势及大选准备情况,并表示愿意到中国看看,我表示热烈欢迎。

9月24日,向蒙古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扎格德苏伦和国际奥委会委员玛格旺辞行,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他们对近年来双方体育界的交流及



中方对蒙方体育事业的支持表示满意和感谢。谈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扎·玛表示希安排双方运动员共同训练。我祝愿蒙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创佳绩。

同日，向乌兰巴托市长恩赫包勒德和其他领导人辞行。我宣布从大使基金为乌市建设投资年捐助300万图格里克（约合人民币3万元）。

同日，夫人何思红向议长图木尔奥其尔的夫人辞行。她是一名教师，与我夫人是同行。她表示希自办幼儿园。何也表达了希双方加强教育部门交流的愿望。

9月25日，向工贸部部长冈卓列格辞行。双方谈及以安民副部长为首的代表团刚来蒙参加两国经济科技混委会第8次会议取得的积极成果，双方均感满意。冈向我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称是授予此称号的第二个外国人）。

同日，夫人何思红到国家宫向原任全国妇女委员会主席的女议员格勒尔苏伦辞行。双方表示今后应促进两国妇女部门交流的开展。

9月25日，向副外长巴特包勒德辞行，巴设宴款待，为我送行。

9月26日，向国防部长古尔拉格查辞行。古部长设宴送行。

9月28日，向大呼拉尔主席（议长）图木尔奥其尔辞行。奥对我任期内的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称，大使是蒙古的好朋友，希离任后再到蒙古来访问参观，看看蒙古有什么变化。

同日，我向在议会中分别负责青年和妇女工作的议员呼尔勒苏赫、甘地辞行。

9月30日，与国家儿童宫主任依希朝克会见并辞行。

同日，向边防局长宋德布少将辞行。宋刚从莫斯科出差回国，还有7个小时的时差，但一定要立即为我送行。会见时，他的眼睛红红的，布满血丝。双方高兴地回顾了边界部门过去的诸多交往，共话友谊。他说，他是蒙古各部门中到中国访问最多的中层领导人之一，多年来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体会最深。两国边防部门坚决执行了各自领导的指示，使边界边防问题得到很好解决。我也深情地回忆起参加第一次边界联合检查工作的情景及与宋德布等老朋友所建立的情谊。我们祝愿两国边界永远成为友好、和平、安宁的边界。

10月3日，向蒙古体育运动中心主席普勒布奥其尔辞行。

10月6日，向外资局副局长奥特根巴特尔辞行。

10月7日，总理恩赫巴亚尔会见。恩回顾了兩國关系的积极发展，特别对经贸合作的发展给予充分肯定，对我任期内的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希望我

离任后继续为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努力和贡献。

离任前,蒙古劳动保障部、农牧业食品部、自然环境部、国防部、人民革命党领导委员会、乌兰巴托市政府等党政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分别向我授予26枚荣誉奖章、20多份证书和1份荣誉公民证书。我深知,这些荣誉不仅是我个人的,而是历任驻蒙大使们和使馆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我只是代表他们去接受蒙方的奖励。

从9月25日到10月7日,我向使团各位使节辞行。

首先拜会的是古巴大使莫兰·塔帕尼斯,在我离任后,他将接任使团长,我们进行了交接。同时我先后拜会了保、越、俄、韩、日、印、老、英、德、法、哈等国大使和联合国机构的常驻代表,向他们辞行。在蒙古,只有20多个使馆和外交机构,拜会起来还比较简单,若在北京有近200个外国使领馆,就要花费很多时间,只能有所取舍了。

经过近年的接触,我与不少大使都有交往,或是会见,或出席晚宴和招待会,共同语言较多。特别是日、越大使懂蒙文,交流更方便。我们经常就蒙古情况、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交换看法,结下了深厚友谊。辞行时,他们都回忆在一起相互交流的美好时光,对我离任表示惋惜。分手时相约日后在北京或乌兰巴托再会。

人们比喻说,外交官如同一只候鸟,国内一声号令,就要飞到祖国需要的地方。与外国外交官在同一个国家一起工作是一种缘分,正如《万水千山总是情》的歌词所说,“聚散也有天注定”,终究有分手的一天。越、老大使热情地邀请我退休后作为旅游者到他们国家参观。我想,以后如有机会,真想去他们国家看看。



主持最后一次国庆招待会

人们说,国庆招待会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国与驻在国关系的一个“晴雨表”。出席招待会的规格与出席人数可直接反映我与驻在国的关系的“冷”与“热”的程度。近年来,中蒙关系不断发展和加强,蒙古领导层出席我国国庆招



待会的规格都比较高,同美、俄等国举行的招待会规格与人数基本相同,有时甚至还高一些。

我对1999年赴任后历次国庆招待会蒙方领导人出席的规格作了一个记录,大致情况如下:1999年(五十周年大庆)议长贡其格道尔吉(总统下乡)出席350人;2000年议长额奈比希出席200人;2001年议长额奈比希出席200人;从2002年起,平年邀请对象稍有减少,总理恩赫巴亚尔出席150人。

2003年是一个平年,按部指示精神,规格与2002年基本持平。由于我即将离任,本来想将招待会与我的离任招待会合并在一起举行,经同各部门协商,认为还是单独举行为妥。

9月30日,我馆礼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出席招待会的蒙方人员近170人。议长图木尔奥其尔夫妇及3名部长、宪法法院院长、总长、副防长、副外长及6名议员出席。出席此次招待会的还有前总统、前总理、几位前驻华大使。我的许多老朋友也来到我们使馆。这种出席规格在平年招待会来说是相当高的了。我在招待会开始时按惯例致祝酒词,然后一一向主桌的各位领导人祝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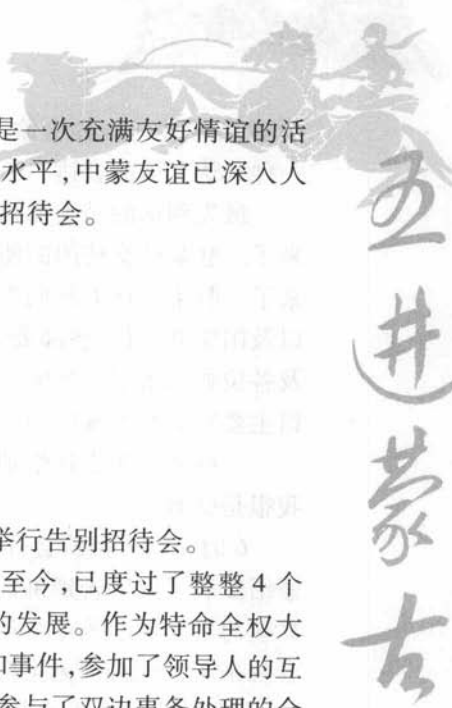
图木尔奥其尔议长对他最近赴华出席国际会议并游览了三峡表示感谢,盛赞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他还再次对我即将离任表示惋惜,希望我离任后继续为两国关系多做些实际工作。我感谢议长先生的评价,我说,长期在蒙古工作,使我有一个“蒙古情结”,我不会离开中蒙友好事业。他对此表示赞许。

几位部长主动同我交谈,对我这几年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对我要离任深表惋惜。

前总统奥其尔巴特、前总理扎斯莱回忆起当年访华的情景,并强调,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当前蒙中关系令人欣喜,我们的共同任务是要使业已建成的蒙中友谊大厦更加坚固。

我在政府和各非政府组织工作的蒙各界朋友在祝贺我国国庆的同时亦不忘与我道别。我告诉他们,为答谢蒙古朋友,准备在一周后再正式举行一次告别招待会。一些朋友称不久要出国或下乡,过几天来不了,分手时我们相拥并握别。

后来我发现,出席此次招待会的规格比平时高,究其原因是不少蒙古朋友得知我即将离任的消息,以为这也是我的告别活动,都千方百计赶来为我送行。我深深地感激他们。



招待会持续了两个小时,客人才陆续散去。这是一次充满友好情谊的活动。我们欣喜地看到,蒙中关系已达到历史上的高水平,中蒙友谊已深入人心,前景令人期许。这次活动后,我就积极筹划告别招待会。



惜别依依

10月7日晚6时,我和夫人何思红在使馆礼堂举行告别招待会。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从1999年8月31日赴馆至今,已度过了整整4个年头。4年来,中蒙关系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作为特命全权大使,我见证了两国关系正常化时期所有重大的活动和事件,参加了领导人的互访,代表国家同蒙方有关部门进行交往与接触,亲身参与了双边事务处理的全过程,同许多老朋友相聚,结识了许多蒙古新朋友,可以说我问心无愧地、较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王毅副部长5月访问蒙古时对我的工作予以肯定,说我“应该可以划一个圆满的句号”。领导的肯定使我甚感欣慰。

对于这场告别招待会,我作了精心的准备和安排。第一是拟邀请人员的名单由我自己开,规格和人数要求“从严掌握”。最高到部长级,不能超越国庆招待会。因为是最后一次告别会,邀请的主要人员以我的老朋友为主,以中下层人士为主,力求面宽一些,好让一些普通的蒙古朋友能有机会到我馆做客。同时,还要邀请华侨、中资企业人员、留学生代表,人数控制在80人左右。第二是招待会上为了表达我对朋友们的谢意,我准备作一个告别讲话。讲稿在一个月前已写就,并经反复推敲,字斟句酌,力求精练、准确地表达我的惜别之情。第三是菜肴要大众化,讲究节约,但量要足够,让大家吃饱。第四是礼堂的摆设要求新,从主桌到下面的餐桌,到两旁摆的椅子,到乐曲的播放、麦克风的设置,都要安排妥当,保证不出故障。如音乐,我要求轮流播放中国乐曲和蒙古乐曲,以烘托气氛。

下午5时40分,全馆同志刚到达等候厅,蒙古来宾就开始进场。外交上都强调出席活动要准时以不失礼。在我的记忆中,来宾如此早到馆的情况极



为罕见,从中可以体会蒙古朋友对我夫妇俩亲切的感情,这是超越外交礼仪的一种真挚友情的表达。

最先到达的是参加第一次边界联检会谈的老朋友们。外交部的各级官员来了。驻蒙外交使团的使节和首席官员来了。前总统夫妇来了。前总理夫妇来了。驻华历任大使们来了。接着,贸工部长、社会保障部长、宪法法院院长以及国防部官员、各部委的司局长、乌兰巴托市的领导来了。总统办公厅主任及各位顾问来了。旅蒙华侨、中资企业家和留学生代表来了。我和夫人及使馆主要官员在等候厅门口与来宾逐个握手,互致问候。

一些朋友为表达惜别之情,给我们赠送了礼品。常言道,“礼轻情义重”,我很是感激!

6时10分,招待会开始,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到麦克风前,先用汉语后用蒙语发表了以下告别讲话:

尊敬的蒙古国总统办公厅主任巴特赫希格先生,尊敬的各国驻蒙古使节先生,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

今天,我在这里举行离任告别招待会,承蒙各位光临,甚感荣幸。首先,我代表我和我的夫人对各位的光临表示最诚挚的欢迎!

还有几天我就要结束我的任期,离开我工作和生活了20年的美丽的蒙古国。在这个时候,真有点依依不舍。

30年前,1973年2月,我首次来到蒙古国,此后我五次来到贵国,一共工作了20个年头。20年来,我有幸亲历了两国关系的困难时期直至逐步转入正常化的全过程。

有些朋友说,蒙古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想这样的比喻有一定道理。我在故乡广东省佛山市只度过了17年的青少年时代,而我在贵国却工作和生活了20年。从我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学习蒙古语专业开始,我就与蒙古国,与蒙古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20年来,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民,这里的蓝天白云,像绿地毯似碧绿的草原,像珍珠般璀璨的羊群,都使我心旷神怡,倍感亲切。蒙古人民热情好客、朴实无华、真诚坦荡的性格和能歌善舞的民风,都使我永志难忘。

我参加过杨尚昆、江泽民、李鹏、胡锦涛等领导人对贵国访问的接待工作,在两国政治会谈中做过翻译,亲身体会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感受到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好情谊。

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我结识了从政府官员到各阶层人士等许许多多蒙

古朋友。我到过中央和地方 16 个省，同广大的蒙古群众深入接触，亲历了蒙古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以及走上民主化道路、进行社会经济改革的进程。

20 年来，我受政府的嘱托，为发展中蒙两国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增进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而努力工作。蒙古国总统给予评价并授予我荣誉勋章——“北极星”勋章，对此我表示深切的谢意。

在即将离开你们美丽的国家的时候，请允许我对在过去的岁月里给予我大力支持和帮助的蒙古国各位领导人、外交部以及其他部门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深信，即将接任我工作的新大使，中国大使馆的全体同仁将会一如既往地加强中蒙友好合作而努力工作，作出新的贡献。

最后，请允许我举杯：

为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为中蒙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为蒙古国和中国的繁荣昌盛；

为在座的各位来宾和同志们的身体健康、幸福美好；

干杯！

在我讲话过程中，整个礼堂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俗话说，“没有不散的宴席”，招待会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分别的时刻到了。额尔登楚龙外长、巴特赫希格主任等官员相继离场，我把他们送至大门口。然后，我们夫妇俩站立在礼堂门口，来宾们自然排成队，与我们一一握别、拥抱。一声珍重，一声嘱咐，暖我心田。我的好朋友，好伙伴，谢谢你们与会和嘱托，我会把这一份份真情永藏心中！



再见，乌兰巴托！再见，蒙古国！

10 月 9 日上午，也是我要离开乌兰巴托的头一天，蒙古留华学生协会的 4 名主席和副主席要求到使馆为我送行。他们是 7 日晚来不及到使馆参加招待会而特地赶来的。我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在这些人当中，除了巴特其米格等



我认识的年轻人外,还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小伙子,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已故前驻华大使、我的好朋友奥勒兹沃依的儿子。听到这里我心中充满感动。中蒙两国的友好关系不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的吗?!

年轻人思想活跃,他们对当前的两国关系发表了很好的见解,认为他们选择学习中文是明智的,今后肯定大有作为,决心要为蒙中友谊努力进取。我说:“我很乐意在离开蒙古之前见到你们这些年轻人。见到你们,我感到年轻了许多。你们是两国的未来,是我们希望之所在。两国关系的未来要靠你们去开创。谢谢你们为我送行。”我祝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好运。他们向我赠送了小皮画和邮票册。我说:“这些有蒙古特色的小礼品,我很喜欢,谢谢你们,我将好好保留在身边。”

10月10日清晨,我和夫人一大早就起床,再一次收拾和检查已整理好的行李,将宿舍所有家具和办公室用品再次整理停当。

10时半,我们走出使馆一层正厅。使馆同志们已在那里等候与我们告别。我们与这些朝夕相处的“同一战壕的战友”一一握手、拥抱、道别。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离开这个国度、这个城市,离开我生活和工作了多年的这个集体和我所熟悉的同事们、朋友们,心中真有些不舍和一丝伤感。这一别,应该是我外交生涯的结束,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再见,我可爱可亲的同事们,外交战线的战友们,我真的很感谢你们这么多年来支持和帮助。如果说我任内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与大家的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我完全相信,在大使馆这个“铁打的营盘”里将会不断创造出更加出色的业绩,在这个“战壕”里战斗的同志们将会为祖国的外交事业贡献出他们的全部青春和才智!

在布彦特乌哈国际机场,蒙古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扎尔嘎勒赛汗早已迎候在贵宾室。按外交惯例,过去使节离任,其他使节都要到机场送行,后来礼宾简化,使节们一般不到机场。不过古巴大使和越南大使还是到机场与我话别。我们按蒙古风俗喝了“上马酒”。

在机场等候时,总统办公厅主任巴特赫希格夫妇刚从国外归来即风尘仆仆地赶到贵宾室与我话别。对此,我十分感动,多好的朋友,多好的兄弟!我动情地说:“谢谢你们赶来为我送行。我忘不了你们,总有一天,我会再次踏上你们的国土,我们会再次相聚的!”

CA902 班机徐徐起飞。满载着同志们和朋友们的情谊,我离开了这片我所熟悉的蒙古土地,飞向祖国的怀抱。

古通》、嘎尔迪的《蒙古文化专题研究》、孟松林的《走进蒙古国》、蒙古国前驻中国二秘巴桑苏伦的《蒙古风俗与历史文化》等著作。这些专著给作者不少有益的启示。承蒙王占主席、韩英书记、张德麟大使、李举卿大使、朱耀廷教授、德博、白音吉尔嘎拉、常万隆、娜琳同志以及蒙古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布彦巴德拉赫先生阅读此书并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同时提供必要的资料，给予无私的帮助，在此谨表示诚挚的感谢！

内蒙古党委外宣办、政府外办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为我这本集子的出版提供了十分重要和宝贵的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我的夫人何思红几十年来一如既往地对我从事对蒙工作给予全力支持。儿子黄河、黄岳从小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为支持我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很大的牺牲，给予很多理解。我愿将此书献给他们。

今天，当我将此书送到亲爱的读者手中的时候，心中不免忐忑不安。诚恳地希望你们指出它的不足，提出宝贵意见。

作者

2008年10月于北京



后 记



2003年10月,我离开工作了20年的蒙古国,结束外交生涯,离任回国。

蒙古朋友对我五进蒙古的经历很感兴趣,建议我写一本回忆录。一些会中文的朋友还自告奋勇愿将我的书译成蒙文。回国后,亲友和同事也“怂恿”我动笔,认为把大家都觉得挺“神秘”的外交工作见闻写出来,可给人们留点什么。但我觉得自己只在一个国家长驻,孤陋寡闻,生活平淡,重大事件不多,没有“出彩”之处,怕写出来如白开水一样平淡无味,所以一直“按兵不动”,未下决心动笔。

退休后,闲余时间多了,40年来从事对蒙工作的往事总在心中萦绕,挥之不去,浓浓的“蒙古情结”终于使我动了“笔耕”的念头,在儿子们的鼓动下于2006年初开始动笔,断断续续,写了一年多,2007年7月完成了这本近16万字的《五进蒙古——驻蒙外交官二十年工作实录》一书的初稿。

“书到用时方恨少”。由于写作功力不足,越往下写,越感到吃力。直到写完此书,仍感到很不成熟,尚有诸多不足。

写这本回忆录的初衷是:回顾中蒙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重要访问的片断,忆述中蒙人民的深厚友谊;描写让我动情的蒙古国、蒙古民族;介绍外交人员所经历的酸甜苦辣。如果读者从拙作中能增加一些对蒙古国、中蒙关系及外交人员工作生活的了解,作者将感到万分欣慰。

在写书的过程中,参阅了张秀华的《蒙古族生活掠影》、郭雨桥的《郭氏蒙

责任编辑 赵英
邓池君
封面设计 张燕红

ISBN 978-7-81115-547-1



9 787811 155471 >

定价：45.00 元

D8